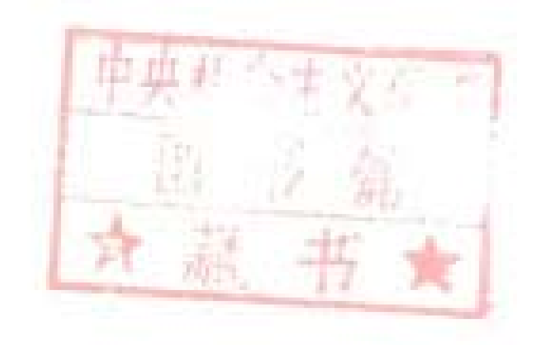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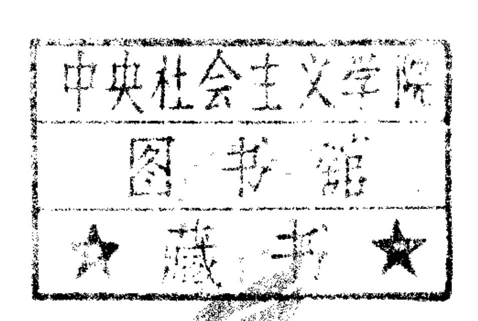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蔡百受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30

1961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3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321千

印数8,500册　印张12 1/8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1.4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 中译本序言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一部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

李斯特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历史学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居统治地位的学派，它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一方面又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斗争。十九世纪下半期又兴起了新历史学派，它成为当时庸俗经济学的主流之一，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反对马克思主义，它的学说也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历史学派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制度学派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1841年。当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地主贵族掌握着政权，国内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三百个减少到三十八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税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参加了。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可是国内政治上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工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从工场手

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怎样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李斯特的这部著作就是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需要而出版的。

英法资产阶级的主张是以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针对英法资产阶级的主张，李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并且创立了国家经济学来同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

李斯特理论体系的中心是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他的生产力概念中，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他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论是狭隘的，因为它只讨论“价值”，不注意生产力。李斯特的这些观点，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生产力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他对价值理论的不应有的轻视，因为如果没有科学的价值理论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

斯密、李嘉图从他们的价值理论出发，认为在别的国家中生产费用较低的商品，毋庸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的国家购买更为合算和有利。李斯特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本书第 118 页）向别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跌落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因此，“保护关税如

果会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本书第128页）我们知道，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落后国家的手段，斯密、李嘉图的说法显然掩盖了这种性质。

李斯特的保护关税主张是同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政策针锋相对的。但保护关税并不等于李斯特的全部政策主张。李斯特从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了包括实行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建议。例如，他主张实行专利政策，保护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他主张从国外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学习经营管理的方法；他认为有必要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主张制定各种经济立法，等等。尽管他错误地把宗教、政权、司法都包括在生产力概念之内，认为法官和行政官员也是生产力，但他的有关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建议却有利于德国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工业落后的德国赶上工业发展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又与古典学派的学说截然不同。

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各国都只生产生产费用比较低的商品，其他商品向别的国家购买，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而实现这种分工只须经由自发的自由竞争，国家不要干预。李斯特认为，这种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错误地以“将来才能实现”的世界联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李斯特提出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只有每一个国家都达到了它们可能达到的阶段，并“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本书第109页），国际间的自由竞争才对一切国家有利。他认为当时德国正处在农工业时期，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依靠国家采取一些具

体的政策措施扶植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关税政策。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有什么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有所谓国家经济学。国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提出“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本书第106页)

李斯特与古典学派之间的这场争论反映了英法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在英法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差别不大，谁也不能操纵国际市场，但是为了防止外国的工业品侵入本国市场，英法资产阶级曾经觅取国家的保护。产业革命以后英法工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资产阶级也有了充分的力量来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因此他们放弃了保护贸易的主张，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在这时德国的工业技术却落后得多，资产阶级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比工业发展初期的英法更加需要保护关税制度，因为这样，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就特别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

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为英法资产阶级夺取国际市场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他们在考察经济问题时运用了抽象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客观规律(比如价值规律)具有普遍性，这在经济科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李斯特从德国一国的情况出发，强调研究各国的历史特点，反对抽象的理论分析，这就使他沉陷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和表面的经济现象当中，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李斯特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的论点，就是从表面现象出发的，它只看到了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消长，而没有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本质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它不可能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真实变化。从

李斯特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否定一般经济规律，用错误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等方面来看，李斯特经济理论中的庸俗性是明显的。

另外，李斯特所谓当资本主义各国达到了高级阶段，它们就可以建立起平衡发展、和平合作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也是不符合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一种绝对规律。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就越严重，各国的利害冲突也就越发激剧，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所设想的德、法、英、美等国的平衡发展。李斯特自己也早就说过，未开化民族和热带国家不能超越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只能处于殖民地的地位，而德国则具有一切优越的条件，应当运用国家力量拥有大量殖民地，并且应当吞并比利时、瑞士、荷兰等邻国，以便尽快地过渡到最高阶段。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和平合作，而只是殖民主义、兼并原则在主宰一切；国家也已经不作为保卫民族独立的手段，而是实行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工具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斯特的所谓国家经济学是以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中心的一种经济学。正如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李斯特是把阶级利益假托为国家利益的。在这个争论当中，李斯特和自由贸易论者一样都是以人民利益代表者的姿态出现的。古典学派说，实行自由贸易有利于全国人民，可以使工人得到“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李斯特却说，“在保护制度下使国内工业有了保障，国内市场由此获得的利益是人人可以自由享受的。”（本书第 148 页）工业发展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增加了，农产品的价格、地租和地价随着提高，工人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本书第 325 页）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劳动人民的支持而散布的，它们掩盖着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私欲。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都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体系，采取这种政策还是采取那种政策取决于资产阶级所

处的历史条件，但是资产阶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本身的利益。恩格斯说得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① 因此，对于工人阶级，问题不是在于选择哪一种政策，而是如何从资本的奴役下获得解放。

李斯特是十九世纪中期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家，而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的。这种软弱性也反映于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中。例如，在德国地主贵族阶级势力强大的情况下，李斯特只主张对工业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反对对农产品的进口征收保护关税；又如，由于资产阶级害怕人民力量壮大，不敢提出消灭封建统治的任务，他们只想争取建立地主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共掌政权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斯特就不敢明确提出反对地主的高额地租，而要强调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有利于地主和农业经营者(第20、34章)，以便说服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工业化。尽管这样，李斯特所宣传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还是遭到了普鲁士地主的反对，李斯特本人也受到了迫害。

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不仅是用来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而且是用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悲惨的境遇，当时工作时间没有限制，工资十分低微，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也在德国传播开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李斯特极力强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的"危害"作用。他说："也许世

①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8页。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专制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1] 为了有效地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李斯特在这本书里强调要实现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制度”。他说:“一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本书第16页)“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本书第98页)以上这些主张，对于德国由封建制度加速地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了，李斯特的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一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科学，从而否认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他的国家经济学中，他把他的生产力理论同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学说，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国民经济部门的变迁，而撇开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因素。在他的“国家”中，各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紧密合作，一切阶级矛盾都消失不见。李斯特的理论，对于德国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历史学派的庸俗经济学就是承袭并发展他的这些庸俗观点而形成的。

李斯特的理论和他的保护关税的主张，在解放前对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曾发生一定的影响。早在1927年他的这部著作就曾在我国翻译出版(书名为《国家经济学》)。翻译出版李斯特的著作，反映了当时某些人士依靠国家的保护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愿望。但是，旧中国的情况和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德国有很

---

①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

大的不同。当时的德国缺乏民族统一，统一的国内市场刚开始形成，因而李斯特创立了保护关税政策，对内是要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外又是要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两国一争长短。中国的情况则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这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关税不能自主，也正是国际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中国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的手掌中倡议保护关税政策，在实质上是不会触动帝国主义的一点利益的。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企图依靠保护关税政策来求得中国的独立富强，这显然是一种幻想。

胡 企 林

1980年9月

# 目　录

# 英譯者序

大約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作品在德国出版并广泛流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駐柏林記者就本书当时在德国所发生的有利于采行保护貿易政策的巨大影响，及时地写了一篇評論。

最初引起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的，就是他的經济学說这种在实际影响上的确凿現象。經仔細閱讀了他的著作以后，使我感到有譯述这本书的必要，这是为了让英国讀者有机会自己来判断李斯特的說法是否正确，論据是否可靠。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历史、理論、学派和国家經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說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現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稅制还沒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較輕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們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因此乍看起来，把叙述与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讀者的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錯誤。但是李斯特所闡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們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慮，其間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論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論点对保护制度原則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語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則，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經营者和商业經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則，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

則的闡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

我們看到李斯特学說的基本概念，是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由輸入，輔之以本国工业对抗外国竞爭时有效的、但不过分的保护(借助于关税)。按照他的見解，要支持本国农产品及原料的生产，最有效的办法是使在这样保护下的繁荣的工业繼續存在。由此可見，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与英国所采行的片面自由貿易下无条件自由輸入的制度不同，另一方面与俾斯麦首相目前所显然贊同的对食物、原料以及工业品輸入一概征收保护关税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眞正的"政治"經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經济学两者之間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綫；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貿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四十年，但实际上还沒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有害的謬論世界主义学說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尝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絕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贊賞，热烈主張英德两国結成联盟。"英国和德国，"他說，"在东欧問題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国为了密謀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德国在商业上、經济上的进展，以致为了次要的貿易利益而牺牲了最高政治目标，对于这种目光短淺的商店主政策，它将来是一定要感到后悔的。"他还写了一篇簡短而有力的論文《关于英德联盟的价値及其必要性》，向英国政府和普魯士政府有所建議。

我翻譯这本书时力求忠实于原作的內容。关于原作的一些繁冗之处既沒有試图有所节略，对于原作的風格也沒有擅自有所改动，原文中用斜体或大写来加重語气的地方也悉仍旧貫。有些人对李斯特論断的一部分或全部是准备接受的，这些人在我們国家

或者还不在少数，他們是一定喜欢将他的学說和論据不加修飾，不加竄改，照原样表达的；有些人是反对他的学說的，他們大概也是願意看到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有智力的創导者对世界表达他的意見时所用文字的本来面目的。

劳埃德，1885 年。

# 著者自序节录

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理論的眞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錯誤以及发生这类錯誤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討；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来，直到現在，已經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間。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見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記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經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經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問題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門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滿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經济政策才能实現，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給他們。流行学派所告訴我們的是自由貿易原則。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間的关稅，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顛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則显得是与常識相調和一致的，也是被經驗所証明了的。但是拿破侖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現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視；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識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論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貿易原則时，这个理論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覚的是流行学派并沒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顧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

家，要在彼此自由竞爭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現。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卽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須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爭。总之，我发現世界主义經济学与政治經济学两者之間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須取消国內关税，采用統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們的商业政策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

1819 年，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是有关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与策划。君主和臣屬，貴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学者，他們所忙着的都是这件事。德国就象遭过了一次战爭破坏以后的一座家园，以前的家主回来了，一切都想重新动手布置起来。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旧章，甚至在每一个細节上都主張照原样不动；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彻底改用現代装备；还有一些人則常識与經驗两者并重，希望走中間路綫，使过去的主張与現在的需要相配合。到处是意見上的矛盾和冲突，到处是以促进国計民生为宗旨的团体和組織。国会宪法本身就是草創的，是在仓猝中拟就的，多数有知識、有思虑的政治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粗具規模的雛型，此后可望逐漸加以改进。宪法中有一条(第十九条)显然为建立国家商业制度留下了余地。我认为这一条为我們祖国今后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基础，由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組織一个德国工商业协会，目的在于取消我們的国內关税，使德国全国能采用統一的商业政策。这个协会最初怎样生根，怎样导使开明的、胸怀磊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統治者采取一致行动，随后又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顧問，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員，所有报紙編輯，所有关于政治經济学

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稅制都认为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們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經營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費"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輿論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萊比錫和法兰克福，出現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聞記者和报刊社論作者投入陣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統一保护稅制的"不合理願望"加以譴責，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顧問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詆毁；例如，他們說这位顧問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經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經济理論以及德国学者們的見解原来是站在他們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說話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一場斗爭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經过細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論，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議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錢。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沒有錢，內部分裂，意見分歧，絕对缺乏理論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辯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識到价值理論与生产力理論之間的区别，认識到流行学派从資本这一名詞所引起的錯誤的論証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間的差异。由此发現了这个学派論証錯誤的症結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貿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証明工业品自由貿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說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

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訓。随后我又訪問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經济学我們可以讀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現实生活。在那里我們看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現在我們眼前——由純粹狩猎生活进而飼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經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輸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沒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我认眞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現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經驗和思考的結果作了比較。

結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个学說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它可能还显得怎样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訓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論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經济学能够为每一个有教育的人所理解。政治經济这門科学，过去由于学者們的过分夸張，由于其間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詞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識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說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說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間的中介体，我的理論体系的整个結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我曾一度有些迟疑不决，是否应将我的学說体系称作自然体系政治經济学，有一位朋友从旁劝阻，他說有些粗心大意的讀者对这个名称难免要发生誤解，认为我这本书所說的只是变相的重农主义。

流行学派对我曾加以誹謗，說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复所謂重商主义。但是讀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在我的理論中对于那个备受責难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采納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它的謬誤之处則一概摒弃；就是关于所采取的那些有价值部分，采取时的依据也与所謂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的；我又就那些来源中关于世界主义学派所一再竭力主張的論点初次作了駁斥，关于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意带双关的名詞的使用以及不合邏輯的論証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論，初次加以揭露。

这里对于各个作家或整个学派的意見和著作加以駁斥时，如果所使用的言詞有时显得过于激烈，那么要曉得这幷非出于个人的狂妄夸誕。我认为我所駁斥的一些見解是有害于公众福利的，因此必須加以严厉的抨击。而且声望卓著的作家，他們錯誤的危害性比声望較差的更大，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駁斥就不能不更加严厉。

各方对于我的批評有些是耿直的，幷不是輕率的，例如关于論証时要点叙述的重复，对这方面的批評我应作一些解釋。凡是研究过政治經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門科学里，所有各个論点总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其听任某一点含混过去，不如把它重复十次，这比避免重复的办法要好得多。我沒有仿照时下的風气多所引証。但是可以說，我所讀到的多于我所引証的何止百倍。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里可能发現許多缺点；不仅如此，就是让我自己現在来重写一遍，有許多地方也許还可以写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情形尽管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仍然可以找到許多东西是新的，是千眞万确的，而且特別对于我的祖国，德国，多少是有些利益的。

# 第一編　历史

## 第一章　意大利人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工商业方面所处地位，再也沒有一个国家能够象意大利那样有利的。粗野横暴的行动幷沒有能完全摧毁古罗馬的文化和文明。那里的耕作方法虽然拙劣，但气候溫和，土地肥沃，为广大人民产生了丰富的食料。最不可少的艺术和工业，仍然象古罗馬地方自治制度一样地保存着，很少受到破坏。沿海一带漁业发达，到处都足以培养海員，沿意大利漫长海岸綫的航运使它內地运輸設备不足的情况大大地获得了补償。它与希腊、小亚細亚、埃及相近，海上交往頻繁，使它对东方貿易获得了特有便利，这类貿易以前范圍虽不广，是經由俄国与北方的各国进行的。由于这样的商业活动，意大利就势所必然地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化保存下来的許多知識、許多艺术和工业。

从意大利各城市在鄂图大帝（Otho the Great）下获得解放时起，就証明了在历史上今古相同的一个公例，自由与生产事业两者总是分不开的，虽然它們出現的先后往往有参差。不論在哪里，如果工商业有了发展，我們就可以断定，在那个地方自由的获得已为期不远；否則，如果自由的旗帜已經在那里飄揚，也就可以断定，那里的生产事业迟早将获得发展。个人如果获得了物质或精神上的財富，他就要想把他所获得的遺留給后代，就必然要努力争取这方面的保証；否則如果他已获得了自由，他就必然要傾其全力来改善他的物质和精神状态。这样的演变是再自然也沒有的。

自从古老的自由国家瓦解以后，意大利城市那种自由、富裕的社会的燦烂景象，就再度涌現于世界舞台。許多城市，許多地区，先后上升到了繁荣状态，并且由于十字軍活动，在前进道路上更加受到了强有力的刺激。十字軍战士以及他們装备和軍需的运輸，对意大利說来，不但有利于它的海运事业，而且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与东方建立了商业关系，从而傳入了許多新的生产事业、新发明、新植物品种，还使它学会了許多新的享乐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統治的压力趋于衰弱，在許多方面势力減退，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土地耕种两方面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佛罗倫薩，次于威尼斯和热那亚，它的工业与貨币兑換业的发展特别显著。当十二及十三世紀，这个城市的絲織业和毛織业已經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同业公会是参与国家政务的，共和国就是在它們的影响下組成的。单单一个毛織业就拥有二百个工厂，年产毛織品八万匹，原料是从西班牙輸入的。此外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輸入未經加工的毛織品年值三十万金季尔盾(gulden)，[1]在佛罗倫薩加工以后再轉运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佛罗倫薩是意大利全境的金融中心，有八十个銀行机构。[2]它的政府岁入达三十万金季尔盾（合我們現在的貨币一千五百万法郎），比那个时候那不勒斯或亚拉岡(Aragon)王国的收入要多得多，比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列顛和爱尔兰并計的岁收也还要多。[3]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十二与十三世紀时是具有国家經济繁荣的一切因素的，在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对别的国家来說，它的农业和工业是起着示范作用的，是仿效

① 季尔盾即福林，是十三世紀时在佛罗倫薩創鑄的金币，重五十四喱，一时德、法、匈、奥等国均通用——譯者。

② 德·萊可呂斯:《佛罗倫薩的兴废》，第23、26、32、103、213頁。

③ 貝奇奥:《意大利政治經济史》。

的动力。它的路政、运河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銀行制度、航用罗盘、改进的造船技术、汇兑制度，还有許許多多极有用的商业习惯和商业法規以及市政和政治制度的大部分，都是独步一时的，文明世界在这些方面都是沾了它的光的。它的商业、海运和海軍在南部海洋一带是占絕对优势的。实际上它据有全世界的貿易，因为除了比較不重要的一部分貿易在北部海洋进行外，貿易的主要活动領域当时是以地中海与黑海为限的。它以工业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供給一切国家，一方面向它們購入原料。但是意大利这样煊赫一时，却独独缺少一件东西，因此使它不能达到象今天英国这样的地位，因为它缺少了这件东西，所以一切别的繁荣因素都如風卷殘云，一霎时化为烏有了；它所缺少的是国家統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意大利的許多城市和統治势力幷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成員而存在着的，而是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一直在进行着互相殘杀、互相破坏的。它們一方面对外进行着战爭，一方面各自的內部也进行着冲突，民主、貴族、专制各种势力更迭起伏。这类冲突对于国家已具有莫大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外邦的侵凌，由于內部教門势力及其破坏影响而危害更大，从而使意大利各自为政的集团相互間形成了两个敌对派別。

意大利怎样自取灭亡，从它沿海各邦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阿馬斐（Amalfi），起初是旣强且盛的（从八世紀到十一世紀），[1] 它的船舶遍布海面，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所流行的全是它的貨币。它所拟具的海上法是最切实用的，当时地中海各口岸都以此为准繩。十二世紀时它的海軍势力为比薩所摧毁，而比薩又亡于热那亚之手，然后热那亚自己經过了一百年的斗爭，

① 阿馬斐当全盛时代有五万人口。航用罗盘的发明者夫拉維歐·基欧就是那个地方的公民。那本对德国的自由和精神为害非浅的古籍《罗馬会典》就是在阿馬斐受到比薩人劫掠时（1135 或 1137 年）发现的。

終于被威尼斯所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傾覆，似乎也是間接由于这种目光短淺的政策。如果意大利的海軍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那就不但足以維持它在希腊、小亚細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优势，而且它的势力可以不断扩大、加强，一方面还可以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进展，防止它在海上的劫掠，同时关于好望角繞道与葡萄牙进行竞爭也并不困难。

但实际的演变絕对不是这样，威尼斯只顧保全自己，結果自己也不能保全，它受到了它兄弟之邦以及邻近的欧洲强国的攻击，終于崩潰。

如果意大利的陆軍力量能够有組織地联合起来，要保卫它自己的独立，反抗强邻的侵略，并不是件难事。它于 1526 年实际上也曾組成这样的联盟，但只是情势确已危急时一种临时的防御措置。这个联盟的領导人物以及各成員之間总是貌合神离，甚至互相傾軋；就是由于这一点，使米兰終于被征服，托斯卡那共和国終于瓦解。意大利工商业的崩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①

威尼斯不論在它的早期或晚期，总是想单独地自成一国。当它只是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着交道时，它要通过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保持它工商业的优势，并沒有什么困难。但是統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一朝出現在政治舞台以后，情势就立即非常明显，威尼斯这时显得仅仅是一个城市，它的貴族政治不过是地方性的。固然它征服了几个島，甚至也征服了几处辽闊地区，但它只是把它們作为征服区域来治理的，因此(根据一切历史紀录証明)每次的征服，不但沒有能增强，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① 由此可见，破坏意大利工商业的是查理五世，尼德兰和西班牙的情况也是这样。从他开始，把貴族看成是一个特权阶級，貴族經营工商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这种想法对国家生产事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他以前，一般的见解适得其反；例如梅迪奇一族掌握政权以后很久还經营着商业。

当此时期，这个共和国所賴以壮大的那种內在的精神意志已經逐漸消失。威尼斯所以能达到富强，是爱国、英勇的貴族政治的成就，这种貴族政治是由发奋有为、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产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这种活力在貴族政治的爱国心、智慧与勇敢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富强局势才能存續并加强。但是貴族政治后来逐漸蛻化为专横的寡头政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受到了摧殘，随着这种情势的演变，富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基础已經不复存在。①

孟德斯鳩曾这样說："一个不能自主的国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爭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个自主的国家則志在于繼續爭取而不是保持現状。"②这句話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現状，不求进取，結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漸降落，終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爭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沒有。当与东印度群島通商的新路綫发現以后，威尼斯人在那个地区的商业可能要受到排挤，但是他們对于这一点直到有了实际經驗方才感覚，事前竟从未想到。世界上别的国家所已經看到的，他們非但沒有看到，还不能相信；当新路綫已經发現，情势已經有了变化，他們已受到了損害时，他們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綫，設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綫。这时要在竞爭中爭取胜利，只有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巧妙地适应新形

① "这些貴族們旣未尝为祖国流血，也沒有輝煌的战績使国家提高威信，扩大版图，只是安富尊荣，坐享租稅；在这种情况下人們就不免要发生疑問，为什么有許多优秀的威尼斯居民他們自已不能在这个共和国当家作主呢？"（达律：《威尼斯史》，第4卷，第18章。）

② 《法的精神》，第192頁。

势，而他們却想使用一些小小的阴謀詭計来維持現局。当他們最后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經丧失，眼看到东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的財富不再流入他們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里斯本时，他們就象那些傻子、那些敗家子一样，想乞助于炼金术。①

当这个共和国成长和发展时期，在“功勛录”(the Golden Book)上获得題名，就被认为是在工商业或在軍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种表揚。当时这种荣誉对外国人也是开放的；由佛罗倫薩移入的最出众的制綢者也荣获題名，就是一个例子。② 但是自从认为荣誉与国家公务是貴族阶級的世襲权利以后，这个記录簿就不再启用。后来人們认为对于衰弱、劣蹇的貴族政治有給与新生命力的必要，这个記录簿又重新开放。但是在簿上获得題名的主要資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样的对国家作出的貢献，而是財富与高貴門第。結果获得題名这件事的荣誉性漸漸丧失，不再受人重視，以致整整經过了一个世紀，在记录簿上也沒有发現任何新題名。

如果我們从历史上来檢查一下这个共和国和它工商业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无能的貴族阶級的愚昧、頑固和懦弱以及陷于奴隶地位的人民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即使繞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沒有发現，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轍，不外是国家統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內教門的統治以及在

① 有个人叫作馬科·布累撒丁諾，实际是一个騙子，他自称有炼金法术，受到了威尼斯权貴們的欢迎，当时竟把他看成是一个救星。(达律:《威尼斯史》，第3卷，第19章。)

② 威尼斯，正如荷兰与英国后来所执行的政策那样，利用了一切机会把外国人的工业和資本吸引进来。例如卢加的天鵝絨与錦緞制造业在十三世紀已經很发达，那里的絲业生产者由于不堪暴君卡斯特罗綽·卡斯特拉卡尼的压迫，曾大批移入威尼斯。(桑度:《威尼斯史》，第1卷，第247—256頁。)

欧洲更加强大而統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不难一眼看破，現代工商业国家的商业政策不过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样葫芦，只是在規模上有所扩大(即扩大为全国性的)而已。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在不論哪一种情况下，所保护的总是本国的船舶、本国的工业，所防御的总是外国的船舶、外国的工业；从外国輸入原料，以制成品輸出国外，总是一个妥善的政策；这些，在那末早的时期就已經奉为对外貿易的准則了。[1]

近来有人为絕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貿易原則辯护，认为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护政策。这个說法所含的眞理很少而錯誤却很大。如果我們平心靜气地考察一下威尼斯历史，当可看出，就它的情形来說，正与后来范圍較大的国家情形相同，国际貿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无限制的自由貿易对于这个共和国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从仅仅是一个农村的地位上升到商业强国，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仍然对它有利，因为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优势。但是当它的工业力量已經有了发展，已經处于优势地位时，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不利了，因为由此使它与一切别的国家的竞爭处于隔离状态，这就要发生懈怠情緒。所以眞正对威尼斯有害的，并不是保护政策的采用，而是当采用的理由已成过去以后，对这个政策仍然坚持不舍。

因此，上述为自由貿易作辯护的論据有一个重大的錯誤，它沒有考虑到世襲君主制各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是一些地区和島屿的統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当它上升到工业强国

① 西斯蒙第：《意大利各共和国历史》，第1部分，第285頁。

的地位时，还是同别的意大利城市在进行着竞爭；只要具有統一力量的、完整的国家还沒有对它展开竞爭，它的禁制性商业政策就是絕对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势有了变化，这些大国同它展开了竞爭以后，这时它除了使它自己成为統一的意大利的首脑，使它的商业体系囊括整个意大利国家以外，就再沒有别的方法可以維持它的优势地位。从来就沒有一种商业政策能使一个单独的城市对許多統一的国家长期保持商业优势的。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就这一例証可据以反对今天的商业保护政策这一点而言）中，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恰恰就是这一点——一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爭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还有，任何国家，借助于保护政策，据有了工商优势，达到了这个地位以后，就能够有利地恢复自由貿易政策。

关于上述論爭以及牵涉到国际貿易自由这一問題的一切其他討論，往往会有一种誤解，这种誤解是許多錯誤論点发生的根源，这就是对于“自由”这一名詞的誤会。当我們談到貿易自由时，我們心目中的自由是与我們談到宗教自由或內政自由时一样的。因此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們就感到特别需要維护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貿易”就成为一个通俗名詞，而对一国范圍以內的貿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間的貿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区别了。然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淵之别。国內貿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貿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貿易自由，它的結果甚至能使国家淪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以后談到波兰的情况时当有所說明。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鳩說得很对，“商业在自由国家里所受到的限制最大，而在专制政体下所受到的限制則最小。”[①]

① 《法的精神》，第20卷，第12章。

# 第二章　汉撒商人

当經营工商业的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意大利已經有了充分发展，已經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弥漫于日耳曼，并在北海沿岸一带树立起了新的基础时，意大利各城市最偉大的解放者亨利一世就开始发动建立新城市，一方面扩大古罗馬屬地旧址和他直轄領土中原有的那些旧城市。

亨利一世和他的后继者，正同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一样，都把城市看作是能抵消貴族政治的势力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国家最大的財源，是国防的新基地。这些城市，由于与意大利各城市有商业关系，由于对意大利生产事业的竞爭以及它們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制度，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久就实現了高度繁荣与文化。和平相处的同胞生活形成了在艺术上、工业上的进取精神，也产生了在財富上、事业上爭取成就、出人头地的热烈願望。物质財富的增进，反过来又激起了在提高文化、改善政治状况上的努力。

北日耳曼沿海城市是强盛的，具有朝气勃勃的自由精神，欣欣向荣的生产事业，但不免要受到由陆上与海上来的盜賊的襲击，因此感到有进一步相互团結以謀共同防御的必要。1241年，汉堡和律貝克(Lübeck)两个城市就在这样目标下締結了同盟关系，以后参与这个同盟的陆續增加，到了那个世紀将近結束的时候，所有沿波罗的海与北海，也就是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来因河一带比較重要的城市，都已加入（当时加入这个同盟的共有八十五个城市）。这个联合机构取名“汉撒”(Hanse)，在低地德語中，它的含意就是联合。

汉撒同盟成立以后，人們很快就看到由此形成的团結力量对

个人事业会带来多大的利益，因此立郎制定了一个商业政策，从而实現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他們并认識到任何强大力量要想創立并保持广大的海外貿易，必須具有保卫这个貿易的手段，于是創立了强大海軍；他們又进一步认識到，任何国家海軍力量的强弱程度是按照它的商船与漁业規模的大小为比例的，这就促使他們制定了一个法令，凡是屬于汉撒同盟的貨物应严格限制用汉撒船舶装运，并建立了大規模的海上漁业。汉撒同盟的航海法以威尼斯的先例为藍本，而英国的航海条例却是从汉撒同盟那里学来的。①

英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先行于它的那些海上优势掌握者的一种模仿。然而当英国长期議会制定航海条例时，却认为是一个創举。亚当·斯密在他对这个条例的評論中，② 关于类似的限制在当时的几世紀以前在不同場合已試行过多次这一点，似乎并无所知，或者是避而不談的。英国議会曾于 1461 年提出該項建議，被亨利六世拒絕，随后詹姆士一世提出了类似的建議，又被議会拒絕；③ 实际上在这两个建議很久以前（在 1381 年）理查德二世就曾施行过这类限制措施，不过施行以后不久即告失效，漸成陈迹。显然，那时这个国家关于这类法令的执行，时机还沒有成熟。有些国家自己感到极宜于发展工商业，在这方面前途大有可为，以这类国家而言，航海法令就同有关保护本国生产事业的别的措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美国，远在它完全获得独立以前，就因詹姆士·麦狄孙的建議，对外国船舶运輸实行限制政策，由此取得的效果（在下面的一章里将提到），决不亚于英国在一百五十年前在同样政策下所取得的效果。

① 安德森：《商业的起源》，第 1 部分，第 46 頁。

②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4 卷，第 2 章。

③ 休謨：《英国史》，第 4 部分，第 21 章。

北欧各国对于与汉撒商人发生貿易关系时所获得的利益，具有深刻印象。通过这类貿易活动，不但使它們本地区內剩余产品获得了出路，不但可以用来换取比它們本国所产的好得多的制成品，而且通过进出口税收，还可以使国庫充裕；①它們的人民原来是偏于怠惰、放蕩的，由此学会了刻苦耐劳的习慣。因此当汉撒商人在它們的国土上設立国外商业代理处时，它們就认为是好运临头，尽量給与各种方便和利益，竭力表示欢迎。英国国王在这一点上表現得更为突出。

英国的商业（休謨說）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②的手里，亨利三世特为这些东方人設立了一个机构，給以特别待遇，所有别的外商須受到的限制以及应納的进口税，他們一概免除。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商业还完全沒有經驗，因此从爱德华二世起，汉撒商人就在“天秤商人”（Merchants of the Steelyard）的称号下壟断了这个王国的全部对外貿易。他們經营商业时完全使用他們自己的商船，因此那时英国的航运业陷于极度衰落状态。③

有些德国的也就是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了长期商业关系

---

① 那个时候英国岁入中出口税多于进口税。但是輸出自由、輸入（制成品）征税的办法所体现的却是国內工业的发达与国家政治的开明。那时北欧各国家和政府，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大致处于与现在土耳其政府相似的阶段。土耳其政府最近才签訂的商約，訂明对原料与制成品征收出口税不超过百分之十四，进口税則不高于百分之五。这种明白表示以收入为主要目的的财政制度，在那里还在继續施行中。那些主张或追随这样制度的政治家和政論家們应当到土耳其去；在那里他們一定会受到称許，认为是眞正站在时代前列的。

② 从前在英国，人們称汉撒商人为“东方人”或东方商人，使他們与来自西方的、即比利时与荷兰的商人有所区别。“英鎊”（“sterling”或“pou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因为从前在英国流通的全部是汉撒同盟所发行的貨币。

③ 休謨：《英国史》，第35章。

以后，終于在1250年接受了英王的邀請，在倫敦設立了一个国外商业代理处，定名为"天秤"(The Steelyard)。这个机构名盛一时，最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生产事业方面具有极大势力，但是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从它成立起直到最后解散止計三百七十五年的过程中，充滿了热烈的、历久不衰的冲突和斗爭。

英国从前与汉撒同盟之間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間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間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輸出的是羊毛、錫、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換来的是制成品。汉撒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他們在布魯日的机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換比利时产的織物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再把它們运回沿北海各国。

1272年，汉撒商人在俄国的諾夫戈罗德設立了第三个代理处，在这里他們所取得的是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換出的是制成品。同年又在挪威的卑尔根設立了第四个代理处，主要从事于漁业以及鯨油和漁产品貿易。①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經驗所教导我們的是：国家如果还处于未开化状态，就可以从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貿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就可以为它的猎場、牧場、森林及农业中的产物，总之所有各种原料品，謀得出路，就可以換得更好的衣着材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貴金屬——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头时对于自由貿易总是拥护的。但是經驗也告訴我們，就是这些国家，当它們在文化上、生产事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对于这样一种貿易制度就不怎样看得上眼了，最后就认为这是在它們继續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英国与汉撒商人的商业关系情况就是这样的。当汉撒商人的代理处"天秤"建立还不滿一百年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就有了

① 薩托留斯：《汉撒史》。

这样的念头，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該只是輸出羊毛、輸入毛織品，应該可以干些比这个更加有用、更加有利的事。于是他积极鼓励法兰德斯的織工到英国来工作，給予他們一切便利和权益；一等到前来工作的这种織工为数相当多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服用任何用外国材料制成的衣着。①

这位国王这一措施是英明的，而别的有关国家的統治者这时所施行的政策却愚昧到万分，从而对于这一英明措施起了协助作用——象这样暗相凑合的事例在商业史上并不是不常見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早期的統治者用尽了心机，竭力发展他們本国的工业，使之日益昌盛，而后继的統治者的举动却适得其反，他們百般地使工商阶級不能安居乐业，从而促使他們向国外迁移。②

1413 年英国毛紡織业已經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使休謨可以这样說："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外国商人极端猜忌，对于他們的商业活动加以种种限制，例如，对于他們由出售輸入品所得的貨价，規定必須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③

在爱德华四世治下，对外国商人的疾視更变本加厉，外国毛織物，还有許多别的商品，都絕对禁止輸入。④

---

① 《爱德华三世法规》，第 5 章。

② 賴默尔：《探古篇》，第 496 頁；德・威特：《荷兰的利益》，第 45 頁。

③ 休謨：《英国史》，第 25 章。

④ 《爱德华四世法规》，第 4 章。这一禁令的一段前文内容极为别致，因此将原文照录如次："居住倫敦以及居住在本国和威尔士境內其他各市、鎮、村的男女技工，曾一再向該議会据情申訴，现在有大批各色各样的下流市儈，他們所屬的行业种种不一，拥有全部制就随时可以出售的商品，还有从海外流入本境和威尔士境內与国王为敌的外国人以及屬于归化者或其他身分的外国商人，他們所制作的商品充斥市場；由于这样的情况，使这些技工在生活上受到了莫大損害，陷于极度穷困。查上述这类外商絕大部分欺詐成性，并沒有經商牟利資格，由于这些人的活动，致使上述男女技工不能象过去那样依靠原有行业生活，有許多人，以及佣工、仆役、学徒等等，现在已經失业，生活艰难，淪于頹废、貧困、破产的境地，因此已經发生了許多不幸事故，如果再不采取适当挽救办法，此后不幸事故势将继續发生（事实上将来是断断不容許发生的）。"

虽然这位国王后来不得不允許汉撒商人的要求，取消了这个禁令，恢复了他們的原有特权，但英国的毛織业似乎由此受到了积极鼓励。休謨叙及亨利七世在位时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位国王是在爱德华四世去位后五十年卽位的。

"貴族左右原来是从者如云的，自从工业技术有了发展以后，雇用大批奴僕的恶习就不得不受到限制，这比强制命令还要有效得多。貴族們彼此之間这时已不再以僕从的为数众多与精壮勇悍相夸耀，他們为了进一步符合时代精神，这时所崇尙的是住宅的壮丽，車馬的华美，鋪陈設备的精益求精，以此相竞胜。一方面庶民也不再能游手好閑，安于懈怠，不再能在他們恩主的庇蔭下乞求生活，他們不得不学习一些手艺，使自己对社会有所助益。这时政府再度頒发了法令，防止不論已否鑄成貨币的貴金屬出口；但是由于明知这类措施难收实效，就再度規定，外商必須将他們出售輸入品所得貨款全部用来购买英国制品。"①

当亨利八世在位时代，外国技工在倫敦人数增加，使那里各种食品的价格大漲；这是国内工业发展使国内农业获得巨大利益的一个确凿征象。

但是国王完全看錯了这个現象的起因和作用，他听信了本国人民对外国技工有欠公道的控訴，总认为这类技工在技能、勤劳和节約各方面压倒了本国人民。于是由樞密院发布了一道命令，驅逐比利时技工一万五千人出境，认为"这批人的存在，使一切食品价格上漲，使国內有发生饥荒的危險"。为了鏟除禍根，釜底抽薪，国王又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限制个人支出，規定了服装式样、粮食价格与工資标准。这种政策当然是汉撒商人所热烈欢迎的。他們对于这位国王表示了同对英国上一代国王（他的政策对他們是有

① 休謨:《英国史》,第 26 章。

利的)同样的好感,情况就象現在英国人对葡萄牙国王所表示的一样。汉撒商人把他們的战船交給了国王，由他自由支配。在这位国王临政的整个期間，汉撒商人对英国的貿易极为活跃。他們既有船又有資本,机敏干练，并不亚于今日的英国人,他們懂得怎样应付英国在朝在野的人物,怎样在其間討好、沾光，而英国政府和人民关于自己的利益究竟何在这一点却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汉撒商人的論点与今天的商业壟断者相对照，双方所依据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汉撒商人以制成品供給一切国家时，他們的权利基础是实际条約与已有的商业关系；而今天英国人同样权利要求的基础只是一种理論，是他們自己海关里的一个职員作出来的理論。这位理論家企图用虛伪的科学的名义来公然强求汉撒商人凭实际条約与公道求得的权利。

当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他的樞密院找到了借口，要取消"天秤商人"的特权。汉撒商人对于这一新措施提出了强硬的抗議。但是沒有用,樞密院坚持原議,由此对国家产生了极有利的結果。英国商人以本国人地位，在毛織品、羊毛以及其他物品的采购方面，与外商相形之下,有着极有利条件,这种利益以前他們一直沒有能清楚地看到，因此一直沒有敢同这样一个財力雄厚的集团展开竞爭。但自从一切外商受到同样的商业限制以后,英国人經营工商业的兴趣就受到了鼓励,他們的企业精神一时竟弥漫全国。①

汉撒商人三个世紀以来在英国市場的独占地位正与英国商人今天在德国和美国的地位相同，至此他們却完全被排出了这个市場，后来由于德皇的抗議，瑪丽女王又恢复了他們一切原有的权益。② 但是这一次他們的幸运沒有能持久。当伊丽莎白王朝开始时,他們对于在爱德华六世与瑪丽統治下所获得的待遇不能滿意,

① 休謨:《英国史》,第35章;又海华德爵士:《爱德华六世传記》。

② 休謨:《英国史》,第37章;又海林的著作。

提出了强烈抗議，希望不仅保持已有权益，而且还能有所扩充。伊丽莎白的答复語气很和平，她說，“她沒有权力擅作任何变更，但是对于他們的已有权益则乐于加以維护。”但是他們对于这个答复全然不能滿足。过了一个时期，他們的貿易进一步受到阻滞，陷于停頓状态，这对于英国商人大大有利，这些商人現在有机会展其所长了。他們掌握了本国的全部出口貿易，他們的努力得到了光荣的胜利。他們分别从事于“坐商与行商”两种活动，前者在固定地点經营商业，后者則在外国或国外各城市販卖毛織品和英国其他工业品。这种情况激起了汉撒商人的莫大憤慨，他們用尽了一切方法对英国商人进行毁謗，使各国对英商发生恶感。1597 年 8 月 1 日，他們終于在德国获得了一道敕令，禁止英国商人在德帝国境內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不久英国女王就找到了报复机会，有六十只汉撒商船与西班牙进行着非法貿易，1598 年 1 月 13 日她下令逮捕了这批商船。她采取这一步驟的原意只是准备在釋放时可以获得汉撒商人的进一步諒解。但汉撒商人为此在律貝克召开了大会，以便以一致行动对英国出口貿易进行打击。她获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即将船只連同所載貨物一概沒收，然后又放回两只船到律貝克，带信給大会，說明她极端鄙視汉撒同盟和它的一切行动。[①]

汉撒商人曾經把船舶借給伊丽莎白的父亲，借給許多英国国王进行对外作战；曾受到許多欧洲君主的逢迎籠絡；几世紀以来，曾經把丹麦和瑞典的国王看待得就同他們的臣屬一样，随他們的高兴，招之即来，揮之即去；对于波罗的海东南岸一带曾加以开拓，施以教化，使这一地区脫离了海盜侵襲的恐慌；不久以前，还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英国一位国王承认他們的特权；英王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們以皇冕为质，有所借貸；他們对英国还曾一度有过那样殘

① 坎貝尔：《海軍将領传記》，第 1 卷，第 386 頁。

酷侮辱的举动，由于英国渔民胆敢逼近他們的漁場，竟溺毙了这些漁民一百人——而現在伊丽莎白却这样对待他們。汉撒商人这时实际上仍然拥有足够力量对英国女王这种行动进行报复；但是他們向来所具有的那种勇敢气质，偉大的冒險与进取精神，自由与团結意志所激发的力量，都已經消逝。他們逐渐退化到了无拳无勇的地步，在欧洲各国朝廷都走遍了，到处哀求，希望能获得进口权利，但到处碰壁，备受嘲弄，这一同盟終于在 1630 年正式解体。

他們所以会一敗涂地，除了一些內在原因随后再提外，还有許多外在原因。丹麦与瑞典在这个同盟下处于依賴地位为时已久，它們不甘心长期受制，企图报复，因此对于它的商业活动尽力从旁阻撓。俄国沙皇对于英国的一个商业机构給予了种种权益。条頓武士团几世紀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同盟的助手，也是它的(原来的)后裔，这时却由衰落而瓦解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到处同他們作对，在各国朝廷上尽力排挤他們，把他們逐出一切市場。最后由于发現了經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島的航綫，他們受到了最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个汉撒同盟的成員們，当它們气燄方張的时候，从来就沒有考虑到值得与德意志帝国結盟，現在它們到了穷途末路，就向德国議会投誠，告訴它，英国每年輸出毛織品二十万匹，大部分运銷德国，要使汉撒同盟恢复在英国的原有权益，必須禁止英国毛織品輸入德国。据安德森的記載，德国議会即使对于这一措施的执行命令沒有实际起草，对这件事确曾愼重考虑，但这位作家說明，只是由于当时英国駐德大使吉耳平的圓滑手腕，这一議案沒有得到通过。汉撒同盟正式解散后一百五十年，汉撒各城市对于这个同盟昔日的煊赫声威已經忘記得干干净净；賈斯特斯·莫塞尔在他著作的某几节里曾这样說，当他到这些城市游历，訪問当地商人，把他們前輩們的偉大事迹讲給他們听时，他們簡直不能相信。例如

汉堡这个地方，以前是各处海盗所畏避不遑的，它在镇压海盗方面对文明的貢献是基督教各国家喻戶曉的，这时却一蹶不振到这样地步，为了使它的船舶能保持安全，不得不向阿尔及尔的海盗年年进貢。后来海上优势落到了荷兰人手里，对付海盗就通行了另一种政策。当汉撒同盟在海上居于統治地位时，把海盜看成是文明世界的敌人，随时随地尽可能地加以歼灭。荷兰人的态度則适得其反，他們把非洲北部一带的海盗看成是帮手，是同道，借助于这类人的活动，在承平时期可以破坏别国的海外貿易，从而对他們有利。德·威特說了一句支持这个政策的簡括按語，"即使从仇敌处也未尝不可获得教益。"安德森引用了这句話，話虽簡短，荷兰人对它却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奉行不渝；英国人也学了样，他們不顾基督教国家的体面，直到現在对于北非沿岸一带的海贼暴行也仍然視若无睹，还是法国人对文明作出了貢献，剿灭了这批贼徒。①

这些汉撒城市的商业并不是国家性质的，它既沒有內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作基础，也沒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个同盟各成員之間的結合是极其松弛的，它們彼此之間互爭优势，各为本身的小范圍利益（或者按照瑞士人或美国人的說法是一州一市的利益）爭胜，这种竞爭观念超过了整个同盟中的团結精神；但是只有依靠了这种团結精神，才能牺牲各个城市的利益，以整个同盟的共同福利为重。于是彼此之間发生了猜忌，有时甚至演成叛变行为。例如科隆就利用了英国对这个同盟的仇恨这一点而从中取利；又如汉堡也企图利用丹麦与律貝克之間的爭执而坐享其成。

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并不是以商人所屬地方上的生产与消費或

---

① 作者似乎忘記了，否則是故意抹煞了，在埃克斯毛思勳爵率領下英国舰队的功績——英譯本注。

农业与工业为基础的。这些城市对于如何促进本地农业发展这一点完全置之不顾；而由于它們的商业活动，外地农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它們覚得在比利时采购工业品要比在自己境內建立工业方便得多。波兰的农业、英国的牧羊业、瑞典的鉄工业和比利时的工业都受到了它們的鼓励与帮助。它們数百年来所奉行的一个准則就是現代經济理論家所推荐的，这就是"专向最便宜的市場购买"。但是当那些与它們有买卖关系的国家把它們攆出了各国市場时，它們发覚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都沒有充分发展、都沒有条件能使它們的商业剩余資本在这些方面运用。結果这項資本就流入了荷兰和英国，使它們的敌人在工业上、財富上、力量上都有了增进。这是一个显著的例証，說明純粹的私营事业如果任其自流，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这些城市，由于专心致志地追求物质財富，对于政治利益的促进这一点就完全置之不顾。当它們处于鼎盛时期，看来它們好象是完全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这些城市里的自私而傲慢的公民，受到了許多帝王、貴族的逢迎諂媚，他們所处地位就好象是海上的君主。当处于这样的全盛时期，他們尽可以与德意志北部各城市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众議院，作为帝国中貴族的一个对称势力，尽可以借助于帝国力量实現国家的統一，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整个海岸地带連成一片，也尽可以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在工商业与海上势力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当时他們如果要使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事实上当他們在海上的大权旁落以后，剩下来的一点势力甚至还不足以誘使德国議会承认他們的商业是一种国家事业。相反地，这时德国貴族却傾其全力来压制这些低首下心的公民。他們在內地的城市逐漸归入各个王侯的絕对掌握，因此他們的沿海城市也就失去了与內地的联系。

汉撒商人所犯的錯誤在英国都沒有发生。英国的海运事业和

国外貿易都是以它的本国工农业为稳固基础的；它的国内貿易是在与国外貿易的适当比例下发展的，在这里，个人自由日益成长时，对国家統一或国家权力并无所損。以英国的情形而言，国王、貴族与人民的利益是在极其圓滿的情况下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有了深刻体会，那么关于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广泛扩展工业生产力，所以能够这样无止境地发展，海軍力量所以能够这样的压倒一切，誰还能說不是由于他們所采行的商业政策呢？有人說英国人所以能获得現在的商业优势和力量，并不是由于它的商业政策，与这个政策并沒有关系，这种說法在我們看来是本世紀流行的最显著的謬論之一。

如果英国人对一切置之不問，任它們自生自灭——也就是流行經济学派所推許的"任其自由，不加干涉"的主張——那么所謂"天秤商人"現在将仍然在倫敦經营商业，为英国制造織物的仍然是比利时人，英国仍然是汉撒商人的牧羊場，一切正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葡萄园以后，由于一位狡猾的外交家的謀略，直到今日依然如故的情况一样。的确，英国如果不是靠了它的商业政策，象它今天所具有的那样高度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現，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工业与財富的产物。

关于汉撒同盟与英国两者之間在工商业方面进行斗争从头到尾的經过情况，亚当·斯密从未加以根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从亚当·斯密著作中某些部分来看，清楚地說明，他对于汉撒同盟崩潰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不了解的。"一个商人，"他說，"并不一定要屬于某一指定国家的公民。他在什么地区經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是沒有关系的。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資本連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这項資本在沒有攤开以前，就是說还沒有把它陈列在地面上变成建筑物或在土地上作持久利用时，就不能說其中的任何部分是屬于任何某一

指定国家的。汉撒城市所曾一度拥有的巨額財富，除了十三、十四世紀黯淡模糊的历史紀录以外，大部分現在已杳无影踪。这些城市，其中有些当初究竟坐落何处、有些原有的拉丁名称指的究竟是哪些欧洲城市，現在甚至已經搞不清楚。”①

亚当·斯密对于汉撒同盟之所以顚覆的次要原因既具有这样的眞知灼見，而对于其中的主要原因却沒有感到有加以根究的必要，这是多么奇怪啊！要考察其間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已成陈迹的城市正不必深究，它們的原址何在，关于哪些拉丁名称属于哪些城市，也正不必在陈年紀录中去寻根究底。他的同国人安德森、麦克弗森、金和休謨都有必要的說明，可以供他参考。

汉撒同盟为什么会一敗涂地，在这方面作考察时是既能引起兴趣，也会获得丰富結果的；而亚当·斯密这样一个造詣极深的观察者，为什么对这一点却絕口不提呢？就我們所能看到的、其間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作这样考察时所导致的結論，对于他的絕对自由貿易原则将无所裨益。由此他所面临的，将无可避免地是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与汉撒商人的自由貿易关系使英国农业脫离了未开化状态以后，他們所采行的以汉撒商人、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为牺牲的保护貿易政策，使英国获得了工业优势，然后借助于它的航海条例，使它进一步获得了商业优势。

这些事实看来是亚当·斯密所不願意了解或不願意承认的，因为这些都是屬于薩依所謂与他的理論相反的、那些不大对劲的事实。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部分，第4章。

# 第三章 荷兰人

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从它們人民的性格与風俗、血統与語言来說，或者从它們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来說，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組成部分。这里曾屡次有查理曼大帝的行踪，他时常駐札在这一带附近，由此对这些地区在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当远比对德国較偏僻地区所发生的影响为强大。还有一层，法兰德斯与布拉奔生来就特別适宜于农业和工业，就象荷兰的宜于畜牧和商业一样。

这些沿海地区的国內貿易，由于广泛而优良的海上与內河航运而获得了莫大便利，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沒有一处比得上的。那些足以阻碍上述地区进步的因素之所以能够消除，运河之所以能够开辟，即使就很早时期来說，也必然是由于水路运輸在农业改进、城市发展方面的有利影响。法兰德斯历任的主政者，早在德国所有別处的主政者之前就看到了保持地方治安、改进路政、发展工业、建設城市等的价值，这种情况就格外促进了法兰德斯的繁荣。这个地区在地利上旣占优势，主政者对于盗賊与野兽的扑灭又进行不遺余力。在这样情况下跟着发生的当然是城乡之間商业的活跃，畜牧、特别是养羊业的发展以及大麻、亚麻产量的增进；而且原料生产既欣欣向荣，財产与商业經营的安全又有保障，于是为制造这些原料时所需的劳动与技术就会与之相适应，这是势所必然的。同时这里的主政者对于羊毛紡織工人的爭取也沒有坐失时机，因为历史告訴我們这里不久就从国外招募了这样的技工。

法兰德斯获得了汉撒同盟与荷兰方面在貿易上交流的支援，它由于毛紡織业的发展，不久就成为北欧的商业中心，与威尼斯由

于工业与航运业的发达而成为南欧中心的情况互相輝映。商船运輸、汉撒同盟与荷兰之間的互惠貿易和法兰德斯的工业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統一体，一种眞正的国家事业。这时法兰德斯工业的最高地位还沒有遇到敌手，因此以它的情形而言，商业限制政策并沒有需要。处于这样的环境，工业在自由貿易下可以获得最大发展，法兰德斯的主政者是懂得这一点的，而无須向亚当·斯密請教。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伯爵罗伯特三世(Robert III)，当英王要求他把苏格兰人逐出市場时，他的回答与现代流行学派的理論精神十分符合，他說，“法兰德斯一向认为它是一切国家的一个自由市場，如果違背这个原則，就与它的利益有了抵触。”

法兰德斯是北欧的首要工业区，布魯日是北欧的主要市場，这样經过了几个世紀之后，它們的工商业地位就轉移到了邻近的布拉奔地区。因为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不願继續給与它們在全盛时期所要求的那些特权。于是安特卫普占了商业的首座，魯文(Louvain)成为北欧的首要工业城市。由于这种情势的变化，布拉奔的农业不久就有了高度发展。早年时期租稅由用实物繳納改为用貨币繳納的这种变革，尤其是关于对封建制度方面的限制，都是对它特别有利的。

这时荷兰人作为汉撒同盟的对手，在統一力量下显露头角，这就打下了将来他們在海上掙得权势的基础。荷兰这个小国在自然条件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善于应付，随处能取得利益。荷兰人在海洋的侵襲下作了长期不断的斗爭，这就势所必然地养成了刻苦耐劳与冒險进取的精神；他們的土地是在不断艰苦斗爭下保持住的，这就养成了对土地格外珍惜的观念，把它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們在这方面所化費的力量簡直是难以形容的。他們受了造化的限制，所能从事的只是航运、漁业和肉类、干酪、奶油的生产，他們不得不靠了海洋运輸、乳制品出口和漁业来滿足他們对谷类、木

材、燃料和衣着材料这些方面的需要。

汉撒商人在后期逐漸被荷兰人擠出东北各国市場，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里可以略举其間的主要原因。汉撒商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木材，主要取給于与他們的城市直接毗連的地区，而荷兰人所需要的这类物資，数量却比他們所需的要大得多。而且荷兰有邻近的比利时工业地区，有来因河一带广闊、肥沃、遍产葡萄的地区，况且这条河流还可以一直通航到瑞士山地，这些都是对它极有利的。

沿海国家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水路交通所賴的河流的流域是否广闊，这一点可以认为是一个通則。[①] 我們只要看一看意大利地图，就可以明白威尼斯商业之所以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薩的商业，其自然条件上的原因就在于波河流域之广闊和富饒。荷兰商业的主要根源是来因河及其支流的灌漑地区，这些地区远比易北河及威悉河流域为丰饒，而荷兰商业之所以优越于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其原因也在这一点上。此外荷兰人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有个人叫作彼得·鲍克尔斯(Peter Böckels)的，发明了一种腌制青魚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即以其人而得名，他的方法秘不外傳，經过了一段很长的保密时期，在这段期間，这一行业由荷兰人独占其利，用此法制出的青魚质量特别优美，因此在市場上可以获得高价。[②] 据安德森說，自从荷兰发明了这种制魚方法以后，数百年間，英格兰和苏格兰魚商虽然享有巨額出口津貼，他們的青魚在国外仍找不到市場，即使竭力减价，也无法与荷兰人竞爭。要曉得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以前，各国对于海产魚类的消耗量非常之大，因

---

① 最近路政大大改进，尤其是有了鉄路以后，这个通則实际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限制性——英譯本注。

② 近来有人指出，荷兰制青魚所以品质特优，不但是由于上述的特种加工方法，这种食品出口时是用橡木制的桶装运的，这一点也有关系——英譯本注。

此当汉撒航运业已开始衰落时，荷兰人竟有力量每年造新船二千艘，这一事实与上述渔业的情况对看，是并不足奇的。

比利时与巴达維亚全部地区在勃艮第王室統治下合并以后，这些地区有一部分获得了国家統一的巨大利益，当我們研究荷兰对德国北部城市在海上貿易竞爭中获得胜利这一事实时，上述情况是不可忽視的。在查理五世統治下的尼德兰王国构成了一个有权能、有作为的集体，这时他对于这种力量的性质若果有眞切的了解，并且能懂得怎样来引导、运用的話，就不难使他在陆上、在海上称霸世界，这种力量对他所能作出的貢献，实在比地上的全部金矿，比教皇所能賜給的一切恩寵、优遇还要有效得多。

查理五世若果有远見，能够把那个西班牙王冠象扔掉一块要把他拖入泥坑的累贅的石头一样地毅然弃去，試問荷兰与德国人民的前途因此将发生如何惊人的变化！这时的查理是尼德兰王国的統治者、日耳曼的皇帝、宗教改革的領袖，在物质上、精神上拥有一切的必要手段，可以建立一个力量最强大的工商业帝国——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的航运业联合在一个旗帜下的海軍强国。

这时要使德国提高到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要使它的工商业势力遍及全球每一角落，甚至使这样的情势也許历許多世紀而不衰——这时要实現这样的野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性概念，只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运用。

但是查理五世和他那个性情乖張的儿子所采行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政策。他們甘願成为痴迷狂妄一派的領导，要使尼德兰趋于西班牙化，以此作为主要目标。这个政策的結果如何，史乘上自有記載。荷兰的北部地区，由于它原有的优越因素，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南部地区的工商业和技术則破坏在政策执行者的手里，只有迁避到别的国家的那部分才幸免于灾殃。这时世界商业中心已不是安特卫普，代之而兴的是阿姆斯特丹。荷兰各城市在很早时

期,由于布拉奔地方的騷乱,已經吸收了大批比利时羊毛織工，現在更无余地可以容納全部比利时的流亡者，結果有很大部分不得不流入英国和薩克森。

爭取自由的斗爭在荷兰产生了一种在海上冒險的勇敢精神，在这样的精神下显得任何困难、任何危險都是不足道的，而恰恰相反，痴迷狂妄的精神几乎使西班牙完全失去了前进的勇气。荷兰主要靠了对西班牙商船、特别是載有金銀財宝的貨船进行私掠、劫夺而养肥了自己。它用了这个方法与伊比利安半島及比利时进行了大量的非法买卖。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以后，荷兰占有了葡萄牙在东印度群島殖民地的主要部分，还获得了巴西的一部分。直到十七世紀上半期止,荷兰在工商业、海运事业、殖民地經营各方面都超过英国，超过的程度正与今日英国在这些方面超过法国的程度一样。但是随着英国革命的发生，情势自然而然地有了巨大变化。爭取自由的精神在荷兰逐漸轉化成为只是一种平凡的国民精神。正象一切在单純商业精神下的貴族政体一样，眼前情况似乎一切都很好,并沒有什么破綻;荷兰人只要他們識力所能及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保全身家性命，在于物质利益，就显得自己是能够干些大事的。可是比較深謀远虑的政治手腕却是在他們的认識能力范圍以外的。他們沒有看到已經获得的优胜地位,必須有大国的基础,必須有强毅的民族精神的支持，才能維持不墜。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民族精神在君主政体下已經有了大規模发展，而它們的工商业則尙处于落后地位，它們眼看到荷兰这样渺小的一个国家,而在工商业、漁业、海軍力量等等方面却处处在它們之上,这就使它們激起了一种羞辱的心情。这时在英国不但存在着这种心情，与之并存的还有革命以后的那种朝气和新生力量。英国頒布的航海条例，就是在这种激动心情下直摔到荷兰这个当前的霸主面前的一封挑战书。一旦冲突表面化以后,情势就非常明显,英国

国民性的气魄要比荷兰的雄偉得多。演变的結果如何是沒有怀疑余地的。

法国跟着学了英国的榜样。据科尔伯特估計，当时全部海上运輸貿易所使用的船舶約二万艘，而其中为荷兰人所有的达一万六千艘，这个数字同这样一个小国是完全不相称的。由于波旁皇室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結果，法国的貿易得以扩展到伊比利安半島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这些都是对荷兰人极端不利的。同时法国对它本国工业、海运事业与漁业实行的保护措施，也使荷兰工商业受到了莫大的損害。

荷兰对北欧各国貿易的大部分、它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进行的非法貿易、它对东印度群島及西印度群島貿易的大部分以及它的漁业，都已轉到了英国人的手里。但对它打击最严重的是 1703 年的麦修恩条約。荷兰对葡萄牙、葡萄牙屬地及东印度群島的貿易从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荷兰在国外貿易方面丧失了这样大的部分以后，結果与汉撒城市及威尼斯过去的遭遇如出一轍——大宗的物质与精神資本这时在荷兰已感到无用武之地，就以移民或貸款形式轉向别的国家，这些国家这时已从荷兰手里取得了荷兰昔日占有的优越地位。

如果荷兰能与比利时、与来因地区、与德国北部联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国家，英国和法国就不容易象它們所已經順利完成的那样，使用战爭和商业政策来削弱它的海軍力量，削弱它的国外貿易和国內工业。象上述那样构成的一个国家，就可以用它自己的商业系統与别国的商业系統进行竞爭。即使由于那些别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它自己的工业受到了些損害，它也可以靠它国內的資源，加上在国外建立的殖民地力量，使創痛得以充分复原。荷兰所有的只是沿海岸一片狹长的土地，只是由日耳曼漁夫、海員、商人和制酪者組成的一小撮人口，但是它却企图把自己建成一

个强大国家，同时对于在它后部的腹地（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屬于这个地区的一个部分）却看作是国外領土，并以此相对待——这就使它在挫敗以后难以恢复。

荷兰这个例子，正与比利时、汉撒城市、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情况一样，它所說明的是，如果所处的外圍环境不利，单靠私营工业是不足以維持整个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工商业和財富的；还有一层，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由政府的政治組織与国家的力量得来的。比利时的农业在奧国統治下再度获得了发展；当它与法国联合时，它的工业已发展到了前一时代的巨大規模。荷兰当孤立无援时，从来就沒有能够为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商业体系，与大国相竞争。但是当 1815 年实現普遍和平后它与比利时合并时，在国內資源、人口与国土方面就获得了极大的增进，使它得居于大国之列，并且拥有了巨大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力量，这时我們看到在尼德兰也建立了保护制度，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农业、工业和商业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一合并現在又告解散（解散的原因不屬于本书研究范圍以內），因此保护制度在荷兰就失去了它所依据的基础，而在比利时則依然存在。

荷兰現在所依靠的是它的殖民地和对德运輸业。但是再来一次大規模海战时，它的殖民地就会岌岌可危，同时德国关稅同盟对于它的利益所在看得越清楚，越是要进一步运用它的力量，就会越清楚地认識到把荷兰包括在关稅同盟以內的必要。

## 第四章 英国人

上面在"汉撒商人"一章里已經提到，英国的农业和养羊业怎样由于受到了国外貿易的影响而获得发展，怎样国外技工由于不

能在他們本国安居乐业而逃到英国，由于英政府对他們撫綏有方而使英国毛紡織业逐漸达到了繁盛状态，并怎样由于工业进步与伊丽莎白女王英明果断的措施，使以前由外人壟断的一切国外貿易，順利地轉入本国商人之手。

关于英国国民經济的发展，在上面第二章里已經談到了一些，在接着談下去以前，让我們先談一談英国工业的起源。

我們要追究英国工商业巨大发展的根源，主要应該从它的养羊业和毛紡織业談起。

在汉撒商人的踪迹初次出現于英国国土以前，英国的农业很簡陋，它的牧羊場也是微不足道的。牲畜在冬季飼料不足，因此每逢秋季，就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加以屠宰，結果畜产和肥料两者都感到缺乏。那个时候猪肉是肉类的主要供源，情况正与一切未开化地区——如以前的德国与現在的美国未开发地带——一样，其間的理由是很明显的。猪比較地不需要照顾，比較地会自己寻食，在荒地与山林中都可以覓得丰富的食料，只需保存相当数量的孕猪过冬，明年春季就稳可以有大群小猪。

但是国外貿易有了发展以后，猪的飼育就逐漸减退，养羊业就有了較大发展，跟着是耕作方法和牛的牧养也有了很快的改进。

休謨在他的《英国史》[①]里对于十四世紀初叶英国农业状况，曾有一段很有趣的叙述：

"斯宾塞勳爵于1327年就他所有的六十三处田产計算了一下，一共有羊二万八千只、公牛一千头、母牛一千二百头、馬五百六十四、猪二千只，平均每处田产有羊四百五十只、牛三十五头、馬九匹、猪三十二只。"

从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英国卽使在那样早的时期，羊的畜养

① 第2卷，第143頁。

数量就已經比其他一切家畜的合計数量还要大得多。由于从养羊事业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在那样早的时期,英国貴族对于工业以及农业的改进就已經发生了兴趣;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貴族,在那个时候对于他們所有田产的大部分,除了用来畜养大群麋鹿以外,还不懂得别的更好的利用方法,他們除了用种种敌对行为向邻近城市及其商业找麻煩以外,也不曉得还有什么更加正当的事业。

在那个时期,正如匈牙利在較近时期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羊群在英国逐漸有了高度发展,有多处采地以拥有羊一万只到二万四千只相夸耀。在如此情况下,当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保护措施时,原来已有很大发展的毛織业即迅速达到高度繁荣,这是势所必然的。①

在第二章曾述及汉撒同盟向德国議会請求对英国进行报复时,提到英国每年输出毛織品的估計是二十万匹,在詹姆士一世时这項輸出总值已經达到了二百万鎊那样的龐大数額,但是在1354年时羊毛出口总值还仅仅是二十七万七千鎊,而所有其他物品的出口价值幷計也不过一万六千四百鎊。到詹姆士一世时止,英国所制毛織品的絕大部分总是在未加工状态下运到比利时,然后在那里加以染色、整理的;当这位国王及查理一世时代,由于采取了保护和鼓励措施,英国的呢絨加工技术达到了高度完善境地,从此国外比較精細的毛織品就几乎不再輸入英国,而英国輸出的毛織品則全部是經过染色幷精細加工的。

英国商业政策在这些方面的結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充分认識到这一点,应当指出,当近代麻布、棉布、絲綢、鉄的生产事业还

① 这时关于禁止羊毛出口的命令无疑是要使人感到煩惱的,是不公道的,更不用說加于近海岸各市場羊毛貿易的种种限制了;然而这一措施对于英国工业的促进,对于法兰德斯的打击,却起了有利作用。

沒有获得大发展以前，毛織品在对一切欧洲国家的貿易、尤其是对北欧各王国、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东印度群島与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中，占交易媒介的最大部分。早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毛織品出口占各种出口品总量的十分之九，这是一个絕对确切无疑的事实，这一工业当时在国际貿易所占地位重要到什么程度，由此可以想見。①

这一項用品的制造，使英国能够把汉撒同盟逐出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場，使它在与地中海东部各国及东印度群島、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中获得了其中最丰富的果实。也就是这一工业促进了煤业的发展，从而又兴起了广泛的沿海貿易和漁业，这两者构成了海軍力量的基础，因此，使那个著名的航海条例得以实行，而为英国海上优势打下基础的也就是这个条例。英国的羊毛工业是各业中的一个主干，許多別的工业圍繞了这个主干而获得发展，这就使这一工业成为英国工商业与海軍力量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其他各部門工业也并沒有忽視。

在伊丽莎白統治下，金屬制品与皮革制品，还有許許多多別的工业品的輸入，就已悬为例禁，而对于德国矿工与金屬业工人的移入則积极鼓励。所需的船舶以前是向汉撒商人购买的，或者是在波罗的海口岸訂造的；但是它在这方面限制与鼓励双方并进，尽力設法促进国內造船事业。

为了造船，需要由波罗的海各口岸购入木材，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对那些地区的出口貿易。

英国人捕制青魚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捕鯨是从比斯开灣沿岸居民那里学来的；政府对于这两种漁业这时都用了奖励办法来积极推进。詹姆士一世对于造船业与漁业的鼓励有着特別热烈

① 《英国史》(1603年)。麦克弗森:《商业史》(1651年)。

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他的百姓多吃些魚，我們对于这种举动虽然不免要觉得有些好笑，然而不能不对他作出公正評价，他对于英国远大前途的方向何在，是有眞知灼見的。还有，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以后流入英国，这一点使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資本上获得了无可計量的增益。英国精細呢絨的制造，麻布、玻璃、紙張、帽子、綢緞、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現的。它懂得怎样利用禁止輸入与高額关税来促使这些工业迅速发展。

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島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們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其他許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風；波斯对于地毯織造与染色的技术終于不得不告放弃。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門就鍥而不舍，給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經几个世紀而不倦，就象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約，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經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論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踐、經驗与国内竞爭，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爭者的老牌产品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某一种工业的成功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許多别的工业的成就相輔相依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工作如果能代代相傳，历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續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些，或者对于这些情况完全无知，那么在他大胆建立自己的理論体系以前，或者在他向操着国家禍福之权的执政諸公献策以前，我們敢請他先讀一讀英国工业发展的历

史。

在乔治一世統治下，英国的政治家們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强大所应依靠的基础是什么。1721年英国議会开幕时，这位国王經內閣授意曾这样說，"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①

这是几个世紀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則，以前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业政策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1841年）的有效性与伊丽莎白时代毫无二致。由此所产生的效果是全世界所共睹的。有些理論家不同意这样的說法，认为英国并不依靠它的商业政策，尽管沒有这个政策，它也仍然会臻于富强的。他們也同样可以这样說，树木当幼弱时虽然曾用籬笆和支木加以扶持，然而它并不是靠了这些成长起来的，尽管沒有这些，它仍然会发荣滋长，果实累累的。

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經济之間存在着密切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历史所提供的証据也是非常确凿的。英国工业的勃然兴起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增加現象，显然使咸魚与煤的需要激增，由此又大大促进了专用于漁业与沿海貿易的商船业务的发展。漁业与沿海貿易两者以前都操于荷兰人之手。这时英国人受到了关稅提高与津貼制的鼓励，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来經营漁业，同时通过航海条例，不但使英国海員掌握了海上运煤业务，而且掌握了本国的全部海运业务。英国商船事业由此获得了发展以后，它的海軍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增长，从而使它有力量与荷兰艦队相对抗。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不久，英荷之間爆发了海战，使荷兰人与英吉利

① 参閱烏斯塔里茲：《商业理論》，第28章。据說所謂"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則是輸出商品，而作为报償的輸入品，則除了現金、銀外，不要任何别的东西，这种說法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荒謬的，而从这里可以看到乔治一世的主张并不是这样。他所希望的是輸出制成品，輸入原料。

海峽对岸各国的貿易差不多完全陷于停頓，他們在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船只几乎全部为英国的私掠船所歼灭。休謨估計在这次战役中荷兰船舶被英国巡洋艦所夺得的为数达一千六百只；达夫南特則在他的《国庫岁入报告》里說明，在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二十八年間，英国的航运业比前增长了一倍。①

就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比較重要的結果而言，以下几点是值得格外注意的：

1. 英国对所有北欧王国、对德国与比利时的貿易（輸出制成品，輸入原料）都有了扩展，根据安德森的記載，在 1603 年以前，英国对这些国家的貿易几乎完全被荷兰人排挤掉。

2. 对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其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的走私买卖，有了大量的扩展。

3. 英国的捕制青魚与鯨魚业务有了显著的增进，这类业务原来是几乎全部为荷兰人所独占的。

4. 英国于 1655 年征服了牙买加，这是它在西印度群島最重要的殖民地，从此它得以控制西印度群島的制糖业。

5. 1703 年与葡萄牙签訂了麦修恩条約，关于这件事在叙及西班牙与葡萄牙情况时当作詳尽分析。这一条約使荷兰人与德国人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重要貿易关系完全断絕。葡萄牙从此完全淪于在政治上依附英国的地位，而英国通过它对葡萄牙貿易中所获得的金銀，得到了对中国与对东印度群島大規模扩展商业关系的資力，从而为它龐大的印度帝国打下基础，并且夺得了荷兰人最重要的几个商业根据地。

以上所举最后两个結果彼此之間是有密切关联的。英国蓄意要把葡萄牙和印度两个国家作为它发展自己前途的两个工具，其

① 《英国史》，第 5 卷，第 39 章。

間所使用的手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除了貴金屬以外，在貿易中可以提供的基本上沒有什么别的东西，而东方所需要的，除毛織品外，主要就是貴金屬。这样的局势就显得在英国人面前是处处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上面曾提到英国执政者坚持不舍的一个原則是輸出制成品，輸入原料，而东方在貿易中所能提供交換的主要只是棉織品与絲織品，这一点是与他們的原則格格不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們怎样应付呢？他們是不是在葡萄牙銷售毛織品、在印度购入棉織品和絲織品而从中取利以后，就这样心滿意足了呢？决不是的。英国执政者的目光所注，并不到此为止。

他們如果允許印度的棉、絲織品自由輸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織业和絲織业馬上就得垮台。印度不但有着劳动力与原料代价都較低的有利条件，而且有着好几百年来相傳的实踐經驗和技术。在自由竞爭制度下，这类有利条件的效果如何是沒有爭論余地的。

但英国并不願意为了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业方面屈从于亚洲。它所要爭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間有着自由貿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它对北美洲殖民地所已經执行的就是这个原則，它甚至不許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馬蹄釘，更不許把那里所造的輸入英国。它自己的工业品市場是它前途发展的基础；而印度人民为数如此众多，又这样克勤克儉，对于旧有制造方式又这样地熟练，这样地广有經驗；又怎样能够指望它放弃它自己的市場，轉让給象印度这样的一个民族呢？

因此英国禁止輸入它自己工厂也在制造的那一类商品——印度的棉織品与絲織品。[1] 这个禁令是絕对的，毫无伸縮余地的。印

① 安德森关于 1721 年的論述。

度制造的哪怕是一根綫，英国人也不許动用。这些制造品物美价廉，但英国自己弃而不顾，它宁可使用质量較差、代价較昂的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織物在較低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願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給它們，而自己却一无沾染。

英国为什么这样做？它是不是一个傻子？按照亚当·斯密和薩依的理論，按照价值理論来說，的确是这样。因为，按照他們的說法，英国应当到能够按最低价格供应最高质量的商品的那些地方，去采购它所需要的东西。它以較高代价来自己制造那些它可以在别处买得到的东西，同时却把那部分利益让給大陆各国，这分明是件傻事。

但是按照我們的理論，情形却适得其反；这个理論我們把它叫作"生产力理論"(the Theory of the Powers of Production)。英国执政者对于这个理論所依据的基础并未加以审察，然而当他們执行着輸入天然产物、輸出紡織品的原則时，实际上却采用了这个理論。

英国执政者所注意的并不是在于价格低廉的、并不是經久存在的那些工业品的取得，而是在于代价虽較高而能够长期存在的制造力的取得。

他們出色地达到了这个目标。今天英国所生产的棉織品和絲織品价值达七千万鎊，英国的制造品供应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印度也包括在內。今天它的本国产額超过它以前經营印度制造品的貿易价額計五十倍到一百倍。

如果一个世紀以来它只是购入印度制造的廉价商品，对它又会有什么好处可說呢？

再說，那些为自己购买了那样便宜的商品的国家，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好处？英国获得了力量，获得了难以估計的力量，而别的国

家所获得的却是力量的反面。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証据为依据、經历史証实了的結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結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評价，这只能是由于那个原則，关于这个原則，我們在另一章里談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錯誤結論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貿易是这位先生最得意的見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論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須設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証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則的异議，他排除异議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經济的两种目的。他說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經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論就事理或就实际經驗来說，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們将在以下的討論中予以充分揭露。

薩依对于美国的經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貿易与保护貿易原則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現比他的前輩还更进一步。他計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漁业津貼上对于一个海員的負担，从而說明这类津貼是如何地虛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問題，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貿易主張者来說是一个很大的絆脚石；他們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們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員时，就只想悄悄地繞过这个絆脚石。

事体的眞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規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沒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經营的航海业与运輸业的自由总是覚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資本，缺乏海員人材，情願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貿易让别的国家来經营。但是过了些时，它們的生产力已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經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們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

国外貿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貨，使自己成为一个海軍强国。它們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經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最辽远的地区經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財力上、經驗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順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們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潤。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最高度发展时，毫无疑問，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說："这样的时候也許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訂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①] 当他說这句話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約，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員趋于懈怠，鼓励他們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爭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經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員技能各方面，在竞賽中落在别的濱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轍，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軍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軍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軍势力的继續增长，殖民地的继續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認这个条例无論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財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財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

① 普里斯特利：《关于历史与一般政策的讲演》，第2部分，第289頁。

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資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財富的果实，因为結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軟弱无能——足以使我們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們既得的財富难以保持，就是我們的生产力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們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們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經有了充分証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車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財富之間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規律視若无睹，却敢貿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約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們已經說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財富。現在让我們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英国掌握了每一个海洋的鎖钥，对每一个国家都安置了步哨，它安置步哨的所在：对德国是赫耳果兰島，对法国是格恩济島和哲尔济島，对北美洲是新斯科頁半島和百慕大群島，对中美洲是牙买加，对沿地中海各国是直布罗陀、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島。它在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綫上据有了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苏伊士地峽在外，然而也正在竭力爭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紅海，以布什尔和卡拉克控制波斯灣。它只須再把达达尼尔和松德海峽、苏伊士和巴拿馬地峽拿到手，对于世界上不論哪个海洋，哪处主要航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封鎖。它一个国家的海軍力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各国海軍力量的总和，即使以船数計不一定这样，无論如何以战斗力計总是这样。

英国的工业在生产能力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虽然它的毛

紡織品产量从詹姆士一世到現在增加了十倍以上（产值达四千四百五十万鎊），但是还有一种工业，只是从上一世紀才建立起来的，即棉紡織业，它的产值却更加龐大，达五千二百五十万鎊。[1]

英国的麻織业与别的国家对照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它在工业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仍然未能滿足，在麻織业方面也想急起直追，取得与上述两种工业相类或者更高的成就；目前它的麻織品产值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鎊。当十四世紀时英国在鉄的生产上还那样貧弱，因此对于这种不可少的金屬认为有禁止出口的必要；但是在今日十九世紀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它所产的鋼鉄制品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产值达三千一百万鎊，所产的煤与其他矿产则产值达三千四百万鎊。按除英国外，所有其他国家的金銀产值总計約二亿二千万法郎，合英币九百万鎊，上述英国两項生产合計的产值与这个数值对照，計超过七倍以上。

現在英国所产的絲織品产值計一千三百五十万鎊，超过了中世紀时所有意大利共和国在这方面的产值。有些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时代不足挂齿的工业，現在也有了巨大产值，例如玻璃、瓷器与陶器的产值达一千一百万鎊，銅与黄銅产值四百五十万鎊，紙張、书籍、顏料与家具产值一千四百万鎊。

还有，英国的皮革制品产值达一千六百万鎊，杂項物品产值一千万鎊。英国单单啤酒与蒸餾酒这一类的产值，就大大超过了詹姆士一世时代全国四千七百万鎊的总产值。

現在联合王国工业的总产值估計达二亿五千九百五十万鎊。

由于、也只是主要由于这种龐大的工业生产，使农业方面的总产值达到了五亿三千九百万鎊，超过上面的数字一倍以上。

---

[1] 这里的以及下面的一些关于英国的統計，是从英国著名統計家麦奎恩的一篇文章里引来的，該文載1839年7月份《泰特氏爱丁堡杂志》。这些数字可能是有些夸大的，但即使如此，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在这十年內将成为现实。

固然，英国的力量以及它生产力这样的突飞猛进，并非完全是出于它的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条例和商业条約之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

但是我們要問，今天一百万的英国工人，怎么会完成数目比他們大許多倍的那些人的工作呢？这是由于人們对英国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它懂得怎样运用明智而有力的政策，在国外、尤其是在它的殖民地引起这种需求，这是由于施之于它国內工业明智而有力的保护政策，是由于它利用专利法对于每一种新发明所提供的优厚报酬，也是由于公路、运河及鉄路所提供的在它內地运輸方面的高度便利。

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輸便利对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成国家財富、人口与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我們看到了，一个自由、勤奋并且有着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在短短的半个世紀期間，卽使处于对外战爭的环境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是什么。現在看来，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前在这些方面所获得的一些成就，只是儿戏而已。据估計英国在那些与国家生产力有关的巨大設施方面的花費达一亿一千八百万鎊。

但是英国只是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經开始有所发展时，才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的。从那时起，一切观察者都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經开始有大規模发展时，才能办到；只有在国內工业生产与农业資源同时有了发展时，代价这样高的商业設备才能获得补償；也就是这类設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它們充分完成使命。

同时也必須承認，英国的巨大生产力与巨大財富，并非单单是国家力量与个人的利得心的結果。人民爱好自由与公正的先天禀賦，人民的活动力和他們的宗教、道德品质这些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国家的政体制度，政府与权要人物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关

系的。不仅如此，地理的环境、国家的气运，甚至僥幸因素，在其間也未尝沒有关系。

在大势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了前者，究竟是社会力量在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間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結果这一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組跟着增长，有一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組也难免不被波及。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在于安格魯撒克逊与諾尔曼血統的混合，提出这个見解的人应当先看一看英国在爱德华三世在位以前的情况。在那个时候，民族的勤勉耐劳精神与儉約习慣到底表現在哪里？还有人說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們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們的議会的。在都鐸王室的統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在自由的宝庫中独有一个宝是安格魯撒克逊-諾尔曼民族远在日耳曼血統其他民族之先就保留下来的，是英国一切自由公正观念所由滋长的种子——这就是陪审权。

当那部罗馬会典在意大利发現时，当那个从廢墟里掘出来的遺骸(在它的时代无疑是非常偉大的，是智慧的結晶)其势力弥漫于欧洲大陆各国时，英国的权要方面却毅然表示，有关法律与土地的任何变革将不予考虑。他們沒有把由这部会典而来的遺毒遺留給后代，这是何等的偉大智力！这种智力，在物质生产的力量上后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英国不但对于罗馬会典不加理会，而且很早就从社会与文学領域、从政治各部門与法院排除了拉丁語，这一点对于国家的发

展，对于立法、司法、文学与工业，有多大的影响；德国长期保留着拉丁文和那些外来的法典，这一点对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現在的匈牙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火药的发明、印刷术、宗教改革以及通往印度的新航綫与美洲的发现，对英国自由、英国文化与英国工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把这些影响情况与在德国和法国的比一比看。在德国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整个德国、在各区之間、甚至在各城市以內的互相傾軋；使人痛心的意見紛歧；在文学上、在国家行政与司法上的未开化状态；內訌、宗教迫害、向国外逃亡、外来侵略、人口減少、土地荒蕪；城市的毁灭，农工商业以及自由制度、民政制度的衰落；显要貴族的无上权势；王权与民族精神的衰退；最富裕地区与帝国的分离。在法国的是：为了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对城市、对貴族进行的鎮压；与宗教势力联合在一起反对求知的自由，同时幷不利于国家的統一、国家的力量；在胜利中虽有得有失，但是受到摧殘的总是自由和工业。而在英国的则是：城市的勃兴，工农商业的进展；貴族服从本国法律，因此积极参加了立法工作，参加了国家行政与司法工作，同时也分享了工业利益；国內資源与国外政治势力的同时发展；国內和平；在一切落后国家占有的势力；国王权力受到限制，但在王室收入、在声名显赫与地位巩固方面都有所增进。总之，在国内是进一步提高的幸福、文化和自由，在国外是压倒一切的权力。

英国怎样会获得这样圓滿的結果，在造成这种結果的各种因素中，有多少应当归功于它的国民精神与政体，有多少应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与过去的境遇，或者还可以說，有多少应归功于机会与命运，这又有誰能肯定呢？

假使把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的地位对調一下，则由于一次下流的离婚案的結果，英国与西班牙的情况，在德国与尼德兰或者也会照样发生，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們为什么說“想象得到”，讀

者一定明白)。假使把与腓力二世这样一个人联姻的那个軟弱妇人放在伊丽莎白的地位，那末大不列顛在它的力量、文化、自由各方面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說在这个偉大变革中，只有国民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一切問題的关鍵所在，那么获得其中有利結果的最大部分的，岂不就应当是变革所由发生的那个国家——德国嗎？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在这个走向进步的运动中，除了灾害与衰弱以外别无所获的，恰恰就是德国。

关于貴族制度，在欧洲各国中再沒有象英国那样安排得尽美尽善的了。它使貴族在对国王、对民众的关系上获得了个人的独立、尊严与安定；給与他們在議会中的鍛炼机会与地位；把他們的活动力导向爱国的与国家的目的；鼓励他們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吸入他們自己的队伍，使平民不論在天才上、在异常的財力上或是在巨大成就上有卓越表現的都归入他們的团体；另一方面，对于貴族后裔过剩的部分則仍然使之回入民众的巨流，这样就为貴族与平民在将来的合而为一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样的处置，使貴族在公民精神、爱国精神、科学以及智力与物质資源等等方面可以不断地从民众中获得新的增益；同时貴族又把自己特有的文化及独立精神的一部分不断地归还給人民．使他們自己的子孙不依賴先人的余蔭而自食其力，可以使民众由此获得一种新生力量的导源。在英国有爵位的人，他們子孙无論怎样众多，在同一时間内只允許有一个人继承爵位，家族中的其余成員都是平民，要依靠专門学識，或从事于行政事务，或工农商业来謀取生活。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在英国享有最高爵位的貴人，他起了一个念头，想邀集他一族中所有的人来举行一次宴会，但是他終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計划，因为他的家系虽然不过起源于不多几个世紀以前，而同族中人已无法計数。要說明这种制度在进取精神、在殖民地开拓、在

权力与自由、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上所发生的影响，簡直有整整一本书可写。[1]

英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英国在对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向来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对于大陆各国間敌对、偏見、自私、激动、灾禍种种方面的影响，总是无所沾染的。它所以能够在政治組織上作独立、純正的发展，宗教改革所以能安然完成，宗教財产所以能充作大有裨益于各种工业的世俗用途，主要是由于这种隔离的状态。它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內战时期以外，它享受和平接連达数百年之久，从而使它免除了常备軍設施，使它在很早就能够采行一貫的关税制度。

英国由于它的島国地位，不但得以避免了爭夺領土的战爭，而且从大陆战爭中还可以为它的工业优势取得极大的利益。陆上战爭与地区的遭受破坏，使战爭中心的工业受到种种損害；直接妨碍农业，毁坏农作物，从而剝夺了耕作者所賴以购买工业品幷为工业家生产原料与食物的手段；間接往往使工厂被毁，或者至少被破坏，因为战爭足以妨碍原料品輸入、工业品輸出，因为这时厂主势必要負担額外的、繁重的捐税，幷且在資本与劳动的取得上发生困难；还有一层，即使在战事停止以后，它的不利后果仍将继續发生作用，因为农民和他們的收获在战时受到的損害越大，則資本与劳力就越受农业工作的吸引而从工业中轉移过去，从而为資本与人力的使用开辟了一个比工业更为簡捷有利的領域。象这样的情况在德国大致每百年要重演两次，它使它的工业倒退，而英国的工业則不断前进。每当英国用装备战艦与軍队的办法，或用津貼的

---

① 发表这个意见的这位天才作家已經逝世，深可哀悼。在他的《关于英国問題的几封信》里，关于这里所述及的問題，他对他本国的貴族曾有所告誡，这是值得他們銘記在心的——英譯本注。

办法，或两者兼用，准备积极参加海外战争时，英国的工业家，与它的大陆竞争者正相反，却可以从中获得一倍或两倍的利益。

有人为非生产性支出、即用于战爭与維持龐大軍队的支出作辯护，认为这是絕对有利的，我們不能同意这种主張，有人认为公債的性质是絕对有利的，对于这个說法我們也未能贊同；但是我們也不相信流行学派的那种論調，他們认为凡是不屬于直接再生产性质的消費——例如战爭消費——都是絕对有害的。关于軍队設备、战爭以及由这类目的所发生的債务，在某种情况下对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严格地說，物质財富的消費有时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但这种消費却可以刺激工业家，使他們作格外的努力，由此可以导致新的发現与改进，特别是生产力的增长。这种生产力取得以后就长期存在；战爭費用只是限于一次的，而生产力的增进却是继續不已的。① 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象英国那样的有利情况下，国家对于每項那些理論家认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所得会大大超过所失。英国的情况的确是如此，这是可以用数字証明的。这个国家在战爭中，单单就棉布业一項所获得的生产力而言，每年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价值，就超过了国債增进項下所須支付的利息，且不提其他一切工业部門的广泛发展与殖民地財富的增进。

最显著的是在欧洲大陆战爭期間，当英国在大陆上駐有軍队須支付費用或津貼时，它的工业由此所获得的利益。这类費用是

① 如果英国的貴族承认，应由在战爭費用上获得利益的那个阶級，即富裕阶級，来負担国債，则英国的国債就不致使我們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大的一个灾害。据麦奎恩估計，三个王国財产的資本价值是四十亿鎊，又馬丁估計，投于各殖民地的資本約二十六亿鎊。由此可见，英国私人財产的九分之一即足以与全部国債相抵。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拨偿国債，或者至少从所得稅收入項下拨付債务利息，似乎是再公平也沒有的办法。但英国执政者却认为用对消費品征稅的办法来应付这方面的費用比較合宜，这就使工人阶級在生活上受到的打击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全部用英国工业品形式支付的，它把这些工业品运到战争地区，那里的工业原来已极度困难，由此就更快地使它趋于末路，而英国工业从此就占有了那个国外市場。这种行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异是一种出口津貼，得到好处的是英国人，遭殃的是外国工业家。[①]

在这样情况下，以大陆各国的工业而言，英国人以同盟者身分所給与它的害处，实在比英国人以敌人地位所給与它的害处更大。倘使要为此說寻找根据，我們只須举出七年战争与对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这两个例子就够了。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利益已經够大的了，但是还不止这些，有些人被英国的政治、宗教和地理条件所吸引，移居到了英国，其由此所发生的影响对英国利益之大，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一些。

远在十二世紀时，就有法兰德斯的羊毛織工为政治环境所吸引，移居威尔士。不多几个世紀以后，有被放逐的意大利人流入伦敦，經营錢兌业和銀行业。在不同期間，曾有法兰德斯与布拉奔技工整批地流入英国，这在第二章里已經提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是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从汉撒各城市、从衰落了的威尼斯来的是商人，随着他們一道来的是他們的船舶、商业知識、資本和进取精神。还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有大量資本和工业家流入英国；还有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荷兰由于航海条例与麦修恩条約的影响，出現了工商业停滞状态，因此有許多商人与工业家流入了英国。只要在英国具有自由的权利，避难的便利，国内安定和平，有法律保障以及一般福利，只要英国具有这些特点，则每一次政治运动，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就会使它在資本和人材方面获得大量的新生力量。例如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与由这个帝国引起的多次战役，

① 参閱附录一——英譯本注。

又如在西班牙、墨西哥、南美洲发生的政治暴动、革命的与反动的运动和战爭,情況都是这样。英国凭了它的专利法,长期独占了每个国家的发明天才。英国工业的成长与进展已經登峰造极,它的生产力原是由欧洲大陆各国得来的,如果現在飲水思源,把其中一部分归还給原主,那才公平合理。

## 第五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英国人为了要在最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繁荣的結构,足足忙了几个世紀,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却凭了他們的新发現,一下子就发了財,在极短促时間內拥有了巨大財富。但这是浪子手里的財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財富則好比是一个克勤克儉的家长辛苦集聚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戶,浪費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値得羡慕,但是在他手里的財富只是供作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則把財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爭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这使英国的亨利一世远在1172年就禁止輸入西班牙羊毛,而意大利毛紡織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远在十世紀及十一世紀时,就一直是取給于西班牙的。在那时以前二百年,比斯开灣一带的居民就以制鉄、航海与漁业著称于世。他們是最先从事于捕鯨业的,直至1619年,他們在这一事业上还远远胜过英国,英国还特为請他們派专人到它那里去傳授捕鯨技术。[①]

摩尔人十世紀时在阿卜都拉曼(Abdulrahman)三世統治下

① 安德森:《商业的起源》,第1卷,第127頁;第2卷,第350頁。

(912—950年)，就已經在瓦倫西亚一带的沃野从事于棉、稻、甘蔗的种植和育蚕事业。哥尔多华、塞維尔和格拉那达在摩尔人的时代就已有了比較发展的絲織业与棉織业。[①] 瓦倫西亚、塞哥維亚、托利多与卡斯提尔的几个别的城市都是以毛織业的发达聞名的。单是塞維尔一处，在历史上很早的时代，就已有織布机一万六千架；当 1552 年，塞哥維亚的毛織业就有一万三千工人。其他各业，尤其是武器与紙張的制造，也有相似的发展。法国当科尔伯特的时代，还慣于向西班牙采购毛織品。[②] 西班牙的口岸城市是广大貿易与重要漁业的中心，它直至腓力二世时代止，一直拥有最强大的海軍。总之，西班牙是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的，而专制政治与頑固不化結合在一起，却要来摧殘国民的进取精神。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首先表現在驅逐犹太人，表現得最激烈的是驅逐摩尔人，由此把二百万最勤奋而富裕的居民連同他們的資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的排除异端精神就这样地把本国的工业放逐出境，同时也不許国外工业家在西班牙境內安家落戶。至于美洲大陆与好望角航綫的发現，对于这两个国家財富的增进，性质只是浮而不实的，一瞬卽逝的——实际上这类发現对两个国家的工业、两个国家的力量首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并不象后来荷兰人与英国人那样用本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群島与西印度群島易取物資；而只是用他們从殖民地榨取得来的金銀向外国购买工业品。[③] 它們的国民原来是勤恳的、有用的，在它們的政策下却

① 西門：《英国观察者的評論》，《西班牙商业及財政評述》。烏斯塔里玆：《商业理論与实践》。

② 沙普塔尔：《法国的工业》，第 2 卷，第 245 頁。

③ 葡萄牙与中美洲及南美洲通商时，它所輸出的主要是貴金屬，从 1748 到 1753 年間輸出額卽达一千八百万披亚斯特。参閱洪保德：《論西班牙王国的政治》，第 2 卷，第 652 頁。它对那些地区以及对西印度群島的貿易，由于传入了种植甘蔗、棉花、咖啡等事业，最初占有較大比重。

变成了买卖奴隶的販子，变成了殖民地的专制魔王。它們就这样助长了荷兰与英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养肥了敌人，引火燒身；这些国家不久就壮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們的艦队，夺取它們的財源。后来西班牙的一些国王制定了禁止金銀輸出、禁止工业品輸入的命令，但是毫无实效。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发荣滋长；只有工业懂得怎样吸引并使用金銀时，金銀才能保持住。

但是葡萄牙在一位开明的、有权力的大臣主持之下，对于工业的发展确曾作过一度努力，努力的初步結果使我們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一样，从远古以来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斯特拉波(Strabo)告訴我們，曾經有一批优种羊由亚洲傳入葡萄牙，每只的代价是一个泰倫(talent)。当厄勒塞拉(Ereceira)伯爵于1681年当权时，他想到了一个計划，要設立毛紡織厂，利用本地原料，以本国工业品供应本国和殖民地。为此特向英国招来了紡織工人。这些毛紡織厂在当局照顾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結果在三年以后(1684年)就使他可以实行禁止毛紡織品輸入。从那个时候起，葡萄牙就把用本国原料制成的这类工业品供应本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得非常順利，这样經过了十九年，这种情况在英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有証明。[1]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經显示出了它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更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当时英国人为了逃避葡萄牙对毛織品輸入的关稅限制，它們把这类出品加以改头換面，称之为嗶嘰或毛毯，实际上用途相同，然后把它輸入葡萄牙。但是这种伎俩不久即被发覺，这类貨色随即也被禁止輸入，詭計归于无效。[2] 葡萄牙这次发展毛紡織业居然获得成功，的确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因为

① 《英国商人》，第3卷，第69頁。

② 同上书，第71頁。

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由于驅逐犹太人而流出了大量資金，而且还一直受着頑固势力、腐敗政治与封建貴族的毒害，人民自由与农业生产长期受到了摧殘。[1]

但是在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1703 年，有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地說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許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納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許英国毛織品进口时按照 1684 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納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于葡萄牙将大大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签訂这个条約的主要动机，看上去好象是葡萄牙国王方面的希望增加关税收入与貴族方面的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約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当年那些不幸的国王被罗馬的元老院拖下水，与它发生进一步密切关系时，元老院对这些国王也是慣于使用这类称呼的。两者所奉行的是同一个原則。

这一条約締結以后，頃刻之間，英国工业品即泛濫于葡萄牙市場，而且立見分曉的是葡萄牙工业突然而彻底的崩潰。这种結果跟此后与法国签訂的所謂伊甸条約以及德国廢除大陆制度的情形极为类似。

根据安德森的証言，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在海关报单上将貨值以多报少的技巧就已經那样精通，結果他們实际支付的税款还不到应納税款的半数。[2]

《英国商人》有这样一段記載："禁令取消以后，我們从他們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銀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經几乎不足以供应他們的需要；于是我們把目标轉向他們的黃金。"[3] 这样的貿易由

---

[1] 《英国商人》，第 3 卷，第 76 頁。

[2] 《商业的起源》，第 3 卷，第 67 頁。

[3] 《英国商人》，第 3 卷，第 267 頁。

英国人一直继續到最近时期。他們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貴金屬全部运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到东印度群島与中国的，然后，象在第四章里已述及的那样，在那里把貴金屬換成貨物，运售欧洲，換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輸出額超过由那个国家的輸入額达一百万鎊。由于貿易上这种順差現象，使外汇率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著者向那位鼎鼎大名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說："我們对葡萄牙貿易中，差額的有利于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貿易所不及，我們現在从那个国家輸入的硬币已达一百五十万鎊，以前不过三十万鎊。"①

从那时起，所有英国商人、經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致贊揚这个条約，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杰作。安德森对于有关英国商业政策的一切問題是具有清晰的观察力的，而且討論这些問題时态度也是非常坦率的，他也称贊这个条約是"极度公平而有利的"，他也不禁要天眞地高呼，"但願它能够天长地久地继續下去！"②

直到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一种与这类异口同声的論調直接相反的理論，他认为麦修恩条約并不在任何一点上对英国商业有什么特殊利益。輿論对这位轟动一时的作家表示了盲目信从，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是很荒謬的)見解。如果要問为什么对他意見的信从是盲目的，只須举出一点就够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意見，直到現在还存在着，沒有人加以反駁过。

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四編第六章里說，根据麦修恩条約，葡萄牙的酒进口时只須繳納别国所繳进口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給与葡萄牙人的明确的利益，而英国人以毛織品运往葡萄牙时，仍須照繳与别国同样高的关税，因此英国人并沒有从葡萄牙人手里

① 《英国商人》，第3卷，第15、20、33、38、110、253、254頁。

② 安德森关于1703年的論述。

获得任何特殊利益。但是我們要問，葡萄牙人在这个条約成立以前，关于他們所需要的国外商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难道一向不是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輸入的嗎？难道英国人此后沒有把葡萄牙市場据为己有，来銷售那种在他們本国有原料制造的工业品嗎？难道沒有找到一个窍門，使葡萄牙关稅减低了一半嗎？难道在英国消費葡萄牙酒的人，沒有由于外汇率的关系，享有了百分之十五的利益嗎？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行銷，难道幷沒有近于完全停頓嗎？难道葡萄牙的金銀幷沒有給英国人供作向印度換取大量商品的手段，然后使英国人把这些商品泛濫于整个欧洲大陆市場嗎？葡萄牙的毛織业难道沒有被全部摧毁，从而使英国人获得莫大利益嗎？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尤其是那个富饒的巴西，难道沒有因此在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嗎？这个条約对于葡萄牙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徒有其名；而英国人所获得的却是在作用上、效果上的实际利益。在英国人此后所訂的各种商約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傾向。在表面上他們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說，他們实际上始終是利益壟断者。

亚当·斯密第二个論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未能从这一条約获得任何特殊利益，是由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把出售毛織品以后由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錢財轉付給别的国家，幷因此在那些国家购入商品；这就是說，他們如果用毛織品去直接掉換那些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就可以通过一次交換来完成由于对葡貿易不得不通过两次交換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直接交易对他們要有利得多。我們对于这位崇高学者的品格与智慧固然深为敬服，但是象这样的論証，使我們对于他的大公无私，或对于他的敏銳的理解力，实在不能不感到失望。如果要我們不存此想，那就要使我們想到，深可叹惜的是人类性格上的弱点，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显的表現的，他的另一些論据也往往是不合理的，几乎是

可笑的；显然，他所要竭力辯护的是絕对自由貿易原則，他为这一本身就很光荣的使命的絢烂夺目的光彩，已經弄得有些眼花繚乱了。

关于刚才提到的論証，我們可以作一个比方。一位面包师傅，他售出面包时向顾客取得的是現款，他就用現款向磨坊买进了面粉，据說这样做生意就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他用面包直接調換面粉，他就通过一次交換而不是两次达到了他的目的。上述論点所含的理論性或邏輯性实际上并不比这个比喻所含的高明些。要說明这个一次交換办法的行不通是再簡单也沒有了，磨坊的主人也許不需要这位面包师傅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面包，再說他自己也許懂得烤面包，或者事实上也是在那里烤面包，因此不經过两次交換，这位面包师傅的业务就无法进行。葡萄牙与英国在签訂条約时的商业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葡萄牙把工业品輸出到南美洲，在那里換来了黃金和白銀；但是由于它的懶惰无能，它自己沒有能制造这些工业品，就用金銀向英国交換。英国却不需要这些貴金屬供作国内流通，就把它們运到了印度或中国，在那里购入商品轉卖給欧洲大陆，然后在大陆上換取了农产品、原料或仍然是貴金屬，把它們运回本国。

我們現在要凭常識提出一个問題，假使葡萄牙人对于那些毛織品願意自己动手来制造，或者願意向别的国家采购，那么英国人手里的那批貨色又有誰向他們来买呢？在那样情况下，英国人的这批毛織品既不能卖給葡萄牙，也将无法卖給别的国家，因为英国人的毛織品在那些国家里早已作了尽可能的推銷，已經无法继續推进。結果英国人势必按照他們曾經售給葡萄牙的那个部分的比例，減少毛織品的制造数量；势必按照他們曾經向葡萄牙取得的金銀的那个数量，減少对印度的金銀輸出量；他們运售欧洲大陆的印度商品，势必按照那个数量減低；結果运回他們本国的原料也势必

按照那个数量减低。

亚当·斯密第三个論点认为，葡萄牙金錢如果不流入英国，英国仍然有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論点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按照他的想法，葡萄牙人手里的金銀既有余，这个剩余部分无論如何总是要外流的，总是要通过某些别的途徑流入英国人之手的。我們这里不妨假定，葡萄牙自己动手制造了毛織品，他們把多余的金銀运到印度和中国，然后向别的国家买回了他們所需要的貨物；試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又能到手多少葡萄牙的金銀呢？再說，葡萄牙如果与荷兰或法国签訂一个麦修恩条約，在它也是一样的。毫无疑义，在这里所假定的两个情况下，总会有一小部分金錢輾轉流入英国，但只是限于它出售生羊毛时所能获得的那一些而已。总之，如果沒有麦修恩条約，英国的工商业与航运业是决不会达到已有的那种发展程度的。

但是就麦修恩条約的影响来說，关于涉及英国方面的，无論作如何估計，姑作别論，关于涉及葡萄牙的方面，至少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这个条約决沒有能誘使别的国家，为了利于农产品輸出，也在它們国內的工业品市場对英国有所让步。葡萄牙与英国有了来往以后，它的工农商业与航运业不但无所进展，而且日趋下降。庞巴尔曾經力图振作，但是沒有用，英国的竞争破坏了他一切的努力。同时也必須指出，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社会状态对于工农商业的进展是格格不相入的，因此商业政策在这里能发生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尽管如此，通过庞巴尔所实現的那一点点成就，已經足以証明，只要能够首先把一国的社会情况中所出現的內部障碍除掉，則一个力求发展工业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后两个继承者統治下所經历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在波旁皇室下对于国內工业所实行的保护

措施很多失当的地方，对于关税法令的认眞施行也极度缺乏能力，但是当它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用到它本国时，各地区、各部門的工业都有了生气，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①] 从烏斯塔里兹和烏洛阿的叙述里，[②] 我們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而工业推进方面居然能收到一些效果，眞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一般社会状态簡直是糟透的，到处是极骯髒的道路，絕对找不到設备齐全的旅館，也沒有桥梁、运河与內河运輸，每一个省区都設有地方关卡，与国內其他省区相隔絕，进入任何城市都須繳納入城稅，拦路打劫和沿門乞討成为正常职业，走私买卖盛极一时，捐稅的苛杂达于极点——这些都是上述两位作家认为西班牙工农业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其实所有这些灾害的根源是在心理上的偏信、盲从、不实事求是，是教士的貪婪腐敗，貴族的享有特权，政府的专制横暴，以及民众的愚昧与缺少自由，而两位作家对于这些却沒有敢公然指斥。

英国于 1713 年与西班牙签訂了阿西安托条約，这是同与葡萄牙訂立的麦修恩条約堪以媲美的，在这个条約下英国人获得权利，每年得以一定数目的非洲黑人运入西屬美洲，英国商船每艘每年得駛入波托貝洛港一次。这就使他們有了机会得将大量私貨运入这个国家。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英国人所訂的一切商业条約总不脫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約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們工业品的銷路，給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則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們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貸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

---

① 麦克弗森：《商业年鉴》，1771 年及 1774 年。对国外商品輸入施行的种种限制，大大地促进了西班牙工业的发展。在那个时期以前，西班牙所需的工业品取自英国的占二十分之十九。——布魯阿姆：《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研究》，第 1 部分，第 421 頁。

② 烏斯塔里兹：《商业理論》。烏洛阿：《西班牙工业的复兴》。

如果不能享有低率关税待遇，在这一点得不到便宜，他們就会想尽一切方法漏税逃税，組織大規模組織的非法买卖。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在葡萄牙行之有效的是前一办法，在西班牙实現的是后一个。在这个問題上，进口税从价的原則对他們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們近来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宣傳，要使人們相信，从量納税的原則——象普魯士所采用的——是要不得的。

# 第六章　法国人

法国也是继承了罗馬文化的許多殘余的。当日耳曼族法兰克人侵入时，这些人所爱好的沒有别的，只是打猎，因此有許多久經耕种的地区又变成了森林与荒地，使法国几乎又失去了一切。法国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在中世紀时农业所以获得进展，大部分有賴于宗教势力，不过后来成为文化发展上一个重大障碍的也是这个势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貴族那样不断地从事于仇杀、竞爭，并不以兵役义务来磨难他們的奴屬，田地与牲畜受劫掠与破坏的危險也比較少。教士們所喜欢的是安閑生活，反对的是爭吵，而且往往願意扶危救困，以此来博得声誉和别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話，“寄居在教門中人的屋檐下总是幸福的。”对于法国早期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十字軍、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与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紀时，諾曼地与布列塔尼就已經从事于制造毛織品与麻織品，供国內消費并运銷英国。这个时候，它的酒与盐的出口业务，主要由汉撒商人为居間，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法兰西斯一世的努力，法国南部开始有了絲織业。亨利四世也重視这一工业，同时并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紡織工业的发展；

里舍留与馬扎藍也曾注意促进卢昂和色当的綵綢、天鵝絨与呢絨制造业以及漁业与航运业。

美洲的发现使法国受到了最有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当时是再沒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的。法国西部所产谷物运銷西班牙的数量很大。比利牛斯山区每年有許多农民移入西班牙东北一带去找寻工作。法国曾以大量的酒和盐运銷西班牙屬尼德兰；它的綵綢、天鵝絨、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銷售尼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于这些原故，在很早一个时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币与銀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科尔伯特开始的。

当馬扎藍死的时候，法国不論是工商业、航运业或漁业都沒有达到重要地位，那时法国的財政更处于最恶劣的境地。

科尔伯特却有勇气独立担負起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在英国是經过三个世紀不断努力、两次革命的代价，才得以順利完成的。他向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收买商业上的秘訣，并广泛搜罗精美的机械和工具。他实行了統一而有效的稅則，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場。对于內地关稅尽可能地撤廢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积极建設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內运輸。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因为消費者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費者之間的接触很便利，而且运輸的代价低廉。他又降低了对地产的直接稅，減輕了以前征稅时在手續上的那种严厉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稅負担，最后还实行了降低利率的办法，这样就使农业方面获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当谷物供应不足、价格高漲时，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对于国外貿易的推广与漁业的发展特別重視。他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重新建立了商业关系，扩大了对殖民地的貿易，开辟了对北欧的貿易。他对于行政的一切部門采行了最严格的节約措施，并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时候，法

国制造毛織品的紡織机已經有五万架，每年絲織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国家的岁入已增加了二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繁盛的漁业，大量的商船，一支强大的海軍。①

隔了一个世紀以后，有些經济学家对科尔伯特严厉地加以責难，认为这位政治家急于促进工业利益而以农业利益为牺牲。这样的責难是过当的，只是說明了这些作家自己对工业的本质并沒有充分了解。②

但是，科尔伯特即使对原料出口反对作定期性的阻止，被认为在这一点上措施失当，然而由于对国内工业发展的鼓励，他却使人們大大地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要，使农业获得了十倍于上述損失的补偿。如果說他对工业規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强制实行，違背时即加懲罰，因而认为他違反了政治家的开明風度，那么要曉得，这样的措施是适应时机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也还是最有利、最适当的，那个时候人民处于长期专制統治下，意志消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对于有进步意义的革新也抱着反对态度，科尔伯特所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民。

有人說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使法国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国内工业，这只有对南特敕令 (the Edict of Nantes)廢除后的极度悲惨后果完全視若无睹的那个学派，才能把这个罪过加在科尔伯特身上。在他死后的三年間，由于上述敕令廢除后的种种倒行逆施，

① 納克:«对科尔伯特的頌詞»(1773年)(«全集»，第15卷)。

② 参閱魁奈的論文«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1768年)»，注5，"关于第八准則"。魁奈在这里以短短两頁的篇幅对科尔伯特进行駁斥，而納克則用了整百頁的篇幅来說明科尔伯特所施行的制度和它的成就。魁奈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对于工业、历史、財政一类問題的无知，是在沒有任何确切依据下对于象科尔伯特这样一个人輕下結論时的武断态度，就这两点来說，究竟哪一点更加使人感到惊奇却难以断言。不仅如此，这个无知的妄人甚至不够坦率到連当时法国新教徒雨格諾派受到驅逐这一事都避而不談；还有，他甚至顚倒黑白，并不以为耻，說科尔伯特曾經用强制法令，限制各省区之間的谷物貿易。

法国最勤奋、最干练、事业上最成功的五十万居民被迫离开祖国。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特别是普鲁士，还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他們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戶，把他們的事业和資本带了过去，这就使他們的祖国受到了双重損害。这样就由于法皇一个姘妇的阴謀毒計，在三年之中，毁灭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丰功偉績，使法国再度陷于那种奄无生气的情况；而英国則在宪法的庇护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国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伊丽莎白和她的上一代开始的那些建設事业一直在稳步进行，中間从未停頓，而且热情越来越高。

法国由于长期的政治腐敗，它的工业与財政状况毫无起色，与英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恰恰成一鮮明对比，因此在大革命将发生以前，引起了法国政治家們的仿效心。他們被那些經济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論所蠱惑，与科尔伯特的政策方針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貿易，以此为补救办法。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輸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暢銷，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英国对于这个建議当然极度欢迎，要它对法国来一个麦修恩条約的翻版，它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成立了 1786 年的伊甸条約，这个条約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結果，与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絲毫沒有两样。

英国人是习慣于伊比利亚半島的烈性飲料的，因此对法国酒的消費量幷沒有增加到原来所想望的程度。这时更加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們在英国行銷的只是一些时兴貨和小工艺品等杂貨，这些貨物的总値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値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賒銷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經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

是法国人想赶紧止住这种恶化現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約。結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訓：已經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間一敗涂地，已經受到摧殘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間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爭在法国已經引起了对英国貨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鏟除，結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續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約廢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說，要他們对伊比利亚半島的烈性酒重溫旧好，却并沒有什么困难。

大革命的騷动与拿破侖时代不断的战爭，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貿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場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縛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鎖范圍內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

拿破侖曾經鋒芒毕露地說过，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将一敗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說，他在这句話里所表現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經济学家在他們著作中所表現的。这位偉大的天才，以前并沒研究过这些学說，却能明智地了解工业力量的性质与重要性，不能不叫人惊叹不置。他沒有研究那些学說，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說，眞是一件好事。拿破侖說过："以前对于財产只有一种說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現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財产，这就是工业。"拿破侖看到了，并且在这里清楚地說明了他同时代經济学家所沒有看到或者沒有明白表达的一个事实，即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工业与农业力量結合在一起的国家，比較一个单純的农业国家，在完善程度上，在富力上，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拿破侖树立了并促进了法国的工业教育，提高了国家的信用，采用了許多新发明与改进的操作方法，改善了国內交通运輸設备，这些都不必細說，因为大家都还記忆犹新。不过有

一点在这里似乎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現代一些理論家对于这位非常高明的、煊赫一世的統治者作出了有偏見的、不公平的評价。

拿破侖时代过去以后，英国竞爭势力，原来其活动只限于走私买卖的，这时在欧洲和美洲却又站稳了脚步。这时我們第一次听到了英国人反对保护政策、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的論调，这些讲究实际的島民以前是把这一原則看成不可实行的幻想的。但是任何观察者，如果不存私見、有相当鉴别力的話，当可很容易地看出，在这种論调的轉变中，幷不存在絲毫博爱主义的感情动机。只有当涉及的問題是如何促进英国商品运銷欧美大陆的便利时，他們才用得着世界主义論据；一等到問題轉向到谷物的自由輸入，或者牽涉到外国商品是否允許在英国市場与它本国工业进行竞爭时，他們所援引的就完全是另一套原則。① 据說不幸的是英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虽与自然原則相違背，但存在已久，已經以人力造成了一种形势，如果加以突然的干預，就不免会发生危險，发生不幸的后果。因此非經过十分謹愼周詳的考虑，不可輕于

---

① 鮑尔文先生，一位极有才能的美国演說家，美国的高級法院院长，当他谈到坎宁-赫斯启森自由貿易制度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这个制度同英国多数的产品一样，是专供出口，不是为国內消費而設的。

当坎宁-赫斯启森制度发表时，法国和德国的自由党員，尤其是主张博爱的世界主义理論家，其中格外突出的是薩依先生，都表示热烈欢迎，兴奋到了极点；我們想起了这类情况时，是笑好呢，还是哭好呢？这时的狂欢气象，簡直要使人感到理想中的黃金时代已在眼前。但是让我們来看一看为坎宁先生作传記的人，他关于这位大臣对自由貿易問題的见解是怎样說的。

"坎宁先生充分相信那个观念原則的眞确性，就是說，他认为商业在任其自由自在的情况下一定是最发达的；但是由于我們祖先的见解既不是这样，处于我們周围的各国的见解也不是这样，并且由于在一切商业关系上已經加上了种种束縛，这就形成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謹愼小心地应用那个观念原則，那么不管它在理論上怎样正确，在实践中也許会引起些悲慘后果的。"（斯塔普尔頓：《坎宁先生的政治生活》，第3頁。）

1828年，英国的这一套策略又盛极一时，因此自由党議員休謨先生在議会中曾毫不犹豫地加以斥責，說这类策略是要置欧洲大陆工业于死地的絞索。

尝試。这是英国的不幸，并不是它的过失。欧美大陆各国毫无拘束，因此可以充分自由地、及时地来共享自由貿易之福；据說这是它們的佳运，是应当格外感到心满意足的。

在法国，它的旧王室在英国保护下或至少在英国金錢势力下重新登上了王位，但上述自由貿易的論据却沒有能够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貿易使法国在大陆封鎖制度下壮大起来的工业受到了重大破坏，因此不久法国就采用了禁止制度，以图挽救。根据杜潘的紀录，[1] 从 1815 到 1827 年間，法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了一倍。

# 第七章　德国人

在叙述汉撒同盟那一章里，我們談到了德国怎样由于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次序上仅后于意大利，而远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繁盛了起来。我們現在必須先把它最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情况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后接着叙述它的工业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猎用的。那时的农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为簡陋，这項工作是丢給奴隶和妇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务是战争与打猎；这就是德国貴族身分的发端。

在整个中世紀时代，德国貴族所坚守的就是这种制度，压制农夫，反对工业；至于他們既处于領主地位，这两項事业的发展必然能使他們获得利益这一点，他們却茫无所知。

的确，德国貴族对于行猎活动这种相沿已久的傳統的爱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們久已在犁头上、織机上发了財，但

[1] 《法国的生产力》。

是对于那个祖傳的工作还是念念不忘，在議院中还梦想保留狩猎事业与狩猎規則，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好象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間，可以用于园艺、植林及科学耕作，也可以供作野猪与鹿兎的馳逐之場。

德国的城市与寺院对于邻近地区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虽未可忽視，但它的耕作事业則长期停滞在未开化状态。

这时在古罗馬屬地，在尘世与宗教首脑人物駐在地区，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他們势力范圍、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漁业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所在，兴起了許多城市。这些城市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对当地需要的供应以及国外运輸业务的經营而获得发展的。那个时候要使国內工业获得广泛发展，要使它能够支持出口貿易，只有从大規模发展养羊与植麻事业着手。但是大規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发展农业，而从事于大規模养羊則必須具有防御狼群与盜賊的保卫設备。当时在各个諸侯与貴族彼此之間以及对各城市不断发生着爭斗，在这样情况下，安全的环境就无法实現。牧場上的牲畜总是盜劫的主要目标；而貴族們为了爱好野猎，謹愼地保留着大片的森林地带，这样对于野兽的为患就談不到彻底扫除。豢养的牲畜旣少得可怜，生命財产的安全又沒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資本和自由两个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則对于农业的发展全无兴趣，这样就必然使农村以及城市的发展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将这些情况作了适当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完全相反情况下的法兰德斯与布拉奔能够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实現了那样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可是虽然障碍重重，沿波罗的海与北海的德国城市，由于漁业、航运业与海外貿易的关系，終于获得了发展；在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則由于意大利、希腊及陆上运輸业的影响而有了

发展；在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則靠了从事于葡萄种植与酒类貿易而有了发展，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紀时路政不修，陆上交通困难，加以普遍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比現在还更为重要，这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联盟，如汉撒、来因、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联盟，各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联盟組織由于普遍貫串着一种少壮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强盛了一个时期，但它們所普遍缺乏的是內部的安全保障，是团結一致的原則和力量。由于貴族所有地的存在，由于乡村間存在着的农奴制，这些城市是互相分离的，它們的联盟迟早会垮台的，因为这时农业人口逐漸增加，境况也比較富裕(通过当地統治者的势力，他們彼此之間原来存在着团結的关系)。这些城市如果在农业发展上企图有所进展，則首先必須設法与农业阶級或貴族阶級相結合，使之成为联盟組織中的成員，否則将自取灭亡。但是它們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覚才能与知識。它們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們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这些联盟組織中只有两个，瑞士联邦与七省联盟，的确实現了这种結合，这也并不是由于深謀远虑的結果，而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当时环境也有利于这样的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联盟就得继續存在。瑞士联邦不过是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是由居于这一地带的自由人民結合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

其余的德国城市联盟都已沒落，这是由于它們藐視乡村人民，荒謬地认为市民身分高于农民，以此自傲，看到农民处于屈从地位反而沾沾自喜，并不想从事于提高他們的水平，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襲王室的威权才能达到統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操于各諸侯之手，他們为了使自己的独断統治避免受

到約束，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級位較次的貴族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他們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个世襲帝国的成立。

因此德国的国王都坚持着罗馬帝国的观念。皇帝只有居于軍队首領的地位时才能算是統治者，只有在进行战爭时才能使那些諸侯以及城市处于他們的旗帜之下。所以在德国受到国王的保护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国王的敌視与摧殘。

但是对罗馬几次的远征，不但越来越削弱了德国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国范圍以內，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原来是可望建成一个統一政权的，但是霍亨斯陶芬王室傾覆以后，統一政权的核心也就随之化为齏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来是旣貧且弱的，它看到国家无法获得巩固，就从事于利用国民精神以降服异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国东南境建成了一个巩固的世襲君主政体，后来勃兰登堡的侯爵們在东北境也仿效了这个办法。这样就在东南和东北以对异族的統治为基础，建成了世襲王位的独立国，一方面在国境的西隅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它們与祖国越来越貌合神离，在国家內部也一直在鬧着不团結，实力日益消耗，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在世界范圍內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陆与通往印度新航綫的相继发現等等，使德国的厄运达于极度。

上文所說的这些智力上、社会与經济上的变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各組成部分之間、各諸侯之間、各城市之間、甚至各个城市的各行会之間以及各个等級的分子之間的傾軋分裂。全国的活动力这时所傾注的幷不是工农商业或航运业的发展，也不是殖民地的开拓或国內制度的改善，实际对于任何实质上的改进都全不在意．人們所爭論不休的只是在于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的問題。

这时汉撒同盟与威尼斯正趋于衰落，德国的大宗貿易，以及在

南北各城市的权力与自由，也就跟着一蹶不振。

于是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各地区、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躪。荷兰与瑞士都退出了，而国内膏腴之区则被法国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紐倫堡、奥格斯堡等，曾經在力量上超过一切选侯轄区，现在由于常备軍的存在而陷于完全无能的地位。

在变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权能够比較地巩固，各城市能够比較地团結一致，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于国家的統一、权力和自由，那么在德国工农商业的发展方面将获得如何不同的結果是不难想象的。有些政治經济学理論硬要我們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生产，与上述的一些观察相对照时卽不难看出，这种論調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視了一个事实，卽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德国采用了罗馬法，对德国来說，再沒有比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关系发生了莫可言状的混乱，而这一点还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劣后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种阶級，这些人是学者，也是法理学家，他們的精神，他們的語言，在在与民众不同，他們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无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們否认一切人类正确知識的价值，处处对公开的事理故神其說，所倚恃的是独断权力，这是一种最卑鄙的仗势行为，他們就在这样的权力下过生活，到处所宣揚、所辯护的只是他們的利益，自由的基础在他們手里受到了彻底摧殘。因此直至十八世紀初叶，德国在各方面还是非常落后，在文学、国家行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各方面都还沒有能脫离未开化状态；农业簡陋，工业与一切大規模商业都奄无生气，国家缺乏团結一致的力量，与外国发生交涉时处处显得軟弱无能，毫无威信。

只有一件东西德国人是保持着的，这就是他們固有的品质。他們热爱的是勤劳、秩序、儉約和节制，他們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撓精神，有誠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具有道德心与审愼周詳的态度。

这样的品质是統治者与被統治者双方所共有的。当德国国民性几乎被完全破坏而情势恢复平靜之后，人民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圍內从事于建立秩序，努力改进和爭取进步。他們对于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极度重視，那种热烈提倡的态度是再沒有别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絕对权力則施之于一般教育、秩序与道德的維持，施之于对弊端的革除与公共福利的促进，关于这方面权力行使时的恰当与有利也是别的国家所不及的。

德国国民性之所以能获得恢复，其基础无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实地把改作俗用的教会地产項下的收入，用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公用事业各方面。由于这类措施，就使国家行政与司法、教育与文学、工农商业、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各方面都有了生气。由此可見，德国的获得发展，它所遵循的途徑，是与一切别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則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結果。因此現在德国人的整个文化是屬于理論性的。也因此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含有許多不切实际的、古怪的特征，这一点在别的国家看起来是很触目的。

我們可以作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就象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原来未曾有机会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从理論上学会了怎样行走跳跃，学会了怎样吃喝，怎样啼笑，然后把他的理論知識付諸实踐。因此产生了德国人所偏爱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主义幻想。这种智力既不容干扰世界实务，就在純理論領域中竭力发揮。也因此使我們看到信从亚当·斯密及其門人的学說的，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处

为多，与坎宁及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論調表同情的，在别处也沒有象在德国那样地深切。

德国工业的最初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廢除，由于这一瘋狂措施，有无数逃亡者流入德国，他們的踪迹几遍及德国各地，因而就到处有了他們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如呢絨、絲綢、帽子、手套、珠宝、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国首先采取促进工业的政治措施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奥地利是在査理六世与瑪丽亚·賽里薩的时代实施这种政策的，但在約瑟二世时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奥地利以前由于驅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奋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极大損失，至于它紧接着实行的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么显著成就，却不能十分肯定。后来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改进养羊业、改进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結果即使在瑪丽亚·賽里薩时代它的工业就已有了相当进展。

在約瑟二世时代，对这一工作推进得更加有力，結果获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实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位皇帝的脾气向来是急躁的，在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进計划上都犯了过于冒进的毛病，結果奥地利与其他各邦比較，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这里的情况也和别处一样，說明凡事操之过急就难期有成，保护关税的实施，如果希望它能順利进行，不致成为对現状的一个扰乱因素，在开始时就决不可把税率訂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实行以后，經过时間愈久，它的优点就显示得愈加清楚。奥地利的工业及农业所以能够达到現在这样欣欣向荣的境地，主要是由于这种税制。

普魯士的工业在三十年战爭中所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别的国家为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的毛紡織业，在这一战役中差不多已完全毁灭。紡織工人大部分流入了薩克森，而这时英国

的輸入品使任何竞爭力量无法活动。于是发生了南特敕令取消的事件，在巴拉登領地以及在薩尔斯堡的新教徒也受到了迫害，从而使普魯士得以坐享其利。普魯士的統治者，这位偉大的选侯腓特烈二世，立刻就看到了伊丽莎白早在他以前所清楚认識到的一个事实。在他的策划之下，大批被放逐的教民流入了普魯士，这就使这个地区的农业有了生气，工业有了发展，科学与艺术也有了进步。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依照他的方針行事，跟着他的脚步前进，但是这位大王热情横溢、勇往直前的气概，却是沒有一个后人及得上的——他在承平时期的政策比他在战爭中的胜利更为偉大。关于腓特烈二世所采行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措施，这里的有限篇幅簡直无法詳論；通过这些措施，使大量的国外农民流入了他的領土，使許多荒地变为良田，培养起了大片草地，提高了牲畜飼料、蔬菜、馬鈴薯与烟草的产量，改进了馬、牛、羊畜牧事业，推广了无机肥的使用，等等，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农民阶級的資本和信用。这些还只是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直接措施，此外由于某些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間接利益更大。他建立了关税制度，改进了运輸工具，建立了銀行，使普魯士在工业方面有了在各邦中突出的进展。普魯士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順利地实現这些措施来說，并不見得有利，境內各区互相分裂，走私买卖的不良影响比那些大邦所受到的更为严重，那些大邦的地区大都是連成一片的，有海洋或河流、山脉为天然屏障，普魯士并沒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但是，它在各方面的进展仍然超过了那些大邦。

我們对于普魯士所施行的制度尽管作了这样的贊揚，但也絕不想替它掩盖缺点，例如它对于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点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点尽管存在而国家工业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是沒有一个进步的、无私的历史家敢于否认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見，沒有被虛妄的理論所蒙蔽，就一定能清

楚地看到，普魯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主要并不是由于它的煊赫战績，而是由于在促进工农商业利益与科学、文学进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賢明政策；而所有这一切却完全是那一位偉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这位国王所依靠的并不是一国中自然习尙的活动力，而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这种制度是有条不紊的，謹愼周密的，但也无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种死板的机械常規的牵制。

而德国所有其他地区，几世紀以来，却一直处于自由貿易势力之下；就是說，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把它的工业品自由輸入德国，却沒有人容許德国工业品輸入别的国家。这个規律未尝沒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是說拥护自由貿易的学派关于自由貿易巨大利益的預見和所作的諾言，通过这个国家的經驗已經获得証实，因为在那里到处所見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进步的現象。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紐倫堡、美因茲、科隆等等，人口已减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仅为了脫售一些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訴諸战爭。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跟着发生了战爭，也跟着发生了英国对于駐欧洲大陆軍队的津貼，从而使来自英国的竞爭变本加厉。因此使工业发生了新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农业似乎有了发展机会，但这种現象只是表面的、一时的。

接着出現了拿破侖的大陆封鎖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薩依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禍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有些理論家，尤其是英国的理論家，把这个政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不論他們怎样說，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鎖政策之賜，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情況的人必然能为此說作証，因为在当时的一切統計著作中，对于这一事实的証明材

料是俯拾即是的。[1] 德国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对于已經着手了一个时期的养羊业的改进，才获得普遍推行，并获得了良好成績；德国对于运输設备的改进，也只是从那时起才有了积极进行的机会。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国也丧失了它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远过所失；普魯士与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为早，这时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再度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爭；因为当相互封鎖期間，这个島国由于有了种种新发明以及对国外各地进行着数額巨大、几乎近于独占的出口貿易，它的工业发展已經远远超过德国，这就使它成为德国工业可怕的劲敌。由于这个緣故，再加上在資本上有了巨額扩充，使英国居于非常有利地位，与德国对照下，它的商品，售价可以压得非常之低，而质量則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賒欠其期限远比德国所提供的为长，而在德国方面則重重困难方始开端，有待于它作艰苦的奋斗。結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遍崩潰的情况，呼号求助之声响遍全国，特别是来因河下游一带，这些地区原来屬于法国，这时已被排除于法国市場之外。还有一层，普魯士的关税制度在絕对自由貿易方針下經过了許多变迁，这时已不足以抵抗英国竞爭。一方面普魯士的官僚們对于国内呼援之声并无同情，却一直抱着反对态度。他們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論在校时漬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机警地认識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魯士甚至还存在着那样的經济学家，他們还在那里雄心勃勃地企图复兴那个久已被駁倒了的"重农"制度。但是事物的現实状态究竟比理論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区的工业家对于与法国的旧有关系仍然念念未忘，从他們那里发出来的痛苦呼声，終不能不予以同情撫慰，終不能一直置之不顾。这时有一种蔓延

[1] 这个政策对于法国所发生的影响必然与德国有所不同，因为当时德国工业品大部分被擯于法国市場之外，而德国市場对法国工业品却是完全开放的。

得越来越广的意見，认为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項計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傾銷，使之泛濫于大陆市場，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些人对于这种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妄談；但是这种看法的广泛流傳实在是极其自然的，是可以从各方面获得印証的。首先是，这种傾銷現象确曾发生，看上去好象确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議員亨利•布魯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魯阿姆勳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搖籃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① 这位勳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議員休謨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勳爵．他的意見与这位勳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說，“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普魯士工业家們的呼吁終于获得了反应；想到他們年复一年与死神搏斗的痛苦，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复苏希望，应該承认这段时間是够长的，但他們的申訴終于获得了良好效果。普魯士在1818年成立的关税制度满足了当时普魯士工业的一切要求，而絲毫沒有过分夸大保护原则，对各国原有的有利关系也沒有作不适当的干扰。它所規定的税率标准远較英法为低，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在当时并沒有从禁制制度逐漸过渡到保护制度的問題，而只有从(所謂)自由貿易走向保护制度的問題。这个制度从全体来看还有一个优点，即征税时大部分是按照商品重量不是按价值計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防止了走私活动及估值偏低、以多报少的弊端，而且达到了一个重大目的，对于性质不同的商品起了不同的刺激作用。有些物品是供普遍消費的，由任何国家自己来制造都极

① 《工商业委員会对美国国会众議院的报告》，1816年2月13日。

为便利，由于总値的巨大，对任何国家說来也最关重要，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就訂得最高；有些物品比較精細，比較貴重，在国內制造比較困难，有些則比較易于引起走私，或比較便于走私，对于这一些物品的保护税率就逐級予以降低。

但是在这种按量計征办法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貿易，受害程度远在各外国的貿易之上，理由是极为明显的。这些次一級的小邦，原来已被排出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場，这时又几乎完全被擯于普魯士，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小邦有許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魯士的省区所包圍的。

这类措施实施以后，普魯士的工业家平靜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业家方面，不平的呼声又高了起来。还有一层，奥地利对于德国商品，特别是上斯瓦比亚麻布的运銷意大利，又規定了限制办法。这就使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出口业务，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它們彼此之間又互設关卡，互相隔絕，它們的工业这时已临到絕境。

1819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春季博覽会时，由德国工商业家五六千人在那里組成的非正式的协会，就是在这种迫切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为政情况下設立的关税，同时在于爭取成立一个德意志全国統一的商业与海关制度。

这个协会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議条款曾送呈議会及德国所有各邦的領导人与政府，請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别設置了联絡員，各城市分别設置了当地联絡員。会內每一个成員与联絡員都以竭尽所能促使团体目标得以实現为职志。該会擇定了紐倫堡为总会所在地，授权該城設置了一个中央委員会，在一位輔佐的参贊下負責領导协会事务，本书的作者卽当选为輔佐。中央委員会的方針策略与議事录，均在协会所办的一个周刊《德国工商

业机关报»公布，与协会任务有关的一些意見、建議、論文以及統計資料，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該会每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博覽会上召集全体大会一次，由中央委員会在大会上作事务报告。

协会向德国国会递了請願书，說明所建議各項措施的适当与必要，然后在紐倫堡的中央委員会就开始行动，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代表参加1820年在維也納举行的各邦使臣会議。在使臣会議上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級的、較小的邦同意另在达姆施塔特召集会議，討論协会所提出的問題。这次达姆施塔特会議討論的結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結成联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魯士結成联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結成联盟；最后，主要出于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个联盟共处于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倫堡、汉諾威与汉撒諸城市以外，已經联合在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圍以內取消了各成員之間原来的各不相謀的税制，对外成立了統一的税制，所征收的税款，由各邦根据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这个同盟所建立的税制实质上与1818年普魯士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說，这是一个适度的、有节制的保护税制。

由于税制的統一，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經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 第八章 俄国人

俄国在文化上与工业上的初期发展，主要是由于对希腊的交往、汉撒各城市对諾夫戈罗德的通商，以及（在諾夫戈罗德被伊凡·瓦西里叶維奇破坏以后）发現了与白海沿岸通航的路綫以后

从而兴起的对英国与荷兰的貿易关系。

但是俄国在工业上、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巨大发展則开始于彼得大帝。国民的团結与政治的环境这两者对于一国的經济生活有莫大影响，俄国近一百四十年来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极有力的証明。

俄国的君主威权，把无数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建成了一个統一国家；俄国在工业上打下了基础，农业上有了巨大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通过运河与道路的修筑使国内交通便利，国外貿易規模壮闊，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統一的巩固政权。

俄国的独立商业制度，只是从 1821 年才开始的。

当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由于她对于国外流入的技工与工业家的优惠待遇，当然使本国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在鉄、玻璃、麻布等工业方面，尤其是在国内农产与矿产丰富的条件下特别有利的那些工业方面，还沒有能越出初期发展阶段。

还有一点，就当时情形来說，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經济利益。假使当时同它有往来的国家向它大量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簡陋的工业品，还有，假使沒有战事以及一些国外事变的干扰，则俄国借助于对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关系，就可能会实現更大的繁荣，它的一般文化状态通过这类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較在工业制度下更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战爭与大陆封鎖政策以及各国在商业上所規定的限制，使它不得不放弃了輸出原料輸入制造品的那条路，别寻发展途徑。在这样情况下，俄国原有的海上貿易关系就发生了波折。它对大陆西部的陆路貿易沒有能弥补这方面的損失，因此对于所拥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来利用。战事結束，全面和平实現以后，它就有了一

种要求,想回到旧有的制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傾向于贊成自由貿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极高声望的,就象薩依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俄国的国內工业在大陆封鎖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由于英国的竞爭而受到了損失,一般对于这样的打击最初还沒有感到震惊。一些理論家认为对于这种打击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貿易的良好效果随后自会发生。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也的确非常有利于这种轉变。欧洲西部农产的歉收,使俄国农作物有了大量輸出的机会,因此俄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得借此获得巨大收入,而与工业品的大量进口相平衡。

但是对俄国农产品这种一时的、非常的需求过去以后,另一方面,当英国为了照顾貴族的利益对谷物輸入加以限制,为了照顾加拿大的利益对木材輸入也加以限制以后,俄国就陷入了本国工业崩潰与国外輸入工业品泛濫的双重困境。以前一般人們,与斯托哈先生一样,是把貿易平衡这个說法看作是一种离奇的幻想的,认为一个有理智的、进步的人而相信这种說法,其荒謬与可笑,簡直无异于相信十七世紀的魔术、妖法;虽然他們原来的态度如此,現在却不得不无限惊訝地覚察到,在独立国家彼此之間必然存在着所謂貿易均衡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銳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就毫不含糊地公开承认,他相信这个說法。他在 1821 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中这样說:"俄国为环境所压迫,現在不得不考虑采行一种无所依傍的貿易制度;我們的产品現在找不到国外市場,国內工业已經破产,或已近于破产,所有国內的現款都向外国流出,最殷实的商行也已瀕于倒閉,情况岌岌可危。"

俄国实行保护制度后的有利效果与恢复自由貿易时所发生的有害效果,同样足以使那些理論家所标榜的一些原則与論断声誉扫地。这时外国的資本、才能与劳力,从各文化区域,尤其是英国

和德国，不断流入俄国，目的在于分享其国内工业所提供的利益。

俄国的貴族阶級也在大体上模仿了政府的政策。他們的产物在国外既找不到市場，就想换一个方向来解决問题，想把市場移置到生产所在地的附近，就是說想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設立工厂。結果由于新成立的毛紡織厂对細羊毛需求增加，使养羊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国外貿易不但沒有减少，而且有了增长，尤其对中国、波斯以及亚洲其他邻近各国的貿易增长更快。商业恐慌气氛一扫而空，这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商业大臣的报告就可以明白，俄国主要由于采行了这个制度，国家財富与力量才有了巨大的进展。

德国人則对于这种进展趋势故意不加重視，只是对于德国东北地区由此造成的損失埋怨不休，这种态度是愚蠢的。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俄国人对于德国的福利并无加以关怀的义务；德国人必須当心的是德国，俄国人所要关心的是俄国。无須埋怨，也不必痴心期待将来的自由貿易那个救世主，赶快把世界主义制度扔在火里，从俄国的榜样取得教訓，这样做要好得多。

英国对于俄国的这一商业政策滿怀嫉忌，这是极其自然的。凭了这一个政策，俄国已經把它自己从英国的势力范圍中解放了出来，在亚洲从事竞爭时，它与英国已經分庭抗礼。即使英国制品比較便宜，但是由于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較接近以及它的政治势力，英国在中亚細亚貿易中，这一优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俄国与欧洲比較，也許仍然只好算是一个略有几分文明的国家，但是与亚洲比較时，它就要算是一个十足的文明国家了。

不过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俄国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还有許多欠缺之处，尤其是帝国政府如果不能銳意改进，实施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逐步限制并最后取消农奴制，組成有教育的中产阶級与自由的农民阶級，改善内部运輸工具和对中亚細亚的交通，从而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它的政治状况与工业要求两相协調，則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莫大阻碍。这些存在的困难都是俄国需要在本世紀加以克服的，它要在工农商业、航运与海軍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須有賴于这种努力。但是要使这类改革成为可能并見諸事实，則首先必須使俄国貴族們认識到，通过这类改革能够获得最大进展的，就是他們自己的物质利益。

# 第九章　美国人

我們对于欧洲各国——除了那些在吸取历史教訓方面沒有什么重要性的以外——的商业政策，已經作了一些历史考察，現在再看一看移殖到大西洋彼岸的人的大致状况。他們原来是完全依賴着祖国的，内部分裂成許多殖民区，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联合；他們从这样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一个团結一致的、有組織的、强大、自由、勤奋、富庶的独立国家，这几乎就是在我們眼前发生的变化。看上去在我們孙子一輩的时代，这个国家将上升到世界第一等海軍与商业强国的地位。就这里研究的問題来說，再沒有比美国的工商业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它的发展过程异常迅速，自由貿易与保护貿易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实現，它們的效果极为分明，国内工业与国家行政整个結构的演进是清清楚楚暴露在观察者的眼前的。

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原来是处于对祖国完全奴屬地位的，除了家庭工业与普通手工业以外，不容許从事于任何种工业。直迟至 1750 年，为了馬薩諸塞州的一个制帽厂，还引起英国議会那样大的激动和猜忌，因此宣称，在北美任何种工业都是“妨害公众”的，連制鉄业也不例外，虽然在那里制鉄所需的一切材料实际

上都异常丰富。甚至迟到 1770 年，查坦伯爵[1] 看到新英格兰人对工业作初步尝試时他还大不以为然，当卽声明，在殖民地区就是一只馬蹄釘也是不准制造的。

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有欠公正的是亚当·斯密，这份功劳是应当归屬于他的。

一切工业都壟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稅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北美各自由州当革命战爭时期脫离了一切束縛，它們有的是供工业用的物质与精神資源，它們跟原来对它們輸出工业品并向它們購买农产品的那个国家已經脫离关系，一切需要就得取給于自己的物資，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样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虽然由于这次战爭，它們的負担很重大，受到的破坏很严重，而地产价格和工資仍然到处急遽上升。但是在巴黎和議以后，由于各州在制度組織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統一的商业制度，結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虛而入，自由暢銷，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爭，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有一位美国国会議員事后关于这个危机曾这样說："我們曾經依照現代理論家的劝告，向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我們所需要的东西，結果国外商品泛濫于我們的市場；英国商品在我們口岸城市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倫敦的还要便宜。我們的工业瀕于毁灭，我們的商人，卽使曾指望靠进口貿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現象对农业又造成了极大損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

这样的事态并不是一时的，从巴黎和議时起一直延續到美国

(1) 指英国輝格党头子威廉·庇特，他在1766—1768 年曾任英内閣首相，积极实行殖民地扩张政策——譯者。

宪法的成立。各州之間后来所以能获得进一步团結，所以不得不把維持統一的商业政策的全权交托給国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事态的足以促成国家团結，比任何別的情况更为有力。所有各州——紐約与南卡罗来納也不例外——紛紛請求国会对国內工业采取保护措施。华盛頓在他就职的那天，特为穿了一套用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当时紐約的一个記者这样說："这位偉人就用了这一个簡单而特別令人感动的方式，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了一次深刻教訓，告訴他們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虽然美国最初实行的税制(1789 年)，对于主要的各种工业品只征收了很輕微的进口税，但是在实行的最初几年就已获得显著效果，使华盛頓能在 1791 年的"咨文"里对国內工农商业欣欣向荣的情况表示庆賀。

这种保护税率不够恰当的情况不久就充分显露出来；因为英国工业家具有进步的生产方法这个有利条件，对于这种較低的税率所造成的困难很容易克服。国会对于最主要各項工业品的进口税率确曾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但这一措施直迟至 1804 年才实行。国內工业家在事前用尽了一切方法来說明提高税率的必要，但是在利害关系上处于相反地位的各派势力則力說自由貿易有利和高税率有害，最后只是由于关税收入不足，才不得不实行了这个措施。

工业方面一般的进展情况比較不很显著，但是与这一点形成鮮明对照的是这个国家的航运业，由于詹姆斯·麦迪逊的动議，从 1789 年起，获得了有效的保护。商船的吨位，从 1789 年的二十万吨增加到了 1801 年的一百万吨以上。美国工业在 1804 年改訂税制的保护下与英国工业对抗时，仅仅能勉强維持現状，而英国工业則在不断改进中，已經达到了非常巨大的規模，如果不是由于1812 年的宣战而实行禁运，則毫无疑問，美国的工业面对着英国的竞

爭,将完全崩潰。由于这一系列的事变,正同独立战爭时的情形一样,美国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結果产量不但足以供应国內需求,而且不久就开始向外輸出。根据美国工商业委員会 1815 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单单毛織业与棉織业所雇的工人就达十万名,每年产値在六千万元以上。由于工业生产力增长的必然結果,情形正同独立战爭时一样,一切价格迅速上漲,不但商品价格与工資,就是地产价格也一致提高,因此地主、工人以及一切从事于国內貿易者享有了普遍繁荣。

根特和議成立以后,国会吸取了 1786 年的經驗教訓,在第一年就規定把原来的进口稅率提高一倍,这个时候,国內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是有些方面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家处于反对地位,由于这些方面的压力以及一些理論家論調的影响,国会复于 1816 年决定大大降低进口稅,于是国外势力重新抬头,結果在 1786 至 1789 年間工业崩潰、农产品滞銷、地产价格低落等現象重新出現。这个国家再度在战爭时期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幸福以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在最殘酷战爭中还要大的灾害。直至 1824 年,当英国谷物法在效果上对美国农民的不利傾向已經充分显露,从而迫使中部、北部与西部各州的农业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趋于一致以后,国会才同意将关稅率略予提高;但赫斯启森先生立即采取了抵制措施,使这种稅制对抗英国的竞爭归于无效,于是在国会經过剧烈斗爭,复于 1828 年在稅制上作了补充規定。

馬薩諸塞州近来发表的官方統計,[①] 使我們对于美国,尤其是它中部及北部各州的工业,在保护制度下——不管 1828 年在稅制上作了如何修改——开端时的情况,得到一个大致的輪廓。1837

① «至4月1日为止1837年的馬薩諸塞州統計表»,州秘书比吉洛編(波士頓,1838年)。美国各州除馬薩諸塞外都沒有这类的統計摘要。我們得以在这里引用这些材料是全靠州长埃弗雷特,他是一位負有盛名的学者、著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年，这一个州(馬薩諸塞)共有282家紗厂，开工錠数565,031，雇男工4,997人，女工14,757人，消耗棉花37,275,917磅，制出棉織品126,000,000碼，产值13,056,659元，使用資本14,369,719元。

在毛紡織业方面有192个厂，机器501架，男工3,612人，女工3,485人，消耗羊毛10,858,988磅，制出毛織品11,313,426碼，产值10,399,807元，运用資本5,770,750元。

靴与鞋的产量計16,689,877双，其中有大部分运銷西部各州，产值14,642,520元。

工业其他各部門的发展，大体上与上述情况相应。

这个州的工业产量的綜合价值(造船业除外)在八千六百万元以上，流动資本約六千万元。

工人(男工)117,352名；全州的总人口(1837年)是701,331人。

在这里的就业工人中，完全沒有貧困、殘暴和犯罪等現象。正相反，无数的男女厂工都有着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服装清洁整齐，建立了图书館，备有許多有实用的、有教育意义的书籍供他們閱讀，工作并不过度疲劳，食物則富有营养而精美。大多数女子都有积蓄，都为自己准备了粧奩。①

上述最后的一种現象，显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低廉、課稅輕微、关稅制度公平的結果。假使英国能取消农产品进口限制，将現行消費稅减低一半或三分之二，用所得稅来弥补这方面的短缺，就不难使它的工人处于类似的地位。

有許多理論家和实踐家对于美国的前途与国家經济作了錯誤的理解，錯誤的判断，再沒有一个别的国家在这方面曾被誤解到这样程度。亚当·斯密和薩依曾断言，美国"就象波兰一样"，注定是

① 据1839年7月美国报紙的报导，单在工业城市罗威尔一处，女工在儲蓄銀行有存款一千元以上的就有一百多人。

应当經营农业的。对于这样一个由一打左右朝气勃勃、抱負不凡的年青共和邦組織起来的联邦共和国来說，作这样的期許是不大能令人滿足的，对于它的前途作这样的展望，鼓励性显然是不大的。上述两位理論家指出，在美国以极低代价可以获得最丰饒的耕地，情况旣然是这样，美国人民就生来被老天指定专門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民就能这样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在这一点上誠然是对他們作了很大的贊揚，事态若果是如此演变，自由貿易原則在这里就可以获得极其圓滿的应用，就可以为这些理論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但是他們的理論与事实并不符合，他們所提出的有力証据的正确性与适应性不久就完全丧失，这一学派在事实演变之前感到懊丧，这是无法避免的。美国寻求它国家幸福前途时所遵循的方向与絕对自由貿易原則恰恰相反，这个学派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这个事实。

学者們对于这个年輕的国家原来是珍爱非常的，这时却成了欧洲各国理論家們最严重譴責的对象。据說欧洲各国正在最懇摯的热情下努力使普遍自由貿易成为可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正在向这个偉大的博爱主义目标作实际的努力，使这方面能获得重大发展，而美国却图重返到已經在理論上被彻底駁倒的、久已被唾弃的重商主义，想走这一条路来促进国家繁荣，这一点足以証明新世界在政治知識上还很少进步。据說象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还有着无限广闊的膏腴之地沒有开垦，工資又这样高昂，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物质財富与增加了的人口，再沒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而且农业有了充分发展，工业到那时自然会跟着兴盛起来，更无需用人为方法督促；如果美国使工业作不自然的发展，不仅将損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国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

但是在美国方面，健全的常識与对国家需要的直覚认識，胜过了对理論主張的信从。他們对理論家的論据作了彻底考察，結果

发現这种理論的信徒对于自己所坚持的理論要点，却不願意付諸实施，这就使他們发生了极大的怀疑。

理論說美国还有大量的土地沒有开垦，对于这一点作出的答复是，就美国人口稠密、土地一般已經充分开垦、发展工业的时机已經成熟的那几个州来說，象这样有待开垦的土地，稀少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如果要把象理論家所說的那一类土地加以垦殖，势必要化极大代价将那几个州的剩余人口移殖到西部，这样不但将使东部各州在物质与精神資源方面受到重大損失，而且移殖的結果，将使原来的买主化为竞爭者，从而使地产及农产品的价値降低。有些旧有的州，在人口、文化及軍事力量方面都还沒有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把所有荒地直到太平洋岸止全部加以开垦，对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利的。情形正相反，就东部各州来說，除非它們能专心致力于工业的发展，能够用它們的工业品交換西部的农产品，否則从事于开垦偏僻的处女地对它們并不会有利。人們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出問題。英国不是也处于同样情况嗎？英国在加拿大、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是在它的統治下也同样有着大量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嗎？英国如果把它的过剩人口移殖到这些地区，同美国把它在大西洋沿岸的过剩人口移殖到密苏里河流域，在便利程度上不是也相差无几嗎？然而英国不但一直保护着它的国内工业，而且在不断地努力扩充，这是什么原故呢？

这个学派还有一个論点，认为在农业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工資率时，由于自然之理，工业就不能获得发展，就只能象溫室里的花草一样用人为方法来勉强获得一些成就，这个說法未尝沒有部分的根据，就是說，它对于部分的情况是适用的，但不能普遍适用。有些工业品，与价値对照下体积較小，重量較輕，主要用手工生产，以这类制品来說，这个說法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有些工业品的价格受工資率的影响比較小，由于机器的使用，由于尙未动用的水

力的可以利用，由于原料与食物价格的低廉，由于低价燃料与建筑材料的充裕，由于課税的輕微以及劳动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高工資这一不利因素的作用，就这类工业品来說，这个說法就不能适用。

还有一层，美国人根据經驗，久已懂得，除非以农产品交換工业品这一点能够获得永久保証，否則农业就不会达到高度发展。如果从事农业的在美国，而从事工业的却在英国，那末双方的交換，由于战爭、商业恐慌或对外关税等原因，就不免要常常被打断，因此要使国家福利获得稳固基础，用杰斐逊的話来說，"就得把工业家請来住在农业家的附近地方"。

美国人終于认識到了一个眞理，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但顾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文化和力量是比单純的物质財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資产——这是亚当·斯密自己所承认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取得并保持这些資产；一个国家如果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强大、文明的各国中有資格占有一个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牺牲时就不可退縮，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守住这些資产；而在那时可为这类資产进行奋斗的地区，显然就是沿大西洋各州。

欧洲的移民和欧洲的文化在美洲首先获得稳固据点的地方，就是沿大西洋岸一带。最先建成繁荣而有文化的地区是这里，漁业、沿岸貿易与海軍的发祥地是这里，贏得独立并建成統一国家的根据地是这里。国家的对外貿易是通过了沿大西洋各州方才得以进行的；通过了它們，国家才能与文明世界取得联系；通过了它們，国家才能获得欧洲的过剩人口、物資、資本和精神力量；整个国家后来的文化、力量、財富和独立自主以及后来对比較落后地区占有的势力，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沿海各州的文化、力量和財富。假使这些沿大西洋的州当初的人口日益减少而不是逐渐增长，假使它們的漁业、沿岸貿易、从事国外貿易的航运业以及国外貿易本身，尤

其是它們的一般发展情况，有退无进，或停滞不前而不是继长增高，那么我們所能看到的情况将是，整个国家文化的泉源，独立自主与对外力量的保障，也将在同样程度上有所减退。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設想，卽使美国整个地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处处都开垦了，每一个州都全力发展了农业，內地人口稠密，但是国家本身在文化、独立自主、对外力量、对外貿易各方面，可能还是处于很低的地位。有許多国家就的确处于这样的情况，它們国內人口众多，而航运事业和海軍却一无所有！

假使世界上眞有这样一个强国，它存心不良，想阻塞美国人民的发展前途，使他們在工商业上、政治上屈服在它势力之下，它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使沿大西洋各州的人口减少，把这一带增加的人口、資本和知識力量驅逐到內地。用这样的方法，不但可以制止美国海軍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有希望于必要时占有大西洋沿岸及各港口的主要防御陣地。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不难想象的，只要能設法阻止大西洋各州力量的发展，使美国接受对外貿易絕对自由的原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假使大西洋各州不能实行工业化，它們就不但在文化上不能維持現有状态，而且在各方面也势必一步一步下降。試問沒有了工业，則大西洋沿岸各州怎样能取得发展？靠了把內地农产品运到欧洲，把英国工业品运到內地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只須几千人就足够办这件事。漁业在那时怎样能取得发展？到那时大多数迁移到內地的人民，他們所最喜欢的必然是鮮肉和淡水魚而不是那些腌制品；他們对鯨油不会有需要，卽使有，数量也不会大的。到那时大西洋各州的沿岸貿易叫它怎样維持？濱海各州絕大多数的居民既然是从事农业的，他們为自己生产着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建筑材料、燃料等等，到那时沿岸一带就沒有什么东西足以支持运輸业务。国外貿易和远地区航运在那样情况下怎样能有所

增长？到那时这个国家除了一般落后国家所大量具备的那些物資以外，再沒有什么别的可以供应，而吸收它的农产品的那些工业国家，它們都在竭力发展着自己的航运业务。試問如果漁业、沿岸貿易、海外运輸和对外貿易都处于一蹶不振的情况，又怎样能建成强大的海軍力量？如果沒有海軍，則大西洋各州受到外力攻击时，叫它們怎样进行自卫？沿海岸这些州的土质早已枯竭，而西部的广大土壤却要肥沃得多，代价要低得多，簡直不需施肥卽可耕种，凭了运河、鉄路等等的交通設备，那里的农产运銷东部时，比东部当地农产的价格要低廉得多，試問在这样情况下，东部这些州卽使就农业这一方面来說，又怎样能有发展机会？就东部各州来說情况是明显的，在对英国保持自由貿易的状态下，一切人口方面与农业資金方面的增进必然要流向西部，处于这样情况下，各州的文化又怎样能发展，人口又怎样能增加？假使美国东部沒有工业，則大西洋各州将淪于何种境地，这从弗吉尼亚州的現状中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这个州同大西洋沿岸的南部各州一样，目前正以农产品供应大西洋各州，从中分享利益。

現在大西洋各州事实上是存在着发展了的工业的，因此在各方面所表現的是与上述完全不同的面貌。人口、資本、技术以及智力，現在正从所有欧洲各国流向大西洋各州；大西洋各州对工业品的需求現在正与它們对西部各州供应的原料的消耗，同时增长。現在的情况是，各州的人口、財富与所屬各城市的数量和范圍，同西部处女地的开垦作了等比例的增进；各州由于人口增加，对于肉类、奶油、干酪、牛乳、蔬菜、含油种子、水果等等的需求也有了增加，因此它們自己的农业也在发展中；由于腌魚与鯨油的需求增加，漁业也有了发展；为了供应工业区人民的需要，須轉运大量的食粮、建筑材料、煤等等，因此沿岸貿易也有了发展；国內各工业区生产了大量商品运銷世界各国，从而又換回了有用的物資；由于沿

岸貿易、漁业与远程航运事业的发展．全国海軍力量有了增长，从而使国家的独立自主有了保障，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对南美各国占有势力；东部各州在科学与艺术方面，在文化与文学方面，也都在进展中，进展的影响从那里又傳布到了西部各州。

促使美国对国外工业品的輸入实行限制、对本国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就是这一些情况。这种措施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就，我們在前面已作了說明。假使沒有这样一个政策，美国大西洋各州的工业建設是决不能胜利完成的，这一点我們可以从它們自己的經驗以及其他各国工业发展史看得很清楚。

美国曾屡次发生那种周而复始的商业恐慌，时常有人把这一点归咎于对国外商品进口的限制，但这个說法并沒有合理根据。情形正相反，美国早期以及比較晚期的經驗都証明，当这样的恐慌发生得最頻繁、性质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就那些农业国来說，它們的工业品是从国外市場取得的，在那里发生商业恐慌的起因，是进口与出口之間的不相平衡。工业国的資本比农业国丰富，它們总是在竭力爭取增加出口数量，因此往往用信用交易方法来鼓励消費，增进运銷数量。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以未来的农产收获为依据，进行貸放。但是如果农产歉收，它的价值縮減，縮減到前已消費的商品价值以下，或者是获得了大丰收，以致供过于求，价格跌落，而同时国外商品仍然充斥市場，那么由于支付手段与前已消費商品数額之間失去平衡，由于农产品与工业品在市場上供求之間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商业恐慌。这个时候外国与本国銀行的行动，对于这样的恐慌可能起推波助瀾作用，但是它們的行动并不能造成恐慌。在下面的有一章里，对这一問題将作进一步詳細的闡述。

# 第十章 历史的教訓

不論何处，不論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財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減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儉約、創造与进取，如果沒有內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結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历史到处向我們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間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在意大利与汉撒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們所看到的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財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財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眞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潰，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論怎样地勤奋、儉約、富于創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們，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財富上的影响，显示得最淸楚的是在于航海事业，就这一点来說，再沒有別一事业能比得上它的。在一切事业的經营中，最需要活动力、个人勇敢精神、进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业，而这些条件只有在自由气氛下才能滋长。无知、迷信以及偏私、怠惰、怯懦、軟弱这些缺点在任何事业中都是要产生不利后果的，但特别

是航海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不可缺少自信心这一点,其重要程度,也是沒有一个别的事业可以比得上的。因此被奴役的人民而能在航海事业上占有卓越地位的例子,历史上就找不出一个。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一向就严格限制在运河及內河运輸与沿岸貿易。古老的埃及对海上运輸所以抱憎嫌态度,也許是由于僧侶和君主們的深恐由此会助长自由与独立精神。古代希腊最自由、最进步的城邦同时也就是在海上最有势力的,它們的自由丧失以后,海軍力量跟着也就不复存在,虽然历史上对于馬其頓王叙述了許多陆上的战績,但关于海上的胜利却一无所聞。

罗馬人是什么时候在海上最有势力,他們的艦队是在什么时候銷声匿迹的?意大利是什么时候曾在地中海上独断独行,又是从什么时候起連它自己的沿岸貿易都落入外人之手的?西班牙的海軍之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还远在英国与荷兰的艦队执行这一命令之前。商人寡头政治在汉撒各城市得势以后,权力、进取精神就跟汉撒同盟脫离了关系。

西屬尼德兰只有沿海几个省是得到自由的,至于屈服在宗教法庭势力之下的那几个省連內河航行的自由都沒有。英国艦队在英倫海峽战胜了荷兰以后,到現在已据有海上霸权.实际上由于自由精神的发揚,早已决定了这样的形势;然而荷兰人直到今天还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已几乎完全消灭。在法国专制君主下,一位有干才的大臣的想建成一支艦队的个人努力,总是劳而无功,因为建成的艦队总是逃不了毁灭的命运。

但是現在我們却看到法国的航海业和海軍势力在日益增长中,这又是什么原故呢?美国的独立还刚刚开始,我們就看到它同它母国的强大艦队展开了斗爭。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只要它們的国旗沒有在海面上到处飄揚,它們的共和政体效能就很难加以信賴。得克薩斯的情形和它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

对照，这个地区还沒有获得充分的政治生活，就已經想在海王領域內占一席地。

但航海事业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只有与其他的輔助部分結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起来，达到重要地位。无論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內和国外貿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如果說自由是航海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个生产力，自由这个条件又将更加不可缺少到什么程度？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而同时它却并不享有自由，象这样的情况，历史上还未見过。

无論何处的工业，首先带动的总是河流、公路、鉄路等等运輸工具的改进，这是使农业方面、文化方面获得进展的基本要素。

历史告訴我們，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移轉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移轉到另一个国家的。它們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它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希腊和亚洲移轉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移轉到德意志、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再从那些地区移轉到荷兰和英国的。无論何处，驅逐它們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們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們德国所处地位来說，与其抱着守株待兎的态度，靜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們的工业驅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們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的有利条件，邀請它們到我們这里来安家落戶，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嗎？

固然，經驗告訴我們，風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蕪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着

風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紀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轉变，世上豈有这样愚蠢的办法？

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擇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內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嗎？历史告訴我們，有許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林者的办法，胜利实現了它們的目的的。有許多孤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这类城市与小邦的同盟，虽然領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也很微薄，但是由于具有蓬勃的自由意志，在地理位置以及环境与机遇方面获得便利，它們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国之先，就已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欣欣向荣；它們由于与这些大国的自由通商关系，向它們輸出工业品，換回农产品，在財富和力量上获得了高度发展。威尼斯、汉撒城市、比利时和荷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这种自由貿易制度，对于同这些范圍較小的国家发生商业关系的大君主国自身，在开头时也是同样有利的。这些大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資源，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沒有充分发展，在这样情况下自由輸入国外工业品，輸出本国农产品，是达到下列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发展它們自己的生产力；使原来习于怠惰、散漫的国民逐漸养成勤勉习慣；激起它們的地主和貴族对工业的兴趣；喚起商人在潛伏状态中的进取精神；更加重要的是提高它們本身的文化、工业和力量。

英国人向意大利、汉撒同盟、比利时和荷兰的工商业学习以后，一般所获得的就是这些效果。但是这些大君主国靠了自由貿易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认識到，只有把工商业同农业結合起来，文化、力量和財富方面的最高度发展才能实現。它們认識到，它們新建成的国內工业要想同国外成立已久的工业在自由竞爭下获得胜利是决沒有希望的；它們本国的漁业和商船业是海軍力量的基础，这些事业如果沒有特殊的保障，是决不能順利发展

的；这个时候外国商人具有压倒一切的資本力量，具有較高的經驗和才能，在这样情况下，它們本国商人的进取精神是永远不会抬头的。因此它們就用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奖励补助等种种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財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植到它們的本土。它們采行这个政策时，有的与所悬的目标格外相切合，有的則在切合程度上差一些，有的在进行时态度格外认真、坚强，有的就不免要差些，政策成功程度的大小、快慢，就看这些方面程度的高低而定。

在一切国家中，英国是首先采取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固定的、实际有效的措施，最初是在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及革命时期制定的；由于执政者方面智力和自制精神的缺乏，或由于內訌外战的关系，在初步执行期間时常中断。英国直到亨利六世时代，方才允許谷物得在国內各郡之間通运或运往国外，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时代，对于計息貸款、甚至票据貼現还一概认为是高利貸性质，还认为用压低毛織品价格和工資标准的方法可以振兴商业，还认为用禁止大规模牧羊的方法可以增加谷物产量——試問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德华三世的措施怎样能順利实行？

亨利八世曾經把谷物价格的上涨說成是一种禍殃，他的先輩曾竭力奖励国外技工入境，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們大批驅逐出境，亨利七世对于国会建議的航海条例曾拒不批准——如果沒有这一类的挫折，則英国毛紡織业和海外貿易的高度发展，会提早多少时候实現？

在法国我們看到，本国工业、自由的国內貿易、对外貿易、漁业、海运业和海軍，总之凡是一个富强国家应有的一切特征——这些都是英国花了几个世紀不屈不撓的努力的代价才掙得的——在一个偉大的天才的手里，就象用魔杖一揮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間就色色具备；但是后来却断送在痴迷狂妄和专制暴虐的鉄腕之下，消灭得比兴起时更快。

我們也看到自由貿易原則在不利环境下与坚决执行的限制政策对抗时的徒劳无功；汉撒同盟覆沒了，而荷兰在英国和法国的打击下也一蹶不振。

我們看到了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看到了法国在南特敕令廢除以后的退化，也看到了英国的經历，在这个国家，自由总是同工商业与国家財富的进展齐头并进的。这些历史事实使我們认識到，要使商业的限制政策永远有效，只有在文化进展和自由制度的支持下才能实現。

反过来說，如果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化，不論同时有沒有自由制度，除非有适当商业政策的支持，否則这个国家在經济进步上所获得的保障总是薄弱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們一方面可以从美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以从德国的經历获得教訓。

現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統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內市場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爭，它在这个竞爭力量之前毫无掩护，一方面在国外市場則受到霸道的、往往变幻莫測的限制政策的排斥，就它文化发展的程度来說，在工业上已有的进展与应当达到的进展，实际上相差得极远，因此种种，它甚至不能保持它原来已經取得的地位，它就象一个殖民地一样，竟被一个国家所任意利用，那个国家也就是在数百年前被德国商人以同样手法利用的；在这样情况下，直到最后，德意志各邦終于决定采取統一的、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使它們自己的工业能够掌握本国市場。

北美的自由州，处于可以充分吸取自由貿易利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超过了以前任何别的国家，甚至还在它独立的酝釀期間就受到了世界主义学說的影响，它在这一原則下的努力，也超过了任何别的国家。但是我們看到，这个国家在自由貿易下原来是向国外购入工业品的，由于对英国的战爭，两度被迫对于所需物品不得不自己动手在国內制造，然后在和約成立以后，由于外商的自由

竞爭，已成立的工业又两度瀕于毁灭；因此获得了教訓，认識到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任何大国要获得恒久的独立与富强的保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自己的力量与資源能够获得独立的、全面的发展。

历史这就向我們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爭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爭的自然結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沒有停止以前，換个說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沒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舍弃的。所以如果談到各个国家是否能、怎样能結成統一的联盟，以及在各个独立国家之間引起了爭端怎样以法律裁判代替武装冲突来求得解决这些問題时，則同时必須求得解决的是，怎样建成一个普遍自由貿易制度以代替各个国家商业制度的問題。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在工业、財富和力量上是出类拔萃的，它所施行的排外性关税制度也是独步一时的；曾經有許多国家不顾这一事实，各个地采行自由貿易制度，例如葡萄牙在1703年，法国在1786年，美国在1786年与1816年，俄国在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国几个世紀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結果，牺牲的是这些各个国家的繁荣，对全人类并沒有好处，只是更加养肥了那个占优势的工商业国家。瑞士的情况（以后将有所說明）是一个例外，它的情况对于两种制度的孰优孰劣，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証明作用。

科尔伯特所施行的、曾由意大利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制度，在我們看来似乎并不是出于他的創造；就我們所知，英国人早在他之前就充分推行了这个制度。法国人如果想滿足他們的希望，达到他們的目的，迟早总是要这样做的，科尔伯特不过是把这种迟早要做的事情付諸实施而已。假使科尔伯特果有什么应受責难之处，也只是在于一点，他所要实行的那些措施只有在政治状况有了根本改革以后才能持久，而他却想在专制政体下进行。

但是对于这种責难也还是有充分理由可以駁倒的，反駁的人可以这样說，科尔伯特的事业如果有圣君賢相好好地继續下去，那么足以阻止农工商业和国家自由前进的那些障碍，是可以通过种种改革来消除的；如果事态有了这样的演变，法国就不会发生革命，相反地，在勤奋与自由的交互影响下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就有可能使它在工业、国内貿易、国外貿易、殖民地开拓以及漁业、海运业、海軍等等方面，于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对英国展开有利的竞爭。

最后，历史教导我們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賦不薄，在財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資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須——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們这里所說的目标——按照它們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們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貿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脫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漁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貿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財富和力量已經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貿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場进行无所限制的竞爭，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們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們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們看到处于第一个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紧紧地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边緣；但在目前只有英国是实际达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的。

# 第二編　理論

## 第十一章　国家經济学与世界主义經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經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經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員或行政官們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問題的作者，他們所写的只是屬于他們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項，完全以这一范圍为限，关于財富的起因这类問題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問題是絕对不予考慮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遍自由貿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們必須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談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經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經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1]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說，尽管重农主义者違反了自然法則，違反了邏輯，发生了严重錯誤，他仍然以闡述全世界范圍的商业絕对自由原則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眞正的政治經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經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問。他把他的著

---

① 有人說亚当·斯密原来是准备把他的伟大著作献給魁奈作紀念的（参看 T. 奥尔曼与 J. 奥尔曼 1825 年出版的《亚当·斯密传記》）——英譯本注。

作题名《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場合談到各种政治經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証明必須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圍的經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經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爭，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論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傳記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則：“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訂立的国家規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轉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稅、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說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薩依就曾毫无掩飾地說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貿易这个概念，我們必須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圍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經济学》第六卷（第288頁）里坦率說明：“我們考虑的范圍可以是屬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經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則所构成的是私人經济。但是屬于整个国家、不論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則，它們所构成的是公共經济。归根到底，政治經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幷須注意的是，首先，薩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經济”这个名詞下，国家經济或政治經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幷沒有談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經济这个名詞下所包含的內容归納到一种学說，这种学說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結果他在这个学說中所談的始終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經济，

[1] 简称《国富论》——译者。

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謂"公共經济",老实說,它的內容应当沒有别的,只是屬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經济,也就是眞正的政治經济;如果薩依在向我們說明他所說的政治經济是什么(实际上沒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圍的或屬于全人类的經济)以后,使我們知道当他談到一些学說的原則时他喚作"公共經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詞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論。

但是当他給这种学說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簡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謂"全人类經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現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結合在一起,各不相謀,而且与那些在天賦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經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經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沒有作出說明,由于这种名詞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論錯誤。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錯誤,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經济学明白地說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們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經教导过了的。《方法評論》里一篇文章談到重农学派时所說的話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話如出一口,它說:"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議自由貿易最早的是哥倫比亚学院院长托馬斯·庫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說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創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設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沒有实际的存在。庫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張是非常一貫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輩和老师們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們各个

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屬于人类社会的經济学，如果庫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說成是錯誤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們这方面来說，我們絕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張的世界主义經济理論一笔抹杀；但是我們认为政治經济，或者象薩依所說的"公共經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們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給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們如果想对于邏輯、对于自然法則信守不渝，那就必須使个人經济不与社会經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項，又必須把政治經济或国家經济与世界主义經济划分开来。政治經济或国家經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維持并改进它的經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經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們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內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証，那么国际自由貿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說，他爭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縛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財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圍越广，則为了爭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稟賦、后天的知識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說，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說，說是与其把它們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內部地方关税把它們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顛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駁的例証，在联合国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是具有无限效能

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則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問，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識和宗教的拥护的。① 如果个人之間的爭斗认为与理性相違背，那么国家之間的爭斗受到同样譴責时，在譴責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經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証据，說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証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訴我們，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爭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緒有了高漲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現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規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們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設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許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現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現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現在已經可以有把握地預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紀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們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

① 基督教所諄諄教誨的是持久和平。但是在“一个羊圈、一个牧人”的諾言还沒有实现的时候，那些教友派教徒的原則不論怎样万妥万善，也无法施展。基督教的教义和諾言完全符合于人类物质与精神福利的要求，这一点最能証明基督教是出于神的創始。

現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經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經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現。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則发生战爭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則彼此在一星期內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損害，或者經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爭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島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現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組成的国会的雛形。用协商来解决爭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較开明的首脑，对于財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經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場所，而这比战爭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貿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碩更安全的果实。我們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則文明国家越会认識到：对于未开化的、內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給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負的一項責任，但这种責任只有在团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該共同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則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被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們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轉到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我們到处可以看見，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資本达到了这样的規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經不足以供养全部居

民，已經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則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經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們就必然会流向对他們的需求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資本累积的結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較小的資本家已經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資本在比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較低的国家。

由此可見，流行学派的学說体系未尝沒有正确原則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則要达到为实踐作先导的目的，必須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誤入歧途，实踐也不能忽視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沒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們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沒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統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沒有出現的情况假定为已經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經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貿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經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各邦来說，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們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訴我們，領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1] 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簡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貿易的結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圍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軍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結論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們看来，这样的形势簡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

① 这个說法在李斯特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許是对的，但是現在却可以举出一个显著的例外。德国各联邦在关税同盟之下的商业联合比它們在帝国之下的政治联合要早出现許多年，而且后者的成立是出于前者的有力督促——英譯本注。



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糾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現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漸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貿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結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現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沒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壟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間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貿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現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眞正自由貿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經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結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貿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說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錯誤是，以单純的世界主义原則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視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馬尔薩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倫斯則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資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張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說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們所以会发生这类錯誤見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們的理論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薩騰(Saturn)。① 这种理論认为由于人口、資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現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釋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們

① 古罗馬的农神——譯者。

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結論，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沒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說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沒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計算、詭譎的論据来証明这种臆說的办法，可以說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計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淺。整个地球可以容納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漁猎者們的計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計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計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現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馬鈴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紀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現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許多欧洲国家，它們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現、发明和改进方面，誰又敢預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許由于某种新发現或創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誰能知道呢？我們已經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許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潛伏中有待发現，誰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現，可以无須象現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誰能預計呢？我們說馬尔薩斯的学說看来是胸襟狹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違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簡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說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願望，这种願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們发揮身心力量、

激起并支持人們高尙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願望的存在。这个学說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則，它对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在挨餓，也应該不聞不問，因为假使給了他飲食，三十年后也許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餓状态。这个学說足以使同情心化为烏有，有的只是机械核算，这就是說，足以使人心化为鉄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們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鉄石心腸，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期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量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財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后果可期望呢？

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料生产的增长趋势，如果資本的积累最后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不能再找到投資出路，如果机器生产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使商品有了巨額过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只是說明，造化注定，不允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享有工业、文化、財富和权力，或者是說，地球上大部分宜于耕种的地方只应当成为野兽的窟穴，人类的絕大部分应当永久陷于野蛮、无知和貧困状态。

这里所說明的是这一学派因从政治观点来衡量人类生产力而发生的錯誤；我們还要指出它由于从世界主义观点来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而犯的錯誤。

如果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那样一个世界联盟的确存在，那时各国所处的地位将同組成北美合众国的各州一样，过剩的人口、才能、技术和物质資本将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情况就同相类的过剩人口、才能等从美国东部各州流向西部各州一样——假定大陆各国具有与英国同样的人身与財产安全，同样的宪法与一般法律，并且假定英国政府能够服从这个世界联盟的統一意志的話。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要使所有这些国家在財富和文化上提高到

与英国同样的程度，那就沒有比自由貿易更好的方法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論据。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一論点又如何能与自由貿易的实际活动相吻合呢？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針将以为它自己謀福利为唯一鵠的。英国人所爱好的是他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法律、風俗和习慣，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資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場，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貿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資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貿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資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較辽远的、他的語言、法律和規章已經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現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許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續出現。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沒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沒有什么别的可以貢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們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傳布英国的文学和語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淪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屬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談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象我們現在想到或談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轉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紀的。

但是眞正的政治科学对于普遍自由貿易这样的結果，认为是

极度違反自然的;我們敢說,如果在汉撒同盟时代实行了这样的普遍自由貿易,那么今天在工商业发展方面高出其他一切国家的,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

現在仅仅由于首先树立政治的商业制度、多半不顾世界主义原則的是英国人,就把世界上一切財富和权力让給了他們,这一点就是从世界主义立場来看,也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貿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須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經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傾向,世界上那些比較辽远的地区,也許会比坐落得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覚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須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驟: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漸从我們市場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資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們必須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們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資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徙到世界上較远地区或殖民地去。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問,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輕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說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 第十二章 生产力理論与价值理論

亚当·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为《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流行学派的創立者在这里所表示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国家經济同各个人的私人經济一样，是应当在这种双重观点下来考察的。

財富的原因与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財富，那就是交換价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費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許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費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

由此可見，財富的生产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获得补償。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說，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紀总要受到疾癘、饥荒或內訌、外战的摧殘，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旣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侶势力的折磨的，虽然它的国內环境比較地和平，[1] 但是总不能摆脫貧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們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領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們还是与美洲发現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漸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貧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資財，但是它贏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

① 就西班牙的情况来說，在受到拿破侖侵略的时期以前是这样，但以后并不是这样。不过著者的論断并不因这一点而失去它的正确性——英譯本注。

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之內，就在財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規模的增长。如果我們把法国在 1809 年与 1839 年的情况作一对比，后者的有利情况要胜过前者多少倍！尽管如此，法国在这一过程中却丧失了欧洲大陆很大一个地区的主权，遭到了两次破坏严重的侵略，付出的战費和賠款达数十亿法郎。

象亚当·斯密具有这样明彻理解力的一个人，說是会完全不理会到財富与財富原因之間的差别以及这类原因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书的緒言里，他曾明白、剀切地这样說："劳动是任何国家財富所由产生的泉源，要增加財富，依靠的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是国家所一般使用的劳动的精巧、熟练和鉴别力程度，其次是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与不从事于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由此可見，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学端端正正地从个别思想家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現，看来并不是造化的計划。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自由貿易"和他自己的偉大发現"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貢献，他似乎认为"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他是打算靠了这一点使他的著作問世以后能哄动一时，使他自己能揚名后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論哪一个，如果有一粒宝石要出卖，把它埋在一袋小麦里带到市場总不是最好办法，虽然小麦是极有用的；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这粒宝石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广有閱历的，因此他不会不懂得，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員(他的书出版时，他在政治經济学方面所处地位就是这样)，如果在登場第一幕就显一下身手，博一个滿堂采，那末后来几幕即使平平而过，也比較地容易获得諒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則作为书

中的緒言与讀者見面的。斯密的打算沒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使他站稳了脚步，成为經济学权威。

但是在我們方面却深信我們能够証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現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亚当·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討“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学說——虽然“生产力”这个名詞在他的緒言里并不是沒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見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虽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劳动生产力主要决定于完成劳动时的技巧与鉴别力程度，但是由于他对“分工”概念的过度重視，就显然趋入了歧途，把劳动本身看成是国家財富的“泉源”。我們要問，如果一种現象，它本身就是許多深一层原因的結果，而我們却把这种現象說成是起因，这难道可以认为是科学的推理嗎？毫无疑問，一切財富总是由脑力和体力（劳动）得来的，但是并沒有理由說是由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結論；因为历史告訴我們，曾有許多国家，它們的国民尽管克勤克儉，还是不能免于貧困。有些国家由貧穷落后的地位进入富强，有些則由富裕与幸福的状况淪入貧困，凡是对这样的演变想根究一下原因的，当他听到了劳动造成富强、怠惰造成貧困的道理以后（其实所罗門王在亚当·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总是不禁要再問一下，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我們說財富的起因是劳动，說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問題，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們說，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資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当一个人感到必須为未来作准备时，他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对他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而促

使他要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謀未来的安全，提高未来的幸福生活；他如果从少年时起就慣于作远虑，慣于积极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习慣越巩固，他的高尙感情就越加发展，身心就越加获得了鍛炼；他从小所看到的榜样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圍情况的机会就越大；他的正当活动所受的束縛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获得的成果越巩固，他的有組織、守紀律的活动就越加能够博得社会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見、謬論、迷信、无知等而受到的打击也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力量对生产目标将作更大的发揮，将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他已有的劳动成果也将作更加圓滿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賴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談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說，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財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內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視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財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們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資源，而且通过国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資源供他們自己来利用。

亚当·斯密一般說来，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极少认識，甚至不认为維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的研究只是限于創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这一方面的劳动，他当然也认識到它的生产力是取决于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巧与鉴别力"的；但是当他研究到这种技巧与鉴别力的起因时，他只說到分工为止，他用来說明这一点的只是交換、物质資本的增加和市場的扩大这些因素。因此他的論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狹隘观点和利己主义。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貫注在"价值"、"交換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

还能够注意到"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釋經济現象，除了"价值理論"以外，还必須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論"。他走錯了路，他要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釋精神力量，就由于这一点，他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种种錯誤和矛盾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們随后将有所論証），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經济学說所以会使最富于理解力的人望而却步，原因就在这里。斯密学派的教导，除了价值理論并沒有什么别的，这不但是由于它的学說处处以"交換价值"这个概念为依据，而且由于它对它的学說所下的定义。据薩依說，这个科学所教导的是，財富或交換价值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費的。这样說，他所指的那个科学，与生产力的怎样兴起和发展以及怎样受到压迫和摧殘这些方面当然沒有关系。麦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这个科学叫作"价值科学"，近来英国作家們則称之为"交換科学"。

私人經济里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說明生产力理論与价值理論之間的差异的。

假定有两个家族，家长都是地主，这两位家长每人每年可以积蓄一千泰勒①，各有五个儿子。前一个家长将他的积蓄存儲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于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則将积蓄用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識的地主，使其余三个各随着他們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是按照价值理論行事的，后一个的行动依据是生产力理論。前者在他临終的时候，单单就交換价值来說，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来說，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管理方法的改进，結果每一份的产量相等于原来两份的共有产量；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資料。前者的地产将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产方法都一仍旧貫，結果五个部分的总产量比前毫

① 德国旧銀币名——譯者。

无增益。后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种种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傳下去，获致物质財富的力量将有增无已；而前一家族地产愈分愈小，愚昧和貧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因此奴隶主由于奴隶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換价值有了增加，但后代的生产力却被他所毁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的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現有价値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該用于国家未來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領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紙、邮政、貨币、計量、历法、鐘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則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如果对这个說法有疑問，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識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計，只須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論自由、有益目的的結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以及官員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决定，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增减，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影响的；說是全无影响，这个情况是难以想象的。①

現代国家在財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財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現象将怎样解釋呢？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現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現在艰苦，各个人所拥有

① 薩依在他的《实用政治經济学》（第3卷，第242頁）里說："法律不能創造財富。"当然，法律沒有这样的作用，但是它能够創造生产力，生产力比財富、也就是交換价值的占有，更加重要。

的土地面积比現在的大，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却比不上現在。要对这些現象作出解釋，我們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現在的状况是在我們以前許多世代一切发現、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結果。这些就是現代人类的精神資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揚光大；无論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領会的深切程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以它的地下蘊藏、疆土范圍、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为依据，尽可能完善、均衡地发展它領土范圍以內一切的天然資源，并且使它道义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业、政治上的势力扩展到比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事务，它应当有所参加；国家生产力的进退，也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經济学派要我們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經济学里来考虑的。如果我們只是以价值和交換作为研究主題，这个說法也許是对的；我們可以为价值、資本、利潤、工資和地租下定义，我們可以把它們分解成元素，从而研究足以影响它們漲落的是些什么，等等，而不必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环境。但是很明显，这些問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經济，也在同样程度上关系到私人經济。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汉撒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物质財富与政治力量两者彼此之間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作用。

这个学派每逢不得不考虑到这类交互影响作用时，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議的前后矛盾中。亚当·斯密对于英国的航海条例曾作出聳动一时的論断，我們只要在这方面回想一下就够了。[①]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沒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

情况不作綜合考慮，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內財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門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値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視。它所犯的錯誤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談到劳动、自然力量、資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沒有考虑到它們之間存在的差别。它沒有看到，仅仅从事于农业的国家与工农并举的国家两者之間的差别，比从事于畜牧的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間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国家处于純农业阶段时，国內情况是任性与奴役、迷信与无知，在文化、貿易、运输各方面都感到缺乏，貧困和政治上的衰弱是它們的特点。在純农业国家，人民的身心力量获得鼓励与发展的、国內的自然力量和資源获得利用的只是一个极小部分，能够累积起来的資本也极有限，或者簡直沒有。

让我們拿波兰和英国来比一比。两个国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屬于同一阶段的，現在它們彼此相差得多远！国內自由、智力、技术与科学、国际与国內貿易、航海业与运輸的改进、文化和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工厂和工业品是它們的前因，也是它們的后果。要把农业从束縛中解放出来，要从农业提高到商业阶段，在技术和科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水平，从而使地租、农业的收入与工資都有所增长，使地产价値提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工业是一个主要手段。流行学派把这种文化力量归之于国外貿易，这样就把仅仅是屬于交換的作用与創造的作用混淆了起来。国外工业为国外貿易提供商品，通过貿易把这些商品运送給我們，从而引起对我們产品与原料的消費，这些产品与原料就是我們用来代替現款与国外商品相交換的——这就是国外貿易的作用。

如果我們在自己的境內办工业，这种工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是同我們結合在一起的，它向我們所吸取的食物和原料不只是它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而是絕大部分，它的产品并不会由于巨

大的运輸費用而抬高代价，我們在这方面的物資交流也不会由于国外工业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或由于战爭或禁制性进口稅等关系而发生阻滞——試問，如果說辽远地区的工业对我們农业有有利影响的話，那么我們自己的工业在这方面的有利影响比前者要扩大多少倍？

流行学派把物质財富或交換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純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这个学派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多大的錯誤和矛盾。

按照这个学派的說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員，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風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場，就屬于非生产性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屬于生产阶級，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換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許只有几分鐘，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頓、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近来麦克洛克把这些都列入人类社会生产性成員項下）。

我們对于薩依“非物质产物”的說法，决不可信为是足以补救亚当·斯密学說中这一缺点的；他只是对于由此所产生的荒謬結論作了一些掩飾，并沒有使这种結論从眞正的錯誤中解脫出来。依照他的見解，精神（非物质的）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只是由于他們是获得了交換价值报酬的，并且是由于他們的报酬是牺牲了交換价值得来的，并不是由于他們生产了生产力。[1] 在他看来，

---

[1] 薩依曾在好多地方說明这一見解，这里只引証他最后所述及的一段話（《实用政治經济学》，第6卷，第307頁）：“一位律师或医师用了一定代价取得的、并且能产生报酬的那部分才能，是資本价値，但不能轉化为实物，只是寄托在拥有这种才能的个人躯体之中。”

他們的成就好象只是一堆积存的資本。麦克洛克还更进一步；他說人是劳动的产品，正同人所产生的机器一样，而且在他看来，似乎在一切經济研究中，人是必須在这个观点下来考虑的。他相信斯密懂得这个原則的正确性，不过他沒有从这一点得出正确的結論。此外他还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认为吃和喝是生产工作。据托馬斯·庫柏的估价，一位干练的美国律师計值三千元，約相等于一个体魄强健的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里所提到的流行学派的一些錯誤和矛盾，从生产力理論的观点来看，很容易糾正。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屬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們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換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說，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續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則由于他們的艺术給与人們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們生产情緒的高漲。从单純价值理論来看，当然，这些生产力的生产者只能在他們的劳务是用交換价值来报酬的这一限度內来考虑；象这样来考虑他們劳务的方式，有时也未尝沒有些实际用途，例如在稅制学說中，因为稅款是要用交換价值来繳納的。但是当我們考虑到国家，从整个国家或它的国际关系来看問題时，这种单純价值理論就完全不能胜任，就要导向一系列的狹隘观念和錯誤見解。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薩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財富(也就是交換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們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薩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創造任何財富，那是錯誤的。一国

的国外貿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論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說，决不可单純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問題时所片刻不能忽視的是与国家現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国家对于物质資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說，必須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流行学派以单純的价值理論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象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較低代价买得到的任何商品，我們不去买而自己动手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壟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內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說，在工业各部門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我們认为在历史上已經获得了証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說，世界上已經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領域以內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爭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經沒有可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話(我們认为这一点的确切无疑是可以証明的)，那么上述的流行学派的論点又怎能站得住脚呢？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經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經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內生产成本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話，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內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順利經营国外貿易，可

以扩張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內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上面提到的那个地主，他牺牲了若干物质財富，让他几个儿子学习生产业务；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制度，使它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种行动在精神上同那个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薩依认为“这些都是贈給我們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純价值理論为評判事物現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錯誤，用生产力理論来評判这类現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結論。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沒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給了百分之三十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費者固然在几年以內可以較低的代价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敗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淪于乞討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即使就最有利的情况来說，原来是法国农民的消費者和顾客，这时将变成农民的竞爭者，农业生产增加而消費則减少。必然的結果是农产品价值降低，地产跌价，国家将陷于貧困衰弱的地位。英国所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換价值，而法国所偿付的高昂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这种礼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慣于送給他的帕夏(pasha)[1] 的那种珍貴的“絲绳”一样。

自从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給他們的那件“礼物”木馬以来，任何国家收受别一国送給它的“礼物”时，总是有些疑忌的。英国人以出口补助形式贈送給欧洲大陆的礼物价値实在不小，但大陆各国付出的代价却更可惊，那是力量的丧失。这类补助看来好象是对英国出口事业的鼓励，而德国工业却遭到了莫大損害。[2]假使今

① 土耳其高級官銜——譯者。

② 参閱附录一——英譯本注。

天英国人对于德国所需的工业产品，甘願在若干年間无偿供应，我們也要力劝德国人不可接受这样的好意。假使英国人由于在技术上有了某种革新，制造麻布时比德国人用土法制造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四十，假使英国人使用这种新法不过比德国人先走一步，不过早了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方面如果沒有保护关稅，它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这时的德国，就好象是一个人四肢失去了一肢。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貪这个便宜而結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

如果說英国人曾时常有机会向别的国家致送礼物，它致送时的形式是种种不一的，而且有时也并不是出于它的自願，但是作为一个接受礼物的国家，对于这种礼物应不应当接受，事前总得仔細考虑一番。英国人的工商业在世界上居于壟断地位，他們时常会发生他們叫作“生产过剩”的情况，据說是由于“存貨积压过多”的原故。逢到这种时期，他們每个商人就都急于把貨色往船上扔。隔了八天以后，这种貨色就在汉堡、柏林或法兰克福市場上出現，隔了三个星期就在紐約出現，代价比它們的实在价值要低一半。英国商人在当时是不免要受到損失的，但是不要紧，会得救的，他們在随后的好买卖中会得到补偿。吃亏的是德国和美国工商业者，他們兜心受到了一拳——这一拳原是应当由英国人自己受的——他們完蛋了。而英国人只是在隔岸观火，听取灾情的报导；大火爆发以后，火場中的烬余碎片如果落到了别的国家，有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时，居間的商人們就說，“这都是恐慌造成的！”由于这样的恐慌，处于与英国作自由竞争地位的那些国家，它們的全部工业，信用系統，不但是这些，还有农业，甚至整个經济系統，都发生了根本动摇，这些国家在創巨痛深以后，还要通过提高了的价格来大大的报答英国商人——恐慌演变的結果往往如此。在这样情况

下，对于各国商业关系的解釋，是否应当以单純价值理論和世界主义原則为依据；我們对于这一点的恰当性还不应当发生极大疑問嗎？流行經济学派就从来不认为对这种商业恐慌的因果关系加以明白解釋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一切現代国家的偉大政治家，几乎沒有一个例外，都认識到工业对于国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样，华盛頓和拿破侖一样，他們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入探討，凭着他們的远見，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識。重农学派却別有会心，用了詭辯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閣已經烟消云散．比較近代的經济学派已經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錯誤依然不能摆脫，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經济学派沒有能认識到生产力与单純交換价值之間的区別，对于前者沒有能在脫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換价值理論下的一个附屬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別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識。它沒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資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資本”)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內工业沒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揮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脫离农业而轉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曉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 第十三章

## 国家商业动作的划分与国家生产力的联合

流行学派发現了它称作“分工”的那个自然法則，这一光荣是属之于它那大名鼎鼎的創立者的；但是不論亚当·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对于这一法則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沒有能作彻底研究，都沒有能把它最重要的后果追究到底。

“分工”这个說法是有些欠明确的，势必由此发生錯誤或模糊的見解。

如果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里打猎或捕魚、砍伐树木、修补屋子、制箭、制魚网、制衣服，这是“分工”；但是在制針工业的不同操作中由十个人分司其事（象亚当·斯密所曾举示的一个例子），也是“分工”。前者是客观的分工，后者是主观的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則促进生产。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个例子指的是同一个人把他的工作划分了一下，以便完成各种事物，后一个例子指的是几个人分担一种事物的生产工作。

但是两种动作也都可以說是工作的联合，这样說也是同样正确的；那个野蛮时代的人是把各种工作結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制針业的情况是把各个人結合起来从事于同一生产工作。

流行学派所据以說明社会經济中这样重要現象的自然法則，它的主要特征显然不只是分工，而是若干个人之間不同商业动作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結合。这类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单单是由于“划分”，主要还是由于“联合”。亚当·斯密自己未尝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說：“就是社会中最低級成員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出于許多个

人共同劳动与协作的結果。"①他已經这样清楚地說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联合劳动这一观念終于沒有能根究到底，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

让我們再回到亚当·斯密为了說明分工好处而举示的制針业那个例子。在制造过程中，十个人联合起来比各人单干时产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我們檢查一下会发生这种現象的原因时就可以发現，这种在商业动作上的划分，要是沒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的时的联合，在生产上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就很小。

要产生充分推进生产这样一个結果，各个人就必須在肉体上、精神上共同协作，并且在一起工作。从事于針头操作的人，如果要使他有把握，他的劳动力不致于白費，则对于从事于針尖操作的另一工人的协作，必須毫无疑虑。从事于这一工作时，各方面的劳动之間必須有适当的比例，工作时彼此之間必須尽量靠近，他們之間的共同协作必須有保証。假定担任这一工作的十个工人并不住在一处，而是各居一国，那么由于战争、运輸方面发生的障碍、商业恐慌等等，他們之間的协作就不免要时常中断；在这样情况下，生产成本要增加多少，分工的利益要减低到怎样的程度，其中有一个脫离了协作范圍时，其余的人岂不是都要陷于失业状态？

流行学派由于只把动作划分这一点认为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唯一要素，結果法则的应用范圍只是限于各个工厂或农場，这就发生了錯誤；它沒有看到这一法则的作用特别扩及于整个工农业力量，扩及于整个国家經济。

制針业要靠了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論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例如要使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順利进行工作，必要的条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部分，第1章。

件是要使它能够向矿山和金屬冶炼厂买到必要的原料，各种各样需用机器的工厂要願意向它购买出品。沒有了机器制造厂，一个国家遇到战爭时，就会面临丧失大部分工业力量的危險。

同样的情况，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間的关系来說，它們彼此之間所处的地位愈接近，双方物資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則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当遇到战爭、国际爭端、商业恐慌、农业歉收等等事变时，这种在同一政权下的工农协作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明显程度并不亚于制針业中許多个人在同一个屋子里协力工作的利益。

斯密断言，最能适用分工的是工业，农业就要差些。① 在斯密的心目中，只有各个工厂和各个农場。他沒有想到把他的原則扩大到整个市区或省区。假使各市各省能够专心致志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于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农业部門的生产，那么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协作的影响，这时就表現得格外突出。有些地区宜于种麦种麻，有些宜于栽培葡萄和各种果品，还有些則宜于培养森林，进行畜牧，等等。假使每个地区各自专門从事于它在自然条件上最适宜的那些生产事业，然后把它特有产品的剩余部分，向别的地区交換那些地区所宜于生产的那些生活必需品和原料，这样做比每一地区对一切生产事业不分好歹样样都来的办法，在人力和地力方面可以获致更大的利用，可以获致大得多的生产效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見的。象这样的商业行为的划分，象这样的在农业方面的生产力的协作，只有在一切工业部門都已达到了最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实現。因为只有象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于种别繁多的产品才会有巨大需要，或者說，对于农产的剩余部分才会有数量旣大且又稳定的需要，从而使生产者可以有确切把握，他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部分，第1章。

的剩余产品不論数量多少，总可以在本年或至少在下一年按照适当价格脫售；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有足够的資本投放于国內农产品的收购与貯藏方面，才会在有利的情况下对鉄路、公路、內河、运河等运輸方面作巨大改进；也只有在运輸設备方面有了彻底改进的情况下，各市各省才能把它特有产品的余額尽量运銷到其他各地区，甚至最辽远地区，向后者換回它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力求自給自足，交換的机会就很少，也就不需要代价高昂的运輸設备了。

我們可以看到，由于工作的划分与个人力量方面的协作，如何促使生产力首先在各个工厂开始增长，然后扩大到整个統一国家。商业行为划分得越細致，工人結合得越紧密，整个团体获得各个人的协作越有保障，則工厂的发展越有把握。国家工业的一切部門都有了发展时，各个工厂与工业的其他部門結合得越密切，則各厂的发展也越有把握。在一切工业部門发展下的工业力量，同农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結合得越密切，則农业生产力越加增长。工业力量有了这样的发展以后，在农业生产中商业行为的划分与生产力的协作，也将作等比例的发展，从而使农业达到最高度完善阶段。因此凡是一个国家，旣培养了在它領域以內工业的一切部門，使工业达到了高度完善阶段，又拥有广大疆土和充分发展的农业，使它工业人口在生活必需品和原料方面的需要，絕大部分可以由本国供应，那么它就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因而也就是最富裕。

現在让我們就这个論点的反面再考虑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仅仅是农业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需要最大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就缺少了生产力中最关紧要的那一半，实际上甚至在农业本身各部門中有利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这一点，它也是缺少的。象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国家同一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对照时，在生产力上相差的决不仅仅是

一半；同那个健全国家相形之下，它拥有的土地和人口也許相等，或者还远远超过，但就所能获致的物质財富来說，恐怕还不能及到那个国家的五分之一，或者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极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所共同生产的多于一个人所独自生产的决不是十倍，也許是三十倍以上；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一个人用两只手所做的，决不是只少一半，而是要少到无限度。机器对于工业的推进作用愈大，在农业上的应用愈少，就一个农业国家来說，在生产力上的这种損失就愈大。农业国这样損失了的生产力，一部分将落到用工业品向它交換农产品的那个国家的手里。但是，只有当一个农业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已經达到了那样的发展阶段，已經有必要建成一个工业国时，这方面的損失才是絕对的損失。如果国家还沒有达到那样的发展阶段，还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它的农业生产力甚至还沒有脫离最原始情况，如果輸入国外制成品輸出原料时，仍然可以使它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可以使它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有所启发和增长，如果这样的貿易关系能够继續下去，不致由于国外禁止輸入原料品或由于战爭而使貿易中断，或者如果这个农业国家是处于热带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輸入国与輸出国双方的利得是均等的，也是符合于自然規律的，因为处于这样地位的国家，在以本国农产品交換外国工业品的影响下，比之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时，可以更迅速、更稳健地实現文化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发展上，就它在国外貿易影响下所能达到的发展限度来說，已經达到了頂点，或者是工业国輸出工业品时，不願意接受农业国的农产品作交換，或由于工业国在这个农业国市場上的有力竞爭，使后者的工业无法成长；在这样情况下，这个农业国的农业生产力就要发生陷于殘缺状态的危險。

所謂农业的殘缺状态，我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由于

缺乏强有力的、在稳步发展中的工业，以致人口的增加部分，为了求工作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全部农产余额，一等到人口有了显著增进时，除了流徙国外，就只好就眼前所有的一块土地与原有的农民争夺土地，将土地零星分割，直到每一个家庭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致所出产的只能勉强供应农民家庭在食物和原料方面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需要，再沒有余额可以用来向工商业者交换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在国家生产力作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国，当它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时，它所增加的人口，大部分就应当轉移到工业，农产的剩余额，一部分就应当用来供应工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料方面的需要，一部分应当用来换取工业品、机器和工具，以适应农民在消費方面、在提高他們自己生产方面的需要。

如果这样的演变能及时实現，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就能相互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无止境的。这时工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将积极增加，而农业方面除了为获致尽可能大的农产剩余量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口轉移到农业，現有土地也就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分割。农产剩余量愈大，农民可以消費的工业产品数額也愈大。农产余額不断增加，对于从事于工业的工人，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因此农业人口的过剩部分将不断地在工业中获得工作，結果工业的人口不但将与农业的相等，而且将大大超过。英国就处于上述的后一个情况，而一部分法国和德国就处于上述的前一个情况。英国在生产事业的两大部門之間所以会获得这种在工作上的自然划分，主要是靠了它的养羊业和毛紡織业，它在这方面的大規模发展比别的国家領先了一步。在别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农业受到了摧殘。为什么有了土地就有权有势，只是因为封建地主依靠土地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奴仆，可以在領地上加以利用。封建主部下的臣民愈多，他能召集的战

士也愈多。况且在当初的草昧时期，地主对于他的收入，除了豢养大批奴仆以外，也实在沒有别的消費方式；他对待这些奴仆的方法是給他們各人一小块土地从事耕种，条件是为他服劳役并用农产品繳納少量的租稅；他要使奴仆們获得一定的报酬，忠于主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这样就用了人为方法，打下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基础；現在，政府如果要用人为方法改变这个制度，那末它的行动不过是恢复原来的状态罢了。

現在要制止国家农业力量继續下降，要逐漸糾正由过去制度所遺留下来的弊病，除了采用移民政策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国内工业；这样就可以把人口的增加部分逐漸吸引到工业，使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結果使較大范圍的农业經营可以居于更有利地位，可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取得尽可能大的农产余額。

农业劳动者生产力的升降，总是随着以农产品交換工业品或其他产品时的便利程度为轉移的。关于这方面，任何略有发展的国家的国外貿易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形我們在另一章里已通过英国的例子加以說明。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文化、資本、人口各方面已經有了相当发展时，那就可以看到，发展自己的工业对农业的利益，較之即使有最发达的国外貿易而沒有工业，也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它自己获得保証，不致由于战爭、外国在貿易上的限制、商业恐慌等等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样就可以节省輸出农产品与輸入工业品的运輸費用和商业費用的絕大部分；这样就可以因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使交通运輸有改进的机会，从而获得极大利益，并且因同一原因，原来沒有被发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可以得到利用的机会；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工业和农业彼此靠得越近，則工农业之間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1828 年，我曾几次写信給費拉德尔非亚的工业技术促进协会

主席查理·英格索尔先生(这一套书信后来汇集刊印时题名《政治經济学新体系大綱》),当时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政权下工业与农业利益結合时的优点曾試加解釋。我是这样說的。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再假定你也不会烘面包,就象安德森所說的十七世紀时英国人还沒有学会腌青魚的秘法的情形那样,因此你就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粉,烘成面包。試問,在这样情况下你的麦子被英国人扣去作为服务代价的那个部分要占多少,在輸出麦子輸入面包的过程中,被装运工人、海員和商人所消耗的要占多少,种麦子的人能够到手的代价又能够有多少?毫无疑問,通过这种程序国外貿易将受到很大鼓励,但有疑問的是这种交易对于国家的福利与独立自主究竟有沒有好处。只要想一想,假使貴国(美国)与英国之間一旦发生战爭,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将处于什么境地,另一方面,那些吃慣了英国制的面包、在口味上已經养成特好的人,又将处于什么境地。由此可見,为了种麦子的人的經济发展,磨麦子的面粉厂所在地应当同他相近,同样的道理,为了农場主的經济发展,做工的人应当住得同他相近,为了整个广大平原地区的发展,应当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位于它的中心,为了国家整个农业的发展,应当使自己的工业尽可能发展到最高度。

耕种地区有些离开繁盛的都市比較近,有些則比較远,让我們把这两方面的农业情况比較一下。后者的农場主要想向城市供应农产品,只能种植那些耐得起长途运輸的一类,他的供应品同距离购戶較近地区的产物相比較时,价格不会更低,质量也不会更好。他的利潤大部分势必被运輸費用所吞去。他要覓取資本来有利地用于他的农場,将感到困难。他处于穷乡僻壤,既看不到好榜样,又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要革新技术,改良工具,采行新的种植方法,这就很难措手。这位劳动者,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由于对工作的积

极努力缺少竞争与鼓励，生产力就很难获得充分发展，他自己就不免要偏于閑散、怠惰状态。

另一方面，一个与城市接近的农場主情况却不同，他可以因地制宜，对每一方土地作尽可能大的利用。他可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供应多种多样的产品。諸如菜蔬、家禽、蛋类、牛乳、奶油、水果这些产品，尤其是远地农場主所不便經营或认为屬于次要的那些产品，由他經营时就可以获得很大利潤。以家畜的飼养来說，远地区农場主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只是在于家畜的繁殖，而他却通过育肥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利益，并且由此可以改善根菜作物和飼料的种植。有許多东西如石、沙、水力等等，在远地农場主很少有用或簡直沒有用处，而他却可以充分利用，从中获得很大利益。无数最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以及教育設备都近在手边，俯拾卽是。为改进农場所需要的資金也很容易累积。地主与工人依靠城市所提供的改造办法，依靠城市在他們中間所引起的竞爭，再加上获利比較方便，因此容易受到鼓励，充分发揮身心力量来改善他們的处境。有的国家是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的，有的国家只能用自己的农产品向国外交換工业品，这两种国家之間存在的差别情况正同上面两种农場主的情况一样。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則。一枚針在制針厂所处的地位，同国家福利在我們叫作"国家"的那个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間的划分。两方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識，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內巩固人身和財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們在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則物质財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資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間的划分与协作。上面已經說明，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針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門、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們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調。有些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哲学家、語言学家、文学家这类人材有余，而熟练技工、商人和海員却感到不足。这是由于在学問方面文化有了高度进展，但工业力量与国內外貿易却沒有能获得高度进展，在这方面缺乏支持；这就象一个工作失調的制針厂一样，制針头的太多了，制針尖的却赶不上。象这样"針头过多"的国家，它所过剩的是一大堆无用的书本、难以究詰的理論体系和学說的空泛爭論，結果使整个国家在理智上越来越糊涂而不是越来越开朗，对于实用工作則置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滞，这就好象是处于这样一种畸形状态，国內的僧侶很多而缺少誘导青年的教师，軍人很多而缺少政治家，行政官很多而缺少公理与正义的裁判者和捍卫者。

一个国家沒有工业，只經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間以及它們各部門之間的交流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換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膀子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許很有用，但总不及自己有两只膀子的好，因为外人之心是难以捉摸的。国家自己有了工业，食物和原料就可以尽量按照工业的需要来生产；如果依存于国外工业，那就要受到牵制，只能按照外国自己不想生产而不得不向另一国家采购的那个限度来生产剩余产品。

同一个国家內各个不同地区之間一样，各国之間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內貿易进行的，后者

是通过国际貿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实际上是缺陷很多的，遇到战爭、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故，就往往会中断。世界各国是依賴这类协作而互相联系起来的，虽然从这一点看来，这类协作好象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就文化上已經获得高度发展的任何国家来說，它的重要性是极有限的。流行学派就不否认这一点，它說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場，比起国外市場来要重要得多。由此可見，不論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結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結合。

但是决定国际和国内分工的，主要是气候和造化本身。中国产茶，爪哇产香料，路易斯安那产棉花，溫带各国产五谷、羊毛、水果和工业品，我們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同样地生产这些产品。有些产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宜在国內生产，如果依照国际分工原則（就是說，通过国外貿易）向国外采购时，质量旣好，价格也低，对于这类物品要想采用国內分工原則，試图由本国来供应，那就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尽量利用它所有的一切自然力量，来滿足本国的需要，使自己能够用生产余額，向别的国家采购自然条件不容許在它自己領土上生产的那些必需品，这种現象所表示的也同样是国家在智力上、勤恳耐劳上的缺乏。

有些国家的土壤能生产质量最优、数量最大的一般生活必需品，其气候也最有助于身心的努力，不論从国内分工或国际分工来說，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国家，这就是处于溫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特别易于发展，因此不但可以使它們在精神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权力上达到最高度，而且可以使一些热带国家以及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們处于从屬地位。因此处于溫带的国家責无旁貸，它們格外应当使自己的国內分工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格外应当利用国际分工使它們自己富裕起来。

# 第十四章　私人經济与国家經济

我們已經从历史上証明了国家的統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們也已說明了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如果沒有当代和后代各个个人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私人工业就很少发展机会。我們在前一章里还进一步說明了生产力的联合对各个工厂起着怎样有利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工业起着怎样同样有利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我們要說明的是，流行学派把私人經济原則与国家經济原則相混淆以后，怎样借助于这个手法掩盖了它对国家利益的誤解以及对国家力量联合的作用的誤解。

亚当·斯密說，[①]“凡是在私人家庭中看上去是有智慮的行动，施之于国家时也决不会是愚蠢的。”任何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势必也有助于社会利益的推进。显然，每一个个人对于他自己的环境总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对于他自己的工作总是最注意的，因此他的資金应当怎样有利地加以运用，能够比政治家或立法者作出远为正确的决定。对于这一点誰要是敢于越俎代庖，那不但对他說来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且这原是完全屬于生产者自己的事，由别人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是最不适宜的。亚当·斯密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为了国内的工业而对貿易加以限制是傻子干的事；不論哪个国家、哪个个人，应当向最便宜的地方去采購物品；要使国家达到最高度发展，我們只須守着这样一句老話办事：一切不管，听任自由。”斯密和薩依把一个企图用保护关税促进工业的国家比作一个裁縫，他是一个縫衣的，却要替自己做鞋子，又比作一

① 《国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

个靴匠，他为了发展业务，却对进門的客人征收通行税。流行学派都不能免于这样的錯誤，托馬斯·庫柏也患了同样的毛病，而且更加趋于极端。他在他反对美国保护制度的那本书里[1]这样說：“政治經济与一切个人的私人經济差不多是一件东西；政治并不是政治經济里的主要成分；說社会与社会所賴以組成的个人，两者完全不同，那是荒謬的。每一个个人都完全懂得怎样来利用他的劳力和資本。社会的財富无非是所有各个成員財富的綜合；旣然每个人都能为他自己作出最妥善的安排，那么尽量听任每个人自己作主时，国家就必然是最富裕的。”美国保护关税制的拥护者曾經反对这种論調，而主張自由貿易的进口商人則曾加以引証；美国施行的航海法大大促进了它的运輸业、漁业和国外貿易；单单为了保护商船业，每年在艦队方面就花了数百万元。按照庫柏的理論，这类法律措施和这类支出，象保护关税一样，都是应当受到指責的。他大声疾呼，“无論如何，为了海外貿易而引起海軍战爭总是不値得的；可以让商人自己去保护他們自己。”

于是流行学派由于一开头就抹煞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則，終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們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

什么？难道在私人經济中认为値得做的，也就是在国家經济中所认为値得做的嗎？难道关涉到民族和国家性质的問題，如关于后代需求的考慮，也是包括在个人性质之內的嗎？我們只要想一想一个美国城市在开創时的情况；任何个人如果听任他自己去干，他就只会关心到他自己的需要，充其量也不过兼顾到与他最切近的一些后輩，而由个人結合成社会时，就能为关系最远的后代謀便利，作打算，就能为了后一代的幸福而使这一代忍受困难和

[1] 托馬斯·庫柏：《政治經济学讲演》，第1、15、19、117頁。

牺牲；这些都是只有个人結成团体时才会实現的，沒有一个懂得事理的人会期望各个个人来这样做的。諸如保卫国家、維持公共治安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数不清的任务，只有借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当个人促进他的私人經济时，他能进一步来考虑这些問題嗎？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該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們的自由嗎？不仅如比，国家难道不应該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們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們自己的生命嗎？我們必須象庫柏那样，先把“国家”、“民族”那些概念連根拔掉，然后才能抱有象他那样的見解。

不，那种見解是完全錯誤的。有些在私人經济中也許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經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理由极为簡单，縫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一个縫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家族計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土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說，由他自行設法，他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我們可以問問那些法庭推事，他們是不是时常要送一些人到监獄里去，只是由于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本領太大了一些，过于卖力了一些。强盜、賊、私販、騙子，他們对于自己周圍和本身的情况、环境，也同样是极端了解的，对于他們自己的事也是极端关怀的；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这些人的个人活动受到最少約束时，社会就会处于至善至美的境地。

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这类情况是多不胜数的。[1] 它防止船主在非洲西岸装載奴隶把他們运到美国。輪船的建造、航海的規則，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止船长从

---

① 参閱附录二——英譯本注。

中上下其手，使乘客或海員遭受灾害。英国近来发現保險公司与船主作不法勾結，由于少数人的这种貪婪罪恶行为，每年受害的有数千人，損失的資財达数百万元，因此对造船业規定了某些限制。美国是最重視个人自由的，但是对面粉厂規定每桶裝入的上好面粉不得少于一百九十八磅，否則厂主須受罰，还派了市場檢查員，一切市場商品須受檢查。任何国家都认为应該保护公众，使他們在生活必需品以及药品等等的銷售中不受到危害和損失，都把这一点看作是国家的責任。

但是流行学派也許要提出答辯，說我們所提到的是关于对財产、对人身的非法損害行为，并非有用之物的正当交易，并非私人經济中那些有益无害的事业，国家对于这些是无权加以限制的。当然，只要这些事业的确有益无害，国家是无权过問的；但是就事业本身、就世界一般貿易来說确是有益无害的事业，就国家的国內貿易来說却可能成为有害的事业；反过来說也是如此。当和平时期，从世界主义观点来看，商船私掠是非法活动；但是在战争时期，政府却贊助这种活动。故意伤害人命在和平时期是罪行，在战争中却是責任。火药、子彈、軍械的买卖在承平时是允許的，但是誰要是在战时向敌人供应这类物資，就要当作卖国賊来处分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責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約束和限制。所謂禁止或保护关稅，与流行学派那种强辞夺理的說法恰恰相反，它对于个人怎样运用他的生产力和資金这一点，并不发号施令；它并不向这一个作出指示，“你的錢必須用来造一只船或建立一个厂”，也不向那一个規定任务，“你一定要当上一个船长或土木工程师”；任何个人在哪里运用、怎样运用他的資金，他要选擇哪一类职业，这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它是絕对不过問的。它只是这样說：“为了我們国家的利益，这些或别的一些商品应当让我們自

己来制造。但是我們由于处于与外国进行自由竞爭的情况下决不能获得这种利益，因此在我們认为必要的限度以內，对这种竞爭加以限制。这样就不但可以使投資于这些新工业部門的人以及把身心力量貢献于这些新事业的人获得必要的保障，使他們不至于损失資本或失去他們所选定的終生职业，而且可以誘使国外商人和技工連同他們的生产力投奔到我們这边来。”在这样情况下，它一点也沒有束縛私人事业；相反地，它使国內个人的、自然的以及金錢上的力量有了更加广闊的活动領域。因此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它并沒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

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制度足以造成国家权力对私人資本、私人事业活动不公平、違反經济原則的侵犯；如果我們考虑到，允許我們私人事业遭受这样的侵犯行为的是国外商业規制，只有靠了保护制度的帮助，才能使我們与那些国外商业政策的有害作用相抵抗，那么流行学派的那种論点的荒謬，就显得更加突出。假使英国人拒絕接受我們的谷物，把它排出市場，他們的做法豈不就是迫使我們的农业家减少谷物产量，减去在自由輸入制度下得以运銷英国的那个数量嗎？假使英国人对于我們所产的羊毛、酒类或木材定了那样高的进口税率，以致使我們在这些方面的出口业务大部分或全部陷于停頓；这样的結果，除了表明英国国家权力在这个限度上限制了我們若干生产部門的活动，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就这些情况来說，显然表明，国外的法制在支配着我們的資本，我們个人的生产力，如果不是由于国外的規章制度，是不会产生这样的結果的。由此可見，如果不靠了我們自己的法制，在以我們自己国家利益为前提下指导我們自己的国內工业，就不能防止外国以它們自己的实际或推定利益为依据，来限制我們的国內工业；在

这样情况下，无論如何对我們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利的。一个情况是听任我們的私人事业处于以外国利益为依据的外国法制的指导之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們的事业由以我們自己利益为依据的自己的法制来指导；难道前一个情况对于我們本国人民反而会更加有利、反而是一个更聪明的办法嗎？如果处于前一情况，作为一个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家，就得逐年留意英国国会頒布的法令，从而摸出那个机构的意旨对于他的谷物或羊毛的生产究竟是要加以鼓励呢还是要加以限制；处于后一情况时，他自己国家的法制在对国外工业品的关系上对他規定了某种限制，但是他全部产品的行銷却有了保障，使他决不会再受到国外法制的侵犯。試問，难道这位德国或美国农业家在前一个情况下反会感到他所受到的束縛比較少嗎？

假使这个学派认为保护关稅将使国內經营工业者居于壟断地位而对国內消費者不利，这样的論据也是非常脆弱无力的。在保护制度下使国內工业有了保障，国內市場由此获得的利益是人人可以自由享受的，絕对不是一种不公开的壟断而是一种特有权益，这种权益凡是我国人民都可获得，除外的只是外国人民；外国人民他們自己也享有同样的这种"壟断"，我国人民只是借此使自己和他們立于同等地位，这就使施行保护制度的主張更加理直气壮了。这种权益既不是使生产者专享其利，也沒有使消費者受到不利；因为如果說生产者在开始时获得了較高价格，他們所冒的風險也是大的，因为一切工业在开創时总不免有发生巨大損失和牺牲的危險，他們是要同这种危險作艰苦斗爭的。但是在消費者方面尽可放心，这种非常利潤决不会达到过高程度或长期存在，由于继起的国內竞爭，不久必然会使价格降低，且会降低到在外商自由竞爭局面下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之下。工业品最主要的消費者是农业家，如果說他們也須付出較高代价而受到不利影响，这种

不利影响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获得补偿而大大有余的——这时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加,价格也有了提高。

流行学派由于把单純价值理論与生产力理論混淆在一起，从而发生了又一詭异的論据。它說一国的財富不过是国内一切个人財富的綜合，要談到刺激生产，累积財富，在这一点上各个人的个人利益要比国家的一切規定有力量得多,因此得出結論說,对于各个人累积財富的活动,如果听其自然,不加干預，国内工业就能够获得最大发展。这个論点未尝不可以同意,但是流行学派希望由此得出的結論却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問題的焦点,象在前一章里已經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通过商业限制来直接增加国内的交換价值的量，而是在于增加生产力的量。但是国家生产力的綜合并不等于在分别考虑下一切个人生产力的綜合；这些力量的綜合量主要决定于社会和政治情况，特别有賴于国家在国内分工和国内生产力协作这些方面进行时的有效程度，这一点在前几章里已作了充分闡述。

流行学派的理論体系处处只考虑到个人，在这种理論的設想下,个人彼此之間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毫无拘束的,如果我們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向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滿意了。这种論調指的当然不是国家經济体系而是人类的私人經济体系；假使沒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預,沒有战爭,沒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这样的体系就会自然形成。至于那些現在已經强盛起来的国家,它們是凭什么方法达到并保持現有强盛地位的,还有些以前曾經一度强盛的国家，它們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了原有强盛地位的，这个理論体系的拥护者对于这些問題却向来置之不顾。我們从这种理論体系所能知道的只是,私人事业、天賦才能、劳动和資本怎样为了使有价值产品得以交換而結合在一起，以及这些产品怎样在全人类中获得分配和消費。但是如果要問一問，屬于任

何一个国家所有的自然力量是凭了什么方法使它們活动起来并具有价値，从而使貧弱国家臻于强盛的，就不能从这个理論体系中获得任何解答；这是因为这个学派完全沒有顾到政治，也沒有顾到各个国家的特有情况，它所顾到的只是全人类的发展。当它談到国际貿易問題时，所討論的始終是本国与外国个人之間的敌对关系，举述的例子始終只是限于各个商人的私人交易，提到商品时总是籠統来說的，并不考虑到問題是有关原料品还是制成品——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要証明一点，进口和出口的不論是貨币、原料或制成品，进出口不論是否平衡，对国家是同样有利的。比如說，我們听到美国发生了商业恐慌，吓得手足无措，就象在本国发生了瘟疫一样，因此向这个理論請教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或緩和恐慌的襲击，这时我們是不会获得教益或安慰的；不仅如此，这个理論使我們对这类現象簡直不可能作科学探討，因为要避免被駡成糊塗虫或无知識的蠢物，“貿易平衡”这个詞儿就根本不宜出口，虽然在議院里、官厅里、交易所里，这个詞是到处在应用的。我們受到了不倦不厌的教誨，說是就整个人类生活来說，出口总是会自然而然地与进口相平衡的；虽然我們看到英格兰銀行的公开报告时，曉得它对事物的自然演变是怎样在进行着帮助的，我們也看到了这一事实，由于英国谷物法的存在，与英国有交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农业家，用他的农产品来償付他所消耗的工业品时，发生了些困难。

有些国家在經济发展上达到了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較低阶段，这个学派却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它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說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論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說，再沒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

但是統計和历史所教导我們的却恰恰相反，国家在經济上越

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預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来說，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說在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不能达到这种境地，或者甚至对国家可能有害，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当然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約束。

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爭說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場观点来看，原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間正当的商品交換加以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些国家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們的利益之下，就是說，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談各国个人之間的自由竞爭，那就荒謬之至了。这个学派拥护自由竞爭的論点，实际上只能运用于屬于同一国家的各个人之間的交換。看来不論哪一个大国都必須力图在自己范圍以內形成一个聚合体，到那时只是在适合自己集体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与别的相类聚合体发生貿易关系。如果我們把各个个人看成只是为他自己而生存的，并不具有屬于国內社会一个成員的性质，如果我們(象斯密和薩依那样)只是把各个个人看成是生产者和消費者，而并不是屬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成員，那么上述的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将迥然不同。在这样情况下的个人是不会关心到后代的发展的；为了难以肯定的渺茫的未来利益(即使在他看来有一点价值的話)而作确定的、現实的牺牲，在他們看来是愚不可及的(象庫柏先生就的确曾向我們这样指出过)；他們对于国家的是否繼續存在根本不十分注意；即使他們的商人的船只受到海盜的侵夺，也觉得沒有什么切身关系；他們对于国家的权力、尊严或光荣这些問題是不会去多操心的；他們至多只是为了自

己儿女的教育能够説服自己在物质方面有所牺牲，給予他們学习一种职业的机会，然而也必須在事前确有把握，深信儿女有了教育在若干年后就能够自己謀生，方才肯这样做。

按照流行学派的理論，国家經济与私人經济实际上的确是极为相类的，薩依曾(例外地)认为国内工业也未尝不可加以保护，但須附有一个条件，要有一切可能使工业在几年以后达到自立地位，这就象一个鞋匠收学徒一样，学徒必須在短短的几年以内把手艺学好，他应当在几年以后能够不靠师傅的帮助，自己独立謀生。

## 第十五章 民族精神与国家經济

从上面几章已經可以看到，流行学派的理論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点。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則，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純交换价值，沒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沒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

但是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間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語言和文字、傳統和历史、風俗和习慣、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繼續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緒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結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圍以内的权利法則，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

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資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圍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設想，才有可能。

然而，一方面各个国家就它們的情况和环境来說，彼此之間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它們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全的，也有缺手缺脚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或野蛮的；但是它們就同个人一样，都要求生存、要求进步，这是天賦的本能。使国家从野蛮轉变到文明，从弱小轉变到强大，尤其重要的是使它获得长期生存的保障，这些都是政治任务。要完成国家的經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世界集团准备条件，这却是一个政治經济任务。

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所具备的是共同的語言和文字、广闊的領土、多种多样的天然資源、合宜的国境和稠密的人口。国家的农工商业和航运事业必須作共同的、按比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教育事业以及一般的文化事业必須与物质生产处于同等基础。它的政体、法律和制度对于本国人民必須提供高度的安全和自由，对于宗教、道德和繁荣必須能有所促进，总之必須以提高人民福利为目标。它在陆上、海上必須具有足够力量来保护其独立生存以及国外貿易。它还应当有力量对落后国家的文化发生有利影响，用它的过剩人口以及精神与物质資本来建立殖民地，建立新国家。

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是正常国家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物质发展和政权巩固的基本条件。一个土地狹小、人口无多的国家，尤其是如果有着各别的語言时，它的文学、它的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制度，就不会是完善的。一个小国是决不能使生产的各部門在它国境以内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的。在这样环境下，一切保护制度不过是私人壟断性质。它只有靠了与强大的国家結成同盟，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并加倍地努力，然后可以有希望勉强保持独立

地位。

一个国家如果沒有海岸綫、商船或海軍，或对其河流的港口沒有管轄权，那么它在对外貿易上就不得不依賴别的国家；它旣不能建立殖民地，也不能締造新国家；在这样情况下，它的过剩人口以及精神与物质資本流入未开化国家时，就会对它自己的文学、文化和工业造成損失，而有利于别的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沒有海洋和山脉为屏障，遇到敌人攻击时就成为四战之地，在这样情况下只有忍受很大牺牲，才能有希望为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制度，然而无論如何，这个制度仍然是不会十分完善的。

国家領土上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方法有的是通过王位的继承，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有的是收买，如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有的是征服，如大不列顛和爱尔兰。

現代則又采用了一个第四种方法，它比征服的方法合乎公道，更加合乎国家爭取进展的要求，也并不有賴于王位继承等偶发的事变，这就是通过自由协商的方法，使不同国家的利益結合起来趋于一致。

德国通过关税同盟这一措施，初次取得了它在民族精神上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这个同盟的范圍还沒有扩展到全部海岸地区，它的范圍应当从来因河口直到波兰边界，把荷兰和丹麦都包括在內，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大功告成。将来这两个国家一定要加入德意志同盟，然后再进一步加入德意志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結果，到那时德意志国家就立即可以享有它目前所缺乏的那些，那就是漁业和海軍，海外貿易和殖民地。况且就血統和一般特征来說，这两个国家本来是屬于日耳曼民族的。它們受到了債务負担的压迫，这只是由于違反自然形势、硬要掙得独立的結果；将来势所必然，这种負担的压迫将愈演愈甚，直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到那时它

們就会认識到与大国合并是合情合理、也是合于需要的。

比利时的領土和人口都很有限，要弥补这个缺陷，唯一的方法是与較大的邻邦相联合。美国和加拿大两者的人口越是增加，美国的保护制度越是发展，就越会使它們感到彼此有靠攏的必要，英国要从旁阻撓，就会越来越感到困难。

从經济方面看来，国家都必須經过如下各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

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轉入畜牧、轉入农业、进而轉入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实現这种轉变的最迅速有利的方法是对先进的城市和国家进行自由貿易，但是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貿易获得眞正大規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預，才能实現。各国工业发展的經过都可以作証，尤其是英国的历史，格外清楚地証明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沒有机会把自己的剩余农产品通过国外貿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只宜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和法制，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貿易(即輸出农产品、輸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与文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内政上已經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愈高，通过国外貿易在改进国内社会状况方面所得的利益将愈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家对它的优势竞爭中它所受到的損害也愈大。

就后一类国家来說，它們已經具备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們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爭力量，使它們在前进道路上受到了阻碍——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商业限制以便

建立并保护它們自己的工业;即使就这类国家来說,也只有当它們的工业已經有了相当力量，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害怕国外竞爭，从而有从根本上来保护国內工业的必要时，才值得实行这种保护制度。

实行保护制度时也并不是沒有步驟的，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竞爭,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別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不但与世界主义經济原則相反，而且也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違背。如果要加以保护的那个工业国还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稅在开始时就必須定得相当輕微,然后随着国家的精神与物质資本以及技术能力与进取精神的增长而逐漸提高。工业的不同部門也并不是一定要在同样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門。这里所謂重要的工业部門,指的是建立与經营时需要大量資本、大規模机械設备、高度技术知識、丰富經驗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們的綜合价値来說,按照它們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說,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例如棉、毛、麻等紡織业就屬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主要部門能够在适当保护下获得发展，工业中其他次要部門就可以圍繞着它們在較低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有些国家,工資标准很高,領土广大，而人口还沒有获得与幅員相称的发展,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象这样的国家，如果从别的国家輸入工业品时能够自由地用它們的农产品相交换，那么对于主要不以机器来进行生产的那些工业可以給与較少的保护,而以主要用机器来生产的那些工业作为保护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办法对它們比較有利。

流行学派认为象这样的国家，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与自己建立工业,两者同样可以促进文化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尤其是社会进步；这样对国家經济的性質就完全陷入了誤解。一个单純

的农业国家，决不能使它的国內和国外貿易、內地运輸設备以及国外航运获得充分的发展，决不能使人口随着生活的提高而相应地增加，在道德、智力、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也决不能获得显著的进展；这样一个国家决不能获得重大的政治势力，对于落后国家的教化和进步也决不能居于能够有所影响的地位从而造成自己的殖民地。一个单純的农业国家与一个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比較起来，就制度的完备来說，不知要相差多少。前者对于用工业品向它交換农产品的那些国家，在經济上、政治上总是要或多或少处于从屬地位的。它要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必須看着别的国家的眼色，要看别的国家願意向它购入多少而定。至于后者，也就是那些工农业同时并进的国家，情形却相反，它們自己也生产大量原料和粮食，只是除由自己供应以外还感到不足的部分，才由純农业国输入。因此就純农业国所处的地位来說，首先它的农产有效銷售量势必要看工农业国家收成的丰歉来决定，其次在銷售中还势必要同别的純农业国相竞爭；这就是說，銷售情况本身原已很少稳定成分，由于竞爭势力的存在，就更加处于搖摆不定的地位。最后农业国对工业国的貿易关系还有遭到全部被破坏的危險，一旦发生了战爭，或外国在关税制度上有了新的設施，貿易的局面即将完全改观，这时农业国一方面不能为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找到买主，一方面眼見工业品的供应断絕，势必受到双重打击。我們在上面已經提过，将农业国比作个人时，这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是向外人借用的，借来的是靠不住的，是不能随时随刻“如身之使臂”的；而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却是两臂齐全的人，他的两只膀子是完全听他自己使用的。

流行学派說保护制度是違反自然的，只是投机政客玩弄的一种花样；这种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历史証明，保护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达到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或是由于战爭与优势工业国

家施行敌对性商业法制的結果。

独立和权力的概念，就是从“国家”那个概念而来的。流行学派从来就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并不是各个国家的經济，而是一般社会或全人类的經济。例如，假使我們設想，一切国家已經在世界联盟的方式下統一起来，那么关于各个国家独立和权力的問題就不再成为研究对象。在这样情况下，各国独立地位的保証，所依据的将只是世界团体的法律条文，就象罗得島和德拉韦两州在北美合众国中的地位一样。自从这个合众国建立以来，說是其中較小的州想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或认为自己的独立地位沒有比它大的那些州安全，象这样的事还沒听到过。

世界联盟这一原則是合理的，然而它不过是一个原則而已，并不是一个旣成事实；如果某一国家，預料从这样一个联盟、从普遍持久和平能够获得莫大利益，因此就假定这样一个联盟已經实际存在，卽以此为依据来規定国家的政策方針，这就与理性相反，成为不合理的行动了。我們要問，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張解散軍队，銷毁兵艦，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但是流行学派竭力鼓吹普遍自由貿易的好处，劝告一些国家放弃保护制度的利益；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依照它的主張办事时，这个国家所做的，原則上同上述的不合理行动也并沒有什么两样。

战爭对于国与国之間的商业关系是要起破坏作用的。这一国的农业家因此不得不与别一国的工业家分手。这时工业家——尤其是屬于有着广泛商业关系的海軍强国的工业家——可以从容地向他本国农业那里获得补償，或者与别的可以接触到的农业国家发生关系，而那个純农业国家的居民，在这样关系中断的情况下，却要受到双重打击。

純农业国居民的剩余农产品将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在原来存

在的貿易关系中已經习于使用、对他已經成为必需的那些工业品，現在已經无法获致，于是在生产和消費两方面，他的力量都将趋于萎縮。

但是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农业国，由于战爭的影响，在生产和消費两方面都有所减退时，如果在人口、文化和农业方面都已有了很大进展，則国际貿易停頓以后，它的工业将勃然兴起。这时战爭对它所起的作用，就象禁止性的关税制度一样。由战爭所造成的形势，使它知道了自己建立工业的巨大利益，使它从实际經驗中体会到了战时对外貿易关系的中断，对它实在是利多于弊的。国內会普遍相信，它得从农业国地位轉变到一个工农业国家的地位，从而在富强和文化这些方面达到最高发展程度。但是象这样一个国家，由战爭时期开始，在工业上已經有了巨大进展以后，如果和平再度确立，而原来有貿易关系的国家想重新建立这种关系时，双方就都会发現，在战时新的事业已經构成，再恢复以前的关系，就会使这种事业受到破坏。① 已往的那个农业国家这时就会感到，如果恢复向国外銷售农产品的办法，势必牺牲自己成立未久的工业；而那个工业国家所感到的却是，一旦恢复自由輸入，它在战时构成的一部分国內农业生产将受到破坏。因此双方都想用征收进口税办法来保护这些事业。这就是近五十年来商业政策的历史。

晚近的保护制度是战爭所促成的。我們坚决认为，即使英国在和約告成以后并沒有犯那个絕大錯誤，并沒有限制生活必需品与原料輸入，从而使战时实行保护制度的动机在和平时期继續保持下去——即使处于这样的情况，那些列入二三等的工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继續施行保护政策，并使它进一步发展。对

① 参閱《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英譯本注。

未开化国家来說，农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只有与文明的工业国家进行貿易，才能获得进步；但是当它已經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除了自办工业，就再沒有别的方法可以使它在富强上、文化上达到最高度。因此当战爭使一个純农业国改变了局势，使它得以轉变为工农业国家时，对它来說，战爭实在是一个福星，美国的独立战爭就正是这样，它尽管牺牲很大，但对后代說来，却由此获得了无穷幸福。但是一个有条件可以发展自己工业的国家，如果在和平恢复以后，依然走向純农业的老路，那就要形成一个禍胎，这种情况的危險性，比战爭本身还不知要大多少倍。

英国在普遍和平恢复以后，对于国外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进口規定了限制，从而对它的主要活动傾向——壟断全世界的工业市場——自己加上了一个限度，这对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来說是一件幸事。英国的农业家在战爭时期对本国市場供应农产品时，曾居于专利地位，战后如果允許外国自由竞爭，当然将感到痛苦，但这种情况只是暫时的，在后一时期，英国工业将由此在全世界居于壟断地位（在另一場合，当詳細說明这一点），他們在这方面的損失将获得十倍的补償。至于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經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战爭，在这个期間，它們的农产品一直与英国市場处于隔离状态，因此使它們自己的工业有了相当发展；根据这个情况，也許只須再經过十年到十五年的严格保护，它們的工业就可以获得进一步巩固，就可以有力量与英国工业的自由竞爭势力相抗衡。我們說，处于这样地位的国家，假使在受了将近半世紀的牺牲以后，放弃了自办工业的巨大利益，仍然要从只有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文化繁荣和独立地位降落到純农业国俯仰由人的劣势地位，那就比英国人限制农产品进口的举动更加愚昧。我們眼看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蒸蒸日上，将与英国展开有力竞爭，而它們自己却又縮回到单搞农业的老路，这只会使英国

看到这种乖謬的举动而快意。

再假定英国的工业界果有充分势力，足以迫使以大地主为主要組成分子的上院和以乡村地主为主要組成分子的下院在限制輸入农产品这一問題上让步，誰又能保証若干年以后又一个保守党內閣在新环境下不会改弦易轍，再来一个新的谷物法呢？也許由于又一次海战或由于大陆制度的变化，再度使欧洲大陆的农业家同島国的工业家分了开来，这时大陆各国在工业上将不得不重起爐灶，傾其全力于克服在开始办工业时势必发生的困难，然后在恢复和平时再将过去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誰又能保証在将来不会有这样的演变呢？

在这样情况下流行学派将振振有詞，它会埋怨大陆国家，只懂得在战时建立工业，在和平时期又把它毁掉，这样轉来轉去，就象西賽法斯① 的搬运石头一样。然而这样的演变，实际上就是流行学派自己所主張的。

流行学派如果沒有从这門科学中（这个学派所研究的尽管自命是科学）把政治因素完全排除，如果对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沒有完全置之不顾，以致关于战爭对各个国家之間的商业关系所发生的影响完全不加考虑，那就决不会产生这样荒謬的結論。

农业家与工业家如果同屬于一个国家，因此眞正在持久和平下結合在一起，則两者之間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情况下，已有工业的扩充和改进，每一步驟都足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并不是捉摸不定的，并不是取决于国外的商业限制、国外的商业盛衰、国外的政治变动和战爭、国外的种种发明和革新、或国外农产的丰歉的；本国农业家不必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不必与它們同甘共苦，他的利益是年年有把握的。不管国外的农产收获如

① 古希腊神話中科林斯的国王。他被罰推运巨石到山巔，但推上又滚下，永无止期，劳而无功——譯者。

何，也不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爭执，他总可以安然脫售他的产品，按适宜的、正常的价格，換回他所需要的工业品。另一方面，本国农业上的每一个进展，在种植技术上的每一种革新，对本国工业都会引起鼓励作用，因为本国农业生产的每一次增长，对本国工业生产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扩張。于是通过这种互为影响的作用，就使作为国家力量与支柱的这两大源泉有了不断进步的保証。

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貿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証，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証，这是比单純物质財富要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例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波兰在国际地位中已被除名，主要是由于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級，而这个阶級是只有在国内工业确切树立以后才能成立的。

流行学派并不能否认，一国的国外市場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內市場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場；但是它沒有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結論，那是极明显的，即向海外追求財富虽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內市場的培养与保卫，只有在国內工业上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国外貿易上有重大发展。

这个学派对于市場的本质和特征，只是从世界主义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衡量的。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大多数处于倫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工业天然的市場范圍之內；在自由貿易下，就大陆各国內地来說，只有极少数地方的工业产品能够在它們自己的口岸与英国工业品維持相等的价格。英国的工业資本比較雄厚，技术比較先进，有着較大的国內市場，可以在較大規模下、因此也就是較低成本下从事生产，海上运輸費用也比較低廉，这就使英国工业居于比别的国家更有利的地位；后者要占有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对本国市場作长期不断的保护，积极改进內地交通設备，才能逐漸实

現。但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場，不論就国內或国外貿易来說，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場占上風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經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的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風气所趋，同情于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論从經济或政治方面来說，国家所处地位再沒有比这个更危險的了。

科学决不可为了世界主义的目标而否认各国特有情况的本质，也不可把这一点置之不顾或加以曲解。只有注意到各国的自然环境，引导各个国家分别按照它各自的特有环境向更高目的努力，这类目的才能达到。我們可以看一看，流行学派学說迄今为止在实踐中的成就是如何的渺小。这幷不是实踐政治家的失职，他們对于国家环境的特征是有相当正确了解的，錯誤是在于理論本身，由于这种理論与一切經驗事实背道而馳，在实踐中就必然要格格不入。有些国家，例如南美洲各国，是不宜于采用保护制度的，因为这个制度是同它們国家环境的要求相違反的；可是这个理論果曾阻止它們采用保护制度嗎？有的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无需实行保护政策，在商业往来上作了这样的限制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施行限制政策和受到限制影响的国家双方都必然会遭受不利；这个理論也曾阻止这些国家采用保护政策嗎？① 那些精制品，主要也就是奢侈品，是不需要在貿易上加以保护的，这类物品尽可以让它遭受竞争，对国家的經济发展显然不会引起絲毫危險；这个理論曾阻止对这些物品实行保护措施嗎？沒有。迄今为止，这个理論幷沒有引起过任何彻底的改革，它既与事物的本质相違反，此后也决不会引起任何改革的。如果它願意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它就能够而且必然会引起重大的改革。

如果这个理論能够說明，阻止粮食与原料的自由貿易，将使实

① 参閱附录三——英譯本注。

行这个政策的国家自身受到极大不利，并且指出，惟有以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的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則首先沾到它的光的就是一切国家、即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它这就可以将有关工业的保护制度树立在正确原則上，从而誘使目前正在严格实行禁止制度的那些国家，例如法国，逐步地放弃这个制度。工业家对于这些理論家一旦有了信心，曉得他們所企图的决不是在于現有工业的毁灭，他們所考虑的每一个通情达理的商业政策，都是以工业的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为依据的；到了那个时候，工业家就不会反对他們的說詞，就不会不願意改变禁止政策了。

如果这个理論能够这样教导德国人，告訴他們，要順利发展他們自己的工业，开始时保护税率只能暫仍旧貫，然后逐步提高，到相当时期再逐步降低；告訴他們，在任何情况下，經过周密布置的有限度的国外竞争，对自己工业发展实际上总是有利的——如果这个理論能够这样說明問題，那要比单純地帮助扼杀德国工业，对自由貿易事业能作出大得多的貢献。

美国的工业有廉价原料和粮食作后盾，有机械力量作支持，这个理論休想使美国工业为自由竞争而牺牲。但是它如果能够这样說明情况，告訴美国人，他們那里的工資既然异常高昂，远在旧世界文明各国之上，那就不妨在别国同意吸收他們的农产品和原料的条件之下，对于以工資为成本主要部分的那些工业品的輸入尽量开放，这样做对于他們生产力、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和促进最为有利——在这样情况下，这个理論就不会受到反駁了。

自由貿易理論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在世界各国暢行无阻，不論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土耳其、埃及以及一切未开化、半开化和热带国家就都可以行得通。那个时候，上述的这类国家，在它們目前文化状态下，就不会再存痴念，要凭保护制度来发展它們自己的工业了。

到那个时候，英国就会放弃它是注定要壟断全世界工业的这种想法。它就不会再向法国、德国和美国嚕苏，要它們为了它允許免税輸入它們的农产品和原料而用犧牲自己工业的办法来报答它的雅意。那个时候，虽然对它自己来說自由貿易越来越有利，但同时它会看到有些国家却应当实行保护制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理論那时就会告訴它，一个已經达到工业优势地位的国家，要防止自己的工商业者趋于退化或怠惰，唯一有效办法是让食物和原料自由輸入，让国外工业品参与竞爭。

英国一向的做法是劝誘别国遵守自由貿易原則，它自己則厉行禁止制度，到那个时候它就会采取与現在完全相反的商业政策，它就会不管外国保护制度的存在，而主动容許竞爭；它就会主动把普遍实行自由貿易这一願望暫时擱置起来，直等到别的国家不再害怕自由竞爭的結果会毁灭它們自己的工业时为止。

英国当时和在这个願望实現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內，由于各国的保护制度，它在日用工业品的輸出貿易上势必要受到些損失，但是它可以通过精制品的更多的輸出，通过为它的工业品开辟、培养新市場来补償这些損失。

那时它在西班牙，在东方，在中美及南美各国，将竭力倡导和平，在中南美、亚洲及非洲的一切未开化以及半开化国家将运用它的势力，进行教化工作，使那些国家得以建成强有力的文明政体，得以确立人身和財产安全，得以建設公路和运河，教育和文化、道德和劳动习慣得以逐漸推进，而狂妄、迷信、怠惰的風气将逐漸被根除。在这样的努力过程中，如果它同时能够取消粮食和原料輸入的限制，它的工业品輸出将大量增加，这比不断企图毁灭欧洲大陆工业的做法要聰明得多，有效得多。

但是英国如果想在对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的教化工作上获得成就，就不可采取独占方式，决不可象它在巴西所使的手段那样，

借助于商业上的特殊权益，企图壟断市場，把别的国家屏之門外。这样的政策必然会激起别的国家的义憤，促使它們反对英国的努力。文明国家对上述一些国家的教化工作，到現在为止，还极少成就，癥結所在，显然就是这种自私政策。因此英国在国际法方面应当推行这样一个准則，卽一切工业国对于这一些国家的商业应当享有同等权利。这样英国不但在它的教化工作上可以获得别国的协助，而且如果由别的工业国家承担相类的教化工作，对它自己的商业也并不会有所不利。現在不論拿哪一种工业或商业来說，英国总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这一点，对任何这类市場的出口貿易，在各国中居首要地位的将总是英国。

我們代英国設想，假使它为了自己的发展前途，壟断世界工业的确是一个必要条件，假使有人說别的国家看了英国的榜样也想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国，当充分实現这一目标时不致損及英国地位，或者說当别的国家在富裕程度上有了增长时，英国的富力并不会因此削弱，或者說德国、法国和美国在天然禀賦上并不亚于英国，可以发展成为与英国相等的强国而并不碍及英国的发展前途——而所有这些都不能确切加以証明；假使情形的确是这样，那末英国处心积虑反对别国建立工业，或者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实际情况絕不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点应当指出，任何国家，如果它自己的工业品掌握了全部国內市場，則由于工业品在国內的生产和消費，随着时間的推移，将获得莫大利益，一方面原来对它供应工业品的那个国家被排除以后，将受到損失，但前者的所得将远远超过后者的所失；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自己在办工业，从而在經济地位上有了充分发展时，就会在財富和人口方面获得更大的增长，結果对于工业品的消費，比之依靠别一工业国供应进口品时，将有无可限量的进展。

至于就工业品出口方面的情形来說，处于溫带的国家，生来特

别宜于发展工业，自有它們的特有活动領域，可以努力于供应热带国家的消費，后者可以用殖民地农产品来交换工业品。但是热带国家对工业品的消費量主要决定于两点：一点是热带国家方面关于产品剩余額的生产能力，还有一点是溫带国家方面对于热带产品需求的增进程度。

如果我們能够証明，在相当时期內，热带国家所产的糖、米、棉、咖啡等等可以比現在扩大五倍到十倍，一方面溫带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消費也可以扩大五倍到十倍，那么就同时証明了一个事实，溫带国家工业品对热带国家的輸出在这个期間可以比現在扩大五倍到十倍。

我們說欧洲大陆国家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費可以有这样的增势，是大体上以近五十年来英国消費量的增势为依据的；談到这里还須注意到一个事实，假使英国对消費沒有过度征税的話，这方面的增势或者还要扩大得多。

关于热带生产增进的可能，近五年来荷兰在苏門答腊与爪哇以及英国在东印度群島的成就，給我們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証据。从 1835 年到 1839 年，英国由东印度群島輸入的糖增加了三倍，輸入的咖啡增加得还要多，輸入的棉花也有了大量增进。最近(1840 年 2 月)英国报紙曾以极兴奋的語調作了报导，认为东印度群島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几乎是无限制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英国关于这类产品的輸入就可以无需再仰給美国和西印度群島。在荷兰方面，近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出路已經感到为难，正在設法寻找新市場。一方面我們还要注意到，北美仍然在不断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得克薩斯作为一个州已經勃然兴起，它的势力无疑将籠罩整个墨西哥，使那一带膏腴之地轉变成象美国南部各州現在的情况一样。我們很有理由作这样的設想，法律和秩序、勤奋和智力将逐漸扩展到从巴拿馬到合恩角的整个南美洲，然后扩展到整个非洲和

亚洲，从而到处增加生产和产品的剩余量；由此我們不难理解，这里是大有发展余地的，决不是仅仅足供一个国家来推銷工业品的。

我們如果把迄今为止实际用于殖民地产品生产的土地面积計算一下，然后同性質上适于这类生产的全部土地面积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到，适于这种生产的土地現在已被实际使用的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从东印度群島一个地方的輸入，即足以滿足英国对这类产品的全部需要，那么英国又怎么能够壟断生产殖民地产品的一切国家的工业市場呢？有許多国家的殖民地产品，它既无力吸收交換，它又怎样能作此妄想，要把它的工业品銷售給所有的这类国家呢？还有一层，如果欧洲大陆的工业沒有能获得大規模发展，因此沒有充分力量足以购买从而消費这类产品，那么欧洲对于这类产品又如何能够产生大的需求呢？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抑制欧洲大陆的工业，虽然一定足以阻止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英国的发展前途却絲毫沒有好处。

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热带国家在目前，以及在一个漫长的未来时期內，将以大量原料提供給一切适于生产工业品的国家作交換。

最后还有一层，保护制度的目的是在于为了整个热带农业的利益而发展整个溫带的工业，而英国工业品目前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竞争則形成了对世界工业的壟断，就为全人类謀福利这一点来說，后一办法决不会比前者更有利些。

因此，英国以外的任何別的国家，如果适宜于发展工业，并有相配的領土、国家力量和人民智慧，看到英国在工业、航运和商业方面的进步，不必感到气餒，它們也可以急起直追，取得与英国同样的工业优势。今天工商业和海运事业的发展已远不是过去所能比

拟，但是更远大的发展还在将来，这种轉变的实現，为期也不会很远。我們要鼓起勇气，对国家偉大前途抱有信心，向这个目标猛进。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充分的民族精神，立刻行动起来，抓住最紧要的关鍵，努力进取，从而为我們后代取得最丰富的果实。首先必須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場，至少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利权不能外溢，对于那些同意用我們自己的工业品向它們作交換的热带国家，要能够直接向它們取得热带产品。德国如果不甘心远远落后在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后面，这就是德国商业同盟必須担当的任务。

# 第十六章 人民經济与国家財政經济，政治經济与国家經济

凡是与一个国家的政府的物质資产在建立、消費、管理各方面有关的那些事項，也就是国家的財政經济，必須处处与国内个人經济所依存的、并受其約制的那些制度、規章、法律和事态，也就是人民經济，相划分清楚。就任何政治团体来說，不論这些团体所包括的是整个国家还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也不論这些团体的范圍是大是小，有作出这种区别的必要总是显而易見的。

就联邦国来說，国家財政經济又有各个邦的財政經济与整个联邦的財政經济的区别。

当国家或联邦国所包括的是一个国家整体，这个整体就人口数量、領土广袤、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財富、力量各方面来看，都有独立資格，因此可以享有稳定局面和政治势力时，人民經济就等于国家經济，也就是說两者这时是同一事物。这两者就与国家的財政經济共同构成国家的政治經济。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小邦人口和領土只占国家或国家領土的

一个部分，它們彼此之間既沒有作完全的、直接的結合，也沒有采用联邦結合形式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們所能考虑的只是“人民經济”，这是与“私人經济”或“国家財政經济”直接对立的。

在这样一个欠完备的政治状况下，关于作为一个大国的那种目标和要求就不能加以考虑；要以完整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长远利益为目的来計划人民經济，就更加无从着手。这里势必要从經济中将政治因素撇开，所能考虑的只是社会經济的自然法則，因为在沒有統一起来的大国或沒有国家經济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法則也会自行发展和形成起来的。

德国的經济科学就是在这样的观点下发展起来的，以前人們把这門科学叫作“国家行政”，后来又叫作“国家經济”、“政治經济”或“人民經济”，始終沒有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些理論体系的根本錯誤。

由于从經济上結合起来的一个国家这里幷不存在，又由于人們到处把“国家”这个清楚、明确的名詞用“社会”这个籠統、含糊的名詞来代替，而后一名詞的概念可以适用于全人类，或一个小国，或一个小城市，也可以适用于国家，因此就无法认識国家經济的眞正概念和特征。

## 第十七章 工业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产力

一个国家所經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現象就必然是感覚迟鈍，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風俗、习慣、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則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

然是竞胜情緒、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这两类人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部分是由于各自所特有的社会习惯和教育內容的不同，部分是由于各自的工作和工作要求性质的不同。农业人口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以精神和物质上的交流关系来說，农民彼此之間也是隔开得很远的。他們的工作互相雷同，这一个人所作的也恰恰就是别一些人所作的，这一个人所生产的照例也就是别一些人所生产的。他們在生产上所剩余的，在消費上所要求的，彼此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自己产品的最大消費者就是他自己，因此精神交流与物质交换在这里的誘力非常微小。与农民打交道的主要是无生物界而不是他的同道。他已經习慣于在耕耘以后經过一个长时期再从事收获，至于他一番努力的結果如何則听之天命，于是知足、忍耐、順从，还有懶散和思想怠惰，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工作旣使他与同类的人不相聞問，因此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关于发揮智力与革新技术方面也就很少需要。他只是在自己所由出身的家庭的狭小范圍內出于模仿而懂得了他的工作，說是这种工作的方法可以变换，技术可以改进，这些問題簡直是在他的想象以外的。他从小到老，就局限在这样人事和物质一成不变的小圈子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至于那些由于卓越的身心努力而获得非常成就和发展的范例，在他是难得有机会見到的。小康的局面或貧困的境遇，就在单純的农业工作中世世代代的流傳着，爭强斗胜的心情所由产生的那种力量，几乎已經完全丧失。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的就根本不同。从事于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們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們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也是靠了这种关系而生存的。从事工业者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是向市場取得的，他自己的产品只有极小部分供他自己消費。如果农民在努力中主要盼望的是上天保佑的話，工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却主要是他的商业关系。农民对于他

产品的买主是沒有什么接触的，或者至少对于他产品的脫售是无需十分担心的，而工业者生存所依賴的就是他的买主。商品、原料、工資、貨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息不停地在变动，工业者所获得的利潤是难以确定的。他不能象农民那样靠着上天的恩惠和单純的普通劳动来保証他的生存和发展，他所依靠的只是他的智力和活动力。他要确保足以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一些，就得超过那个必需限度多多爭取；換个說法就是，为了要避免陷于貧困，就得努力致富。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比別人能占先一步，那就有了成就，发了大財；如果比别人落后了一步，那就不免要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必須不断地买进卖出，談交易，做生意。他处处要同人事、同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及种种律例、規章相接触，因此他在智力上受到鍛炼、获得发展的机会要多于一个农民无数倍。他要使自己精通业务，就得熟悉外情，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使他的事业立于不敗之地，就得格外努力。一个农民所需要周旋的只是他自己周圍的人物，而工业者的业务則可以扩展到一切国家，扩展到世界上各个角落。他希望获得并保持同道中人对他的尊敬，他的对手則不断的向他展开竞爭，不断威胁着他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因素对他說来都足以产生深刻的刺激作用，使他作艰苦奋斗，爭取不断进步。同时有着数不清的例子展示在他面前，告訴他，通过卓絕的成就和格外的努力，一个在生活上、地位上处于最下层的人不难上升到最高的社会等級，而由于脑力的迟鈍和精神上的懈怠，也可以从最崇高的地位一落千丈，降为一个卑屈的失敗分子。这样的环境对工业者足以激起一种活动力，那是在单純农民的身上所看不到的。

假使我們把工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喚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农业工作不知要大多少倍。亚当·斯密确曾表示过这样的見解（据他的傳記作者斯图尔特說），这是他极得意的、但是

极荒謬的見解，他认为农业所需要的技巧多于工商业。試将制一只钟同管理一块田地这两件事比較一下，是哪一件需要更多的技巧；这且不去深究，我們只須指出一点，农业工作是千篇一律的，而工业种类却說也說不清，数也数不完。不过有一点不应忽視的是，在这里与工业作对照的农业，指的当然是在原始状态下的，并不是在工业影响下技术上有了改进的农业。假使在亚当·斯密看来，今天英国农民的情况比英国工业者的情况更加值得重視的話，那么有一点他却不可忘怀，农民地位所以获得提高，仍然是由于工商业的影响。

农业所需要的只是屬于同一类型的个人能力，只是在簡单的程序观念下把体力和耐力結合起来从事于笨重体力劳动的那类能力；而工业所需要的智力、技巧和經驗却是千变万化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見的。工业对于个人才能上的要求既然这样多种多样，这就使工业国家的各个人容易找到同他的能力和兴趣相配合的工作或职业，而农业国家个人在这方面的选擇机会却极少。在前者的情况下，个人天賦才能的受到重視比后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而在后者的情况下，个人的有用程度一般是决定于他的体力的。身体衰弱或殘廢者在工业国家的劳动比体魄最强的人在农业国家的劳动会受到更高的評价，这种情形也并不是不常見的。任何种力量，妇女和儿童的，老年和殘廢的，都会在工业中找到工作和报酬。

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我們可以看一看，在原始农业的情况下需要科学与技术这两者的地方多么少，它所使用的粗陋工具用得着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地方又是多么少。誠然，由于农业产生地租，最初使人专心致志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是农业；但是如果沒有工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就只能永远成为私人的宝藏，对于群众的有利效果就只能达到极微小的程度。在工业国家，群众的工业获得了科学的启发，反过来，

科学与技术又受到了群众的工业的支持。任何种工业同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設計等等多少总有些关系。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現、新发明，必然会使許許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因此在工业国家，科学与技术必然会普遍流行。許多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付諸实施，这些人的著作和讲演是有教育作用的，为了教育目的上的需要，就誘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专門从事于教导和著作。这类才能的貢獻是非常需要的，从而造成人材方面的竞爭，使科学活动有了分工与协作，这一点不但有利于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于技术与工业的不断改进也有极好的影响。这类进步的效果甚至还会立即扩展到农业。只有在工业上获得发展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才会在高度的智力下經营农业。在工业的影响下农业有了提高，它本身就变成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实业，一种技术，一种科学。

科学与工业結合以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未开化国家的文化，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区的移殖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莫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工业国家利用机械力量的机会比农业国家多得何止百倍。一个有殘疾的人操纵一架蒸汽机时，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比一个赤手空拳的壮汉多百倍以上。

机械力量加上現代的完善运輸設备，就可以使工业国比純农业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运河、鉄路和輪船只有靠了工业力量才能产生，也只有靠了它才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在純农业国家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大部分用来供应他自己的需要，每个人所消費的大部分就是他自己所生产的，他們中間只能經营少量的貨物和客运，这就不可能有数量足够巨大的客运和貨运来負担建立和維持运輸

机构的费用。

在純农业国家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沒有多大价值。在这样的国家，从事于这类工作的人，他們的研究和努力往往劳而无功；而在工业国家，要获得財富和地位，最便捷的一条路却莫过于发明和发現。因此在工业国家受到重視、获得厚酬的，首先是天才，其次是技巧，再次是体力；而在农业国家，除了公家职务以外，照例是适得其反的。

工业既有利于国民智力的发展，对于体力发展也有良好作用，它对劳动者提供了娱乐方法，使他們有了发揮体力的动机，利用体力的机会。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工人从精美的机器和工具所得到的帮助且不談，就是除开这一因素，他在一天之內所完成的工作比在純农业国家要多得多，这一点也是无可否认的。

还有一层，工业国比农业国总是更懂得爱惜时間，这一情况也足以說明劳动力在前者是屬于較高地位的。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間重視的程度来看，再沒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一个蛮族中的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屋里虛度着光阴。一个放羊的，整天只是靠了一支笛子，靠了睡觉，来勉强度过他的生活，时間在他簡直是一个負担，叫他又怎样能懂得光阴的可貴呢？一个奴隶、农奴或小农，他的劳动是在强迫下执行的，对他来說，劳动是懲罰，偷懶是收益，这又叫他怎样能懂得珍惜时間呢？国家只是通过工业才认識到时間的宝貴的。現在的情况是，爭取时間就是爭取利潤，丧失时間就是丧失資財。工业家是要尽可能最高度地利用时間的，这种热情会逐漸傳布到农民。工业使农产品的需要有了增加以后，地租、因此地产价值也有了增长，耕作方面的投資也有了增加，利潤也有了增加，这就必須使土地产生更多的农作物，以供应增加了的地租和資本利息，以供应提高了的消費量。一方面是工資有了提高，一方面是工作也要求多做。

这时工人开始感到，他有的是体力和运用体力的技巧，这是可以改善他生活的手段。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常說，“时間就是金錢”。

农民由于生活与外界隔絕，孤陋寡聞，他对于一般文化的提高很难有所貢献，也很难懂得怎样来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値，要他积极参加公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难了。因此他大都是处于依賴地主的地位。在純农业国家里看到的总是奴隶生活，或是在专制、封建、教士政治压迫下的生活。仅仅土地独占这一事实，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教士阶級对广大农民有了統治权，而广大农民本身却无法摆脫这种統治。

就任何純农业国家的情形来說，暴力、迷信和教士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鎖，在頑强的习慣势力下已經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农民已經把它看作是他們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看作是他們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門别类和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迫使行业不同的工业者彼此牵連在一起。摩擦可以发生火花，对于心灵也是这样。但是只有当人們密切地相聚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有了頻繁的接触，在商品方面、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才会产生心灵上的摩擦。人們的生活越是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地点，其間每个人在他的业务上越是有賴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需要知識、教育和謹愼小心这些方面越是殷切，頑固、不法、压制和无理違反正义的现象越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他們的奋斗目标少加干涉，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圍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就任何时間任何地点来說——例如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紀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随后的英国，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自由和文化总是发源于城市的。

但是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种可以称作是生产性的，还有一种是消費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进行加工，对于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工业品来償还給农村。这就是工业城市，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越加能够发揮，则工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城市，那里的居民只从事于消耗地租。任何在文化上有相当发展的国家，总有一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假使认为这种消耗有害于生产或对生产不能起促进作用，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遍原則，那是錯誤的。因为既然通过地租的取得可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这一可能性对于理财、对于从农业中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的利用，就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况且靠了地租生活的人，为了要在同儕中有所表現，博取声望，加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独立地位的有利条件，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文化、对公共机关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就会起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这样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化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总是要看国家已經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来决定的。这种要在同儕中显露头角、也就是出于自願的想对国家有所貢献的活动，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方面的表揚与尊重、能够获得荣誉职务的国家中才会获得发展；有些国家的統治阶級，对于个人任何企图获得社会重視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現，总是側目而視的，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不能获得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陷于頹廢、怠惰的生活，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受到輕蔑，損害国民的德性和勤劳意向，他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力。在这样情况下，即使由于靠地租收入为生的人的消費行为对城市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人們也会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不足道的、不健全的产物，认为对国家文化、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实际上在健全工业下特别会发荣滋长的是自由和

文化，因此也就可以說，正是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不致成为导向怠惰、頹廢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轉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結果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純消費的城市才得以轉变为生产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費城市的因素是公务人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費。这类消費在城市也足以助成一些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繁荣以及生产力究竟是特别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損害，这就完全要看消費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偏于促进还是偏于損害这一点来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純农业国家大城市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許多富戶，也有許多种行业，但是对于国家文化、自由和生产力的影响极为微弱，其間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們，势必与他們的顧客抱着共同的見解；他們的地位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主和公务人員的家仆。这些城市的生活往往极度奢侈浪費，而处于城市四郊的居民則情况相反，处处見到的是貧困、器量狹小和奴隶性。工业应当独立成长，完全不依靠坐食租息者和公务人員，应当为广大农民或出口貿易服务，在工业品制造方面应当大量消費本国农民的产品；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工业，对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对于一国的文化和自由，才会有良好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工业，实力越是强大，則由上述那类消費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力量以及坐食租息者与公务人員，就越会被吸引到它自己的身边，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向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改进。

我們可以作这样一个設想。假定有一个大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着无数的工业者，他們都是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的，而且是很富裕的，商人在利害关系上，在地位上，同他們站在一起，地租收入者自己感到不能不博得社会的尊敬，公务人員是受輿論約束的，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們为大众服务，他們也是靠了

这一点而生活的，大众的精神和物质資产就在这样一个狹窄地区內結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事业进行时的分工法則以及力量的联合，使这类資产結合得更加密切。在这样情况下我們可以看到，假使有任何改进，在公共制度以及社会与經济状况上有任何进步，或者假使有任何退化現象，在公共利益方面有任何損害，就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覺察；还有，大众既然集居在一个地点，他們对于共同的目标和規章就会怎样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見，在这类目的上就会有怎样庞大的資产在当地集中起来；最后，象这样一个进步的、强有力的、爱自由的社会，与国內其他情况相类的社会的关系又会怎样地密切。如果我們对于这一切都加以适当的思考，就不难深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論它的总数怎样庞大，对維持和改进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方面比起来只是极其微細的，而城市全部力量所依靠的（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那样）是它的工业以及与工业相輔相依的农业的发展。

城市对国家的政治和市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势力，这一点絕不是对乡村居民不利，恰恰相反，后者由此所得的利益是无可計量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它們感到，提高农民地位，使他們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是它們的职責所在；因为乡村人民所能享受的这类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数量越大，他們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料的数量也越大，向城市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也就越大，結果就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活动力、文化、自由和良好制度是由城市而来的，城市也只有使乡村人民共享福利，它所享有的自由和良好制度才能获得保証。农业以前所供养的是地主和他們的仆从，現在則在为国家提供捍卫国家自由的最富有独立精神的坚强的保卫者。在土地耕种事业中，現在任何阶級都能改善它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一个农場主，农場主可以成为地主。工业所創建的資本和运輸設备，現在处处使农业获得发展的机会。

奴隶制、封建束縛、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律和規章都絕迹了。地主所有的那些森林，原来只供行猎之用，現在可以向他提供百倍于以前的收入。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劳动中获得的一些菲薄的产品，只能使他們勉强維持簡陋的乡村生活，他們的唯一娛乐是畜养犬馬和打猎，对于这类娛乐如有任何干犯，就会使他們感到不愉快，认为是有損地主尊严的一种罪行，現在在自由劳动下产量有了提高，他們的地租收入也有了增长，他們一年中已經有一部分时間可以在城市里作寓公。他們在城市里受到了戏剧和音乐的陶冶，有了觀摩艺术和讀书的机会，風度变得溫文儒雅起来，同那些艺术家、学者們有了接触以后，也懂得了智慧和才能的可貴。他們原来只是一些喜欢打猎的人，現在却变成了优雅人士。在勤劳的社会中人人在爭取改进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激起了他們的进取精神。他們这个时候所追逐的是新知識和新思想，已不是深林密菁中的鹿和兎了。他們回到乡村以后，对于中小农場主起了值得仿效的示范作用，他們所获得的是对方的尊敬，不再是对方的咀咒了。

工业和农业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意志就越加不受拘束，就越能使寬容忍让的精神占上風，使眞正的道德和宗教势力在內心代替天良的强制。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們的胸襟寬大，使牧师轉变成为人民教师，轉变成为学者。民族語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創造，內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国家所以能与文化比較落后的国家进行国外貿易，所以能扩大航运业，建立海軍，所以能利用剩余人口，在开辟殖民地以后，进一步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純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統計証明的。由此可見，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

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証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現在这个时代,在战爭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着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入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貧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滿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完全矢忠祖国还是部分意存反側,能够召集的兵士是多还是少——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値得重視了。

# 第十八章 工业与国家的自然生产力

人类与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利用自然力量以达到預定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圍也就越加扩大。

就处于个人周圍的那些自然富源来說,一个打猎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国外的風土和地区,对他来說,或者是全无关系,或者充其量也只能給予极少的享受、帮助或鼓励作用。

就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来說,对于現存的天然富源,大部分还任其廢置,沒有加以利用,人們的活动力仍然以最靠近的环境为限。現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風力大部分沒有加以利用;各种矿产应当怎样加以利用,在工业者是知道得极淸楚的,却让它們呆在那里,原封不动;各种燃料(例如泥炭)則被浪費,或仅认为是耕作中的障碍;石料、沙土、石灰这类物质极少用作建筑材料;河流本来是应当用作人們的交通工具的,应当用来使附近土地变成良田的,却任其泛濫,成为禍根;溫暖的气候和海洋对农业国家所

提供的产品只是寥寥无几。

农业国家在生产中所格外倚重的那个自然力量、即自然的地力，当农业沒有能得到工业的支持时，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利用程度也是很低的。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須生产它所需要使用的那么多的产物，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部分的产物大量銷售給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取給它所需要的部分。某一地区也許土质极好，宜于生产油料、染料和飼料植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培植林木，供作燃料，因为經过漫长的崎嶇道路向遙远山区取給燃料，代价太大。有些地区也許宜于种植水果和蔬菜，如果将土地作这样利用，就可以多得两三倍的收入，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来种植谷物和飼料。有些人如果专門从事于家畜的繁殖，对他們來說就最为有利，但是在繁殖以后不能不兼顾到飼养；相反地，在专門从事飼养最为有利的那些人方面，也不能不兼顾到家畜的繁殖。如果能利用石膏、石灰、灰泥岩等无机肥料，或用泥炭、煤等等来代替木柴，并开辟林地，加以垦殖，那就会滋生多大的利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缺乏运輸設备，这类物产就无法在有利情況下运赴較远地区。如果能建設大規模水利事业，山区原野就不难变成良田，那就可以获得多么丰富的收入；但是在农业国家只能听任河流去冲刷沃土，利源变成了灾害。

农业国家建成了工业以后，就可以改进路政，修筑鉄路，开凿运河，使河道得以通航，輪运航綫得以成立。有了这样的設施，不但农业剩余产品可以轉化为生利的机器，不但被机器工作所吸收的那些人的劳动力有了使用机会，不但使农民从他們所拥有的自然資源中可以获得比前多得无可計量的收入，而且一切矿产、一切金屬，以前是呆藏在地下的，现在都有了用途，受到了重視。有許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理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

等等，以前运銷范圍不出数里，現在却可以分配到全国各地。因此象这类物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現在在国家产品統計中却占到了重要地位，还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全部农业产值。就拿瀑布来說，現在即使一立方尺的水流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尽些力量；即使是在一个工业国的最偏僻地区，以前簡直沒有人能想出办法来加以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現在也成了有价值的商品。

由于工业的建設，对于許多种类的食品和原料有了需要，某些地区从事于生产这些食品或原料时，要比专門从事于生产谷物——那是原始农业国的通常主要产物——有利得多。牛乳、牛油和肉类的需要增长以后，就提高了現有牧場的价值，从而引起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建設；水果和蔬菜的需要增长以后，就会使原来的荒蕪农地变成菜圃和果园。

农业国家越是在自然条件上宜于經营工业，它的土地越是适宜于生产和开采工业所格外需要的原料和天然力量，那么，安于現状，不加利用，它所受到的損失就越大；在山岳地带和一般不十分适宜于耕种的多山地区，却富有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工业所需要的資源，那里的农民是可以生产工业所格外需要的那些产品的，对这类地区来說，如果沒有工业，則所受到的損失最大。

处于溫带的国家，几乎沒有例外，总是宜于发展工业的。溫和的气候足以促进力量的发揮和发展，远不是热带气候可比。一年中的严寒季节，在短視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在自然条件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实际上它对于积极奋斗、事先准备、艰苦节約等习慣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者。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他在未来的六个月內不但不能从地上获得任何果实，而且必須为他自己和他的牲畜的生存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东西，以防寒冷气候的襲击时，就势必格外克勤克儉；他的情况，与一个处于热带的人，只須注意到不受雨淋，而丰富的果实終年不断，俯拾即是的情况，是不可同

日而語的。勤劳、节約、有步驟、有准备，这些最初都是事势的必要所引起的，以后由于习慣，由于不断的鍛炼，就成为經常存在的品质。道德与勤奋节約，不道德与怠惰侈靡，两者总是各自幷行不悖的；前者是力量的根源，后者是衰弱的起因。

因此处于溫带的农业国家自暴自弃，对于最富饒的那部分自然資源沒有加以利用。

流行学派談到气候对財富的生产所发生的影响时，沒有把农业和工业分别开来看待，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个問題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誤，关于这一点我們在别处虽已大致提到，但这里仍然不能省略，須加以彻底揭露。

这个学派为了要說明使同一地区的生产色色具备这一办法的愚蠢，曾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假使我們为了要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溫室里培养葡萄，試問这样做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制酒幷不是做不到的，不过这种酒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用工业品可以換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得多，代价要高得多。有些人对事物的本质是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作深刻鉆研的，对这些人来說，这是一个一針見血的論据，这个学派之所以深得人心，大部分原因就在这一点上；无論如何，在法国种葡萄的，制造絲綢的，在美国种棉花的以及棉花商人，对此說总是深表同情的。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即可看出，这个說法是根本错誤的，因为商业往来的限制，对农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同它对工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

让我們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对农业发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假定法国拒絕德国家畜或谷物进口，这一措施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首先德国就不能再买法国的酒。法国由于商业关系在这一点上的破坏，酒类出口减少以后，它就不得不按照这个減額比例縮减葡萄的种植，把原来最宜于种植葡萄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利

益較差的用途。原来专力从事于种植葡萄的人将相应地减少，因此本国农产品的需要也将减少，减少的部分就是原来专門种植葡萄而現在不能繼續种植的那部分人原来所消費的。酒类的生产情况如此，油类的情况也势必相类。法国拒絕了德国畜产以后，保护了家畜飼养这个行业，但这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用人为方法勉强促成的，因此經营这一事业的那些地区对于这一事业或者并不适宜；这一点說明法国在农业的一个方面纵有所得，而在农业的其他各方面所失将远不止此。假使我們单純认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同它对立的德国是农业国，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不采取相类行为作报复，那么情况的演变就到此为止。但是假使德国由于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相类的限制措施，假使我們认为法国也并不是一个純农业国，同时还是一个工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就似乎还不止如上述的那样。德国在报复态度下这时对法国将不仅提高酒类进口税，对法国所有产品，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或并非必不可少，或能够向别处购得的，也将采取相类措施；而且将更进一步，对于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是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别处购得的那些工业品，也将限制由法国輸入。这时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办法，使它自己所受到的損失，看来将一倍或两倍于所得。显然，法国在葡萄种植事业、在橄欖种植事业以及在工业中所雇用的人数，只能以由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取得的生活資料和原料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人数为限。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限制輸入并沒有能使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只是使生产从一个場合移轉到了另一个場合。假使法国允許自由交換产品，則产品和原料的輸入，因此也就是酒类、油类和工业品的外銷，将不断增加，結果在葡萄与橄欖的种植事业中、在工业中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貿易的进展，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和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品的需求，也将增长。工农业方面的人口

有了这样的增加以后,对于那些不容易由国外輸入,生来只能由本国农民供应的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将引起增势; 因此本国农民所获得的利益比以前将大大增加。在自由交換下,对那些与法国土质特別适宜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它的增势将大大超过在限制政策下以人为方法生产产品时的增势。一个农民如有所得时是不会使别一个农民有所失的,这时国內整个农业将有所得,而工业所得的还更多。由此可見,在限制政策下国內农业幷不会有所进展而只是受到限制;而且,原来可以由于国內农业的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料的輸入而发展起来的那个工业力量,将被消灭得无影无踪。限制政策所能造成的只是一个地区的价格上漲,别一地区的农民却受到牺牲,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整个生产力也受到了牺牲。

对农产品交換作这样的限制是不利的这一点,就英国的情形来說,比法国更为显著。毫无疑問,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磽薄土地也获得了开垦机会; 但是如果沒有这个規定,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却是一个問題。英国輸入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售出的工业品就越多,能够在英国生存的工人也越多,工人阶級的生活也就越加提高。英国的工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就会有可能为自己备一个园子以供娛乐,还可以在园子里种植些菜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屬的享受将比前丰富得多。显然,工人人数有了这样大規模的增长,生活有了这样的提高,消費量有了相应增加以后,对于生来只有这个島国自己能够供应的那些产品,将产生莫大需要,这个时候被开垦的土地,比在不自然的限制办法下所开垦的,很可能将超出一倍到两倍。这个說法是否可信,可以任何大城市附近的情况为証。凡是一个大城市,不論从远道运来的产品数量怎样巨大,也不論这个城市附近的土地天賦条件怎样欠缺,但是在这一带附近休想找到

一块未經开垦的土地。假使你禁止从辽远地区将谷物輸入这样一个城市，結果只会使这个城市的人口、工业和繁荣都趋于萎縮、衰退，只会迫使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戶不得不从事于利益較差的那些农作事业。

大家会感到，到目前为止，我們的分析与流行理論并无二致。流行学派說，在任何情况下，极度的商业自由，不論对个人或对整个国家来說都是最有利的；就原料的交换这一点而論，这个說法是完全正确的。[1] 当然，我們未尝不可用限制办法来增加这方面的生产，但所得的只是表面利益。正如这个学派所說，这样做只是使資本和劳动移轉到效用較低的方面。但是工业生产力的情形却相反，这是在另一套法則的支配之下的，不幸这个学派对于这一点完全沒有顾到。

我們已經看到，限制原料品輸入是有碍于国家自然資源与力量的充分利用的，但是对工业品限制輸入时，情形却完全不同。就一个人口众多，在农业和文化上已經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說，限制工业品輸入就可以引起生枯起朽的作用，使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活跃起来；实际上毫无疑問，在純农业国家，大部分天然力量是永远隐伏着沒有利用机会的。限制原料品輸入，不但妨碍国家工业，而且妨碍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因限制国外工业品輸入而产生的国内工业生产力却能刺激整个农业生产力，这是高度发展的国外貿易所办不到的。假使說輸入原料足以使外国对我們处于依賴地位，足以剝夺它发展本国工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們輸入国外工业品也会使我們自己对外国处于依賴地位，就是自己放弃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手段。假使說輸入农产品和原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它自己的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

① 参閱附录三——英譯本注。

个机会轉让給了我們，那么同样的道理，輸入工业品就是使自己放弃了增加人口并让他們获得工作的机会。假使說輸入自然产物和原料足以使我們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势力，使我們具有与各国发生商业关系的手段，那么輸入工业品却会产生相反的結果，会使我們处于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束縛之下，仰人鼻息，就象葡萄牙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乔治一世的大臣們曾这样說过，国家輸出工业品、輸入粮食和原料的数量越大，就越加富强。历史和統計都証明这句話的正确性。有些国家只是由于专門輸出粮食和原料、专門輸入工业品而一敗涂地，这是有事实可以証明的。孟德斯鳩[1]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吸取历史給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訓，他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上面所說的一点，不过在那个时候政治經济学还很少有人注意，使他无法彻底說明其中的癥結。他同重农学派全无根据的推論相反，认为波兰如果能完全放弃国外貿易，当可获得更大发展，那就是說，它应当自己建立工业，国內原料和粮食应当由它自己进行加工和消費。波兰只有发展本国工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稠密、各种事业欣欣向荣的城市，才能有巩固的內部組織和本国工业，才能有自由和財富；只有这样，才能爭取独立自主，才能对文化比較落后的邻近国家取得政治优势。它所应当輸入的不是外国工业品，而是外国工业家和外国工业資本；英国在文化上处于与波兰同样的水平时，就曾一度这样做过。但是波兰的貴族阶級情願将从农奴劳动中得来的微不足道的产物运銷国外市場，換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一个国家，当它自己的工业还沒有充分巩固，在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上还沒有能与外人相竞爭时，是否宜于向国外购入工业品——波兰貴族的后繼者現在可以答复一下这个問題。別的国家的貴族阶級，当受到了封建

---

[1] 参閱《法的精神》，第20卷，第23章。

意識的煽动而胸无主宰时，应当把波兰的遭遇記在心里，然后再看一看英国的貴族，就可以明白，强大的工业、自由的內政制度和富足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說，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値。

波兰的选任王，处于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有可能实行象英国世襲王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这一层姑且不論，假使他們果然这样做了，那么对波兰将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难道我們还理会不到嗎？那时靠了勤劳奋发的大城市的助力，王位将成为世襲制，貴族将不得不让人們便于参与上院的立法事宜，将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自然获得发展，就同英国的情形一样；波兰的貴族将富裕起来而且受到尊敬；波兰这个国家，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現在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受人尊重，也早已强盛起来，在文化上有了高度发展，势力也早已扩張到了文化比較落后的东方。它由于沒有工业，以致衰亡，并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未曾发生，此后也仍然是势所难免的。在波兰，自发的工业力量从来就未曾有过发展机会；这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受到先进国家的破坏。它既沒有保护制度，只是在自由貿易制度下与先进国家发生着商业关系，即使它直到現在仍能保留独立地位，它所能进行的也只是处于殘缺状态下的农业，决不会别有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它是决不会达到富强地位，决不会对外占有势力的。

工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資源和天然力量轉化为生产資本，这一事实正足以說明保护制度对于国家財富的增长会起怎样有力的作用。这种发展并不是虛假的表面現象，象保护政策对純粹天然产物的貿易所发生的影响那样，而是一种眞实的东西。农业国家自己建立了工业以后，就会使原来完全擱呆不动的天然力量有活跃的机会，使原来全无价値的自然資源成为宝貴的財富。

向来有这样一种經驗之談，认为人类也同各种动物一样，通

过异种配合，身心两方都可以获得改进，认为彼此通婚的范圍如果老是限于少数家族，就会逐漸退化，正同老是用同类种子施种于同一块土地的情形一样。非洲和亚洲有許多未开化或半开化部落，人口无多，那里的男子总是向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不认为就是出于这一自然法則的启示。有些小城邦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总是在他們自己团体范圍內互相通婚，結果或逐漸消灭，或显然退化，这是一个經驗事实，这一事实也似乎与这一自然法則有关。假使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实行交配，几乎沒有例外，子孙总是壮健而漂亮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認的，例如白种与黑种杂交以后，第三代到第四代子孙就会出現这样的情况。这个見解应用到整个国家时似乎更加确凿可信，經常进行异种交配并使这种風气扩大到全国的那些民族，他們思想的活潑，精力的充沛，以及在智力、体力、仪表各方面，都胜过别国的民族。①

有些人在小村落里从事处于殘缺状态的农业，那里几千年来，只是有限的若干家族在彼此通婚，那里若干世紀以来沒有人想到要使用新式工具，或在耕作中采用新法，或在衣服式样上作任何改变，或吸收任何新思想，那里被认为最上的妙策的并不是怎样来发揮身心力量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享受，而是怎样得以尽可能地省

① 据查尔延說，屬于古代波斯的一个未經异种交配的蛮族格伯利族，丑陋、畸形而且笨拙，就象出于蒙古后裔的一切民族那样；而波斯貴族，那是許多世紀以来与格魯吉亚及塞加西亚的女子通婚的，却以优美壮健著称。普立查德博士說，居于苏格兰高地未經杂配的居尔特人，在高度、体力、外貌各方面就都远不及居于苏格兰低地与撒克逊人交配的同类人。帕拉斯对俄罗斯人及韃靼人后裔同与他們有关的未經杂配的各部落作比較时，也有相类见解。阿扎拉斷言，西班牙人与巴拉圭土人的后代比两者的前代都要漂亮、强壮得多。人种杂交的好处，不但在不同民族之間，就是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氏族之間，也显然可见。例如克利奥尔种黑人，在智力和体力上就远胜于直接从非洲来到美洲的那些未經杂配的黑人。唯一屬于印第安种的加勒比人是經常向邻近部落挑选对象的，他們在各方面就都优于所有其他的美洲种族。如果說这种演变是一个自然法則的話，那么为什么中世紀各城市在建立以后不久就会勃然兴起，获得进展，为什么美国人民精力旺盛，容仪优雅，就可以获得部分的解释。

免这类享受；但是根据上节的推論，我們认为可以断言，这些人并不是注定要变成这样蠢頑不灵的生物的，这样的演变并不是必不可免的。

建立了工业以后，这种情况就可以完全改变（这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的）。增加的农业人口有一大部分投入工业社会以后，各地区的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彼此互相通婚而搀合在一起以后，那种在智力、道德、体格上停滞不前的現象就可以消失。工业以及以工业为依据的与各国各地区之間的商业所引起的交往关系，会使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受到新血液的灌注。

工业的发展对于畜种的改良也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不論何处，建立了毛紡織业以后，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良。工业人口增长以后，对于上品肉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农民就势必要設法提高畜产品种。对于"上乘的馬"的需求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发生的必然是馬在品种上的改进，这是一定的道理。于是我們就可以不再看到那些恶劣的、屬于原始品种的馬、牛和羊，那是由于农业处于殘缺状态、对于家畜品种的交配和选擇全不注意的結果，是它們蠢陋的主人的側面写照，双方是互相称合的。

許多国家在家畜方面，由于外国品种的輸入，本国品种已經有了极大改进，因而国家的生产力也有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这方面有待于更进一步努力的，还有多少啊！所有欧洲的蚕种，是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代，由希腊僧人把它放在空心竿子里从中国带到君士坦丁，然后傳入欧洲的，当时中国对于蚕种是严禁出口的。法国的毛織品所以这样优美是由于輸入了西藏产的山羊。向来关于动物的飼育和改进，主要目的总是在于适应奢侈享乐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在于增进广大群众的福利，这是很可惋惜的。根据旅行家的記述，說在亚洲某些国家曾看到一种牛类，既富有拖重能力，又善于奔馳，使用时几乎与馬具有同样的优点。欧洲的小农民如果能备

有这样品种的牛，对他将何等有利！劳动阶級在生活資料、生产力和便利方面，由此将获得多大的增进！但是人类生产力从草本和木本植物的改良和輸入方面得到的增长远比从动物品种的改良和輸入得到的为多。这只要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植物同改良品种比一比，就立見分曉了。我們可以看一看，就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欖来說，它們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在形式上，效用上，两者之間有着多大的差异！由此在营养与享受方面，在人力获得有利使用的机会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諸如馬鈴薯、甜菜根、飼料根菜作物的种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改进的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部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对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現与改良，科学已經作了很多貢献，政府方面对于这一重要問題，为了經济利益，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但目前在这方面的注意还不够。最近据說在北美洲草原发現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貧瘠的土地上所提供的产量，比我們所知的最肥沃的土地上的飼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原野，还有很多植物听其自生自长，沒有加以利用，經过移植与改良以后，也許会使溫带居民的福利获得无限的增进。

这是很明显的，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殖，这方面大多数的新发現，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創造与发現，主要受益的总是溫带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国家。

## 第十九章 工业与国家的工具力(物質資本)

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況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資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

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資本)。在前两章里已經分析了工业对于前三項国家生产力来源的影响,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們将从事于說明工业对上述末一項生产力来源的影响。

我們在这里所称作“工具力”(instrumental powers)的,在流行学派則称作“資本”。对于一种事物,用什么字眼来表示,并沒有多大关系,但是所选擇的字眼,表示的必須始終是同一事物,不多也不少,尤其是关于科学研究,这一点更加重要。当討論到問題的不同方面时,作出这样的区别就有了必要。現在流行学派使用“資本”这一名詞时,指的不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精神和社会手段。但是当提到資本时,显然应該确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資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資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当应該作出这种区别而沒有作出时,就势必会导致錯誤的推論,或起一种掩盖錯誤推論的作用。不过我們主要目的是在于暴露这种在不准确、不恰当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錯誤,而不是在于制造新名詞,因此我們仍然采用了“資本”这个名詞,但是对于精神資本与物质資本之間,对于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資本之間,对于私人資本与国家資本之間,将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用了資本这个籠統的名詞,提出了下列論点,竭力反对保护貿易政策,他的門人也沿襲了这种論调至今未改。他說:“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保护)办法以后,的确可以使某类特种工业比沒有这个办法时成立得快些,这类工业在若干时間以后也的确能够出产与国外同样便宜、甚至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虽然在这样情况下可以更快地使国家工业走向它以后会自动走向的方向,这决不是說,用了这样的方法,国家的工业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国家的工业只能随着資本的增长而作相应的增长,国家的

資本則只能依照从收入中逐渐得来的儲蓄而增长。可是这些方法的直接后果是使国家的收入減少。既足以減少收入，就不能使資本，以及工业，比在任其自由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增长时增长得更快，这一点是确切不移的。”①

这个学派的創立者为了証明这一論点，举述了我們已在前一章里所駁斥了的在苏格兰种植葡萄那个著名的例子。

他在著作的同一章里又說，国家的岁入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換价值。

上述論証，就是这个学派反对保护貿易政策的主要根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把工业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出产同国外来的一样便宜或者甚至更加便宜的工业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減低国家收入，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換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資本的力量，因为資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儲蓄形成的；然而，国民工业总量是决定于資本总量的，前者是只能随着后者而相应地增长的。得出的結論是，通过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一类工业，如果让它循着自由的进程前进，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这类措施是足以削弱工业的。

我們反駁这种推論时首先要指出，亚当·斯密使用資本这个字眼时，他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的人或商人在簿記及貸借对照表上对資本所必然要抱有的那种观念，就是把資本作为与由資本产生的收入有所区别的那种交換价值綜合量。

他忘記了他自己給資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力量包括在这个名詞的涵义之內。

他誤认为足以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物质資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数不清的証据，說明这些收入主要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

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力联合所实現的完善程度），說明保护政策虽然需要有一个时期的物质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力量上，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支出。

他忘記了，使整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資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經使用的天然力量轉变成为物质資本，轉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純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說，有着許多擱呆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工业才能使之加速地活跃起来。关于工业对国内貿易与国外貿易、对国家的文化和力量、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維持以及对于由此而来的取得物质財富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影响，他都沒有考虑到。

他沒有体会到，通过殖民地开拓，英国取得了多大数量的資本（据馬丁估計这一項数額在二十五亿英鎊以上）。

他在别的場合虽然那样清楚地說明，使用在中間商业中的資本，只要是沒有与任何某一国家的土地适当地結合在一起，就不能认为是屬于那个国家的，在这里他却沒有考虑到，这种資本由于有利于国家的国内工业，是极有效地实現了国家化的。

他沒有考虑到，通过促进本国工业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国外的精神資本与物质資本吸引到本国来。

他錯誤地认为这些工业是在自然趋势下自动发生的；他不曉得不論拿哪一个国家来說，为了它自身的特有利益，它的政治势力对于这种所謂自然趋势，总是要加以干預，使之趋向人为方向的。

他的論据以含糊籠統的說法为依据，因而是根本錯誤的，他在論述中举了一个例子，要想証明因为在苏格兰用人为方法从事制酒这一措施的不足为訓，所以用人为方法建立工业也是愚蠢行为，这个例子也是根本錯誤的。

他把一个国家資本形成的过程，縮減到了一个收租者私人的动作，收租者私人的收入是取决于他的物质資本价值的，他只有把他的儲蓄重新轉化成資本才能增加收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他沒有看到，这种儲蓄理論，就商人的地位来說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由整个国家来遵行，就必然要使国家陷于貧困、粗鄙、无能和腐化。既然人人竭力从事于儲蓄与节約，生产的动机就不再存在。既然人人只是致力于交換价值的累积，生产方面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就要漸告消失。假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象这样一些头脑不灵的守財奴，那就会为了怕負担战爭費用而放弃对国家防卫工作的注意，只是在受到敌国欺凌，牺牲了一切財产以后才会明白，爭取国家財富与收租者私人致富之道有所不同，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收租者私人，当他作为一戶的家长时，他所应当遵行的一套理論方針，与这里所提出的店主的物质交換价值理論就必然完全不同。他对于后代在教育方面，至少必須支出那样多的交換价值，当管理財产的責任一旦落到他們头上时，使他們能够进行管理。

国家物质資本建立时所采取的方式与收租者单純儲蓄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就是說，这是与生产力建立时的方式相同的，因为它主要依靠国家的精神資本与物质資本之間以及农工商业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

国家物质資本的增长有賴于国家精神資本的增长，反过来也是这样。

农业物质資本的形成有賴于工业物质資本的形成，反过来也是这样。

商业物质資本处处是作为一个中介者存在着，在工业資本与农业資本两者之間起着协助与补充作用。

未开化国家，在漁猎生活下，一切东西几乎全部是来源于天然

力量，資本几等于零。国外貿易使資本有了增长，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枪炮、火藥和子彈的作用)，天然力量的生产力也就被完全破坏。儲蓄理論对一个打猎的人并无好处；在这种理論下他势必要改行，改成一个牧羊的，否則就必然要沒落。

在畜牧国家，物质資本会很快地增长，但是只有当天然力量对家畜能够自然而然地供应食料时，才能获得在这个限度內的增长。家畜以及生活資料有了增长以后，人口就会紧跟着增加起来。一方面牛羊群和牧場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割成越来越小的范圍；另一方面，国外貿易对消費在发生着誘导作用。这个时候对他們宣傳儲蓄理論也是徒劳的；国家势必要从畜牧事业轉变到农业.否則将陷于貧困。

就农业国家来說，它可以利用处于潛在状态下的天然力量，从而增加財富，它的活动領域是广大的，但毕竟是有限度的。

就农民自身来說，他可以貯存粮食，改进庄稼，增加牲畜；但是生活資料有了增加以后，人口总是要跟着增加的。生产愈丰饒，人口愈增加，物质資本(即耕地和家畜)也就随着这个增进程度被增进中的人口分割得更零碎。但是靠了勤耕力作是不会使土地面积扩大的，而且由于运輸工具的缺乏——那是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指出的，由于商业往来不发达而必不可免的欠缺情况——对于土地的固有力量是无法充分利用的。还有一层，純农业国家多半感到缺乏的是，通过工业及由工业而来的商业給予国家的那些手段、智力、进取心、活动力以及社会发展，因此純农业人口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情况，这时农业物质資本不再能与人口的增加齐头并进，国家的資本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个人的貧困却越来越显著。

在这样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产物就是人，他們在自己国家既然不能够丰衣足食，就要向外国迁徙。流行学派把人看作是累积的資本，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說，这种說法是很难使它感到安慰的；

因为人口輸出以后是不会引致回程貨物的，而且适得其反，将造成大量物质价值如工具、家具、貨币等等作非生产性的輸出。

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内分工还沒有正式发展，要想增加物质資本(个人在物质上的富饒)，显然是旣非勤恳、也非节約所能奏效的。

当然，作为一个农业国而絕对沒有任何国外貿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国外貿易，就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說，关于資本的增长这一点，也未尝不能补国內工业的匱乏，因为它由此使国外工业家与本国农民有了商业关系。但是这种事态的发生，性质毕竟是部分的，而且是缺点极大的。首先，这种商业只限于某些大宗产品，活动地区主要只是在那些沿海岸及通航河流一带；其次，无論如何，这种商业关系总是极端非正規的，遇到战爭、商情变化、貿易方面的法制有了改变，或者遇到国外有了特大的丰收或輸入方面的变化，这种关系是往往会中断的。

要使农业物质資本作大規模、有节奏、继續不断的增长，只有在农业国建成充分发展的工业，才能实現。

一国的物质資本，絕大部分总是与土地分不开的。不論哪一个国家，地产、乡村和城市住宅、工場、工厂、給水設备、矿山等等的价値大約要占国家全部資产价値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因此，凡是足以使不动产价値有所增减的，也足以使国家物质資本总量有所增减，必須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通則。这是一个显明事实：具有同样生产力的土地，它的資本价値，邻近小城市的，比在偏僻地区的不知要高出多少，邻近大城市的比邻近小城市的又不知要高出多少；至于工业国家的这种价値同純农业国家的相比，双方高低悬殊，簡直无可比拟。反过来，我們还可以看到，城市住宅与工业建筑物以及它們的地基的价値，总是随着城市与乡村在商业关系上的扩大或收縮，或者是随着农业的盛衰，作等比例升降的。由

此可見，农业資本的增长有賴于工业資本的增长，而后者反过来也有賴于前者。[①]

但是当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时，这种交互作用在工业方面比在农业方面要有力得多。当从单純的游猎形态轉变到畜牧形态时，資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牲畜头数的迅速增长；当从畜牧形态轉变到农业形态时，資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耕地与剩余农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而如果由农业形态再进而轉变到工业形态时，国家物质資本的增长却主要是通过专門用于建立工业的那些价值和力量而实現的，因为大量的、以前所未經利用的天然力量与精神力量是由此而轉变成精神資本和物质資本的。建立工业絕对不会有碍于物质資本的蓄积，恰恰相反，要使国家能够經济使用农业儲蓄，建立工业是第一要着，要鼓励国家着重发展农业經济，建立工业是第一个有效手段。

在美国的立法机关里，时常听到这样的話，說谷物由于沒有銷路不值得收割，只好让它在田里烂掉。在匈牙利則听說农民被过多的产額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而那里的工业品比在英国却要貴两

---

① 可与下列載于1883年《泰晤士报》的一篇短文《工业与农业》对照：

“美国农业部的統計学家在最近报告中指出，田产价值是按照农业对其他事业比重的增进而相应地降低的。这就是說，当一切劳动力都傾注于农业时，田产的价值最低，人民如果只有半数务农，它的价值就会显著提高，如果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数务农，价值将更高。根据統計，証明事业的多样化对于一个州来說最为有利，田产附近如果有一个工厂，就会使这块地以及地上的农作物价值提高。这里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說明，假使将美国各州按照农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的高低分为四类或四級，以农业人口所占比率不足百分之三十的为第一类，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五十的为第二类，在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之間的为第三类，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为第四类，則田产价值与农业人口是成反比例的；在純农业地区、即第四类，田产价值每英亩只有5.28美元，次一类13.03元，再次一类22.21元，而在工业地区則达40.91元。这一点說明，有多种事业混在一起的地区，占有极大优势。而且不但土地的价值提高，每亩的产量也会有所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比前丰富。因此各种工业不但有利于工业者，对农民也同样有利。农民应当放弃对工厂抱反感的偏見，实际上工业对于他們的財产价值是有提高而不是貶低的作用的。”——英譯本注。

三倍。这样的情况在德国也許还能記得。由此可見，一切剩余农产品在农业国家并不是物质資本。有了工业时，把这項产品收入仓庫，首先就成为商业資本，然后卖給工业者，就轉化为工业資本。在农民手里无法利用的存貨，到了工业者手里就成了生产資本，反过来也是这样。

有了生产，才有消費的可能，而消費要求又足以刺激生产。純农业国家在消費方面是靠国外情况决定的，如果情况不利，那些因消費要求而引起的生产就会消失。但是在那把工农业在自己国土上結合起来的国家，那种相互誘导的作用是不断存在的，因此生产将不断提高，工业資本和农业資本也将随着不断地增长。

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由于在上面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些原因，在物质資本方面比純农业国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这一点是显而易見的，因此前者的利率总比后者要低得多，使企业家可以有較大的資本，在比較有利的条件下自由分配。由此可見，工业国与农业国新成立的工业相竞爭时总是要占上風的，后者对前者总不免要不断地居于負債地位，前者的工农产品价格在市場上的不断波动以及貨币价值的不断变动，将使后者在物质財富的累积方面、在道德以及节約习慣方面受到同样大的危害。

流行学派把資本分为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类，而把許多在流动中的事物出乎情理之外地納入前一类，关于这种区别却并沒有加以任何实际上的应用。作出这样区别时可以引起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这个学派却置之不顾。物质資本与精神資本大都是与农业、工业、商业或其中的某些部門——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往往与某些地区——結合在一起的。例如一株果树，在砍下以后，对工业者(假使他用它来做木制品)和对农民(假使他是要把它栽培起来生产果品的)来說，价値显然完全不同。又如对所飼养的羊群，不得不加以大量屠宰时，象德国和美国所已經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它們的

价值，与用来生产羊毛的羊的价值，也显然完全不同。又如葡萄园自有它的价值，假使改作耕地，原来的价值即将丧失。帆船，如果用作木料或燃料，它的价值比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时将低得多。如果紡織业受到破坏，完全崩潰，原来的厂房、供水和机器設备还有什么用处？同样的情况，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包括經驗、习惯和技术，在失去了本业以后，一般就会大部分不复存在。流行学派对于所有这类事物和資产，都一概籠統地叫作資本，在这一名詞的掩盖下，可以随意把它从这一个移置到那一个使用范圍。薩依就曾劝告英国，把它的工业資本轉向到农业。这样一种不可思議的事情将如何实現，他沒有告訴我們，看来英国政治家对这一点直到現在也还莫名其妙。薩依在这里显然是把私人資本同国家資本混淆起来了。一个工业家或商人可以把他的厂或船卖掉，然后用所得价款买进田产；而整个国家却不能这样做，除非把大部分物质資本和精神資本付之牺牲。这个学派为什么对这样分明的事实要故意加以曲解，其中的道理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对于事物給予了恰当的名詞，眞象就会显露，就很容易使人理解到，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从这一个移轉到别一个使用范圍时是要发生困难和危險的，而这一点决不会始終有利于“自由貿易”，却往往是有利于国家保护政策的。

# 第二十章 工业与农业利益

假使説，保护关稅有利于国内工业，只能使工业家致富，而不利于工业品的消費者，那么对于这种不利情况感覚得最深切的应当就是地主和农业經营者，因为这是消費者中人数最多、最重要的阶級。但我們可以証明，甚至这个阶級，从建立工业中所获得的利

益比工业家本身所获得的更大;因为有了工业以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品种上将增多，在数量上将扩大，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将提高，这时农业經营者就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土地和劳动力。地租、利潤、工資这一切因此就都可以提高；地租和資本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就会使地产售价和劳动工資提高。

地产的售价实际上就是資本化地租；它一方面决定于地租的数額和价值，另一方面却主要地决定于国家現有精神資本与物质資本的量。

一切个人和社会的改革——尤其是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长——都足以使地租的数額增加，同时使地租对总产量的比率降低。在事业很少发展而人口稀少的农业国家,例如波兰,地租可以占到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充分发展、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国家，例如英国，則地租比率降低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比率虽低,以实际价值量,以貨币价值,尤其是以所能换得的工业品計算时,却要比高比率所含有的大得多。英国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二十五蒲式耳，其中的五分之一就等于五蒲式耳,而波兰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九蒲式耳,其中的三分之一却只有三蒲式耳；在英国五蒲式耳的价值平均是二十五先令到三十先令，而在波兰內地三蒲式耳的价值至多不过八先令到九先令。还不止如此,工业品在英国至少要比在波兰便宜一半,因此英国的地主，用三十先令的貨币地租可以买到十碼布，而波兰的地主用九先令的地租却很难买到两碼布。由此可見，同样的地主,在英国的拿到了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在波兰的拿到了三分之一,而前者比較后者境况要富裕得多,作为一个收租者时所得的貨币要高三倍，作为一个消費者时所得的工业品要高五倍。这是說地主的方面，至于自耕农和雇农,尤其是作为工业品的消費者时,在英国的处境，在波兰的也难与比拟。在英国二十五蒲式耳的产

量内，分配于播种、耕耘、工资与利润方面的占二十蒲式耳，其中后两项计占半数，即十蒲式耳，平均价值是六十先令或二十码布（按每码三先令计），而在波兰的九蒲式耳产量内分配于播种等四项的仅仅六蒲式耳，其中分配给工资与利润两项的计占半数，即三蒲式耳，价值十先令到十二先令，只能买布三码半。

地租是有效使用物质资本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它的价格是要看国家的现有资本量和供求比例来决定的。工业国家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达而积累了剩余资本，那里的利率又比较低，在那样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里总有许多有了钱的人要把他们的剩余资本向地产投资；因此就某一数量的地租来说，它的售价在这样的国家里总要比纯农业国家高得多。在波兰的售价约相当于十年或二十年间的收入，在英国则达三十年或四十年间的收入。

地租的售价在工商业国家既比农业国家为高，土地本身的售价情形也相类。具有同等的自然产出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

工业对于地租数额，因此也就是对于土地的交换价值，是有影响的，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九章末尾确曾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只是偶然提到的，并没有适当地把工业在这方面非常重大的意义表达出来。他分析了影响地租增长的那些原因，有些他认为是直接的，如土地本身的改良和家畜数量及价值的增进，有些则认为是间接的，把工业列入了间接原因之一。他就这样把地租和土地价值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工业）放在几乎使人难以觉察的次要地位；至于土地改良和牲畜繁殖，两者本身就大部分是出于工业和由工业而来的商业的结果，而他却把这些说成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原因。

亚当·斯密以及他的门人绝对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在这方面的价值。

我們曾經提到，工业及与工业有关的商业的发展，使具有同等地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約十倍到二十倍。現在試将英国的工业产值与工业資本总值及农业产值与农业資本总值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财富的絕大部分表現在增加了的地产价值項下。

麦克奎恩①对于英国的財富和收入曾作如下估計（下列数字单位为百万鎊）：

### I. 全国的資本总值

| | | |
|---|---|---|
| 1. 农业 | | |
| 土地、矿山及漁場 | 2,604 | |
| 运轉資金——牲畜、农具、儲藏品及貨币 | 655 | |
| 农业經营者的家具和用具 | 52 | |
| | | 3,311 |
| 2. 工商业 | | |
| 工业及工业品国内貿易 | 178.5 | |
| 殖民地商品貿易 | 11 | |
| 工业品国外貿易 | 16.5 | |
| | 206 | |
| 1835年(这一估計在該年作出)以后的增額 | 12 | |
| | | 218 |
| 城市各种建筑物及工业建筑物 | 605 | |
| 船舶 | 33.5 | |
| 桥梁、运河及鉄路 | 118 | |
| 非农业用馬匹 | 20 | |
| 全国資本总値(殖民地、外債及内債投資除外) | | 776.5 |
| | | 4,305.5 |

### II. 全国的产值

| | |
|---|---|
| 1. 农业、矿山及漁場 | 539 |
| 2. 工业 | 259.5 |
| | 798.5 |

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

① «不列顛帝国的一般統計»，倫敦，1836年。

1. 英国在农业方面土地的价值占全国資产总值的四十三分之二十六,超出投放于工商业的資本总值約十一倍。

2. 英国投放于农业的資本占全国資本总值四分之三以上。

3. 英国固定資产的总值,即

| | |
|---|---|
| 土地等等 | 2,604 |
| 城市房屋及工业建筑物 | 605 |
| 运河及鉄路 | 118 |
| | 3,327 |

占全国資本总值四分之三以上。

4. 英国工商业資本,包括船舶,不过241.5百万鎊,占全国財富十八分之一。

5. 英国农业資本总值3,311百万鎊,所产生的总收入是539百万鎊,約合百分之十六;而工商业資本218百万鎊的年产总值却达到259.5百万鎊,达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里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凭了218百万鎊的工业資本获得了259.5百万鎊的每年产值这一事实,是为什么英国农业資本能够达到3,311百万鎊这样大的数額,从而获得每年产值539百万鎊的主要原因。农业資本总值內絕大部分是土地和家畜总值。工业使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对大規模的国外貿易、大規模的航运事业以及許多殖民地的取得和开发,提供了使之实現的手段,从而使生活資料与原料的需求有了等比例的增长,使农业經营者同时得到了滿足这种增长了的需求的手段和动机,使农产品的交換价值有了提高,由此又使地租的数額与售价以及土地本身的售价有了按比例的增长。假使这一項218百万鎊的工商业資本一旦被完全毀灭,那时就不难想象,不但259.5百万鎊的工业产值将化为烏有,而且那3,311百万鎊的农业資本以及539百万鎊的农业产值中的絕大部分,也将不复存在。那时英国在生产上所損失的将不仅是工业产值259.5百万鎊,土地价值也将低落到与波兰相等,

卽現有价值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由此可見，农业国在有利情况下用之于工业的一切資本，經过相当时間，会使土地价值提高十倍。各处的經驗和統計都足以証明这个說法。工业建立以后，土地价值和資本累积就会迅速增进，到处所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如將法国（1789年及1840年）、美国（1820年及1830年）或德国（1830年及1840年）的这类价值量比較一下，看一看这些价值量与工业发展較差或发展比較充分的情况是如何地相符合，就可以明白，我們的見解是到处的事实經驗都可以証明的。

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而这是从有节奏的分工与国家力量的巩固的联合得来的，也是从国外貿易、从处于国家支配下的那些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进一步有利的使用得来的。

关于运輸工具的改进，我們可以看到的也是同样的因果关系。由此不但使运輸事业本身有了收入，从而收回了在这方面所支出的資本，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地产价值，在相当时間內，可以提高到創建运輸事业时所使用的实际物质資本价值的十倍。运輸工具的改进使农业經营者获得极大利益，而农业經营者所处的地位与运輸事业的承担者对照时却要有利得多，他对于所投資本，可以有充分把握获得那提高了十倍的利得，不必有任何牺牲，而运輸事业的承办人則必須把他的全部資本傾注在这个事业上。农业經营者的地位与新工业的建立者相对照时，有利的情况也相类。

工业对于农业生产、对于地租、从而对于地产价值的这种影响既然这样深切，对于一切与农业利益有关的各方既然这样有利，那么有人說保护政策只是有利于工业者而以农业經营者为牺牲的这种說法，又怎样能成立呢？

农业經营者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的物质幸福主要决定于一点，

即他們所生产的价值要超过他們所消費的价值。对于农业經营者有切身利害的,主要是各种农产品是否有广大需求,是否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至于工业品价格是否低廉,对他并不是一个怎样重要的問題。假使通过保护措施的作用,市場情况有了改进,使农业經营者出售他自己的产品时可以获得較大利益,他在这方面的所得,超过了他需要的那些工业品价格提高以后的所失,那就不能把他說成是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势下受到了牺牲。凡是自己能够建立工业的那些国家,这样的情势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本国工业成立的初期,情况更为明显;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轉移到工业的資本,大部分用于住宅和厂房的建造、水力的应用等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有利的就是农业經营者。在建立工业的初期,农产品銷路扩大,价值提高,抵銷了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不利情况而有余。但是农业經营者在这个时期所享受的利益无論怎样广泛,他在以后的有利情况必然还要继續进展,因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所能获得的价格必然逐漸趋涨,而工业品价格必然漸漸降低。

还有一层,农业經营者和地主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有賴于他們取得收入的那个手段、即土地的价值状况,地产价值至少要能維持原状。这一点不但是他們事业发展的,而且往往是他們整个經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經营者一年的生产是超过他的消費的,但是他却感到已淪于破产地位。如果他对地产还負有銀錢債务,而一般信用市場情况并不安定,如果一方面貨币資本求过于供,而另一方面地产却供过于求,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普遍发生貨币貸款要求收回而地产則急于求售的情况,結果地产价值一落千丈,使許多最积极勤儉而富于进取精神的农业經营者陷于破产境地。这并不是由于他們的消費超过了生产,而是由于在他們手里的那个生产手段、即地产,在他們无法控制的原因下,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使他們的信用受到破

坏;地产价值既普遍低落,以地产为抵押的貨币負債数額与他們所有財产的貨币价值,即不能保持原有比例关系。近五十年来,这样的恐慌在德国和美国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許多德国貴族就这样丧失了他們的財产或地产;但是他們却沒有明白,使他們受到这种遭遇的,实在就是他們所认为居心那样善良的好朋友、英国保守党所采取的政策。但是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农业經营者和地主所处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土地生产力和农产品价格都有了提高,农民所获得的不仅是生产价值超过消費价值的数額,地主所获得的也不仅是每年地租的增长,还有地租增长所体現的資本額。他的財产价值提高了一两倍,这并不是由于他增加了劳动强度,作了进一步的节約或田地有了更大的改进,而是由于工业建立以后对于他的財产价值发生了影响。这就使他有了进一步发揮身心力量、改良土地、增加牲畜头数的手段和誘因,他虽然在消費方面有所增加,仍有更多的节余。他的地产价值提高以后,信用就有了提高,从而实行改进时取得所需要的物质資本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亚当·斯密对于地产交换价值的这类情况保持沉默,不加聞問。薩依却不是这样,他表示了意見,他认为土地的交换价值并沒有什么重要意义,无論价值是高是低,土地总是同样地适合生产的。这位作家,在他的德文翻譯者們的心目中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权威者,而在他作品里对于国家繁荣具有这样深切关系的一个問題,却抱着这样錯誤的見解,眞是一件憾事。我們的主張却相反,认为必須肯定,土地价值的高低是測驗国家繁荣程度的最可靠标准,这方面的波动和恐慌,应当认为是能够降临到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最大的灾害之一。

这个学派所以会陷入这样的錯誤見解,也是由于对自由貿易理論的一意偏袒,它是希望自由貿易这个名詞能够深入人心的。

有些純农业国家同富强的工商业国家有着无拘无束的商业往来，而在地产价値与价格方面波动与恐慌发生得最剧烈的，也就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国家。

固然，国外貿易也能使地租及地产价値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情况，同本国工业的建立、工业生产有規律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內工业品对国內农产品的交换相对照时，前者的那种不确定、不均衡、不能持久的情况是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語的。

当农业国家还有着大量未經开垦或耕作粗放的土地，它所产的主要农作物在富强的工业国家里有稳定的銷路，可以换得工业品，这类农作物在运輸方面也沒有問題，农作物的需求又能逐年有所增长，增长的程度大致与农业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双方的貿易关系也沒有被战爭或国外关稅制度所阻断——只有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外貿易对地租与地产交换价値的增长才会发生强大影响。但是这一系列的情况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了变化，或中止发生作用，国外貿易就会成为国家經济停滞的起因，不仅如此，还往往会造成国家經济重大的、长期的退化現象。

国外的需求是变化无常的，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最有害的影响，如果由于战爭、农产歉收、来自别的地区的輸入的减退，或由于任何其他情况或变故，工业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原料或上述的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需求有了增长；然后由于和平恢复、农产丰收、从别的地区輸入增加，或由于政治措施，这种需求却又大部分不复存在。如果上述需求增进的持續期比較短促，农业国家也許会由此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如果持續期长达好多年，則这时国家的一切情况与一切私人組織的消費規模，已經与这个需求相調和配合。生产者对于某种标准的消費已經习惯；关于某些原来认为是奢侈的享受，現在对他說来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事物。他的农业收益与地产价値已有所增长，他凭了这一点，改善了耕种与房屋設

备，添置了許多东西，如果地产价値沒有提高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上地的买卖与租賃以及貸款，都是在地租和地产价値提高了的标准上成立的。再說，个人的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国家本身的开支也就必然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一旦突然中止以后，生产与消費之間、降低了的地产价値与幷未降低的貨币貸款之間、根据租約应付的貨币地租与租地上的貨币产額之間、以及国家的收入与支出之間都会失去平衡，由于这一系列的不平衡状态，就发生了国家在經济、政治、精神各方面的破产、窘迫、沮丧、退化等等現象。在这样情势下的农业繁荣，它的作用就象鴉片或烈性飲料一样，只能引起一时的兴奋，結果将終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閃，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墜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

在农业上曇花一現的繁荣比持久而平稳的貧困局面还要坏得多。如果要使繁荣眞正有利于个人和国家，那么这种繁荣就必須是无間断的。但是只有在逐漸增长的趋势下，只有国家对于这种增长与增长趋势的持久不变具有保証力量时，这样的繁荣才能成为无間断的繁荣。就土地价値来說，处于較低水平，比水平虽高而波动不定的局面，不知要好到多少倍；只有当这种价値处于逐漸而稳定的增势时，才能使国家享受持久繁荣。可是要使已經相当发展的国家，对于土地价値稳定而持久的增长具有保証力量，就只有让它自己有了工业，才能办到。

那些法国葡萄园的业主們，直到現在仍始終认为法国的保护制度有損于他們的利益，要求在对英貿易中享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希望由此可以使他們的地租增长；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一般对于国内工业与国外貿易两者对地租与地产价値的影响大不相同这一点，果能有彻底了解的是多么少。

鮑林博士的关于英法間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的基本意向是要表明法国由英国多輸入毛織品、对英多輸出酒类时所能获致的利

益；但是他所提供的資料，却可以用来作为一些事实的极显著的証明，这些事实同他自己的論点恰恰处于对立地位。

鮑林博士指出，法国酒类1829年輸入荷兰計2,515,193加侖，輸入英国只431,509加侖，由此証明，如果英法之間存在着比較自由的商业关系，則法国酒类对英銷售量将会有如何大規模的增长。

英国人对于酒类是习慣于那些由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特納里夫島、馬德拉群島、好望角等处輸入的蒸餾酒、烈性啤酒以及性烈而价廉的各种刺激飲料的，法国酒要大量运銷英国，在这方面未必沒有阻碍；这些都姑且不論，假定英国对于法国酒的消費确能增进到与荷兰同样的比率，那么按照英国人口計算，它的消耗量将增进到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侖，等于現在对法国酒类消費量的十倍到十五倍；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来，对于法国，对于法国的葡萄园业主，的确显得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是，假使我們对这个問題加以彻底研究，所获得的結論将完全不同。按照所宣揚的原則和鮑林的論点，所主張的当然是彻底的自由貿易。我們且不提这一点，只是假定在尽可能获得的貿易自由限度下，这时毫无疑問，英国人将使他們的工业品，特别是毛、棉、麻織品以及鉄器、陶器，占有法国市場的一个很大部分。即使按照最稳健的估計也必須假定，由于法国工业生产的下降，法国城市居民将减少一百万人，以原料与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农民也将減少一百万人。按照鮑林博士自己的估計，法国人民对于酒类的消耗，在乡村的是每人16.5加侖，在城市的加一倍，即每人33加侖。据此，法国工业力量由于自由貿易而減退后，它的酒类在国內的消耗量将減少五千万加侖；而对外輸出量不过增加了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侖；这样的結果对法国葡萄园业主显然是有害无利的，因为对酒类的需求，在国內的所失，比在国外的所得超过了十倍以上。

总之，就酒类生产，或者就肉类、谷类以及一般原料与粮食的

生产来說，这一点是显而易見的，凡是宜于由自己建立工业的大国，国內工业生产对这类溫带农产品所引起的需求，比之卽使在最旺盛的出口貿易下对这类产品所能引起的需求，也将高出十倍到二十倍，因此对于地租与地产的交换价値的提高也将发生十倍到二十倍的有效作用。有些地区距离城市較远，虽然由于路政完善及商业往来上的便利，与城市有着联系，但是就地租数額与地产交换价値来說，与邻近大城市的地区比較，仍然瞠乎其后；这一点也是上說的一个最有力証明。

地租問題可以从价値观点或从生产力观点来加以研究；但是还可以从单純的个人关系，卽地主、农业經营者和劳动者之間的关系，或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情况这方面来加以研究。流行学派对于这一問題主要只是从私人經济的观点来考虑的。例如，一国的地租被消費时，实行这种消費行为的地区离开产生地租的地区愈接近就愈有利，而有些国家的則与这个原則相反，消費行为大都发生在一国元首所駐在的地区，以专制君主国来說，大都发生在一国的首都，与地租产生的地区离开得很远，因此对农业、对最有效用的工业、对国家精神力量的发展所能发生的利益只是限于最低度——就我們所知，流行学派談到地租时，对于这一点却一字不提，无所闡述。当地租消費集中在首善之区时，貴族地主除非在宫廷中求生活或在政府据有官职，否則就不能享有权利或政治势力，这时一切公众权力和势力都集中在首都，地主們都被吸引到这个中心点，他們要满足欲望，要找到暢暢快快地化費地产收入的机会，这里几乎是唯一的理想地区；而且大多数地主越是习惯于首都生活，在別的地区居住时，对于他們在社交方面、在高等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少，他們就越来越感到首都生活的富有魅力，別的地方生活的可厌。結果使各地方失去了、使首都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那些由地租消費而产生的精神改进手段，尤其是原来

可以由地租来維持的那些工业和精神生产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首都的确是显得极度富有吸引力，因为它把精神劳动者的一切才能，把生产奢侈品各行业的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它的本身。但是各地方却丧失了主要使农业經营者能改进农业、能鼓励他們实行改进的那些精神力量、物质手段和那些工业。

我們看到法国的首都，特别是在专制政权下，一切文物的輝煌燦烂，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城市，而这个国家在农业方面却很少进步，各省区在精神文化以及有实用的工业方面都感到缺乏。为什么会这样？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上述那些情况。貴族地主越是能与宫廷生活相脫离，越是能在立法与行政管理上占有势力，通过代議制与行政制度，給予各省区、各城市管理它們自己地方事务和参預国家立法行政的权利越是广泛，結果使人們居留在省区时越是能够受到尊重，获得势力，則产生地租的地区的吸引力就越大，就越加能够多多吸引貴族地主和有教育有財力的公民到那里去居住，这个时候地租的消費对地方上精神力量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对农业的改进以及对人民群众有用的工业的促进所发生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英国的經济情况就为这个見解提供了証明。英国地主一年中絕大部分时間是住在他自己的田庄上的。这一事实在多方面促进了英国农业，直接的方面是由于駐在地主为他自己打算，会把地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业改进，或用来支持佃戶方面所承担的这类改进工作；間接的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消費行为，对于附近一带的工业和文化教育組織会发生支持作用。再就德国和瑞士来說，与法国对照时，虽然缺少大城市，在交通运輸設备与国家制度方面也相形見絀，但在农业方面，在一般文化方面，却高出很多，其中原因也部分地可以用这里所說的一些情况来加以說明。

亚当·斯密和他的学派在这一問題上所犯的絕大錯誤，我們

在前面已經指出，这里还可以作进一步清晰的說明。他的錯誤在于沒有能清楚地认識到工业对地租增长、对地产自身的市場价值以及对农业資本所发生的影响，在于对这一点沒有能加以充分說明，却相反地将农业和工业作了对照，在他那样对照的情况下，显得农业比工业对国家要有价值得多，要重要得多，显得由此所造成的繁荣，要比后者所造成的巩固、持久得多。亚当·斯密在这里只是重复了重农学派的錯誤見解，不过在方式上略有些改进而已。他显然被一些現象所迷惑，那就是我們已經借助于一些英国情况的統計数字加以論証的，表明即使在最富足的工业国，在重要性上农业物质資本也超过工业物质資本十倍到二十倍；实际上，就是每年的农业生产，在价值上也是大大超过工业資本总額的。重农学派以农业与工业对照时，所以会过高估計前者的价值，或者也是由于受了这种現象的迷惑。表面上看起来，农业足以使国家富足起来的力量，当然显得要比工业高过十倍，因此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比起工业来要高出十倍，也就值得給以多于十倍的考虑。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农业繁荣的根本原因，就会发現主要只是由于工业的存在。英国所以会具有 3,311 百万鎊的农业資本，主要只是由于 218 百万鎊工业資本的存在。关于运輸工具，情况也是这样；靠近运河一带的土地，价值所以会提高，只是在建造运輸工具方面所化費的資金所促进的。如果运河上的运輸工具受到了破坏，我們也可以把原来供作交通运輸用的水流用来灌溉河边的土地，这样也显然能使农业資本、地租等等有所增长；但是即使假定由此使这一带土地价值有了大大的提高，这一点对农业也显然是有利的，然而以运河周圍地产的总計价值計算，較之运輸工具存在时的情况，低落将何止十倍。

从这一观点来考虑，根据一国的工业資本总額与农业資本总額对比下为数如此細小这一情况而得出的結論，势必与現在及以

前那些学派所得出的結論，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現在看起来似乎是，工业本身所需要吸收并加以运用的資本与农业对比下为数越是小，工业力量的維持与扩大，即使对农业經营者来說，也就越加值得重視。的确，农业經营者，尤其是收租的人和地主們，現在应当看到，維持与发展国内工业是对他們有利的，即使所必須筹集的資本，对他們来說，沒有获得直接报酬的希望，情况也是如此；这就同建筑运河、鉄路和公路的情形一样，即使这些事业沒有实际净利，然而享受利益的仍然是他們。有些工业是与农业最接近，在农业上最必要的，如面粉厂就是一个例子，将这一工业与上述論点結合起来看，就可以充分証明，这种見解的正确性是沒有怀疑余地的。試将离开面粉厂較远的同处于厂址周圍的地产价值与地租相比較，就可以发現这一工业对地产价值与地租是有重大影响的，就可以发現，在具有同样天然生产力的情况下，土地的总值与建設面粉厂的成本对比时，所增长的不只是一倍而是十倍到二十倍，即使在建厂时地主們須共同有所負担，一切設备則归之厂主，而地主方面所获得的利益仍然是巨大的。这样的情况，在美国远离城市的半开垦地区簡直是司空見慣的，在那里当个人沒有足够的資力完全由他自己来建設这类工厂时，地主們就会高高兴兴地从旁协助，共同合作，或以劳力支援，或捐贈木材等等。事实上这类情况在文化比較古老的国家也曾发生，不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很多古代封建的"公共工場"权利，其起源必然也可在这里找到。

面粉厂的情况是这样，此外以鋸木厂、炼油厂、灰泥厂以及制鉄厂等等的情况来說，也无一不是这样；处处的情况都足以証明，地租和地产价值的增长程度，是按照这些地产距离工业的远近程度、特别是按照这些工业与农业間商业往来的密切程度为轉移的。

面粉厂的情况既是如此，毛紡織、制麻、造紙、紡紗等等的厂的情况怎能不是这样呢？一切工业的情况又怎能不是这样呢？至少

我們可以看到，任何处的地租和地产价值，总是随着地产距离城市的远近程度作完全等比例的增长的，总是随着城市人口稠密与工业活跃的程度作完全等比例的增长的。如果我們計算一下那些范圍比較小的地区的地产价值和在那上面所化費的資本，再計算一下用在各种工业上的資本价值，把它們双方的总值比較一下，就会到处发現，前者超过后者至少十倍。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认为将物质資本投放于农业比投放于工业为有利，认为扩大农业資本对农业本身最为有利，那就要陷入錯誤。农业物质資本的增进，主要有賴于工业物质資本的增进；凡是不能认識到这一事实的国家，不管它在农业上的自然条件如何有利，不但不能获得进展，而且在財富、人口、文化和权力方面都将逐漸退化。

虽然如此，我們却看到地租和地产所有人往往会发出怨言，认为那些目的在于建立国内工业的財政和政治措施只是一种特权，使工业家获得致富机会，而一切义务則由他們(地主)来負担。这些人在开始經营农业时，看到在他們的邻近地区建立一个面粉厂、鋸木厂或制鉄厂，对于由此会使他們获得极大利益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也願意忍受最大牺牲，从旁支援，使这些事业得以建成；但是当他們作为农业經营者的利益已經有了些进展时，关于本国工业有了充分发展以后，对国家整个农业将由此形成如何巨大的利益，以及基于他們自己的利害关系，也必須忍受些牺牲，否則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在这些方面他們就不再能有清楚的理解。因此除了少数的、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以外，一般的情况总是这样的，各个地主对于眼前利益大都高度地敏感，但是对于在比較广闊的視野下才能見到的那些远一层的利益，却沒有足够的智力来加以領会。

还有一层也未可忽視，那就是流行学派的理論对于地主們思想的混乱，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斯密和薩依力图处处把工

业家爭取保护制度的努力說成是出于单純自私心的驅使，对于地主的看法則相反，认为他們从来沒有为自己提出这类要求，因而加以贊揚，把他們說成是慷慨为怀的，大公无私的。但是照实际情况看起来，好象是地主們只是为了无意于保有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才会被拉扯上这种美德而备受贊揚；因为在絕大多数的、最重要的工业国家，这些地主們早已提出了要求并已获得了保护措施，虽然这一措施，我們在別的場合已經提过，对他們自己是极度有害的。如果說这些地主为了建立本国工业，以前曾有过牺牲，他們的做法同乡村中的农业經营者为了使一个面粉厂或制鉄厂在他附近地带得以建成而作出的牺牲，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些地主現在为了他們的农业也要求保护，他們所要求的，同以前那些乡村地主們当工厂在他們的帮助下建成后要求厂主在农耕方面帮助他們时所会提出的要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无疑这是一种荒謬的要求。农业的进展，地租与地产价値的增长，是只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相应地前进的；而原料与粮食的輸入受到限制以后，工业就不能获得发展。工业家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然而在多数大国中，地主仍然爭取到了保护措施，其中有一个带几分奧妙的理由。在实行代議制的国家，地主在立法方面的势力是凌駕一切的，工业家因此有所顾忌，对地主所提出的愚昧要求未敢坚决反对，恐怕由此横生枝节，会促使后者傾向于自由貿易原則；工业家是宁可与地主妥协的。

于是流行学派向地主进了种种說詞，告訴他們，用人为方法建立工业是愚不可及的举动，就象在寒冷地带用溫室培养葡萄从而酿造酒类那种荒謬行为一样；工业应当在自发自願的情况下，听任它自生自长；以資本增长这一点来說，农业所提供的机会不知要超过工业多少倍；一国的資本是不能用人为方法要求增长的；法律和政府的規章制度只能使事态比較地不利于財富的增进。最后，关

于工业对农业确有影响这一点終于无法否认时，就尽量把这种影响縮小到最低度，并竭力把它說成是在性质上不可靠的。据說不管怎样，即使工业对农业确有影响，至少任何对工业有害的因素，对农业也同样有害，因此工业对地租的增长虽也有所影响，但影响只是間接的。但是另一方面，据說人口与牲畜的增加、农业的改进、运輸工具的改善等等，則对地租增长有着直接影响。这里所說关于直接影响与間接影响区别的情况，就同这个学派在許多别的方面（例如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效果）所作出的区别一样；上面我們曾提到的一个例子这里也可以应用——以树上的果实为例，照这个学派的說法，这显然是一个間接結果，因为果子是生长在小枝上的，小枝是大枝的产物，大枝是主干的产物，而主干又是根部的产物，只有根才是土壤的直接产物。人們一眼可以看到，在任何大工业国，工业本身总是人口、牲畜、运輸工具等等增长的主要原因；現在要把人口、牲畜、运輸工具等等說成是直接原因，把工业却相反地說成是地租增长的間接原因，这种顚倒的說法，跟上面所举的例子不是同样的强辞夺理嗎？他們要把工业的效果和这些效果的起因置于同等地位，还不止是这样，要把由工业而来的这些成就置于首位，說成是主要原因，而把工业本身放在后面，說成是間接的、因此也几乎是次要的原因，这难道是公平合理的嗎？象亚当·斯密这样一个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天才，所持的論点却这样顚倒是非，与实际事理离开得这样远，这除了是出于一种企图，要故意掩盖工业及其对国家繁荣和国家力量、对地租和地价的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誘因呢？这除了是出于一种願望，要避免作出解釋，从而造成对保护制度有利的这个十分明显的結果，还会有什么别的动机呢？关于地租的本质，自从亚当·斯密作了研究以来，这个学派在这方面特别令人遺憾。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穆勒、麦克洛克等等，都抱着一种見解，认为地租是由土地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生产

力而来的。李嘉图的整个理論体系即以此为依据。他假使到过加拿大,在那里的山区和平壤作过漫游,就会相信他的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所考慮到的只是英国的情况，因而他陷入了錯誤观点,以为这些英国的田地和草原所产生的这样丰富的地租,是由他所假定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而这些田地和草原的情况是一向如此的。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力显然是极其微薄的，它对于使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量是极小的，因此单单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地租簡直少得不值一提。整个加拿大在原始状态下，即单由猎人居住时，所产生的肉类和皮革，看来还不够供作一位牛津大学經济学教授的薪水。又如馬耳他遍地都是岩石，以那个地方的土地自然生产力来說，簡直不能在任何时候产生地租。如果我們把一切国家的文化发展过程，从古到今地想象一下，这些国家的生活情况由打猎而进入游牧，然后又进展到农业,等等,我們就不难使自己深信,不論哪一个地方的地租原来总是絕对沒有的,总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与精神資本及物质資本的累进而逐步增长的。把純农业国家同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靠地租生活的人比前者要多二十倍。例如，根据馬歇尔关于英国的統計,1831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人口是 16,537,398 人,其中收取地租的有 1,116,398 人。在波兰同样大的土地上，我們决不能找到这个数目的二十分之一的收租者。如果我們把探討的对象,从一般的退到各个的,研究一下各个地产的地租来源和起因，也到处可以发現这是一种生产力的結果，但是这种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地、无意識地发生出来的,并不是造物主的恩惠，主要是直接或間接由于在这里所使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劳动和資本，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地段的土地,如采石場、沙坑、牧場等等,也产生地租,但从来沒有由人力施以耕种,这种地租只是附近一带文化、資本和人口有所增进的結果。另一方面我們

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段的土地产生数額极大的地租，而它們的自然生产力却已被完全破坏，它們沒有別的用途，只是用来供人們在上面行走坐臥，吃喝享乐，工作学习——即建筑用的基地。

地租产生的根据是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所提供的专有利益；这种利益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占有者所在的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資本和物质資本的量，同时也决定于地产的特有地位和性质以及对以前所投資本加以利用时，对占有人所提供的取得物质价値或滿足身心要求与享乐的机会。

地租是一种資本的利息，这种資本是同自然蘊藏結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說是資本化的自然蘊藏。有些国家只是将农业方面的自然蘊藏加以資本化，由于它們只有农业，因此在資本化方式上也是有缺点的，在这样情况下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与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对照之下是差得极远的。享受丰富地租的收租者所屬的国家，大都是能够供应工业品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在农业和人口方面已經有了高度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时，正如我們在前一章里所已經指出的那样，它就得以不但把格外适用于工业而以前沒有使用的那些自然力量加以資本化，而且把有助于农业的工业力量的絕大部分也加以資本化。因此象这样一个国家的地租的增长，将无可限量地超过发展工业时所必需的物质資本的利息。

# 第二十一章 工业与商业

到此为止，我們所談的只是工业与农业間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是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对于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沒有能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以前，对于商业的眞正职能和地位是无法获得正

确理解的。商业当然也是生产性的，流行学派也是这样説的，但与工农业的生产性，情况完全不同。后两者实际生产着商品，而商业只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間，在生产者与消費者之間，促成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見，商业必須按照工业和农业的利益与要求而被調整，而不是相反。

但是流行学派的見解与这个說法恰恰相反，它所喜欢引用的是古尔耐老人所說的那句話，叫作“一切不管，听任自由”，这句話商人听得进，盗賊和騙子也同样听得进，可見作为一个准則是有些疑問的。流行学派的理論所考虑的处处只是現有价值，絕不估量到产生这种价值的力量，把整个世界看成只是一个商人的不可分割的天下，因此这种毫无顾忌地把工农业利益屈从于商业要求的顚倒說法是势所必然的結果。这个学派沒有看到，商人在达到他的目的(那就是爭取交換价值)时，可能使工农业或国家的生产力受到牺牲，甚至可能損害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商人按照他职业的性质来說，当他輸入或輸出商品时，这一行动对国家在道德、繁荣或力量等方面会引起什么作用，在他正不必操心太过；对他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可以輸入药品，也可以同样欣然地輸入毒品。他可以用鴉片或火酒損害任何国家的元气。他凭了进口貿易或走私活动，可以使千百万人获得工作与生計，也可以使他們淪落到赤貧地位，不論結果如何，对他作为一个商人来說，并沒有多大出入，只要他自己的錢袋因此得以更加充实。假使由于他的活动，有些人无法在祖国生存，不得不向国外逃亡，这个时候他还可以为这批移居者作出安排，从中博取利潤。在战爭时期，他可以向敌人供应軍火。假使可能的話，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給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輸出国外。

这就很明显，各个商人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两者是相差得很远的。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鳩說得好，他說，“假使国家对

各个商人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在自由富强国家，他的业务所受到的限制最严，在专制国家他却最自由放纵。”[①] 商业是由工业和农业而来的，假使国家沒有能使这两个主要生产部門在它自己的領土上获得高度发展，它的国內和国外貿易在我們这个时代就不能达到巨大規模。以前的情况不同，那时的确曾經有个別城市或城市联盟，靠了国外工业和国外农业，得以进行大規模的交换业务；但是自从偉大的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兴起以后，我們就不再能想象还有可能实現象汉撒同盟所进行的那样的单純交换业务。无論如何，那种业务的性质是极不可靠的，与那种以本国生产为依据的商业比較起来，几乎是不值得考慮的。

国內貿易的主要內容是食物、盐、燃料、建筑材料、衣着材料，然后就是工农业用具和工具以及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和矿产原料。这类商品的国內交换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所达到的規模，比純农业国家所能达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双方是无法比拟的。純农业国的农业經营者，往往主要靠他自己的产品維持生活。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缺乏需求，由于缺乏运輸工具，他不得不为自己生产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顾到他的土地最宜于生产的是些什么；由于缺乏交换手段，他还不得不为自己制造他所需要的工业品的大部分。燃料、建筑材料、粮食和矿产，由于缺乏改进的运輸工具，市場极端狹隘，因此不能作为远距离貿易物品。

这类产品，由于市場有限，需求有限，就不存在在这方面加以貯藏或蓄积資本的动机。因此就純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說，在国內貿易方面的資本几乎等于零；因此主要要靠天时的好坏来决定产量的那类产品，价格波动非常剧烈；因此任何国家越是把自己局限在农业一个方面，发生饥荒的危險性就越大。

---

① 《法的精神》，第20編，第12章。

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主要是靠国内工业以及由此而来的改进的运输工具和人口的增加发展起来的，是按照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而相应地增长的;这样的国内贸易所具的重要性,比之纯农业国家的国内贸易要超过十倍到二十倍，比之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要超过五倍到十倍。如果将英国的同波兰或西班牙的国内贸易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居于温带的农业国家的国外贸易，假使老是局限在粮食和原料这两者,就永远不会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有种种理由的。

第一,农业国的出口对象总是限于少数工业国家,这些国家自己也经营农业,实际上由于既有工业,又有广泛的商业活动，它们的农业组织要比纯农业国的完善得多，因此纯农业国的这种出口贸易是既不规则，也不稳定的。纯农产品贸易总是一种带有高度投机性的活动,大部分利益会落到投机商人的手里,对于农业经营者或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则好处很少。

第二,以农产品交换国外工业品时,这种交换活动极容易受到外国商业限制政策与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或大部分停顿状态。

第三,由于纯农产品的输出,能够获得利益的主要是沿海或通航河道沿岸一带地区,内地就不能分享这种利益,而构成农业国领土的较大部分的却是内部腹地。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工业国所需的粮食与原料不一定要纯农业国来供应，它有时会感到向别的国家或新成立的殖民地输入这类物资对它比较有利。

于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由澳洲输入羊毛以后,德国运赴英国的羊毛就减少了;英国由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西属与葡属各岛以及好望角殖民地输入酒类以后,法国和德国运往英国的酒类就减少了；英国所需木材有了加拿大方面的供应以后，普鲁士木材对英输出就显著减少。英国所需的

棉花主要将取給于东印度群島，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經作好了安排。如果英国能順利恢复旧有的商业路綫，如果得克薩斯州日益得到发展，如果叙利亚和埃及、墨西哥和南美各国的文化有了提高，到那时美国的植棉者也就会感到，对他們的产品能够提供最安全可靠、最持久不变的出路的，还是他們自己的国内市場。

处在溫带的国家，絕大部分的国外貿易是起源于国内工业的，只有靠它們自己的工业，才能使貿易得以維持和发展。

有些国家是能以最低代价生产一切种类的工业品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同处于一切不同气溫下的、一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民发生商业关系，才能供应一切不同的需求；如果原来的需求不复存在时，才能創造新的需求，才能吸收一切不同种类的原料和粮食，用来交換工业品。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用船装运各种不同商品到遙远的市場，以适应那些沒有本国工业品的国家的需要。只有出口运費本身足以抵偿航运的开支时，才有可能于回航时載运价值較低的商品。

溫带国家最主要的輸入品是热带地区产品，如茶、棉、糖、烟叶、染料、咖啡、可可、香料等等，也就是一般所謂殖民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絕大部分是用工业品来偿还的。促使溫带工业国家工业的进步和热带地区文化与生产的进步的因素，就主要体現在这个互通有无的过程中。这就是最高度的分工与生产力的結合，这是古代所沒有的，是荷兰人与英国人所首創的。

在繞行好望角这条航綫发現以前，东方在工业上还远远胜过欧洲。欧洲的物品，除貴金屬和少量的毛織物、麻織物、軍火、鉄器以及一些奢侈品外，在东方还很少使用。陆路运輸，使貨物輸出輸入的代价都非常高昂。普通的工农业产品，即使生产过剩，也沒有希望可以用来交換东方的絲織品、棉織品、糖和香料。所以我們尽管看到了关于对东方貿易曾經达到如何重大发展的記載，也必須

始終在历史情况的对照下来理解；那样的商业关系，只是在那个时候是重大的，但是与現在情况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由于在內地和美洲获得了比較大量的貴金屬，由于发現了經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捷徑，热带产品貿易在欧洲才占有了比較重要的地位。但是只要东方所生产的工业品供过于求时，这种貿易就不会达到十分重要程度的。

这种貿易所以会达到象現在这样的重要地位，是由于欧洲人在东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开拓殖民地，由于甘蔗、咖啡树、棉、稻、靛青等等在北美和南美的移植，由于把黑人作为奴隶，販运到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由于欧洲工业对东印度群島工业竞爭的胜利，尤其是由于荷兰和英国政权扩張到国外各地，这两个国家的作風跟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它們不偏重巧取豪夺手段，却主要用以工业品換取殖民地产品的方法来从中取利。

欧洲的巨大航运設备和用于国外貿易的工商业資本，其中的主要部分，目前是使用在上述这类貿易方面的；通过这类貿易由热带地区运到溫带地区各国的产品，每年价值何止千万，其中除少数例外，都是**用工业品来偿付的**。

用工业品交換殖民地产品这种举动，对于溫带国家的生产力有許多良好作用。这类产品，如茶、糖、咖啡、烟叶，既可以供实际食用，还可以刺激工农业生产；要取得这类殖民地产品，必須生产工业品来供作交換，这就会使更多的工业者获得工作；工业和工业品貿易的規模因此可以积极扩大，結果可以获得更多利潤；貿易扩大以后，使用的船舶、海員和商人，为数也将跟着增加；还有，由此引起了人口增加以后，对于本国农产品的需求，也将跟着大大增加。

由于工业生产与热带产品生产两者之間的交互促进作用，結果使英国人对于热带产品的平均消費量超过法国人約一倍到两

倍，超过德国人約两倍到三倍，超过波兰人約四倍到九倍。

还有一层，殖民地生产此后仍有作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就投入目前貿易的这些殖民地产品在生产时所需的土地面积加以約略計算，对这一点就可以有所认識。

假定現在棉花的消费量为一千万生丁納[1]，每嗽(合四万平方呎)的平均产量只有八生丁納，那么这項生产所需土地不过一百二十五万嗽。假定投入貿易的糖为一千四百万生丁納，每嗽产量十生丁納，則这一項生产所需土地不过一百五十万嗽。

关于其余各項产品(咖啡、米、靛青、香料等等)的綜合数量，假定与上述两項主要产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有現在投入貿易的殖民地产品在生产时所需的土地当不超过七百万到八百万嗽；象这样范圍的一个面积，就地球上宜于种植这类产品的地面来說，大概还不到这样地面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島，法国人在安的列斯群島，荷兰人在爪哇和苏門答腊近来的活动，都足以确切証明，要使这类产品的生产剧烈增进是完全有可能的。

英国的情况尤其突出，它从东印度群島輸入棉花增长了三倍，英国报紙輿論信心很强，认为在几年之內，英国对殖民地产品的全部需求，不难从印度获得滿足，如果能据有对东印度群島的原有通商航路，这一願望就更易实現。如果我們考虑到英屬东印度地区的辽闊，土壤的肥沃，那一带工資的低廉，就可以相信这个說法并不算夸大。

一方面英国在东印度群島着着进展，一方面荷兰人在这些島上的垦殖事业也将更进一步；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瓦解，非洲和亚洲西部、中部的一个很大部分在生产上将有所提高；得克薩斯人将以

---

[1] 德国重量单位名称，合五十公斤——譯者。

在北美的耕作方法扩展到全部墨西哥；南美各国有了有組織的政治制度以后，那里热带地区的巨大生产力将显示作用，农作物产量将大大提高。

假使热带各地的殖民地产品比以前有了显著增长，它們就将为自己增添力量，取得从温带各地輸入数量要大得多的工业品的手段；一方面工业品銷路扩大以后，工业家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費量也就能够跟着扩大。生产和交换有了这样的增长以后，热带农业与温带工业之間的貿易关系，也就是世界上最大范圍的商业关系，此后将积极扩大，扩大的规模将远远超出上世紀。

这种世界范圍的大商业，現在已經有了增长，此后还有在意料中更大的增长，其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势，部分是由于工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部分是由于水陆运輸工具的改进，部分也是由于政治上的演变和发展。

东方簡陋的工业，由于机器的产生与种种发明創造，已經被欧洲的工业所摧毁，后者能以最低价格向热带地区供应大量工业品，这就促使这些地区有了发展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力的动机。

由于运輸工具的显著改进，热带各地与温带各地之間的距离比以前不知縮短了多少；而且热带各地相互之間的商业关系，由于風險减少、时間縮短、运費降低、比較趋于正規化等种种原因，也比前有了无限进展；在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的腹地，一旦輸运普遍流行、鉄路系統建成以后，这种商业关系还有无限的发展前途。

自从南美洲脫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土耳其帝国瓦解以后，世界上有大量的膏腴之地获得了自由，这些地区現在所迫切盼望的是由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在和平亲善的原則下，引导它們走向享有法律与秩序、文化与繁荣的光明道路；这里所要求的沒有别的，只是把工业品带給它們，让它們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換。

由此可見，一切欧美国家，凡是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都

大有可为，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它們可以使自己的工业生产充分地活跃起来，可以积极增进对热带地区产品的消費，可以按同样比例扩大对热带地区的直接商业关系。

# 第二十二章

# 工业与海运事业、海軍力及殖民地开拓

工业是大規模国內貿易和国外貿易的基础，也是大量商运船舶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为內河运輸的最大职能是为工业供应燃料与建筑材料、原料与生活資料，所以沿海与內河航运在純农业国家是不会有很大发展的；同时海員、船长以及造船技术要通过海运事业才能获得鍛炼，因此就純农业国的情况来說，是缺乏任何大規模海运事业的主要基础的。

在上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国际貿易的主要內容是工业品对原料与自然产品的交換，尤其是对热带地区产品的交換。但是溫带的农业国家对热带地区所能供应的，只有它們自己所生产的或是它們自用以外还有剩余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原料和食品；因此与热带地区的直接商业关系以及由此发生的海上运輸，在这些国家是无法实现的。这些农业国家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費，势必以它們对工商业国家能够以出售农产品和原料来偿付的那个数量为限，就是說，它們只有在間接轉手之下，才能获得殖民地产品。还有一层，在农业国与工商业国的商业交往中，絕大部分的海上运輸必然掌握在后者手里，即使后者并沒有借助于航海条例获得任何特权来爭取海运的主要部分，这样的現象也无可避免。

除了国內貿易与国际貿易以外，海上漁业也需要使用大宗船只；但是农业国家对于这一事业往往也是沒有份的，或者即使有份

也是极有限的。农业国家对于海产品既不会有多大需求，而工商业国家則由于要顾到保持它們的海軍力量，它們是慣于专門为了自己的海洋漁业而保护它們的国內市場的。

海軍艦队的海員和駕駛員是从私营商船业中招募得来的。經驗一貫証明，干练的船員不能象陆軍那样的速成培养，必須在沿海与国际航运以及海洋漁业的服务中經过鍛炼。因此国家的海軍力与这类海上事业总是齐头并进的，以純农业国家来說，在这些方面就几乎完全沒有基础。

要使工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內貿易和国外貿易获得发展，要使广大的沿海与海外航运事业和海洋漁业，从而海軍力得到較大的发展，最不可缺的工具就是**殖民地**。

母国一方面向殖民地供应工业品，一方面向它們換回剩余农产品和原料；这样的交易过程使祖国的工业获得了活动力，从而使人口得以增加，国內农业品的需求得以增长，海运事业和海軍力也得以扩大。母国在人口、資本与企业精神上的优势力量，由于殖民地的开拓而获得了有利的出路，这一点反过来又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許多已在殖民地发財的人們，其中的很大部分，一定会把他們的資本带回母国兴办事业，或把他們的收入带回母国尽情花費，使母国更加欣欣向荣。

农业国家既缺乏开拓殖民地的手段，也沒有保持或利用殖民地的力量。殖民地所需要的，它們无法供应，它們所能供应的，殖民地本身已經具备。

工业品与自然产品的相互交換是現在使殖民地地位继續保持的基本条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一旦感到它自己有必要、有力量来举办工业，发展海运事业，与热带地区直接通商，就立即脱离了英国；同样的道理，将来加拿大达到同样地位以后，也会跟美国学样的，时机成熟时，在澳洲的溫带地区也会兴起一批

农工商业都发达的独立国家的。

但是这种热带地区与溫带地区之間的交换是出于自然之理，这一点是永不会变的。因此印度对英国放弃了工业以后，跟着也就放弃了它的独立地位；因此亚洲热带各国势将逐漸演变，而淪于溫带工商业国家的統治之下；因此处于热带的那些島屿，現在已經成为失去独立地位的殖民地，将来也很难使它們自己获得解放，摆脫現在的地位；而南美各国对工商业各国将处于在一定程度上的从屬地位，这种局势也是很难摆脫的。

英国所以会占有这样广大的殖民領土，完全是由于它的卓越的工业力量。如果别的欧洲国家也想学样，对于开垦荒蕪地区、教化未开化民族或教化以前曾經一度开化現又退化的那些民族这类有利事业，也想加入一份，那么它們首先就必須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发展自己的商船和海軍力。假使它們在这方面的努力，受到了英国工业、商业和海軍优势的阻撓，那么使这种不合理的权利主張化为合理的权利主張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們的力量联合起来。

## 第二十三章 工业与流通工具

流行学派对于貴金屬流通、与貿易均衡等問題建立了一套与所謂“重商主义”学說的見解背馳的理論原則；根据近二十五年来的經驗，这些理論原則如果經証明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話，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了重大弱点。

經驗，尤其是俄国和美国的經驗，一再証明，农业国的工业品市場是处于优势工业国的自由竞爭势力之下的，工业品的輸入价值，往往会大大超过农业品的輸出价值，因此有时会突然发生貴金屬大量外流現象，从而使农业国經济，尤其是当国內交易以紙币

为主时，陷入混乱状态，造成全国性的灾害。

流行学派的理論认为，我們对于貴金屬的准备如果与准备任何别的物品的情形一样，那么貴金屬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大体上是沒有什么出入的，因为流通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物品是貴还是賤；外汇率有了失調，往往会有利于国家的輸出，它的作用就象是对出口业务的一种奖励，足以使輸出量增加；因此得出的結論是，金屬貨币存量与进出口之間的平衡以及国家的一切其他經济情况，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下，以最妥善的方式，自动获得調节。

就一国的国内交易来說，这个論点是完全正确的；就城市与城市之間、城市与乡村之間、省区与省区之間以及屬于同一联邦政府的州与州之間的商业关系来說，这个論点是可以得到証实的。任何經济学家，如果认为北美合众国各州之間、或德国关税同盟各邦之間、或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間的进出口差額，可以用国家的命令与法律来調整，由此会比自由交换得出更好的結果，这样的說法必然会使人感到遺憾。假定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間也存在着与上述同样的联盟关系，那么这种把一切交托給事物的自然演变的理論将是頗能自圓其說的。但是在世界的現在情势下，如果认为在国际交换中，一切事情会获得与国内交换中同样的結果，那就再也沒有比这个更加与經驗相違反的了。

現在支配和控制着独立国家进出口貿易的，并不是象流行学派所說的那种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国家的商业政策和力量，是这些因素对世界局势、对外国与外国人所发生的影响，是殖民地的占有与国内信用的建立，或者是战爭与和平。因此在这里，一切情势演变的情况，与那些在政治、法律与行政上团結在一起、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处于恒久和平下的社会之間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試將英国与美国之間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来考虑一下。假使英国不时地以大量工业品在美国市場抛售，假使英格兰銀行运用提高或降低貼現率的手段，对于对美輸出或对美信貸极度地加以鼓励或限制，假使由于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場，結果使英国工业品在美国的价格比在英国本国还要低廉，或者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使因此使美国对英处于长期負債状态，对英汇率处于不利状态——即使是这样，在假定两国之間毫无約束的交換过程中，这种混乱情况也会不費力地自动获得糾正。美国所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以及各种生活資料，比英国要便宜得多。英国对美运銷的工业品越多，促使美国种植者生产足以換取工业品的有价值商品的手段和动机也就越大；給予种植者的信貸数量越大，驅使种植者为自己争取償淸債务的手段的推动力量也越大；英国的外汇率越是对美不利，驅使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推动力量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业經营者在英国产品市場竞爭中也就越能居于有利地位。

这样的輸出活动，結果会使逆势的汇兌率很快地自行获得糾正；这种汇兌率实际上也并不会达到十分不利的程度，因为美国在看到了本年度有大量工业品輸入而积下了債务以后，势必通过下一年的超額生产和出口的增进，使这种收支上的逆势自然获得平衡，金融市况和信用关系也就会跟着趋于緩和。

如果英国工业家与美国农业經营者之間的交換关系，就象英格兰工业家与爱尔兰农业經营者之間的交換关系一样的无拘无束，情势就会作这样的演变。但是两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必然是不同的。假使英国对美国烟叶进口征税由百分之五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千，假使它利用关税限制使美国木材无法輸入，假使它只有在饥荒时才容許美国粮食进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样就使美国的农业生产与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費，双方不能自相平衡，也不能用农产品来淸償这些由工业品构成的債务，这样就使美国

对英輸出只限制在狭小范圍内，而英国对美輸出則在实际上漫无限制，結果两国之間的汇兌关系就不能自动地趋于平衡，美国对英債务就不得不用对英輸出金銀块的办法来清偿。

但是金銀块在这样情况下的輸出，会破坏美国的紙币流通体系，势必引起美国銀行信用的破产，从而使地产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发生普遍的波动，使物价与信用陷于普遍混乱状态，而使国家經济处于不可收拾境地；我們可以說，当美国的自由州不能倚靠国家关稅制度使进出口保持平衡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发生了这样的破坏现象，消費也有了减退以后，說是过了一个时期，英美两国間的进出口关系就会自动恢复到相当平衡状态，这样的說法是不能使美国人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商业和信用受到了这样的扰乱、破坏，消費也有了縮减以后，个人生活与福利以及公共秩序所受到的損害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的，这样的变故如果屡次发生，就必然会留下长期存在的不幸后果。

流行学派的理論认为貴金屬流通量不論是大是小并沒有多大关系，认为我們只是用物品在交换着物品，认为在交换中所使用的貴金屬的流通量不論是大是小，对个人来說并沒有什么出入；这样的說法，就更加不能使处于上述情况下的美国人感到安慰。对一个生产者或企业主說来，他所生产的或保有的某一物品的价值是一百生丁[1]还是一百法郎，只要他用一百生丁所能换到的适应需要或享受的物品，同用一百法郎所换到的在数量上相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間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說是一个无甚出入的問題。

如果价格发生着頻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經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購入原

---

[1] 法郎的百分之一——譯者。

料，經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貴金屬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購入了一块地产，購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償債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額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他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約。价格漲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頻繁，对于国家的經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有些国家在工业品的需要和本国产品的銷售上是完全依賴外国的，有些国家的商业活动是主要以紙币为依据的，当貴金屬在这类国家有了突出的內流或外流現象时，它的有害影响就表現得格外显著。

大家承认，一国所能投入或保持流通的紙币数量，决定于它所保有的金屬貨币量的多少。不論哪一个銀行，总是力图按照它庫里所存貴金屬量的多少，来扩充或限制它的紙币流通量和业务的。如果它自己的貨币資本或存款有了很大增长，它就要扩大信貸，通过这种信用关系，又使它的債务人放出的信貸增加，这样就会使消費量和价格提高，而且格外会使地产的价格提高。如果情况相反，貴金屬有了显著外流現象，这个时候銀行将限制它的信貸，从而使它的債务人在放出信貸与消費方面也将有所收縮，从而使債务人的債务人也将处于同一局面，这样类推下去，将一直影响到那些依靠信用关系消費輸入工业品的人們。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一旦金屬貨币有了非常的外流現象，就会使整个信用体系、商品市場、尤其是地产的貨币价值陷入混乱状态。

在美国最近以及以前发生的商业恐慌，据說原因是在于美国的銀行制度和紙币制度。实际上銀行的确是象上面所說的那种情况，助成了这类恐慌的，但发生恐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实行了“折衷”方案以后，英国工业品輸入价值远远超过了美国农产品的

輸出价值，結果使美国对英負债数額越来越大，无法用农产品来抵偿。我們說这类恐慌的起因是失去均衡比例的进口数額，这是有事实可以証明的。由于恢复了和平，或由于美国关税率的降低，結果使美国輸入工业品的数量非常巨大，每逢工业品大量輸入时，恐慌就跟着发生；当关税足以阻止工业品輸入，使它不能超过农产品的輸出价値时，这种現象就从来不会发生。

还有人把恐慌的起因說是由于美国在建筑运河和鉄路方面所化的巨額資本，这項資本大都是用貸款方式从英国得来的。实际情况是通过这些貸款的作用，只是把恐慌的发生推迟了几年，而一旦暴发时却增加了剧烈程度；而且所以会产生这种貸款，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从进出口不平衡而来的，假使沒有这种不平衡現象，根本就不会借债，也不可能借债。

美国輸入大量工业品以后，对英欠下了巨額債务，不能用农产品、只能用貴金屬来偿还，这时由于不平衡的汇兌率和利率对英有利，使英国乐于接受美国的鉄路、运河和銀行股票以及美国政府債券来抵付这种差額。

美国輸入工业品超过輸出农产品的数字越大，英国对于这类証券的需求越大，美国在举办建設事业及企业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美国在这类事业上所投放的資本越多，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就越加殷切，同时也就更加扩大了美国进出口之間的差額。

英国工业品的輸入美国，一方面由于美国銀行的扩大信用关系而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英格兰銀行在信用关系上所提供的便利及其貼現率的降低，也在这一点上起了同样的作用。英国工商业委員会的公开报告說明，英格兰銀行由于扩大貼現数額，結果使現金庫存从八百万鎊減到二百万鎊。这一措施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对美国工业的竞爭，另一方面为英

国对美国股票与政府债券的投資提供了便利，发生了推进作用。在英国可以按三厘的利率获得資金，而美国的立約人和借方所提供的利息却是六厘，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后者的証券在英国就不怕沒有买主。

这种交易的条件表面上显示了繁荣气象，虽然美国的工业正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受到摧殘。美国农业經营者的剩余产品，原来在自由貿易下是可以卖給英国的，在适度的工业保护制度下是可以卖給自己工厂里的工人的，現在却卖給了在英国資本支持下的公共事业所雇用的工人。由于英美双方国家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样的不自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勉强抑制的經过期間越长久，一旦爆发时对美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債权人可以一再延长貸款期限，使債务人不至于倒下来；但是債务人經营的事业如果沒有可靠基础，險象环生，只是靠了債权人不断的增加貸款来拖延时日，那么拖延的日子越久，一旦不得不宣告破产时所遭受的損害就越大，这是一定的；上面所叙述的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发生破产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英国有了非常的举动，对外輸出了大量金銀块，这是由农产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引起的。我們說这是由于大陆保护制度的結果，因为如果欧洲大陆市場对英国繼續开放，英国从大陆大量輸入谷物，就可以主要用向大陆大量輸出工业品的方式来求得抵补，英国的金銀块即使暫时大量外流到大陆，也可以由于工业品輸出的增加，使它在短时期內重行內流。当然，在这样情况下，大陆工业将成为英美間商业活动的牺牲者。

处于这样的局面，英格兰銀行要企图挽救，并沒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于限制信用，提高貼現率。采取了这一步驟以后，英国不但不再需要美国更多的股票和公債，而且已經流通的部分也将泛濫于市場。因此美国不但失去了用繼續推銷証券的办法来弥补当

前亏欠的那种手段，而且它由于多年来在英国出售股票和公債而对英所負的全部債务，現在也面临着用貨币偿付的要求。現在看来，在美国流通的現金实际上是屬于英国的。还不止这样，美国整个銀行和紙币制度所依据的是对現金的保有，現在看来，英国人簡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美国的現金了。假使英国人对于这項現金加以处理，美国的銀行和紙币制度就会象紙糊的屋子一样，傾刻垮台，从而地产价格，因此也就是多数私人生活的經济手段所依据的基础，也将崩潰。

美国銀行方面为了避免瓦解，对于現金支付采取了延宕办法，实际上为了至少能使形势趋于緩和，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它們一方面想借此办法爭取时間，等待新棉收获，用它来抵偿，从而减輕美国的債务；另一方面希望在延付期間，靠了縮减信貸办法，能减少英国工业品輸入，使本国的輸出将来能与輸入求得平衡。

但是靠了棉花輸出能与工业品輸入相抵到什么程度，是很有疑問的。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經常超过消費，由于产量增加，价格越来越低。这时在棉紡織业方面遭到了麻紡織业的剧烈竞爭，后者由于机器設备的改进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植棉者方面，同他们相竞爭的則有得克薩斯州、埃及、巴西以及东印度群島的植棉者。

这里还必須注意到一点，从美国棉花輸出得到好处最少的，是消费英国工业品最多的各州。

这些州获取工业品的主要手段是从谷物种植业与畜牧业得来的，在这里出現了另一种形态的恐慌。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輸入，美国工业受到了抑制。因此一切增加的人口和資本都被迫流到了西部的新村落。每个新村落在开始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都是有所增进的，但經过数年以后，它們本身就有了大量农产品余額。这种現象在那些村落已經发生。因此人口和資本流入西部各州数年以后，

由于新建运河与鉄路的便利，就会有大量剩余农产品从那里流到东部各州；而东部各州，由于它們的工业受到了国外竞爭力量的抑制，消費者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势必繼續减少。由此必然要造成农产价値与地产价値同时降低的結果，如果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鏟除上述貨币恐慌发生的根源，則生产谷物各州农民的普遍破产，其势卽难以避免。

根据我們在上面所說明的一些英美之間的商业情况，它所給我們的教訓是：

(1)如果一个国家，在資本方面，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就不能容許英国在它的工业市場上取得竞爭优势；否則对英将永久处于負債地位，对英国的貨币制度将处于从屬地位，将卷入英国农工商业恐慌的旋渦而不能自拔。

(2)英国国家銀行凭着它的力量，是能够压低在它势力下的美国市場的英国工业品价格的，从而造成对英国工业有利、对美国工业不利的局面。

(3)英国国家銀行凭着它的力量，还能对美国人的消費发生影响作用，使美国累年所消費的輸入工业品的价値，大大超过它用輸出农产品所能償还的价値，使美国一連好几年不得不用輸出股票与公債的办法来弥补亏欠。

(4)处于这样情况下，美国經营国內交換业务所使用的、以及美国銀行与紙币制度所依据的那些現金，是在英国銀行势力之下的，英国銀行基本上可以凭着自己的动作和意向把这項現金吸收过来。

(5)金融市場在任何情况下的变动，对于各国的經济总是极端不利的；有些国家的范圍广大的銀行制度与紙币制度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貴金屬为基础的，对这类国家說来，就更加不利。

(6)只有能使出口与进口保持平衡的那些国家，才能防止企

融市場的波动，才能防止由此而起的恐慌，才能树立和保持稳固的銀行制度。

(7)国外工业品在国内工业市場越是占有竞爭优势，本国农产品輸出时受到国外商业的限制越是严格，这种进出口的平衡就越难保持；反过来說，国家关于工业品的供应与自己农产品的銷售越是不依靠外国，这种平衡就越不容易被破坏。

这些原則是也可以用俄国的經驗来証实的。我們也許还記得，当俄罗斯帝国市場对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品敞开着大門时，那里的公众信用关系曾經发生过多大的动乱，自从实行了1821年税制以后，那里就沒有发生过类似变动。

流行学派显然是落入了所謂重商主义所犯錯誤的另一极端。假使我們說，只有貴金屬才是国家的財富，只有出口貨值超过进口貨值，其間的差額用輸入貴金屬办法来淸偿，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的說法当然是錯誤的。流行学派的理論与这个說法不同，它认为在世界現状下，一国以內所流通的貴金屬量是多是少幷沒有多大关系，那种对貴金屬惟恐存量过低的忧虑是庸人自扰，认为我們对于貴金屬应当宁可促使它輸出，不必希望輸入，等等；但是这样的說法也是錯誤的。假使我們可以这样設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团結在同一法律系統之下的；当我們輸入了工业品只能用輸出农产品的办法来抵偿时，我們的輸出行动絕对不会受到那些供应工业品国家任何样的商业限制；由战爭与和平所引起的变化，对生产与消費、对价格、对金融市場都不会引起波动；那些龐大的信用机构也不会兴風作浪，不会专門为了本国利益而企图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別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样的推論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各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在每一个大国的立場上看来是英明的政策，就是要設法保护自己，就是要施行一种商业制度，从而防止发生足

以破坏整个国内經济的那种金融恐慌与物价变动，它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只有使国内工业生产与国内农业生产以及进口与出口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目的才能实現。

貴金屬单純的保有是一个問題，貴金屬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权力是另一个問題；流行学派理論对于这两者显然沒有作出充分区别。即使在私人交換中，作出这样的区别也显然是必要的。沒有人願意把現款死藏在自己身边，誰都想把它拿出去，离开自己的屋里越快越好，他所要保留的只是支配权，使他对任何时候需要的数目能够加以支配。現款的实际保有量是无足重輕的，到处所表現的情况都是这样，拥有財富越多，这种实际保有量的比率就越低。个人越是富足，只要对于他所有的、藏在別人鉄箱里的現款他能够随时支配，对于現款的实际保有他就越不关心；但是个人越是貧困，对于存在別人手里的現款的支配权越是有限，則对随时需要准备着的現款就越加关切。各个国家工业的盛衰不同，貧富不同，就現款这一点来說，情况也是这样。英国对于一时流出的現金或現銀数量的多少，通常是不大注意的，这是由于它有充分把握，它深知貴金屬作一度特大的輸出以后，一方面会引起貨币价值与貼現率的上漲，另一方面会使工业品价格低落，因此由于这类商品輸出量的扩大或由于国外股票与公債的变卖，必然会使流出的、它在商业中需要的那宗現款，很快地流回本国，仍然由它保有。英国就象一个有錢的銀行家一样，他袋里即使不名一文，也随时可以向左近的或比較辽远的往来戶任意支取。但是以純农业国家来說，情况就不同，在那里現金有了过度的出口时，就不能处于同样有利的地位，这不但是由于它們的产品的交換价值和农业价值量不大，而且国外的法令对于它們的出口事业也造成很大障碍，因此它們向国外取得所需的現金的手段是很有限的。这就象一个穷人一样，他沒有商业往来，沒有支票可以签发，但是富人

有了什么困难时他却要偿还债款，因此即使实际掌握在他手里的錢財，也不能算是他自己的。

一个国家所以能获得国內貿易方面所始終需要的那部分現金的支配权，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保有或生产以交换的便利而言与貴金屬的交換便利程度最相接近的那些商品和价值。

流行学派的經济学家在关于国际貿易討論中，对于貴金屬支配权这一点固然很少注意，对于不同的商品和財产具有不同的交換便利程度这一特点也极少考虑。我們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私人交易中存在的各种价值物，就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是定置着的，它們的价值之可以交換，只限于在它們的所在处，而且即使在那里，交換时也要費很大代价，經过很多困难。一国的財产中四分之三以上就屬于这一类，这就是不动产和固定着的器械及設备。个人所有的地产不論怎样范圍广大，他总不能把他的田地和牧場送到城市来換取現款或商品。他固然可以利用这些財产来押借款項，但是首先他必須找到一个貸出者；这样一个人的住处距离他的財产所在地越远，使他得以如願的希望看来就越少。

除了这种固着在地上的財产以外，次于这一項的，是极大部分的农产品（殖民地产品与少数价值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貿易中，这是在交換便利程度上最低的。这些产物中的絕大部分，如建筑材料、劈柴、制面包原料、果品、牲畜等等，只能在距离产区相当近的范圍內出售，如果余額过大，就只能堆在仓庫里等候买主。这类产品固然未尝不可运銷国外，但运銷对象也只能以某些工商业国家为限，在这里一般是要受到进口稅的束縛的，交易能否实現，还要看对方自己农产收获的丰歉而定。在美国內地，牲畜和农作物产量过多的情况也許极为显著，但是那里的农民却沒有办法把这些大量的剩余产品运銷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从而易取貴金屬。但是供一般使用的有价值工业品的情况却不同，它

們在交換的便利程度上比农产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这些商品平时在世界上一切公开市場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当非常的恐慌时期，以較低价格，也可以在那些关稅制度只能在平时发生不利作用的市場找到出路。这些商品的交換能力显然与貴金屬的交換能力最相接近；英国的經驗証明，如果由于农产歉收，发生了金融恐慌时，提高工业品輸出量，鼓励外国股票与公債外流，就可以很快地恢复平衡局面。英国人手里所存的外国股票和公債，显然是由于以前工业品輸出时造成有利的交換差額而来的，这就成为掌握在这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的票据，必要时就可以向农业国家要求兌付，当对貴金屬的需求特别殷切时，这一行动对証券持有者个人說来，誠然不免要有所損失，就象金融恐慌时工业品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維持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經济地位这一点說来，是极端有利的。

貿易平衡这个原則曾經受尽流行学派的譏嘲，但是不管它怎样說，根据上面的一些观察，我們仍然要提出这样的意見，卽，在独立自主的各大国之間，必須保持某种性质的貿易平衡，作为一个大国而长期在貿易上居于显著逆差地位是危險的，貴金屬作大量的、长期的外流以后，国內的信用系統和物价情况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动。我們这样說，絕对不是要使在所謂"重商主义"下坚持的那种貿易平衡的主張复活，我們絕对不认为国家对貴金屬輸出应当横加阻撓，或者說各个国家对于貴金屬应当記淸細帳，斤斤較量，或者說各大国之間的进出口貿易偶然有个几百万的差額，就要大惊小怪，当作一件大事。亚当·斯密在他书里专門討論这一問題的一章[①]的末尾曾这样說：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每年輸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也許一直是远远地超过輸出的；这样一个国家的

① 《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3章。

貴金屬存量也許逐年地大大减少，在国內是用紙币来代替流通的；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負債也許是听任它不断地增加和扩大的；但是，尽管这样，它在繁荣程度上仍然可以逐年有所进展"。我們所否认的只是这一点。[1]

我們在这里要特别表明反对的只是这一見解，这是亚当·斯密发表的，是他的学派此后所一直支持的，但是被无数次經驗所駁倒了的，是在实质上与常識相对立的，总之，用亚当·斯密自己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說，是"荒乎其唐的"。

有些国家以貴金屬的生产作为一种有利事业，因此它們的貴金屬輸出与工业品輸出在性质上极相类似，这一情况与我們这里所說的沒有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有些国家按照它們自己口岸的价格来計算进口品与出口品价額，在貿易差額方面势必由此产生的差异，也与我們这里所說的情况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进口总額，必然会按照本国商业利潤总額超过出口总額，这一現象表明对国家是有利的，不是不利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見的。至于那些意外变故，例如船只中途失事，造成財产损失，因此較大的輸出所表示的不是利得而是亏损；象这样的情况，当然更不是我們所要否认的了。流行学派对于由进出口而来的交換价值，就象一个店老板那样的加以核算、比較，对于由此形成的虛妄現象則加以巧妙利用，目的在于把我們引入歧途，使我們对于任何独立自主的大国由进出口之間眞正巨大差額所造成的损失，也誤认为沒有什么不利影响，例如法国在 1786 年及 1789 年、俄国在 1820 年及 1821 年、美国在"折衷方案"施行以后所发生的現象虽然并不恒久存在，但涉及的数額却那样龐大，而根据流行学派的說法，則我們仍将认为是沒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的現象。

---

[1] 参閱附录四 —英譯本注。

最后，还有一点須特别表明，我們所要討論的对象并不是那些殖民地和附屬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孤单的独立城市，而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商业系統、工农业系統和貨币、信用系統的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大国。

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輸出可以不断地大大超过輸入，而不必牵涉到繁荣程度盛衰的問題，这一点显然是与殖民地的特征相一致的。它的輸出与輸入总額，如果能年年增长，它就能随着这个增长比例而繁荣起来。如果它的殖民地产品輸出經常地、大量地超过工业品輸入，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也許是由于那里的地主是居住在他們的祖国的，他們的收入，即殖民地产品、农产品或由此变換成的現款，就必然要流入母国。如果情况相反，母国对殖民地輸出工业品大大超过輸入的殖民地产品，那么这一点也許主要是由于逐年进行移民或貸款，使大量資本經常流向殖民地的原故。这一現象对于殖民地的繁荣，当然是极度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延續几个世紀，而因此发生的商业恐慌却很少見，或簡直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它既不受战争威胁，也不会受到敌对的商业措施或母国国家銀行措施的压迫，殖民地是沒有它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工商业与信用系統的，正相反，它是經常受到母国的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支持的，这就避免了一切在这方面可能受到的危害。

象这样的情况，在英美之間曾經很有利地持續到一个世紀以上，目前在英国与加拿大之間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与澳洲之間，这样的情况或者还将继續存在几个世紀。

但是殖民地一旦成为独立国家，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一切条件，可以发揮自己的力量、貫徹自己的政策、組織自己特有的商业和信用系統时，情势就会在頃刻之間发生根本变化。假使这样一个由殖民地地位过渡到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兴国家，由

于它具备了在精神、物质和經济上的自然条件，自己感到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商业国家，它就会制定特别有利于它自己航运事业和海軍力的一套法律，就会树立有利于它自己国內工业的关税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銀行，等等。另一方面，以前居于母国地位的那个国家，对于这个新兴国家的航运业、商业和农业生产将企图加以限制，它的信用机构此后将专門致力于維护它自己的国家經济状况。

上面曾提到亚当·斯密那种极端不合理的見解，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地增加金銀的輸出，减少貴金屬流通，扩大紙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負債，而同时仍然能稳步地走向繁荣道路；他企图証明这一見解时所举示的例子，恰恰就是在美国独立战爭以前存在的美洲殖民地。他的用心是很周到的，譬如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国家，彼此已經有一个时期不发生依存关系，而它們两者的航运事业和工农商业利益却与别的敌对国家处于竞爭地位，象这样的例子他是要故意避免的，他所引証的，只是一个殖民地同它母国之間的关系。假使他活到現在，他的书是現在写出的，他就一定会謹愼小心地避免以美国为例，因为这个例子在今天所証明的，是同他所企图証明的論点恰恰相反的。

談到这里或者会引起一种反駁，认为照我們这样說法，假使让美国仍然回到英国殖民地地位，对美国說来，岂不是要有利得多。我們的答复是，假使美国不懂得怎样来利用它的国家独立地位，始終不想建立幷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对外独立的商业和信用系統，那么这个反駁意見是可以成立的。对方也許会进一步指出，认为假使美国继續处于英国殖民地地位，英国就不会实行谷物法，对美国烟叶进口就不会征收那样高的关税，美国的木材就可以继續大量运銷英国，那时英国不但絕不会想到在别的地区促进棉花生产，而且将使美国享有这一生产事业的专利，从旁尽力支持，結果美国近

几十年来发生的商业恐慌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岂不都是十分明显的嗎？对的；假使美国不要工业，不要为自己建成一个持久的信用系統，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发展海軍，这样的推論就完全是正确的。既然是这样，波士頓人把茶叶抛在海里，眞是多此一举，那些关于独立自主和国家远大前途的高談闊論也是多余的，那就不如重新投入英国怀抱，作为它的殖民地，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到那个时候，英国对于美国的商业活动不但不会設法限制，而且还将加以协助；对于美国的植棉业、谷物生产等等，不但不会想尽方法养成敌对势力来进行竞爭，而且对于向美国进行竞爭的方面还要加以抑制。那时英格兰銀行在美国将設立分行，英国政府对美将提倡移民幷将輸出資本，当美国工业彻底消灭的时候，将竭力促使美国原料与农产品运英，然后就象关怀自己的儿女一样，将尽力防止商业恐慌在美国发生，使这个殖民地的进出口額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关系。总之，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奴隶主和植棉业的經营者最美妙的梦想将成为現实。实际上过去一个时期，从这类事业經营者的爱国观念、利益和要求来說，显得更加值得想望的倒不是北美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却是如上述的这种局面。只是当他們开始有了自由与独立的情緒时，他們才抱有工业独立的想望。但是这些人的热情不久就漸趋低落，中部及东部各州近二十余年来的工业发展經过，在他們看来是一种可厌的現象，他們告訴国会，說美国的繁荣全仗英国在美国的工业統治。說美国如果再度投向英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会更加富足，更加繁荣，这句話的含意，除了作这样的解釋，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一般說来，我們认为主張自由貿易者不妨公开劝告一切国家干脆服从英国，作为英国的屬国，从而要求换取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它們原来虽不能为自己組成一个独立的工商业系統与信用系統，对英国却不能不装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处于从屬

地位以后，它們在經济方面比原来所处的半独立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假使主張自由貿易者提出这样的論調，他們关于金融恐慌、貿易平衡以及工业这些問題的論点将显得更加貫串，更加明朗。葡萄牙在麦修恩条約成立以后，假使由一个英国总督来管轄，假使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就象印度一样，置于它的卵翼之下，在这样情况下对葡萄牙将如何有利，不是显而易見的嗎？这样的情况对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将造成如何有利的形势，岂不也是一目了然的嗎？

的确，印度的工业力量被英国夺去了，但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輸出方面不是大有所获嗎？以前在印度首領統治下的战爭不是停止了嗎？印度各邦的王侯不是非常富裕嗎？他們不是依然保有大量的私人收入嗎？他們不是从此不必再为政务操心，放下了那副沉重的担子了嗎？

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們这样提出問題，是模仿着象亚当·斯密一类人的强詞夺理的作風的——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亚当·斯密虽然竭力否认貿易平衡的存在，却认为另有一种現象是存在的，这种現象他叫作一国的消費与生产之間的平衡，但是經分析以后說明这一点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实在就是我們所說的貿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輸出与輸入，如果彼此大致相平衡，就国內交换方面来說，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費的在价値上并沒有十分超过它所生产的；如果一个国家累年輸入的国外工业品，在价値上远远超过它自己农产品的輸出，象近年来美国所发生的現象那样，那就可以确信，就国际交换方面来說，它对于国外工业品的消費，在价値上远远超过了它本国的产品。法国在1786年到1789年、俄国在1820年到1821年以及美国从1833年起发生的恐慌，所証明的不是这一点是什么？

有些人把貿易平衡的整个理論看成是已經被駁倒了的无稽之

談，在結束这一章时，对这些人我們要提出几点疑問。

如果发生了确凿而持久的不利的貿易差額，存在这种現象的国家(殖民地除外)，不論在公共信用机构方面或是在各个商人、工业家或农业經营者方面，就必然地、毫无例外地要遭到国內商业恐慌、价格剧烈变动、財政困难和普遍破产的損害；这是什么原故？

在那些在貿易差額上保持着明确优势的国家所看到的情况，就与上述的完全相反，如果同它們有着商业关系的国家发生了商业恐慌而使它們受到不利影响时，这种現象也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什么原故？

俄国自从对所需要的工业品絕大部分能够自己生产以来，就能明确地、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貿易差額，从此以后，就沒有听到在那里发生过經济动乱現象，从此以后，那里的繁荣程度就年年有所提高；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也是这样，同样的前因总是发生了同样的后果；这是什么原故？

美国自从实施了"折衷方案"以后，工业品輸入激增，接連好几年发生了极度不利的貿易差額，跟着就在国內經济上发生了那样大規模的、連綿不断的动乱；这是什么原故？

我們看到美国現在是充满了各种农产品如棉花、谷物、烟叶、牲畜、谷物等等，价格到处低落了大約一半，然而它却无法使它的出口与进口相平衡，从而偿还对英国的負債，把它的信用关系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貿易平衡这个說法是不成立的，貿易差額不論是順是逆是无所謂的，貴金屬流出国外是多是少是无关重要的，那么英国遇到农产歉收的时候(只有遇到这个情况，才会使它发生不利的貿易差額)，为什么要战战兢兢，想尽方法促使进出口相平，輸出或輸入每一盎司現金或現銀时都要小心估量，它的国家銀行对于貴金屬

的輸出要那样关切地加以防止，对輸入要那样地加以鼓励；貿易平衡既然是"被駁倒了的无稽之談"，为什么这个时候却沒有一家英国报紙不是在热烈討論着这个"被駁倒了的无稽之談"，把它当作对国家具有极重大关系的問題；我們要問，这是什么原故？

在美国，同样的人們，在折衷方案实施以前把貿易平衡說成是无稽之談，而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就不得不把这个无稽之談說成是对国家最关重要的問題；这是什么原故？

既然自然趋势总会使每个国家获得恰好是它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貴金屬，那么英格兰銀行又何必还要用限制信用与提高貼現率的办法来試图轉变这个所謂自然趋势，使这个趋势对它自己有利，以致美国銀行在輸入还沒有能减少到大致与輸出相等的时候，不得不时时采取停止付現措施；这是什么原故？

# 第二十四章　工业与事业的稳定及存續原則

我們假使考察一下工业各个部門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就会发現，它們那些改进的操作方法、生产的有利条件、机器建筑、經驗技术以及使它們能够有利地购入原料、有利地銷售产品的知識和交往关系，都是逐漸累积起来的。我們可以大胆地說，在通常情况下，改进和扩充已成的事业要比創立新事业容易得多。到处看到的情况是，經过了好几代的老商店賺的錢总比新鋪子的多。凡是在国内已經成立的性质相类的工业部門为数越是少，要創办一个新企业就越困难；因为在这样情况下，所有管理人、监工和工人必須在国内先行訓练，否則就得向国外招請，而事业兴办以后是否有利可图，既然沒有經过充分考驗，資本家就不免缺乏信心。如果将任何国家各类工业在不同期間的情况比較一下，我們就会随处发

現,这些工业如果沒有意外原因使它們受到損害,让它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那么不但在价格的低廉方面,而且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会表現显著的进步。相反地,如果由于外在的有害原因,如战爭、地方上的劫掠等等,或者如专制政府的虐政或狂妄措施(例如南特敕令的撤銷),也可以使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或工业的某些部門后退几个世紀,因此反而落在以前在工业上赶不上它的那些国家的后面。

这是任何人一想就可以明白的,就一切人类制度来說是这样,就工业来說也是这样,其間有一个自然法則,同劳动分工及生产力联合的自然法則很相类似,是所以能在这些方面获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因素;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則,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一連几个世代的力量会适当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地、同样地参加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則,所以在世襲王位的情况下,对国家力量的存續与发展,比在选举王位經常更換統治皇族的情况下,不知要有利多少倍。

凡是长期处于适当組織的立宪政体下的国家,在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方面就会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就,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一自然法則的作用。

只有借助于这个自然法則,印刷术发明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才能获得部分的解釋。印刷术首先使人类在知識和經驗上的所得有可能比較用口傳方法进一步妥善、完整地傳給后代。

有的古代国家有不同种姓的阶級区别,古埃及还有过这样的法律,子孙必須继承上代的衣鉢,从事于同样的行业或职业;所以会有这类制度,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对这一自然法則的认識。在印刷术沒有发明与推广以前,为了使技术与行业得以存續与发展,这样的規定看来似乎是不可少的。

行会和同业公会部分也是由于这样的考虑而来的。技术与科学之所以得以存續幷取得进步,所以能代代相傳,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古代国家的僧侣阶級,归功于寺院和大学。

过去的教团、騎士团以及教皇职位所以会获得那样大的权力和声勢,正是由于它們所向往的总是同一个目标,后一代总是在继續努力于前一代未竟的事业。

从物质成就的方面来看,这一原則的重要就更加明显。

各个城市、寺院和社团在建立各种事业方面所支出的費用总計,也許比它們当时所有全部財产的价值还要大。只有世代相傳,把积蓄专門用在同一偉大目标上,才能汇成这样大的財力。

我們可以看一看荷兰的运河和堤防系統,这是好几代的劳力和积蓄的結晶。一个国家的运輸系統或防御工事系統是要經过好几代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国家公債制度是近代政治最巧妙的一种創造,对国家来說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手段,使这一代的成就和努力所費去的代价得以分攤到以后几代;这里所說的成就和努力为国家产生的利益,指的当然幷不是一时的,是长远存在的,由此使国家的存續、发展、偉大、权力与生产力的增长获得了保証。但是如果把公債作了不适当的利用,用于对国家无益的消耗,因此对后代的进步不但不起推进作用,而且事先剝夺了后代从事于国家偉大事业的手段,或者把支付公債利息的負担,不是加在資本的方面,而是加在劳动阶級消費的方面;只有这样做,这个制度才会成为禍胎。

国家公債是現在一代对后代开出的支票。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专为这一代的利益,可能是专为后代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两者的共同利益。这个制度只是在上述第一个情况下是应当反对的。但是如果目的是在于維持与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資力不是这一代的力量所能胜任,因此借助于发行公債

这一手段时，这一类情况都屬于上述末一范疇。

就現在一代的支出来說，再沒有比改进交通运輸工具方面的支出更加絕对地特别有利于后代的，这是因为这类事业，除了一般总是能使后代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以外，随着时間的进展，还能够不但为所費的成本按照不断增长的比率滋生利息，而且产生紅利。由此可見，現在一代不但有理由把这类事业的主要經費和它的适度利息(当事业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时)推給后代負担，而且如果把負担、甚至負担的相当部分加在自己肩上，那就是对自己、对国家經济的眞正基本原則有欠公道。

当考慮到国家生产事业的存續这个問題时，如果仍然回到构成生产事业的主要部門、工业和农业的方面，就可以看出，虽然对农业来說，存續問題也很关重要，然而这个生产部門如果发生了中断状态，比較工业处于同样情况时，受到的損害要輕得多，損害的性质也沒有那样明确，而且对于不幸的后果进行补救时，也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

农业受到的損害或发生的中断情况不論怎样严重，农业經营者个人实际的需要与消費，从事于农业时所需技巧与知識的普及以及操作方法与所需工具的簡单，都足以使农业不致于完全停頓。

即使受到了战爭的蹂躪，它也会很快地重整旗鼓。不論是敌人或国外竞爭者，总不能把农业的主要手段土地拿走；要使良田变成荒地，或使乡村人民失去經营农业的能力，也得經过一連好几代的不断迫害才会落到这样地步。

工业的情况就不同，即使是极輕微的、为时极短暂的間断，也会发生严重影响，如果間断的时間稍久，就会成为致命伤。任何工业部門，进行时所需要的技术与才能越多，所需的資本数量越大，办理这一工业时所投資本陷入的程度越深，一旦发生停頓，所受到的損害就越大。这个时候机器和工具的价值等于廢鉄和木柴，厂房

成为廢墟，工人和技工不得不流徙到別的地区或靠农业工作維持生活。于是只有經过几代的辛苦經营才能建成的生产力与財产的一个复杂組合，頃刻之間就会化为烏有。

工业的每一部門总是靠了整个工业的确立与存續而誕生的，反过来它又对許多別的部門起了促进与支持作用，使它們欣欣向荣；同样的道理，一个工业部門的傾覆，总是別的許多部門不能继續存在的先声，最后就会动搖国家工业力量的主要基础。

整个工业稳定的存續这一現象是会发生巨大效果的，工业发生了間断状态，受到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正是由于坚信这两点而不是由于工业家和商人的叫囂或他們对特种权益的自私要求，才引起了为本国工业采行保护关税的打算。

当保护关税也无济于事，或由于缺少出口貿易使工业不免遭到损失，或工业发生了停滞現象，政府方面也沒有任何补救方法——当遇到这类情况时，我們往往看到工业仍然会勉强掙扎，在实际亏損的情况下继續生产。它們宁可忍受牺牲，靜待时机好轉，它們要避免的是事业一旦中断以后就不免要遭受到的无可挽回的損失。

在自由竞爭中往往会使用手段，想迫使对方工业家或商人往往在实际亏本的情况下以合法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他难以支持，使他的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廢。这里的目的不仅是在于免使自己的事业发生停頓危險，而且是要迫使別人放弃他的事业，希望自己将来能按更高的价格出售产品，使已有的損失获得补偿。

总之，追求壟断地位这一观念，构成了工业本质的一个部分。这就使保护政策不是不足取，而是有了必要。因为这样的竞爭活动如果只是限于国内市場，是足以促使价格降低，促使生产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的；如果压力是来自国外的雄厚势力，受到排挤的是本国工业，那么同样性质的竞爭活动，就会使本国工

业发生停頓状态而趋于崩潰。

工业生产除了資本上的限制与銷售手段上的限制以外，它的发展是沒有限制的，自从有了机器，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支持与促进以后，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經继續发展了一个世紀，累积了龐大的資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規模信用机构发揮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輸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場；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毀灭性战爭。在这样情况下，别的国家就不可能仅仅由于在农业上的进步，"在自然趋势下"(那是亚当·斯密說的)建設大規模的工业和工厂；就是由于战爭所造成的商业停滞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工业，也不可能"在自然趋势下"使自己得以长期保持。为什么一个孩子同一个壮汉角力时沒有获胜希望，甚至无法試图作有效抵抗，同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构成英国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工业，与别的国家那些新生的或半成长的工业相比，具有数不清的有利条件。英国工业能够获得人数最多、工資最低而又有技巧、有經驗的工人，能够获得头等的技术人員和监工、最完美而代价又最低的机器，买进卖出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当购入原料或售出成品时能利用代价最低的运輸工具；它的工业家与銀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时，能够按最低利率获得比較扩大的信用关系；它有高人一等的商业經驗、商业关系、策略、計划，有高人一等的工具和建筑物，这些都是只有經过好几代的經营，才能累积起来，建立起来的；它有广大的国內市場，还有同这一点可以媲美的是，它有同样广大的殖民地市場。因此，英国工业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大力推銷大量工业品时，在这一点上总覚得是有把握的，他們事业的继續存在是有保障的，他們如果对某一国外市場要加以控制时，尽可以用賒銷办法，期限可以长至数年，他們在这方面所拥有

的手段是丰富的，神通是广大的。我們如果把这些优点，一个一个地屈指算一算，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要在自由貿易下，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趋势”的作用，同这样一个偉大的力量从事竞爭，簡直是愚不可及。拿我們这方面的情形来說，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員还有待訓练，机器工业和适当的运輸工具还在建設中；这里的工业家即使在国內市場也还沒有站稳脚步，更不用說什么出口市場；这里的工业家所能获得的信貸，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数額也是极小的；这里的人对于市場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使一天也沒有把握，由于英国的商业恐慌或銀行措施，随时可能有大量的国外商品会涌入国內市場，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在所用原料的价値之下，因此也許会使我們自己的工业一連好几年不能获得进展。

象这样的国家，如果听任自己对英国的工业优势处于永久屈从地位，更沒有別的奢望，只是想对于也許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或不能向別处取得的东西能有所供应，就心滿意足，这样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就是甘心处于这样的屈从地位，也不能使这些国家获得永久利益。試問，美国牺牲了最富饒的、文化最高的那些自由劳动州的幸福，也許还牺牲了整个国家的偉大前途，只是为了便于向英国供应原棉，这对美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制止英国不再企图向世界別的地区取得这項原料？德国人用最上等羊毛向英国換取所需要的工业品，如果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那是痴心妄想，这样的政策是絕对不能阻止澳洲的精美羊毛在以后二十年間泛濫整个欧洲市場的。

一旦发生战爭，这样的国家就要失去向国外售出农产品、从而失去向国外购入工业品的一切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时，这种仰人鼻息的情况，就更加可悲可叹。在这样的时候，一切經济考虑和經济制度就无从談起。这时促使这些国家由自己来进行农产品加工、放弃敌人的工业品的，是自給、自卫的原則。处于这样的局势下，采

取这样的战时禁止制度，不論要遭受多大損失是在所不計的。但是农业国家在战爭期間，为了建立工业，无論尽了多大力量，作了多大牺牲，到了和平恢复以后，国外的工业优势竞爭力量又将咄咄逼人，这类在必不得已时的辛苦經营又将归于毁灭。总之，这是一个建設与破坏、幸福与灾害的无穷无尽的交替过程；有些国家，由于沒有实行劳动上的分工，沒有把自己的生产力联合起来，因此它們的工业是否能世代相傳，永久存在，就沒有保障，象这样的国家就得忍受这种痛苦經驗。

## 第二十五章 工业与生产及消費誘因

在社会中，人是能生产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能直接生产产品或創造生产力，而且是由于他能創造生产誘因、消費誘因或生产力形成的誘因。

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首先是对人类精神意志的趋于高尙純洁、对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須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約行为也是具有提供誘因的作用的。

书籍和报刊由于能傳布知識，就对精神与物质生产发生了作用，但要获得这些东西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就它們所提供的享受来說，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一种誘因。

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是在精神上提高社会；試看做父母的为了能有足够資力使他們的子女获得优良教育，化費着多大的气力！

試看在精神与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有多么广大的活动是出于一种动机，要想置身于上流社会！

我們可以住在一所別墅里，也可以同样地住在一个木板搭的

小屋里，我們化几个佛罗棱(florins)①买一件衣服，同最考究的衣服一样的可以蔽体御寒。用金銀制成的装飾品和器皿，同用鉄与錫制成的比起来，在使用上并沒有什么高下之别，但与对前者的占有有关的那种荣誉感，对于身心的努力，对于节約，却形成一种誘因；社会大部分的生产力就是因这种誘因而产生的。即使是单靠私产生活的人，他的活动无非是对他的收入进行保存、增进和消費，但是他对精神与物质生产也会在多方面发生作用：首先，由于他的消費行为，对于艺术与科学以及各种技术行业作了支持；其次，可以說，他是在发揮着作为社会物质資本的保存者和增加者的职能；最后，由于他在生活上的表現，足以激起社会一切其他阶級的竞胜情緒。当学校实行奖学金办法时，虽然得到奖励的只是限于少数，但是全校都会因此受到鼓励而努力学习；同样的道理，巨大財富的占有，以及与这一点結合在一起的体面外表与生活作風，对文明社会也会发生鼓励作用。当然，如果大宗財产是由侵占、勒索或詐欺而来，或者关于財产的占有与享受不能公开显示，那就情况不同，就不能发生这里所說的鼓励作用了。

工业所生产的，倘不是生产工具，就是滿足生活需要的資料与供作夸耀用的資料。后两者往往是結合在一起，无从辨别的。社会上的等級不同，生活作風也各不相同，在飲食与衣着方面，在一切装配的奢华程度方面，在所雇僕役的人数、质量与外表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商业性生产水平較低的地区，这种差别是很細微的，就是說，大家的生活情况都很差，穿得都很簡陋，看不到什么爭强斗胜的現象。这种差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程度而日益显著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虽然所消費的工业品质量高低有着千差万别，但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穿得很体面。凡是覺得自己有一些工

① 英国銀币，价値两先令——譯者。

作能力的人，沒有一个願意在外表上露出寒酸模样。所以工业由于它所提供的誘因，起了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而农业所有的只是簡陋的家庭工业与原料及粮食生产，是不能提供这样的誘因的。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間当然是大有差别的，人人总是想吃得好些，但进餐时并不一定是当着大众的，德国有一句俗語，"人們看見的是我的衬衫領子，不是我的肚皮"。如果我們从小就习慣于粗糙簡单的飲食，就不大会想到要吃得好些。所消耗的食品如果只是限于周圍极近地区所生产的那一些，范圍就非常狹窄。溫带国家消耗食品的范圍，首先是由于能够取得热带产品而扩大的。但是在食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要想积极扩大与提高，要想使全国人民能普遍享受，那就象我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只有靠了工业品的国外貿易才能实現。

殖民地产品，除供工业用原料外，供食用的显然以刺激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沒有人会否认不带糖的大麦咖啡与带糖的摩加(mocha)咖啡同样有营养价值，但即使也认为两者都具有一些营养价值，它們在这方面的价值还是很不重要的，不能认为可以代替本国的粮食。至于調味香料与烟草，当然純粹是刺激品，主要只是由于在大众的生活愉快方面能有所增益，从而对身心劳动能发生刺激作用，因此产生了对社会有用的效果。

在許多国家里那些靠薪金或地租收入生活的人，对于他們所慣常称为下层社会奢靡习慣的那类現象，有着极錯誤的想法。这些人看到以前只喝些麦片粥就心滿意足的工人，現在却喝着加上糖的咖啡了，就感到震惊；他們看到那些庄稼汉脫下了手織的粗毛衣服，換上了用精細呢絨制的衣服而不胜叹惜；他們說将来一个女佣的打扮同她的主妇也許要分不清了；古时在各个阶級的服装上是有限制的，他們对于这一点贊美不置。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工人，由于劳动的結果，吃得好、穿得好，就同有錢的闊佬一

样，而有些国家的工人，也是由于劳动的結果，却不能不自安于粗衣淡飯；如果我們把两方面劳动的成果比較一下，就可以发現，前者的享受并不是由牺牲公众的福利而来的，而是由于对社会生产力所作出的貢献。在前一情况下工人一天的工作成果，比后一情况下的要超出一倍到两倍。假使在服装上要規定等級，在奢华享乐方面要加以限制，那就会破坏社会大众健康的竞胜心情，徒然使社会上身心怠惰的現象获得滋长。

无論如何，必須先有产品，然后才能加以消費，因此生产一般地必然在消費之前。但是就通常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說，消費却往往先于生产。工业国家有着大量資本的支持，而在生产上所受到的限制比純农业国家为少，因此往往以未来的收获为依据而对后者預作支付，这样就使后者的消費先于生产，后者只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消費，才随后从事生产。在城市与乡村之間的关系上也有着同样情况，而范圍更加扩大，工业家与农业經营者越是接近，則在消費刺激与消費手段方面，前者对后者所提供的就越大，后者在扩大生产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

对生产与消費能給以最有力鼓励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有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个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努力和成就从社会的一个阶級上升到另一个阶級，从社会的最低阶級上升到最高阶級；有錢的人怕露富，也不敢公开享受，惟恐他的財产受到危險或引起指責，說他自尊自大，或被人嫉視；做生意的人在社会上得不到荣誉，毫无光彩，国家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也沒有他的份；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有了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敬，不能由此博得任何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說，不論在生产或消費方面，最有力的动机并不存在。

每一条法律，每一种公共規章，对生产、消費或生产力，总是起加强或削弱的影响的。

专利权的授与是对于发明創造的鼓励。由于希望获得这样的奖励，就激发了精神力量，使这种力量走向工业改进的方向。这种奖励制度使創造能力在社会上能获得荣誉，根絕了在落后国家为害那样大的坚持旧习慣、旧方式方法的偏見。这种制度为除了发明天才别无所有的那些人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因为資本家既已有了把握，曉得同这样的人合作可以分享預期利益，就会受到鼓励，去支持发明家。

有些工业品在本国也能生产，但在国外生产时比在本国处于比較有利的地位，保护关税对于生产这类工业品的本国工业起了鼓励作用。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企业家和工人于学习新知識、新技术能够获得报酬这一点有了保証，对国内与国外資本家如何于投資后在确定时期内能享有特别利得这一点指出了一个途徑。

## 第二十六章　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促进国内工业的手段、方法是种种不一的，凡是在效力上、应用上沒有疑問的那些手段、方法，都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內。举几个例子，比如教育設施（特别是技术学校）、工业展覽、优良成就奖励、交通运輸改进、专利法等等，总之，凡是目的在于促进工业、促进与調节国內外貿易的那些法律与制度，都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我們在这里所要談的，只是作为发展工业手段的关税制度。

根据我們的理論，对輸出加以禁止或征税只能看作是例外情况，对于自然产物的輸入只应当課以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关税，决不应当課以以保护本国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关税。在工业国家征收收入关税的对象主要是由热带来的奢侈品，不是谷物、牲畜等

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在热带地区，或者是人口較少、疆土較小的地区，或者是人口还不十分稠密的地区，或者是在文化上、在社会与政治制度上还十分落后的地区，对于工业品的輸入只应征收收入关稅。

但任何种收入关稅都应当有相当节制，不可使輸入和消費因此受到限制；否則不但将削弱国内生产力，而且也将使增加税收的目的受到挫折。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闊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資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发展，因此有資格与第一流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軍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輸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輸入，或税率較前者略低，从而对輸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沒有一个是絕对有利或絕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适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

战爭对于保护制度的选擇有很大影响，因为战爭往往使国家处于被迫的禁止制度之下。在战爭期間，交战国之間的交易停頓了，每个有关国家，不論它的經济状况如何，都不得不爭取自給自足。因此，一方面是在工业上比較落后国家的商业，另一方面是最先进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两者在这个时候都会受到极大鼓励。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方面，尤其是当战爭延长到数年之久时，在工业上就会获得相当进展；有些工业品的生产是无法与最先进工业国家从事自由竞爭的，只是由于战爭所引起的隔离状态而使这类工业获得了发展，这就会引起一种形势，在和平恢复以后，这种隔离状态如果能仍然继續一个时期，对这类工业将有很大好处。

在这次普遍和平恢复以后，德国与法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假使在1815年，法国同德国、俄国和美国一样，听任英国竞爭势力为所欲为，它也将遭到与这些国家同样的命运；在战爭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絕大部分将一敗涂地；它从那时起在一切工业部門、国外貿易、內河及海外航运、国内运輸工具改进、地产价值提高（按法国这时的地产价值約提高了一倍）、人口增长与国家岁入增加这些方面的进展，就不可能有实現的希望。这个时候，法国的工业还在幼稚时代，国內只有少数的运河，矿山还很少开发；由于政治动蕩与战爭，还不能大量累积資本，充分培养技术人才，还沒有足够数量的眞正合格的工人，或者說，工业与企业精神还沒有产生；全国意向所注还比較的偏于战爭局势，不是和平事业；在战时勉强累积起来的少量資本，还是主要用在农业方面，而这时的农业也已經极度衰落。于是法国初次看到了英国在战时已經获得了多大的进步；它第一次有了可能从英国輸入机器、技工、工人、資本和企业精神；它了解到为了使本国工业能独占本国市場，需要发揮最大力量，需要利用全国所有的天然資源。这种保护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再沒有別人，只有盲目的世界主义者，对这些效果才会視若无睹，才会說，法国在与别国进行自由竞爭时能获得巨大发展。德国、美国与俄国的經驗，不是已經极端明确地提供相反的証明了嗎？

我們认为法国从1815年以来所施行的禁止制度对它是有利的；但是它在保护政策的推行上是过火的，有缺点的，继續保持这种过火的保护政策又有什么效用和必要；我們幷不想从上述禁止制度是有利的这一論点出发，为它在这方面所犯的錯誤作辯护。法国用进口税限制原料与农产品（如生鉄、煤、羊毛、谷物、牲畜）輸入，这是一个錯誤；如果它在工业力量充分强大、有了稳固基础以后，不願意回复到比較緩和的保护制度，从而允許有限度竞爭，激发国內工业家的竞胜情緒，这将进一步鑄成大錯。

各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不同，有的打算从自由竞争过渡到保护制度，有的认为应当从禁止政策轉变到溫和的保护制度，談到保护关税时，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两种情况应有所区别；在前者的情况下，开始时税率必須比較低平，然后逐漸提高，在后者的情况下則相反，必須由高額税率逐漸降低。

假使一个国家，原来在关税方面沒有充分保护，現在感到有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要，就应当首先努力发展生产一般消費用品的那些工业。主要是因为这类工业品总値比代价較高的奢侈品总値要大得多。这类工业能够使大量天然的、精神的及个人的生产力活跃起来；而且由于在創办时需要大量資本，这就会对于資本的大量蓄积发生鼓励作用，会促使外国資本以及种种力量共同来加入协作。由于在文化上比較落后的国家主要所需的是供大众使用的工业品，溫带国家所以能与热带地区进行直接交換，主要原因也是在于能够生产这类工业品，因此这类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力地促进人口增加、国內农业繁荣、尤其是对外貿易的进展。假使一个国家，它自己还要輸入棉紗与棉織品，就不能与埃及、路易斯安那或巴西发生直接貿易关系，因为它无法供应它們所需要的棉制品，也无法吸收它們的原棉。还有一层，这类工业品由于总値巨大，因此特别有利于促成一国輸出与輸入在大体上趋于均衡，从而使国家能始終保有它所需要的通貨量，或者說，能以此作为一个手段，使国家获得通貨供应。国家所以能贏得并保持在工业上的独立地位，只是由于这类工业能获得长期发展；一旦发生了战争，原来的国际商业关系被破坏，如果受到阻碍的仅仅是高貴奢侈品的购入，就不会发生重大困难，否則如果一般使用的工业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漲，以前大量农产品的銷售业务突然中断，就必然会引起严重灾害。还有，那些走私或虛报貨値的偷漏关税行为，就这类一般使用的工业品来說，可虑的程度要比高貴奢侈品輕得多，要容易防止得

多。

施行保护关税的目的总是在于为国家謀福利，但是工业就象树木一样，不能頃刻涌現，是要逐漸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保护制度，如果仓猝之間，雷厉風行，突然割断了原来存在的商业关系，就必然对国家不利。这类关税只应当随着国内或从国外吸引来的資本、技术才能和企业精神的增长比例而提高，只应当随着国家对于原来专供輸出用的那些剩余原料与天然产物能够改由自己利用的进展比例而提高。但是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进口税提高的尺度应当事先决定，使国内的或由国外吸引来的資本家、技术人員和工人的报酬可以获得可靠保証。这种关税尺度一朝确定以后即不容反复，在未到期以前不能降低原来規定的标准，因为只要对这类毁約行为稍存顾虑，就足以大大破坏报酬的保証效力。

从自由竞争轉变到保护制度时进口税应当提高到什么程度，从禁止制度轉变到緩和的保护制度时又应当降低到什么程度，这些是不能从理論上来决定的，这是要看比較落后国家在它对比較先进国家所处关系中的特有情况以及相对情况来决定的。試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它所必須特别加以考虑的因素是原棉对英国的輸出，农产品及海产品对英国殖民地的輸出以及国内的高度工資水平；它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值得考虑的是，它有可能把英国的資本、企业家、技术人員和工人吸引过来，关于这一点它比任何别的国家更有把握。

在一般情况下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如果任何技术工业不能用原来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保护税率建立起来，不能靠了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税率的不断保护下持久存在，那就缺少工业力量的基本条件。

在工业建設的方面所以会缺乏基本条件，原因是种种不一的，要改正这些情况，有些比較容易，有些則比較困难。比較容易改

正的一类是，国内交通运輸工具的缺乏，技术知識、有經驗工人与企业精神的缺乏；比較难于改正的一类是，在人民方面刻苦耐劳精神、重視公道精神、以及文化、教育与道德的缺乏，健全有力的农业系統、因此也就是物质資本的缺乏，政治制度的不良，公民自由与法律保障的缺乏，还有一点是領土地形散漫，无法制止走私买卖。

那些仅生产高貴奢侈品的工业，只需要最低度的照顾与保护；这首先是因为这类生产需要技术上的高度造詣与熟练；其次，这类生产的总値与全国总产値对比是不会大的，輸入以后，很容易用农产品与原料或供一般使用的工业品来抵偿；再次，如果在战爭时期輸入中断，不致因此引起太大的不便；最后，如果对这类产品征税过高，极容易通过走私来逃避这种高率关税。

凡是在专門技术与机器制造方面还沒有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輸入应当允許免税，或只征收极輕的进口税，直到在机器生产上能与最先进国家并駕齐驅时为止。在某种意义上說来，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对国外机器輸入征收关税，实际上就是限制国内工业的发展。机器工业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既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一个国家在机器供应上不应当受战爭所造成的机会与变动的支配，这一特种工业如果在溫和的进口税下不能与竞爭势力相抗，就有权向政府要求給以直接支持。如果这一工业获得了維持与发展，在战爭开始时，对需要最迫切的一些工业用机器就可以进行供应，如果由于战爭关系，使国际商业活动受到了較长期的間断，已存在的机器工业对新成立的同业就可以起示范作用。由此可見，从应付可能由战爭引起的变局来看，国家对于这一工业至少应予以鼓励并予以直接支持。

至于退税办法，按照我們的理論观点，只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适用：有些仍然要从国外輸入的半制品，例如棉紗，为了使本国逐漸能自己生产，必須課以很重的保护关税，只有对于这类产品，才应

考虑退税。

为了使本国工业品于輸出后能够与先进国家的工业品在局外的中立市場相竞爭，而用奖励金作为經常办法，这是应当反对的；如果以此为手段，使本国工业品得以占有在工业上已經有了进展的那些国家的国內市場，这样的行动就更加应当反对。但是在有些場合，以此作为一个暫时的鼓励手段还是可以的。例如国家的企业精神萎靡不振，当精神恢复的初期，只須从旁加以鼓励与帮助，就可以使生产获得加强与持久的力量，从而对那些自己工业还沒有获得发展的国家推进出口貿易，在这样情况下暫时施行奖励办法，就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但即使在这类情况下，政府对下列問題仍須郑重考虑：对企业家个人給以无息貸款及其他特别权益这种办法是否值得采取；或者对在冒險精神下創立新事业的这类公司，从国庫撥支款項作为公司所需資本的一部分，从而使参与公司經营的个人所投資本获得特惠利益，这种办法是否更符合于促使公司及时成立的目的。关于上述冒險事业我們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从事于对商业关系上个人还沒有获得联系的那些遙远地区发展商务与航运的試探性企业，如从事于对遙远地区建立新航綫或开辟新殖民地等等。

## 第二十七章　关税制度与流行学派

流行学派在保护关税的作用这一点上，对天然或原始产物与工业品这两者是不加区别的。它从这种关税对原始或天然产物的生产总是有害的这一点出发，得出了錯誤結論，认为这种关税对工业品生产也具有同样有害的影响。

有些国家是不宜于发展工业的，有些国家則由于国家領土的

性质、农业的充分发展与文化的提高，由于在它們前途的发展以及持久与强盛方面有充分的保証，因此显然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工业；这两类国家的情况不同，而流行学派对于这两类国家建立工业的問題則不作任何区别。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資格发展工业，如果沒有保护关稅，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掙得圓滿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沒有能看到这一点。

它沒有考虑到战爭对保护制度必要性所发生的影响；它尤其沒有能看到的是，战爭造成了强迫的禁止制度，而海关的禁止制度不过是在战爭下引起的那种禁止制度的延續。

它企图用自由的国內貿易所产生的利益作为証据，以此来証明，只有在絕对自由的国际貿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达到最高度强盛地位；但历史經驗处处所証明的却与这一点恰恰相反。

它认为保护制度足以造成国內工业家的壟断地位，从而引起怠惰情緒；它不懂得一直存在着的国內竞爭，对工商业者的竞胜心情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

它要使我們相信，对工业品征收了保护关稅以后，工业家由此所得到的好处是牺牲了农业經营者的利益而来的；但是事实証明，有了国內工业，国內农业經营者就由此获得了莫大利益，至于他們在保护制度下所不能避免的一些牺牲，比起所得的利益来，簡直是极其微小的。

流行学派又把海关費用与非法买卖活动所造成的弊害作为反对保护关稅的主要理由。这些缺点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保护制度对国家的生存、权力与繁荣这些方面既有着那样的巨大影响，相形之下，这些缺点果然是值得严重考虑的嗎？假使說常备軍和战爭都是有害的，难道由此就可以构成国家不再重視国防的理

由嗎？假使說保护关稅远远超过了走私者平时所能获得的利潤限度，因此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实际沾得利益的是非法买卖，不是本国工业家；这样的說法只能适用于腐败的海关机构，或領土窄小、国境有欠完整的国家，或在边疆地区的消費，或对体积不大的奢侈品所征收的高額关稅。

到处的經驗都足以証明，只要是在領土广大而完整的国家，有着管理严密的海关組織，有着設計完善的稅制，非法买卖是妨碍不了保护关稅的目的的，是起不了什么重大的破坏作用的。

至于談到海关組織的費用問題，那末即使把这个保护制度取消，于征收收入关稅时，也必然还是要負担这項費用的大部分；假使說大国可以取消收入关稅，那就是这个学派自身也不是这样主張的。

况且这个学派自身也并不是反对一切的保护关稅的。

亚当·斯密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对国内工业可施以特种保护：第一、如果外国对于我們运往的商品进口时有所限制，而我們采取相类措施就有希望促使它撤銷限制，可以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手段；第二、如果有关国防需要的那些工业品在公开竞爭下国內无法生产，可以此作为适应国防需要的手段；第三、如果外国产品所負担的稅低于本国产品，可以此作为一种平衡的手段。薩依对于在这些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措施一槪反对，他又举出了一个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有把握在若干年后可以获得巨大利潤、因此到那时就可以不再需要保护的某些工业部門，他认为象这样的工业才值得保护。

这样看来，主張将报复原則納入商业政策的是亚当·斯密。这一原則将导致最荒謬的措施，造成最有害的后果；特别是如果这种报复关稅象斯密所主張的那样，一旦外国同意撤銷限制，就应立刻取消，那么它所造成的灾害更将不堪設想。假定由于英国对德国

的谷物和木材征了税，后者就采取报复手段，排斥英国工业品，通过这样行动，靠了人为的方法，它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英国对报复措施有了反应，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重新开放，难道德国对于它以巨大牺牲辛苦經营起来的工业，就必須听任它付之流水嗎？多么荒唐的設想啊！这样說，在德国方面倒不如对英国的一切限制措施安心忍受，不加計較，对于卽使在英国限制进口的情况下也会成长起来的任何本国工业，不但不必鼓励，而且还可以加以阻止，这样做比上述行动反要高明十倍。

报复原则应当与国家工业发展的原则相一致，应当在这一目的上起协助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才能是一个合理的、能够应用的原则。

这是不錯的，如果英国对别国农产品的輸入加以限制，因此后者采取报复行动，对英国工业品輸入也加限制，这样的行动是合理的，而且对后者也是有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卽，只有这些国家有資格建立自己的工业，建成以后能够长期保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报复行动才能是合理的，才能对它們是有益的。

就亚当·斯密所举的第二个情况来說，根据他提出这一論点的精神，实在不仅应当保护供应战争直接需要的那些工业，如武器与火药制造业，而且应当施行象我們所了解的那样的整个保护制度；因为通过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使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以后，可以增长国家的人口、物质财富、机械力量、独立自主以及一切精神力量，因此就国防手段这一点来說，由此所获得的增长程度，比单是发展武器与火药制造业所能达到的，不知要大多少倍。

亚当·斯密所举的第三个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我們的产品的税負担較重，外国产品的税負担較輕，就可以把这一点作为对后者征收保护关税的正当理由，那么我們的工业与外国工业比較起来，还有許多别的弱点，为什么这些别的弱点就不能作为对我們本国

工业进行保护以反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外国工业的正当理由呢？

薩依显然看到了亚当·斯密所举的几个情况在內容上的矛盾，但是他所举的用以代替的那第四个情况，也未見得高明。一个国家如果在天然条件上、文化发展程度上有資格建立自己的工业，那么有了持續的、有力的保护制度以后，工业的每一部門就必然会欣欣向荣，有利可图；如果对一国的某一重大部門工业或整个工业的完整发展，只許給它短短的几年时間，就象对付一个鞋匠的学徒，应当限他在几年內学成制鞋手艺一样，这样的設想未免可笑。

流行学派为了要說明絕对自由貿易的尽善尽美，保护制度的有害无利，为了要把这一点說成是顚扑不破之理，慣于援引几个国家的情况作为例証。它曾以瑞士的經驗为例，証明沒有保护制度，工业也可以获得发展，絕对自由的国际貿易是国家繁荣的最可靠基础。它又把西班牙的遭遇作为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告訴大家，想求助于保护制度的国家，会落到怎样慘痛的下場。我們曾在前面一章里說明，英国的事例是一个絕好的榜样，一切有資格发展工业的国家，可以由此获得教訓，向它仿效；但是流行学派的理論家却别有用心，竟然利用这个国家的事例来支持他們的論点，认为工业生产这种能力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天賦才能，就象制造勃艮第酒的能力一样，认为英国在这一点上的禀賦特厚，高出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它应当专力从事于发展工业和大規模商业，这种能力是天賜的，这样的任务是生来注定的。

現在让我們对这些例子作一比較仔細的考察。

談到瑞士，首先必須說明，它幷不具备国家的本质，至少就領土的大小来說，幷不能算是一个大国，只是几个自治区的集合。它被禁閉在三个大国之間，沒有海岸綫，缺乏努力从事于建立本国海运业或与热带地区直接通商的一切誘因，也无需注意到建立海軍或开拓殖民地。瑞士現在所享有的极有限的繁荣，它的基础还是在

附屬于德意志帝国的时代打下的。从那个时候起，它几乎一直沒有发生过內訌，資本就一代一代地累积起来，而在各自治区政府的开支方面，則对这項資本并沒有什么需要。近几百年来，欧洲由于战爭、革命、专制虐政以及种种痴迷狂妄的举动，禍乱不絕，而瑞士則置身事外，因此那些不能在本国安居的人，想把他們的資本和才能迁移到别一国家时，瑞士就成了他們的避难所。这个国家就这样从国外获得了大量財富。德国对瑞士从来沒有采取严格的商业限制，这就使后者大部分的工业品在德国找到了市場。况且瑞士的工业向来不是屬于全国性的，所生产的又大都不是普通用品，而是以奢侈品为主，因此很容易私运到邻近各国或比較遙远的地区。它所据地势又最适宜于經营中間貿易，在这一点可以說它是居于特别有利地位的。还有一层，瑞士人对于他們三个邻国的語言、法律、制度与一切情况的嫻习与精通，有着极好的机会，这一点对于他們經营中間貿易方面以及任何别的方面，应該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与教育的普及，喚起了瑞士人的活动力与企业精神；他們因为供应本国人民的国內农业和国內資源范圍狹窄，就不得不向国外求发展，在那里通过兵役、商业以及各种各式的工业活动，累积了財富，然后把这些財富带回祖国。他們就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获得了精神資源与物质資源，从而发展了生产奢侈品的少数工业部門，这些工业只是靠了向国外运銷产品，并沒有借保护关税之力，就获得了自立。但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援以为例的，大国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这样的政策大国也可以仿行。瑞士作为一个小型国家，开支不大，有它独具的方便之处，大国要想达到这样的地位，除非把自己分解成若干自治区，可是这样就要使国家受到国外侵襲的危險。

西班牙百般的防止貴金屬出口，它自己对于这类商品已經有了丰富的生产，已經有了那样大的剩余量，而还要这样做，这实在

是一个愚蠢行动，是任何懂得些道理的人都要这样說的。但是如果把西班牙工业的衰落，国家繁荣的减退，归咎于它对工业品輸入的限制，那是錯誤的。假使西班牙沒有把摩尔人和犹太人驅逐出境，从来沒有发生过所謂异教裁判那回事；假使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准許宗教自由；假使能把教士和僧侶轉变成人民的教师，把他們所有的巨大資产改作俗用，或者至少减少到足以維持他們实际生活需要的限度；假使由于这类措施能使公民自由获得稳固基础，使封建貴族获得改造，使君主政权有所限制——总之，假使西班牙也能象英国那样，在宗教改革以后取得政治上的发展，再把这种精神扩展到它的殖民地，那么施行禁止与保护政策以后，就能产生与英国相类的效果。而且情形还不止是这样，当查理五世时代，西班牙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英国和法国，当时在一切国家中只有荷兰比西班牙居于較先进的地位，假使就当时西班牙的制度和一般情况来說，其势足以把外国的人材和資本吸引到它那里，而不是把它自己的人材和資本驅逐到国外，那么靠了保护政策，荷兰經营工商业的精神就有可能轉移到西班牙，根据这一点，西班牙将大有可为。

英国的工商业优势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从何处得来的，关于这方面在第五章里已經有所叙述。

英国的商业政策对于国家天然富源所以能作最高度利用，所以能充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特别是由于它所享有的公民自由、精神自由和宗教自由，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但是誰能否认别的国家也能够使自己提高到同样的自由程度？誰又敢断言，别的国家要求获得发展工业所必需具备的手段时，就一定会被造化所拒絕呢？

就天然富源这一点来說，英国煤和鉄的藏量极为丰富，往往有人把这一点說成是英国为什么注定是工业国的一个理由。誠然，

在这一点上英国受到上天的恩惠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說，即使就这些天然資源而言，上天也并沒有单純象一个晚娘那样对待别的国家；因为别的国家对于这类天然資源所以未能充分利用，主要障碍是在于缺乏良好的运輸設备；它們有着巨大的未經利用的水力，利用时代价比汽力低；它們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其他燃料来弥补煤量不足的缺陷；有許多别的国家对于鉄的生产具有无穷潛力，而且它們还可以通过对外貿易来取得这类原料。

最后我們不能不談一談以关税互惠为依据的商业条約。流行学派对于这类协約抱有反感，认为是不必要的，有害的；然而在我們看来，这是逐漸消除各国在貿易上的限制、从而导使世界各国逐漸走向国际往来自由的最有效方法。当然，就世上已經看到的这类条約的实例来說，是不大值得仿效的。我們在前几章里已經指出麦修恩条約对葡萄牙、伊甸条約对法国产生了怎样的有害后果。这个学派所以反对商业条約，看来主要是以在条約关系下相互減低关税所发生的不利后果为依据。按照这个学派的商业絕对自由原則，执行結果应該是对締約双方都有利的，并不是使一方受到破坏，另一方获得莫大利益；但是就上述两个例子来說，实际經驗所显示的情况显然与这个原則相反。如果研究一下发生这样后果的原因，当可看出，葡萄牙和法国在結約以后，就把它們在工业上已有的成就以及在将来可望获得的成就一并放弃，造成了英国的有利地位，它們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条約的作用上，一心一意地要想由此增进它們自然产物的对英輸出，結果它們的工业就日益衰落，由工业的較高水准降落到較低水准。但是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一个国家，如果在訂立商业条約以后，为了国外的竞爭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工业，从而永远把自己束縛在純农业經济的低水准上，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行动；可是决不能由此就推定一切商約都有害无利；如果通过商約的訂立，对双方农产品与原料的交換或双方工业品

的交換都能有所促进，这样的商約就不能說是有害无利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农产品与原料的自由貿易，对一切国家在一切工业发展阶段总是有利的。从这一点可以推定，任何足以減輕或消除对这类商品自由貿易所加禁止和限制的商业条約，对締約双方必然会发生有利影响；例如由法国与英国訂立协約，使葡萄酒和白兰地对生鉄和煤的交換得以推进，由法国与德国訂立协約，使酒类、油类和干果对谷物、羊毛和牲畜的交換得以推进。这类条約对締約双方都应当是有利无弊的。

根据我們在上面的推論，保护制度必須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張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現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換而訂立互惠商約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較精細的工业品，例如高級棉織品和絲織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約的促进下由比較落后国家来供应。

如果各个国家在工业发展程度上大致相等，彼此訂立这类商約时也許更加切合需要，更加有利；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国家之間，不致发生一方占压倒优势的、破坏性或抑制性的竞爭，也不致发生使任何一方独占一切的形势，只是象国内貿易方面的竞爭那样，对彼此竞胜心情，对生产改进与成本降低，起着刺激作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法国、奥国和德国关税同盟相互之間实行征收相当低平的保护关税以后，产生的效果也許是有利而无弊的。这些国家也未尝不可与俄国訂立互惠条約，这一措施也許对有关各方都有利。这个时候它們所应当共同戒惧的只是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竞爭力量。

从这一点看来，英国在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殖民事业各方

面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对彼此关系日益密切的各个国家說来，似乎是它們当前的最大障碍；虽然同时也必須承认，英国当务力于爭取这种优势地位时，大大地增进了、而且还在每天不断地增进着全人类的生产力。

# 第三編　学派

##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的国家經济学派

在政治經济学的理論与实踐方面，意大利是一切近代国家中的先驅者。貝奇奧伯爵就意大利这一部分的文献，辛苦地写成了一个概略，不过人們对于他的著作不免存有这样的意見，认为他死守着流行理論，过于拘泥。意大利的周圍都是在世襲君主下統一起来的大国，而它所缺乏的却是国家的統一，各共和邦和城市都在教会統治之下，城市自治自由完全丧失，这些都是意大利工业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却沒有充分加以探討。假使他对于这些起因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就不会不理解到馬基雅弗利《君主論》的别有用心，对这位作者就不会只是偶然一提，輕輕略过。①

貝奇奧曾有一段記录，說馬基雅弗利在1525年給他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主張所有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封信曾傳到教皇克力門七世的手里，由此可以推想，关于在1526年成立的"神圣同盟"，他是从中很起了些作用的。我們看到了这段記录以后就想到，《君主論》那部书一定也含有同样的旨趣。随后我們翻閱了那部书，一見之下果然我們的猜想沒有錯。这部书是1513年写的，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打动梅迪奇一族，說他們負有在一个君权下統一全意大利的使命，并且向他們指出，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达

① 这位作家，当他的著作付印时正在德国游历，这时他初次听到兰克(Ranke)和格非諾斯（Gervinus）两位博士根据和他同样的观点批評了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

到这个目的。从这部书的命名和形式来看，一般意向好象是在于討論专制政体的性质，这一点显然是經过审愼考虑以后故意使出的一个手法。它对于各个世襲君主和政府，只是在不經意的态度下附带提到的。但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应当在意大利看到一位独一无二的霸主。那些諸侯統治的小邦必須推翻，必須使不同的朝代不复存在，使封建貴族屈服，将各共和邦的自由連根拔除。那位霸主为了建成一个意大利帝国，应当不择手段，不論是美德或恶行、忠勇或譎詐、聪明干练或大胆无耻、幸运或机遇，必須尽量施展和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有一个秘訣，这个秘訣发揮作用时的力量在三百年后才充分揭露，这就是必須建立一支国家的軍队，要施以新式訓练，拥有新发明武器和战术，从而保証胜利。①

就这位作家在《君主論》中一般論証的內容来說，如果认为他别有意图这一点还有斟酌余地的話，那么讀到最后一章，对这一点的怀疑就可以釋然。他在那一章里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禍害的基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与国內的分裂；认为統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这是它們的幸运)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来完成統一全国的偉大任务的；认为要成立一个新政权，目前是最好时机，一位新的摩西現在必須勃然兴起，把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作为一位君主的无上光荣、无上偉大的事业。②

---

① 馬基雅弗利不論在《君主論》出版以前或以后所写的一切，都足以表明，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样一种計划。他是一个非战斗人員，一位著作家，一位大使或政府官吏，从来沒有从过軍，他为什么对于战术的研究要这样孜孜不倦，他关于这类問題的著作簡直使当时最杰出的軍人也为之惊叹不已；这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点，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呢？

② 腓特烈大王在他的《反对馬基雅弗利主义》一书中，对于《君主論》只是作为关于一般君主权利和义务的科学論著来討論的。他对馬基雅弗利的著作逐章加以反駁，但是对于标題为"关于把意大利人从外人势力下解放出来的呼吁"的最后一章或第二十六章，却一字不提，而是插进了原作所沒有的另外一章，标題是"关于不同性质的談判和关于宣战的正当理由"，这一点是使人难解的。

任何人也可以从《君主論》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間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显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談到教会各邦时的态度。他說，"教士拥有土地，但沒有加以治理，他們对土地有支配权，但沒有加以防卫；这些人間无上乐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 如果对它們說一句批評的話，就不免会褻瀆神明。"他这番話只是一种反語。他实际的意旨，說得明白些，显然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国家，对一个勇敢的人来說并沒有什么特殊困难，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們的亲屬据有教皇职位，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沒有阻碍。

馬基雅弗利自己对于共和政体是有热情的，但他对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关于对付这些共和邦的劝告却是这样，这一点又如何解釋呢？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是一个大思想家，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个爱国的烈士，而他却劝告未来的霸主完全摧毁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論》题献給君主，这除了出于为自己打算的一种計划，想借此向君主献媚，从而博取个人利益，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呢？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写《君主論》的时候，他还受着貧困的折磨，为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热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給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 1513 年 10 月 10 日从他所住的乡村破屋里写了一封信給他住在佛罗倫薩的朋友貝托里，这封信使我們对上述情况再沒有怀疑的余地。①

話尽管这样說，但是仍然有很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們相信，他写这部书也并不是专为迎合梅迪奇一族从而猎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实現一种霸业計划；这种計划，虽然按照我們現在的道德观念来說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受到譴責的，但是跟当时在共和邦下的爱国观念并不抵触。从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职时的

①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馬基雅弗里〈君主論〉思想的表里》（米兰，1810 年）那本书里。

举动可以証明，他对于过去所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以及所有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是了了于胸的。一个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样久远的过去，又能那样淸楚地看到周圍的一切，对未来就必然也能看得很远。既然在十六世紀初叶就已經能认識到在意大利进行組織全国武装的利益，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君主国的时代已經到来，必然能看到，在当时环境下，政权只能用强力取得，用独裁政治維持，而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已成为国家統一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須鏟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总有一天会在国家統一的局面下成长起来的。馬基雅弗利显然是要把已經褪了色的几个城市的自由扔掉，让它作为专制政体下的牺牲，希望借此贏得国家的統一，从而使后代获得更加偉大、更加高尙的自由的保証。

意大利关于专論政治經济学的最早著作是 1613 年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写的，內容主要是論述使各“王国”获得金和銀的丰富供应的方法的。

薩依和麦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随便看了一看这本书的标題就馬虎过去，說它只是討論貨币問題的；从书的标題来看，的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貴金屬为財富唯一要素这种謬見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但是如果他們能讀一讀这本书，把內容仔細領会一下，也許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安东尼·舍拉虽然陷入了以金銀充裕为財富表征的錯誤观点，但是对于財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淸楚。

他当然是把采矿放在貴金屬直接来源的第一位的；但是关于取得貴金屬的間接手段却說得很有理。依他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財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繁荣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其間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例如

是否勤恳耐劳、节倹、有活动力、有进取精神等等；也决定于地区的性质和环境，例如城市的位置是否宜于經营海外貿易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舍拉认为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体、公共秩序、城市自治自由、政治保障与法律的稳定性。他說，"如果每一个統治者接位以后就要頒行一套新法令，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决沒有发展希望，所以在教皇統治下的国家与那些政权和法制比較稳定的国家对照时，在繁荣程度上就相形見絀。試看威尼斯就与上述前一类国家的情况相反，在那里可以看到相沿数世紀不变的法律制度对公共福利的影响。"这就是这一經济学說的精粹，它的目的虽然显得只是在于貴金屬的取得，但在大体上竟这样的見解正确而自然，这是值得注意的。就薩依的著作来說，虽然其中有些关于政治經济学的概念与內容是舍拉在他的时代所无法預知的，但在几个主要論点上却远不及舍拉，尤其是关于正确估計政治环境对国家財富的影响这一点，比之舍拉，相差更远。假使薩依对舍拉的著作作了研究，而不是把它丢在一边，他就不至于說这样的話："在政治經济学里是不能考虑国家政体問題的；不論在哪一种政体下，人們都会发財致富，也会陷入貧困；唯一重要的是行政管理应当力求完善"(見薩依的«政治經济学»第1頁)。

我們一点也不想拥护任何一种政体，說它与别的政体比較时具有**絕对**优越性。人們只要看一看美国南部各州的情况就可以了然，以民主政体而言，如果在广大人民中时机还沒有成熟，就会成为使社会繁荣显著趋于退化的原因；只要看一看俄国就可以深信，当人民还处于較低文化程度时，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会使国家福利事业获得极显著的进展。但这并不是說人民在任何政体下都会富裕起来，都能够在經济生活发展上达到最高度。实际上历史所告訴我們的是，国家的政体，不論是叫作民主共和或貴族共和或君主立宪，只有当它能使人民获得高度的个人自由与財产安全，在管理

制度上使他們获得保証，当他們从事于向共同目标作奋斗时能高度发揮活动力，并且能持久地、稳定地进行——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公众福利才会获得高度进展，工商业才会达到高度繁荣状态。因为在高度发展的文化状态下，主要問題不是在于行政在某一时期应当如何完善，而是在于应当如何求其继續不断的、始終一致的尽善尽美；后任的执政者不应当破坏前人的良好成就；在科尔伯特的三十年政績以后，不应当来一个南特敕令的撤銷；一个世紀接着一个世紀，遵守的应当是同一个制度，努力奋斗的应当是同一个目标。安东尼·舍拉說得对，只有能体現国家利益的那种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在那种政体下，国家行政制度势必随着統治者个人的意志而不时变更——才能使行政制度的稳定与一致获得保証。但是另一方面，也确有处于某些文化等級的国家与专制政体更相适应的情况，在这样的治理下，对国家經济与精神方面的进展，比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要有利得多。这里我們指的是，还存在着奴隶与农奴、野蛮与迷信、国家分裂、阶級特权这类現象的国家。因为在这样情况下，政体不仅会保持国家利益，而且也会使当时的一些弊政继續存在下去，而就专制政府的利益与本质来說，則目的总是在于消灭后一类現象；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有时会出現具有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使国家一下子作几个世紀的跃进，为国家恒久的生存与进步打下基础。

由此可見，薩依要从他的学說中把政治这个因素除去，他所依据的也只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平凡的信条。在任何場合，政治修明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但行政管理的效能决定于政体，凡是最能促进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与物质福利以及前途发展的政体，对那个国家說来显然也就是最好的政体。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曾获得些进步。但是有些国家的政体足以使国家获得高度自由和力量，使它們的法律和政策長期稳定，使它們拥有效能很

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經济发展。

安东尼·舍拉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来看問題的；不是以已有学說的一些推論为依据，或以事前已經决定要宣傳与实行的某些原則为依据，然后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問題的。他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作了比較，由此看到，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在財富上有最大的累积，而大規模商业是从充分发展的工业而来的，工业又是以公民自由为出发点，然后由此获得发展的。

柏卡里亚的見解充滿了重农学派的荒謬論点。这位作家談分工原則或在亚当·斯密之前，或与他同时，这一論点也許是他发現的，也許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他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不但把这个原則应用到各个工厂工作的划分，而且指出，由于社会成員之間职业的划分，公共福利有了进展。同时他也与重农学派一样，毫不犹豫，认为工业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

那位法理学大家菲兰哲里的見解可以說是最狹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认为英国实行保护政策，只是使非法貿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业。

威利是一个有实地經驗的政治家，因此不会錯誤到那样大的程度。他认为有保护国內貿易、抵制国外竞爭的必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只有强大、統一的国家才能采用这一点他却并沒有或沒有能看到。

# 第二十九章 工业主义

## (流行学派誤称“重商主义”)

在世襲君主政体以及国民力量集中的情况下导致了各民族的团結，由此大国蔚起；当这个时期，商业与航运，从而財富与海軍

力，象我們以前所已經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組成的共和邦或这些共和邦的联盟。这些大国的制度越是发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須把这些力量和財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起来。

大国的君主們深信，要使这些力量和財富的根源得以发荣滋长，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实現，他們就按照这个方針进行，給城市以自由行动权，鼓励建立行会，认为这类設施都足以与封建貴族的势力相对抗，而这些貴族是一直在企图独立，一直与国家統一的宗旨不相容的。但是靠了这样的权宜手段要使政策方針得以貫彻执行，看来还是不够的，其間有种种原因。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与共和邦所享受的全部利益，比君主政府在它們自己的自治城市所能提供或願意提供的全部利益要大得多；其次，要使一个一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自由竞爭中，安然地排除在工商业及航运业方面占有优势已历数世紀之久的那些国家，这件事不但非常困难，簡直不可能；最后，在这些大君主国內的封建制度，对国內农业的发展，从而对国內工业的发展，起着阻撓作用。因此这些大君主国，出于势所必然，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方針，对外国工业品輸入及外国的商业与航运，竭力主張加以限制，对本国的工商业及航运业的发展則加以贊助。

这些国家的岁入原来以对輸出的原料課税为主，此时則以对輸入的工业品課税为主。这一政策所提供的利益，使文化比較高度发展的城市与地区的工商业者及海員受到了鼓励，就带着他們的資本迁居到这些大君主国，从而也激起了后者原有居民的企业精神。于是随着国民工业的增长，国民自由也获得了增长。这时封建貴族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感到对从事于工商业及农业的人們有表示让步的必要；由此更加推进了本国的农业与工商业，这些国家財富的要素彼此之間又互相发生着有利影响。我們已經指出，由于

实行这样的制度,加上宗教改革的有利影响,英国在生产力、自由和权力方面有了怎样的累世不絕的长足进步。我們曾經談到,这样的制度曾使法国在一个时期获得相当成就,但未能有始有終,只是由于封建制度以及教会与专制君主制度还沒有获得改革。我們也已說明,波兰終于一蹶不振,只是由于选举君主的制度沒有充分的势力与稳定性,足以促成强有力的城市自治制度,使封建貴族获得改进。施行了这样的政策以后,原来的工商业城市以及大都处于城市政治势力以外的农业地区改变了面貌,代之而兴的是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完全无缺的国家,是一个协調的、紧凑的整体,这里一方面把原来存在的君主、封建貴族与民众之間的分歧轉化为和諧一致,另一方面在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間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与相互有利作用。这样一个国家比原来存在的組織不知要完善到多少倍。这是因为城市自治共和邦的工业原仅局促于狹小范圍內,而現在却可以把范圍扩大到全国;因为全国的現有資源,現在都可以供工业支配;因为在工业的不同部門以及在农业中的分工与生产力联合的有效性比以前提高了无数倍;因为从事于农业的各个等級的人在政治上、商业上都与工商业者結合在一起,他們之間保持了永久的协調;因为工业与商业之間的交互作用得以牢固存在,永久不变;最后,还因为由工商业而来的在文化方面的一切利益,农民也可以共享,并不例外。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就象是一个势力扩展到全国的城市,或者象一个提高到城市地位的乡区。在这样的一个統一国家范圍內,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势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将日益发展,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在国家的岁入方面、軍事力量以及人口方面,将不断增长。所以我們在今天可以看到,首先使农工商业获得充分发展的那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謂工业主义,原来并沒有书面上的明确定义,也不是作家們設想出来的一套理論，只是在事实上执行着的，这种情况直到斯图尔特的时候为止；斯图尔特的学說大部分是从英国的实际情况推演而来的，正同舍拉的学說是从威尼斯的情况推演而来的一样。但斯图尔特的論著并不能算是科学作品。这本书大部分是专論貨币、銀行、紙币流通、商业恐慌、貿易平衡以及人口問題的，直到現在还可以使我們从中学到許多东西;但是写得十分无条理、欠明朗,同一概念往往反复說上十遍。关于經济学中的其他問題,有些只是极浮泛地提了一提，有一些簡直完全略而不談。例如关于生产力問題和价格原理問題,都沒有彻底討論。在作者心目中的,处处只是英国的經驗和情况。总之,在这本书里所始終注意的,只是英国实况与科尔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工业主义与后来的一些学說体系相比,其长处是:

1. 它清楚地认識到国內工业的价值，认識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含糊地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认識。

2. 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在大体上应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①

3. 它是以"国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把国家看做各个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

另一方面,工业主义也存在着以下几个缺点:

1. 它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的基本原則以及使这个原則能够付諸实施的一些情况,一般缺乏认識。

① 斯图尔特說(第1編，第29章):"一个国家为了振兴工业，不但要有所許可，要进行保护，而且必須采取行动。假使法国鉴于英国經营毛紡織业极端有利，自己也想动手建立这一工业,而国王对于創办者不作大力支持,不給以种种优惠待遇，对一切国外毛織品輸入也不加以严格限制，那么这一工业怎能建成?試問，任何国家要建立新工业时,除了采取这类措施,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2. 由此将使处于不适宜于发展工业的那些地带的人民以及小型的与未开化的国家和民族发生誤解，以为也可以采行保护制度。

3. 它总是企图把保护制度应用到农业、尤其是原料生产的方面，它不懂得对原料生产采取保护措施是对农业有害的，而农业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护的，是不怕国外竞爭的。①

4. 它企图用限制原料輸出的办法来过甚地爱护工业，这样做是有損于农业的。

5. 它并不向已經占有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指出，象这样的国家应当容許在本国市場范圍以內的自由竞爭，从而防止它自己的工业家和商人流于怠惰。

6. 当它一味地追求政治目标时，忽視了一切国家之間的国际关系，忽視了全人类的目标；因此会导使国家趋入歧途，以致使它們当实行保护办法已經足够应付时会采取禁止制度，或者当征收溫和的保护性进口税比較适合目的时会征收实际上带有禁止性的进口税。

7. 最后，主要由于它完全忽視了世界主义原則，因此就沒有能认識到，作为一切国家的努力方向，应当爭取逐步接近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共同联合，是持久和平的树立与普遍的貿易自由。

但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对于工业主义作了錯誤的責难，认为它只是把貴金屬作为財富的唯一要素，其实貴金屬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与其他一切有价值商品并沒有什么两样；因此认为这个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对别的国家应尽可能地多卖出，尽可能地少买进。

关于上述指責，并不能获得事实上的印証；不論就科尔伯特或就英国从乔治一世以来政府的施政方針来說，都不能說它們对于

---

① 参閱附录三——英譯本注。

貴金屬輸入这一点的重視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

它們商业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与国外貿易；其間不免发生許多錯誤，但整个說来是有重大成就的。我們还可以看到，英国自从 1703 年訂立麦修恩条約以后，每年曾以大量貴金屬运往东印度群島，并沒有认为这样的輸出是有害的。

乔治一世的朝臣，当 1721 年禁止印度棉織品与絲織品輸入时，并沒有把一个国家应当尽量向国外多卖出少买进作为采取这一步驟的一个理由。这种荒謬說法是随后的学派硬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当时那些朝臣們所主張的只是这样，认为一个国家显然只有靠了輸出自己的工业品，一方面从国外輸入原料与生活必需品，才能达到富强。英国在国家政策上就遵守了这个准則，一直到今天，由此达到了富强地位；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在农业上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这实在是一个唯一正确的准則。

# 第三十章　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

假使科尔伯特的偉大事业能够让它一帆風順地进行下去；假使南特敕令的撤銷，路易十四的酷慕虛荣，好大喜功，及其后代的驕奢淫逸，沒有把科尔伯特所播下的种子在萌芽时就加以摧殘，結果在法国竟出現了欣欣向荣的工商事业；假使僥幸得很，法国教会的巨大財产竟轉让給了大众；假使由于这样的演变，产生了强有力的議会下院，靠了它的势力使封建貴族获得了改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就絕对不会出現所謂重农主义。这一学派显然是起源于法国的当时情况，也只能与那时的情况相适应。

当这一学派創始的时候，法国的地产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貴

族的手里。耕地农民则呻吟憔悴在农奴境地与人身压迫之下，他們陷入了迷信、愚昧、怠惰与貧困的深淵中。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地主們，只是鎮日游手好閑，度着逍遙佚宕的生活，他們对农民生活旣漠不关心，对农业也毫无兴趣。眞正的耕地农民，对于农业改进，旣沒有精神手段，也沒有物质手段。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者的无饜之求，封建势力在这方面的压迫变本加厉，使农民对教士与貴族享有的免税权益，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这样情况下，那些主要行业，即所依靠的是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費力的那些行业，就无法支持；只有从事于生产供特权阶級使用的奢侈品的那些行业，还能努力爭取发展。物质生产者对于热带地区产品旣沒有大量消費能力，又无法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来偿付，因此国外貿易的发展有了限制；而国內貿易也在省际关税的压迫下奄奄不振。

在这样情况下，这就难怪当时一些有思虑的人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困苦艰难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认为只要农业沒有能从束縛中获得解放，有土地有資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的境地，陷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租税依然不能減輕，不能由各阶級公平負担，国內关税限制依然存在，国外貿易不能发展，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就談不到国家福利。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这些所謂有思虑的人，有些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內的寵幸，有些是貴族和敎士的心腹或知交，他們对于专制势力或貴族和敎士是不能、也不会公开反抗的。他們要傳布自己的見解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把他們的改革計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这正同早期以及晚期都曾試行过的、把政治与宗教改革思想潛伏在哲学理論內容中的做法一样。与他們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哲学家，眼見法国陷入了完全混乱状态，就想在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广泛范圍內求得安慰，这

种情形，就象一户的家长，当他看到家庭四分五裂，无可奈何时，只好从酒乡中寻求一时的享乐一样；现在重农主义者也是学的这个样，他們抓住了普遍自由貿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們抓住了这一点眞理以后，就把他們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又从中发現了土地的"淨收入"这一論点，作为他們早已胸有成竹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他們的学說体系的基本准則："只有土地能产生淨收入，因此农业是財富的唯一根源。"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无限奇妙的結論——首先封建制度必須鏟除，必要时土地占有也不例外；然后，土地旣为一切財富的根源，一切租稅就应当从这里征收；然后貴族与教会享有的兗稅特权必須取消；最后必須把工业者看成是不生产的阶級，它不应当負担納稅义务，可是也不应当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关稅就必須取消。

总之，他們事前已經有了絕大眞理横梗在心头，决定要加以証明，因此就不惜用最荒謬的論点来設法証明他們的那些絕大眞理。

关于国家，以及与其他各国相处关系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情况这类問題，可以不必再加考虑，因为这在百科全书里就已經說清楚，它說，"个人福利是以全人类福利为轉移的。"因此这里关于国家、战爭以及国外商业政策这些問題，就一概不必再加考虑，历史和經驗尽可置之度外，或任意加以曲解。

然而这一学說体系有一絕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与工业者的享有特权，而在实际上被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法国农民遭到了苦难，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科尔伯特不得不代人受过——尽管人人都曉得，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而且就是头脑最迟鈍的也懂得，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的主要手段。这些思想家对于南特敕令的廢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爭、路易十五的胡乱花

費等等因素，都一概置之不問。

魁奈对于人們反駁他的各点，在他的书里逐条叙入，并逐条作了答复。在他书里出現的、假定为反对者嘴里說出来的那些道理，都是那样的健全正确，而他反駁时提出来的論点却是那样的荒謬絕倫，使人看了簡直惊奇之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理論的趋向与法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合，是同那一个世紀流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沆瀣一气的，因此得到了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人們的贊許，认为是智慧的化身。

## 第三十一章 交換价值理論
## (流行学派誤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学說，关于国家及国际情况的方面，只是重农主义的延續。这一学說与重农学派一样，并不顧到国家的本质，几乎要把政治和国家力量这些因素完全丢开；它事先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与世界联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国家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主張貿易絕对自由。

他陷入了这样的根本錯誤，在这一点上同在他以前的重农主义者情形完全一样，就是說，他将国际貿易的絕对自由作为一个准則，对于这一准則的贊許是从常識的要求出发的，并不是彻底研究了历史对这一观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后形成的。

那位为亚当·斯密作傳記的能手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告訴我們，斯密在他的著作 1776 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 1755 年，就已首先有了貿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参加的一次学术討論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

“人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和阴謀家利用作政治活动的材料。

这些阴謀家在对人事的处理中,攪乱了自然状态,其实人們对于造化只应当听其自然,让它自由行动,从而完成它的目标。要使一个国家从野蛮阶段的深淵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适度的稅收与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的一切就会在自然趋势下按照它們自己的意向循序而进。任何政府行动时違反了这种自然趋势,要想把資本引向别的途徑,或者是要限制社会按自然程序进展,就是逆天行事,这时政府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就会成为专制暴虐的政府。"

亚当·斯密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他后来的一切著作就以对这一点的証明与解釋为唯一目标。他 1765 年游历法国时結識了魁奈、杜閣和重农学派另一些健将,他們对于他上述观点都表示贊同,因此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斯密显然认为貿易自由这个概念是一种聪明的发現,足以构成使他在学术上成名的基础。因此凡是与这个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他总要在他的著作中把它拋开或加以駁斥,他自居为貿易絕对自由这一主張的公开拥护者,他就在这样的心情下进行思考,进行写作;他旣已成竹在胸,抱着这样的态度原是极其自然的。

他旣已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見,当他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統計、对政治措施与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評价时,要他不以与他的基本原則是否有抵触这一点为依据而以任何别的一点为依据,这又怎么办得到呢?

从上面所引証的斯图尔特告訴我們的一段話里可以看出,斯密的全部理論是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圍之內的。政府的权力,除了可以执行法律、征收尽可能少的一些稅收以外,就不能也不应别有所为。政治家如果企图建立工业,促进海运,扩大国外貿易,用海軍力量保护貿易或开拓殖民地,在他看来,这位政治家就是阴謀家,是要阻碍社会进步的。对他說来,并不存在什么国家,只是一

个集体，一个由許多个人居住在一道的集体。这些个人关于哪一类工作对他們最有利这一点，他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促进他們的福利，也是他們自己最善于选擇。

象这样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創造者地位的論調，只有当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影响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經实际存在的事物，卽物质財富，或不如說是实际事物所具有的交換价值时，这种論調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个人主义必須获得唯物主义的支持，这样才能把个人从国家、从国家的統一、从生产力在全国范圍內的联合这些方面而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这一点隐蔽起来。旣然价値只是由个人生产的，旣然国家不能創造价値，它的动作只应以喚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为限，那么就必然要設法使人們相信一个光头禿脑的价值理論就是国家經济学。在这样的設想下，政治經济学的实质可以概括如次：財富就是对于具有交換价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換价值的物品是由个人劳动与天然力量及資本相結合时产生的。通过分工，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增长；資本是由于儲蓄、由于生产超过消費而累积起来的。資本的总量愈大，分工、从而生产的能力也愈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約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国方針是对私人工业不加干扰，所需要当心的只是司法制度的完善。因此要想凭着国家的法律措施，誘使人民自己来生产在国外可以用較低代价买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种愚蠢行动。象这样一个完整的学說体系，說明了財富的要素，把生产程序說得那样清楚，把原有各学派的錯誤揭露得那样透彻，在沒有产生其他学說体系时，是不会不受到欢迎的。这一学說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經济学說，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經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間并沒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沒有彼此

分得淸淸楚楚的政治組織或文化阶段，也沒有战爭或国与国之間的仇恨。說来說去，这个学說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論，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論；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說，并沒有說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續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續保持。

这个学說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問題的。根据这个学說，任何事物的价值就是財富，因此唯一目的是价值的取得。至于生产力的建立，那是要听任机会、听任自然趋势或天命的(随便你喜欢怎么說)，政府决不可从中有任何作为，关于交換价值的累积这件事，政治力量是不可从中干預的。根据这个学說，哪里的貨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如果本国工业由于外貨輸入而一敗涂地，在它看来无关重要。如果外国对工业品輸出实行补助办法，那就更妙了，买进时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在它看来，除了实际生产有交換价值的物品的人們以外，沒有一个阶級是生产性的。关于分工如何有助于某一具体事业的成功，它是充分认識的，至于分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怎样，它就一无所知了。它知道只有通过个人經济才能使資本增加，也只有在資本有了增加以后，个人业务才能随着这个增加比例而扩大；但是它对于由建立本国工业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或由这种增长而来的国外貿易或国家力量，却不懂得重視。只要个人能获得財富，整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来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至于地产的价值則置之度外；它并沒有理解到国家財富的絕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关于国外貿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动和灾害，它簡直毫不介意。总之，这个学說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而科尔伯特的唯一目标是在于建立国家工业、国家商业，对于交換价值一时的得失并不措意，他是主要傾向于“工业主义”的，結果何以会把“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加在他的头上，实在

有些費解。

尽管如此，我們对于亚当·斯密的偉大功績并不否认。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到政治經济学的。他凭了这个方法和惊人的智慧，闡明了科学的一些最重要部門，这些部門原来几乎完全是不清楚的。在亚当·斯密以前，存在的只是例有的成法；通过他的著述，才使政治經济学成为一門科学有了可能，他对这門科学所貢献的材料，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人。

但正是他在智力上的这种特性，一方面使他从事于分析政治經济学的各种因素时作了这样重要的貢献，另一方面也使他的学說存在了許多缺点；为什么他沒有就社会全体作完整的观察，沒有能把个人利益合并成一个和諧的整体，沒有把国家放在个人的前面来考虑，当他急于要顾到各个生产者行动自由这一点时就忘記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原因就在这里。他对于单是在一个工厂里进行分工的好处看得那样清楚，却沒有理解到，同样的原則在整个省区、整个国家应用时也是同样有效的。

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对于他的批評与这里的意見正相符合。斯密对于人的个别特征能够作出异常尖銳的判断，但是当他有必要对一个人或一本书的全般性质提出意見时，他所表示的見解竟那样的孤陋、偏执，簡直使人惊訝万分。不但如此，他对于同他亲密相处了多年的那些人的性格，也沒有作出正确評价的能力。他的傳記作者这样說："这个写照，如果从某一观点出发，与本人相对照时，总是神情毕露、栩栩如生、維妙維肖的；但是从这个人的一切角度与整个体态来看时，写照决不能具有逼眞的、全面的再現力。"

# 第三十二章　交換价值理論(續)
# ——薩依和他的学派

尙·巴普蒂斯特·薩依这位作家，总的說来，只是把亚当·斯密在一种不够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闡述，加以系統化、通俗化而已。他对于事理的闡明与加以組織化这些方面具有高度天才，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成功的。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确认亚当·斯密所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沒有什么新的或独創的見解。上述这一点，根据生产力理論来說固然十分正确，不过与交換价值理論是对立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說，斯密的理論显然要比薩依的完整些。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換价值；不仅如此，由于他們的消費行为，还减少了物质生产与蓄积的总量，也就是减少了物质財富的总量。还有，薩依在他的观点上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列入生产阶級的理由是他們所得的报酬是交換价值，这个理由实在全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換价值在沒有流到精神劳动者的手里以前就已經被生产了；所变更的只是价值的占有者，价值的量并沒有增加。只有当我們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換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財富时，我們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薩依在这一点上感到他自己是与斯密对立的，这正同斯密感到他自己是与重农主义者对立的情形一样。

斯密为了要把从事于工业者列入生产阶級，不得不扩大財富所由构成的事物的概念；薩依，在他这方面，并沒有别的路可走，要么接受亚当·斯密傳給他的衣鉢，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謬見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否則就得象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的做法那样，也来一个扩大財富概念，再把生产力也包括在內；这

时就得說明，国家財富并不在于交換价値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漁夫的財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魚，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魚以滿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

有一点値得注意的是——就我們所知，这并不是一般所周知的——薩依有一位兄弟，凭着他簡单朴质的常識，淸楚地看到了价値理論的根本錯誤，薩依对于他自己理論的是否健全、正确，在这位怀着疑問的兄弟的面前也表示了怀疑。

路易·薩依在南特时曾这样写道，有一个学术名詞，在政治經济学里已經流行，但是引起了許多錯誤的推論，就是他的兄弟尙·巴普蒂斯特·薩依也不能免。[1] 按照路易·薩依的說法，国家的財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它們的交換价値，而是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尙·巴普蒂斯特·薩依的交換价値理論是从商人个人的狹隘观点来看財富的，这种理論是要想糾正所謂重商主义的，但是它自身依然是有限制的重商主义。[2] 关于这类疑問和反駁，尙·巴普蒂斯特·薩依答复他的兄弟时这样說，"他的（就是尙·巴普蒂斯特·薩依的）方法（方法？）（卽交換价値理論）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困难之点是在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3]

什么話！当眞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嗎？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經找到了一个嗎？不是这么說的；眞正的困难是有些人沒有足够的机智果断，去把这位兄弟所說的（当然只是概括地說的）概念抓住，并追

---

① 路易·薩依：《国家財富的研究》，序文，第4頁。

② 以下是路易·薩依的原文（第10頁）："組成財富的并不是使我們的需要或享乐获得滿足的那些事物，而是使我們能經常享用这些事物的能力。"又說（第14—15頁）："重商主义学說的錯誤观点在于以貴金屬为財富，而代之而兴的另一学說的錯誤观点在于以买卖或交換价値为財富，它就象一个商人一样，对于构成財富的是什么这一点并不重視。"他还說（注释，第14頁）："反駁重商主义的近代学派自已建立了一种理論，这种理論本身就应当称作重商主义理論。"

③ 載《国家財富的研究》，第36頁（这是著者引証尙·巴普蒂斯特·薩依的一句話）。

究到底；或者不如說是，要把已經确定的学派推翻，要把与已經借此成了名的学說恰恰相对立的一面来加以推演，这样的做法也許是非常不愉快的。在尙·巴普蒂斯特·薩依著作中唯一独創性的东西是关于学理的形式方面，就是說，他替政治經济学所下的定义是表明物质財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費的科学。尙·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及他的学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正是由于这样的分类和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解釋，这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他这样做时一切都是現成在他手边的；他懂得对生产的特有程序和所涉及的个人力量怎样进行通达曉暢的解釋，(在他自己設定的狹小范圍內)关于分工原則、个人行业这些方面，他也能胜任愉快地作出細致詳尽的分析。他的話不論哪一个制陶器的、不論哪一个小商小販都能理解；他所說的內容，其中新的或为一般所不知道的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領会。因为就一个陶工的工作来說，必須把他的双手和他的技巧(劳动)与陶土(原料)結合在一起，然后靠了鏇盘、炉子和燃料(資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产品或交換价值)，这是每一个有相当地位的陶器作坊里的陶工都早巳知道了的，不过他們不懂得怎样用科学的語言来叙述这些事情，不懂得把这些事情借此来进行归納而巳。小商小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們通过了交換，买卖双方都能获得交換价值，如果任何人輸出了价值一千泰勒的貨物，然后从国外換得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別种貨物，他就从中賺得了五百泰勒，在尙·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前不懂得这点道理的小商小販大概是很少的。

这也是大家在以前都早巳懂得的，勤俭可以致富，游惰必致貧穷；个人的利己心是勤奋工作的最有力刺激；而誰要想获得鸡雛就不可先吃掉鸡蛋。当然，人們在以前并不曉得这些就是政治經济学；但是他們都乐于輕易地登上这門奧妙的科学的殿堂，从而摆脫使心爱的奢侈品价格提得那样高的可恨的关稅，而共享持久和平、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关系和太平盛世的至福。許多有学問的人和政府官吏都成了斯密和薩依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倒是首先倡議和解釋这个原則的人需要有些聪明；他們两位的继起作家也不必多費思考，只需就他們的論点来加以闡述、潤飾，加以反复申言；假使把两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誰还不願意、誰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些理論有一个奇异的特点，人們假使接受了他們著作中最初的論点，然后誠心誠意地跟着他們所指引的那条路走下去，經过几章以后，就迷失了方向。我們必須在一开头就告訴尙·巴普蒂斯特·薩依先生，照我們的看法，政治經济学这門科学所教导的，并不只是交換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間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費。我們要告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須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須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資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

这种理論(薩依的)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不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重輕的。薩依先生关于个人万能与政府一无所能的見解，已經进展到近于可笑的程度。当他看到科尔伯特的政策在法国工业教育方面所收到的效果不禁要有所贊揚时，他这样說，"这样的高度智慧是很难归功于个人的。"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从理論轉向到理論的創造者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并沒有广泛的历史知識，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沒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沒有政治与哲学眼光，心头只是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来的見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統計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

搜索，想从中发現足以支持他見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証和事实。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他对于航海条例、麦修恩条約、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約等等所提出的意見，这里对他提出的評語就不难获得証实。对各国工商业历史作有条理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有些国家在保护关税下达到了富强地位，这一点他也并不否认，不过他别有高見，认为这些国家所以获得富强与保护政策无关，并不是实行这个政策的結果；他还要求我們应当相信他所作出的結論。他說，荷兰人所以会想到与东印度群島直接通商是由于腓力二世禁止他們进入葡萄牙港口；好象保护制度就証明那种禁止是有理由的，好象沒有这一点，荷兰人就不会到东印度群島去了。薩依先生不喜欢統計和政治，就同他不喜欢历史一样；因为毫无疑問，前者会引起許多不对劲的事实，这些事实，他說，“所証明的往往与他的理論相反”，至于对于后者，他是簡直一无所知的。他总是忍不住要向我們作忠告，惟恐我們跌入陷坑，說統計事实是要引我們趋入歧途的，政治是同政治經济学沒有关系的；这种說法的“合情合理”，听起来就象是有人这样告訴我們，假使你所考察的是一只錫蜡制的盘子，你就不应当想到錫蜡这件东西。

薩依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敗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經济学；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續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經历。我們在记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謂)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貿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躊躇过一番的。他仇恨(拿破侖的)大陆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創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絕对自由貿易主义。

“自由”这个字眼，不論在什么地方使用时，五十年来在法国总是有着絕大魔力的。薩依不論在帝国时代或复辟时代，碰巧都是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他不断地提倡經济学。由此可見，他的著作

之所以受人欢迎，并不是由于著作的內容，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否則在拿破侖敗亡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采用薩依的学說，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豈不是要使人难以索解了嗎？在那样环境下他还是坚持世界主义原則，說明这个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淺。他是坚决信从坎宁和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旨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世界局势了解得多么少。他声望上的唯一欠缺是，不論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沒有給他当上商务和財政大臣；假使他有了那样职位的話，他的大名在历史上就要同科尔伯特并列，一个是国家工业的創建者，一个是破坏者。

从来也沒有一个作家曾經象薩依那样，所具有的眞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說內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經叛道，甚至象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人也害怕这位政治經济学方面的教皇的咒詛。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那部书沒有什么别的，自始至終只是在于說明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他在这一点上是表示得明明白白的，他說，处于目前世界形势，法国只有在保护制度下才有希望获得繁荣。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自由貿易加以頌揚，跟他論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整个意向直接相反，这是他違反了薩依学派的主張而乞求寬恕的表示。薩依的作風的确很象一个罗馬教皇，教皇頒布了“禁书目录”，他甚至連这个样也学会了。他当然沒有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可是比这个办法还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加以禁止的；他警告学政治經济学的青年学生，讀书不可太泛，那是容易使人走入歧途的；他們讀的书不宜过多，但是要讀好书，这就等于是說，“你們不可讀别的书，只应当讀我的和亚当·斯密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說的后继者和闡述者又深恐后人对于这个学派不朽的开山祖师在崇敬中寄予过大同情，为此也曾費了一番苦心；他这样說，他认为亚当·斯密著述的內容极其

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滿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們懂得，所謂“应当讀亚当·斯密的书”是只有从他那里来学习的。

虽然如此，当薩依正在声名鼎盛的时候，却出現了某些年青的异端者，他們对他学說的基础展开了攻势，他們的进攻竟那样的大胆有力，因此他态度很謙恭，宁願对他們在私下答复，避免任何公开討論。反对派中最激烈最有才能的要推沙武尔，这人曾不止一次地当过国务大臣。

薩依給沙武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話：“亲爱的批評者，按照您的意見，我的政治經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論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簡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因此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象有一位批評者所說的那样，使政治經济学有了退步。”① 他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很天眞地加了一句：“从您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个論战再继續下去是无益的，很可能会使我們大家感到困恼。”

現在斯密和薩依学派在法国已經被推翻，交換价值理論那种僵硬的、无生气的影响已經过去，接着发生的是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这种气氛就是罗西和布朗基两位先生也无法驅除的。圣西門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派，虽有卓越天才，但是他們对于旧有的学說不是加以改进而是完全丢弃，却自己另想出了一套烏托邦制度。最近有一些天分极高的人，企图找出他們的学說与以前学說理論之間的相关之处，并且使他們的見解与現在情况相适应。他們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者可以获得重大成就，其中格外有希望的是多才的密歇尔·歇伐利埃。他們学說中所含的一些眞理，可以同現在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主要在于他們对生产力的联合与协調这一原則的解釋。他們的缺点在于完全抹杀了个人自由与独立；

① 薩依：《实用政治經济学大全》，第7章，第378頁。

按照他們的想法，个人与社会已完全合为一体，与交換价值理論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而国家則并不足道的想法恰恰相反。

也許世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現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預見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論如何总要經过許多世紀以后才有实現的可能。至于遙远将来的新发現和社会状况的进步，这些都不是世人所能預測的。即使象柏拉图那样的智慧，也不能預見到数千年之后社会在工作中会使用鋼鉄和銅制的工具；即使象西塞罗那样的头脑，也想不到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代議制有可能扩展到一切文明国家，甚至全世界、全人类。即使少数奇才天賦极高，会預見到未来数千年以后人类进步方面的个别事例，然而每一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特有任务的。就我們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說，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組織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許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們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現，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組織連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这个先进国家所处的地位不是非常危險嗎？現在交換价值理論已經完全失去势力到这样地步，以致它所从事研究的几乎仅在地租的性质这方面，因此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經济学原理》里会这样說，“政治經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生产物在地主、农場主和劳动者之間应如何分配的法則。”

有些人深信政治經济学这門科学已經达到了圓滿境地，再也沒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

事求是的眼光来讀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門科学根本还沒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沒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謂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旣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

最后,为了避免誤解,我們必須声明,我們对于尙·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及他的前輩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些批評,所涉及的只是著述內容有关国家的和国际的方面,至于有关一些次要問題的学理解釋,它們的价值我們并不否认。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他的理論基础也許始終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对科学的个别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极有价值的見解和推論。

# 第四編　政策

## 第三十三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大陆国家——法国和美国

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城市或国家在工业、商业与海运方面处于超群絕倫的地位，但是象当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国家，世界上以前却从未見过。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强国力求达到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其中并沒有一个国家能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优势国家，把它的力量建立在这样广大的基础之上的。那些国家也曾試图凭着武装力量建立世界統治权，但是它們的力量同英国今天的企图对照之下，显得何等渺小。英国簡直使它的全部領域轉化成了一个工商业与海运业发达的龐大城市，使它与世界各国相处时，就象是一个大城市与它周圍地区相处时的关系一样。在它本国范圍以內可以說是色色俱全，它有一切的工业、技术和科学，有一切的大商业和財富，有海运业也有海軍力量；它是一个世界的首都，它的工业品供应着一切国家，同时它又向一切国家吸收对它有用或它所合意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这些国家好象生来是应当为它效力的；它又是一切巨大資本的一个宝庫，是一切国家的銀行，控制着全世界的通貨，它向世界上一切民族发放貸款，收取利息，从而使他們对它处于从屬地位。但是我們对于这个强大国家和它的努力也应当說句公道話。世界进步并沒有受到英国的阻碍，而是大大地得到了它的帮助。它已經成为一切国家的榜样；在国內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各种重大发明与大規模企业方面，

在工业操作以及运輸工具的改进方面，在关于未开垦地区的发現与垦殖方面，尤其是关于热带地区天然富源的取得以及对未开化民族与退化到未开化状态的那些民族的进行教化这些方面，它都起了示范作用。假使从来未曾有过象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誰知道世界将依然停留在怎样落后的状态？假使現在沒有了英国，誰能估計人类将退化到什么地步？因此我們对于这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应当深自庆幸，并祝它天长地久，国运昌隆。但是，是不是由于这一点，我們就也应当希望它以别的国家作牺牲，从而建立它对世界的統治地位呢？这只有莫測高深的世界主义或店老板的狭窄胸襟，对这个問題才会作出同意的答复。这种違反民族精神的做法会得到什么結果，我們在前几章里已經指出，并說明只有使許多国家在文化、財富、权力各方面处于彼此相仿地位，才能使全人类文化获得发展；英国已經把它自己从未开化状态提高到目前的强盛地位，别的国家也应当象它一样，跟着它走上同样的道路；目前有条件在文化、財富、权力各方面爭取达到最高标准的，正不止一个国家。現在让我們簡单扼要地說一說，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則是些什么。这些准則大致說明如次：

一貫鼓励生产力的輸入，[1] 商品輸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

小心謹愼地撫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輸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輸出的只限于工业品。

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

---

(1) 甚至英国的羊毛生产，部分也是由于对这一原則的遵守。西班牙是禁止羊类出口的，爱德华四世获得了特惠待遇，从那里輸入羊三千头，分配給各教区居民，命令在七年以內不得屠宰或閹割。（載《論英国商业》，第1卷，第379頁。）一等到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英国就禁止輸入西班牙羊毛，用以酬謝西班牙政府給予特惠待遇的一番好意。尽管可以认为这一行动是多么有欠公道，但这一禁令的功效与查理二世禁止羊毛輸入（1672年与1674年）的功效，是同样地不可否认的。

的征服方面。

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屬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攬,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

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間的貿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漁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

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軍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貿易,扩大殖民地占領。

承认殖民地貿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們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給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約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訂立盟約;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論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絕它們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貼的办法,使它們的工业陷于破产。①

这些准則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議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諱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們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輸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輸入原料、輸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

① 参閱附录一 ——英譯本注。

强。甚至到了查坦勛爵和諾思勛爵的时候，他們还毫不迟疑地在議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馬蹄釘也不应当允許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們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則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則，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現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論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說的秘密就在这里。他偉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爭下已經再沒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設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語气告訴它們，它过去走了許多弯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发現了自由貿易这个眞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論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門面的。1786年他发表了一篇演說，实际上他这番話既不是讲給議会听，也不是讲給他本国人民听的，他显然是要引起法国政治家們的注意，那个时候那些政治家缺乏一切經驗和政治眼光，他說話的意向所在只是要誘使他們贊成伊甸条約，这番話是斯密的推論方式的一个絕妙雛形。他說法国生来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

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① 英国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則，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貿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这一准則在当时、而且直到現在依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見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眞地在坚决执行。但是英国在威廉·庇特的时代以后，若果将保护制度看作是一件廢物一样弃而不顾，那么它所据有的地位比現在当还要高得多，距离它壟断全世界工业的那个目的，当还要接近得多。达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就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那个时候对拿破侖的大陆制度正在深恶痛絕，大陆上的一切国家对世界主义理論都是欣然接受的。不論是俄国、德国、整个欧洲北部、西班牙半島以及美国，如果有机会能把它們的农产品和原料向英国交换工业品，都将感到欢欣鼓舞。就是法国，在酒类与絲織品貿易方面获得一些确切权益以后，放弃禁止制度也未尝沒有可能。

普里斯特利談到英国航海条例时曾这样說，**取消英国保护制度将与当初采用这个制度同样的适合机宜**；这句話在这个时候正

---

① 庇特說，法国在气候和天然条件上都优于英国，因此它的原料生产超过英国；另一方面英国在工业品生产的条件上則优于法国。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油类和醋，尤其是前两种生产，占有这样的重要地位，具有这样的价値，是我們的自然产物在价値上絕对无法比拟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肯定的是，关于某些工业品的生产英国也居于絕对优越地位，毫无疑問，在这一点上法国是无法同它竞爭的。这是一个彼此相輔相成的情况，两国之間应当在这个基础上訂立一个互受其利的商业条約。两方各有它所特有的主要商品，各有对方所缺少的东西，因此两方都应当象經营着不同行业的两个大商家一样，彼此进行商品交換，这样的交换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我們还可以注意到一点，法国是我們的邻邦，它拥有巨大財富和繁庶人口，与我們相距极近，因此极便于进行迅捷而經常的交易活动。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自由貿易，在这一点上誰还会有一刻的躊躇，誰还会不热烈地、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实现呢？我們有了这样一个广大的、确定的市場以后，必然能使我們在商务上有极大推进，必然能打击走私者，增加国家税收，有利于我們的財政，从而使英国的財富与政权两大动力更加充沛。

可以实行。

实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結果，将使东西两半球的剩余原料和农产品一齐流向英国，英国的紡織品将"衣被天下群生"。一切的趋向都将有助于英国的进一步富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論是俄国和美国，在本世紀就都不会要想到实行保护制度，德国也再不会想到要建立关税同盟。要使人們下定决心牺牲眼前利益而把希望寄托在遙远的将来，显然是很困难的。

但是天意所在，总不会使树木高了再高，一直聳入云霄的。卡斯尔累勛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托在貴族地主們的手里，这些人就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假使这些貴族地主能容許英国工业家壟断一切国家的市場，那么英国与世界各国所处的关系，将同一个工业城市与周圍曠野地区所处的关系一样；英国全境将布滿屋宇和工厂，将布滿寻欢逐乐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农村土地将专門用来生产牛乳、肉类、菜蔬，将专門从事于一般只能在大城市附近經营的种植事业。对英国农业說来，从事于这类产品的生产时，将比生产谷物有利得多；因此在相当时期以后，英国貴族地主所获得的地租，将比将外产谷物逐出本国市場的办法下所获得的高得多。不过貴族地主所关心的只是他們的眼前利益；由于战爭，外国的原料和谷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英国市場，从而使地租有所提高，他們宁可借助于谷物法，使他們的地租得以保持較高水准。这样他們就迫使大陆各国放弃了用农产品自由交換英国工业品的办法而別寻途徑，以促进自己的福利，他們另辟的途徑就是由自己来建立工业。由此可見，英国的限制法令与拿破侖的大陆制度作用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影响发生时在时間上比較慢一些而已。

到了坎宁和赫斯启森主政的时候，貴族地主們已經尝够了禁果的甜头，这时要凭常識上的推論来說服他們放弃原有利益已不可能。这些政治家感到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問題，使他

們处于困难地位；一直到现在英国执政者还是处于这样的窘境。他們要使大陆各国相信自由貿易的好处，同时为了本国貴族地主的利益，对外国农产进口却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要使他們政策的推行情况，不辜負英国和欧洲大陆两方的自由貿易拥护者的期望，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討論时，总是滿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問題牽涉到本国任何一种关税的变更时，他們就以保护原則为推論依据，并不以为其間存在着任何矛盾。

赫斯启森的确曾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来沒有忘記注意到，在較低的税率下国內工业仍然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他的做法与荷兰人管理水利工程的办法极为类似。什么地方外面的水漲得高，这些聰明的当局就筑高堤，什么地方水低些，就把堤也筑得低些。英国公布改革商业政策时，对外宣傳得天花乱墜，而实际上作風不过如此，玩的只是在政治上和經济上的一套戏法。有些人把英国降低絲織品关税作为一个例子，說明英国政策的公正寬大，他們沒有好好地想一想，英国只是企图借此打击这类商品的非法买卖，增加它的財政收入，而并不損害到它自己的絲織业，就保护本国絲織业而言，这一措施也完全使它达到了目的。假使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保护关税（这是国外絲織品輸入英国时現在要負担的税率，其中包括附加税[①]）可以算是公正寬大的証明的話，

① 在李斯特写下了这些以后，外国絲織品輸入英国时須繳納的关税已經完全取消。取消以后的情况，可以从沃德耳先生关于英国絲織业的报告中看到，报告內容摘录如次：1825 年在倫敦，有織机二万四千架，織綢工人六万名；现在織机减少到一千二百架，工人减少到不足四千名。在科芬德里，1861 年，絲带业据說可以維持四万零六百人的生活，而现在靠此为生的大致不过一万人，那里开工的机器織机由一千八百架减到六百架。在德貝，从事于絲織业的工人，从 1850 年的六千六百五十名减少到现在的二千四百名。在康格尔頓地区，这一行业的工人从 1860 年的五千一百八十六名减到 1884 年的一千五百三十名；1859 年那里有繅絲工厂四十家，现在存留的只二十家，“其中只有四分之三的机器开工”。在曼彻斯特，这一行业实际上已經絕迹。在弥得尔

那么大多数国家可以說，在这一点上它們是走在英国前面，并不是落在它后面的。

我們懂得，坎宁和赫斯启森的那些高談闊論，特别是要想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一些作用，因此在这里回想一下他們所表演的一些手法怎样地在两个国家都碰了壁，是不无意味的。这一次英国也同以前 1786 年那一次一样，获得了理論家方面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法国的自由党正热中于普遍貿易自由的偉大理想，正在被薩依浮夸的理論所激动，对于受人嫌恶的政府則抱有反感，又有沿海城市以及釀酒业与絲織业經营者的支持，因此态度嚣張，要求援照1786年的成例扩大对英貿易，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福利唯一的正确途徑。

不論人們对于复辟王朝怎样不滿，怎样加以責难，但它对法国曾有过无可否认的貢献，在这一点上后代是不会有爭执的；这就是关于商业政策它沒有被英国人的詭計和自由党的叫嚣所迷惑，沒有被它們引入歧途。坎宁先生对于应付法国这件事这样重视，这样地耿耿在心，他亲自特为到巴黎，为的是要使維萊耳先生相信他政策的高明，跟着他走。但維萊耳先生是一个久經世故的人，他完全

---

敦也已"完全崩潰"。这些现象，据沃德耳先生說，足以証明，为什么英国的生絲輸入，从 1871 年的八百万磅减少到现在的不足三百万磅。

另一方面，在李斯特著述发表以后，美国对于国外絲織品进口时所征收的保护关税却在日益增进，稳固地保持着高額关税制度。美国关税委員会成員波特尔先生在1883 年一次演說中，曾公开說明这一政策的結果，内容摘录如次：

美国在 1861 年实行摩立尔关税議案以前，从事于絲織业的共有五千人。1880 年增加到三万人。絲織品产值从 1860 年的一百二十万鎊增加到 1880 年的八百万鎊。"但是达到消費者手里的制成品的成本，以金币計，在稳步降低，超过了原料成本的降低程度。"波特尔先生接着又談了关于陶器与玻璃板工业的一些情况，然后說："根据关税委員会所取得的証据，我們无疑地看到，由于美国国内竞爭，对消費者說来，費用已經有了降低。因此，各位先生，我认为，而且可以用統計証明，就美国的情形來說，保护制度終于在各种情形下都使消費者得到了好处；根据这个理由，我贊成并且拥护这个制度。"——英譯本注。

看穿了这一手花招。据說他是这样回答坎宁先生的，“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許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經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沒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說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許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維萊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坎宁被这个决絕的回复触恼了，他回国后在議会里大言不慚地說，他利用了干涉西班牙事件，把一副重担子放到了法国政府的肩上。由此可見，坎宁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情緒，并不是象大陆上那些好心腸的自由主义者所設想的那样眞摯。坎宁先生对于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若果有絲毫在念，他又怎能仅仅为了要想加重法国政府的負担，而使西班牙的自由政体在法国干涉下受到牺牲呢？問題的眞相是这样的，坎宁先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英国人，在他嘴里的那些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英国工商业优势的加强与更进一步扩展，或有助于蒙蔽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方的意識时，他才会津津乐道，才会让他自己怀有这样的情緒。

事实上，在維萊耳先生方面也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才能看穿坎宁先生为他設下的圈套。德国在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工业不断的衰退，維萊耳先生根据邻国的經驗，对英国的所謂自由貿易原則的眞正意义，早已心中有数。况且法国在 1815 年以来施行的制度下，进行极为顺利，它决不肯学寓言里那只狗的样，放下嘴里現有的东西而向影子里去扑空。象沙普塔尔与查理·杜平这类人，对法国工业現状是具有极深刻的观察力的，他們都曾以最坚定的語气說明这个制度的成就。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著作，內容沒有别的，只是表示对法国商业政策的拥护，只是从全体、从每个細节上来說明这方面的成就。从以下所引的一段，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旨趣所在。"我們不可让自己陷入抽象哲学的迷途而不能自拔，我們首先要抓住現实，首先要就已有的事物加以改进。妥善的关税制度是工业的堡垒。在这样的制度下，进口税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增减，可以使过高工資与过高燃料价格这方面的損失获得补偿，可以保护尙在萌芽时期的技术与工业，直到它們充分壮大足以抵抗国外竞爭时为止，可以助成法国工业的独立并通过劳动使国家富裕起来；我在上面已經屢次指出，劳动是財富的主要泉源。"①

查理·杜平在他的《論法国生产力与 1814 至 1847 年間法国工业的进步》那本书里，对于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行的商业政策的成就，作了詳尽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經过了半个世紀的努力，作了那样大的牺牲，获得了那样丰富的成果，前途又那样充滿着希望，作为一个法国的执政者，在这些方面旣已看得这样清楚，是决不可能受到麦修恩条約的誘惑而忍使前功尽弃的。

美国 1828 年的税則是英国商业政策造成的必然結果。这个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豆粉及其他农产品一概关在英国的門外，至于原棉也只有用来交換英国工业品时可以允許进口。在这样情况下对英国进行貿易时，只有美洲黑奴的农业劳动是受到鼓励的，而美国比較最自由、最进步、最强大的那些州的經济发展則受到了极大阻撓，它們每年的剩余人口和資本不得不向西部的荒地移殖。赫斯启森先生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英国駐华盛頓大使曾不止一次地将英国政策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正确地告訴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假使赫斯启森先生果眞是象别国人民所想象的

① 沙普塔尔：《法国的工业》，第 2 卷，第 147 頁。

那样一个人，他将利用美国公布税則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宝貴机会，乘此使英国貴族領会到谷物法的失策，告訴他們及时把它廢除的必要。但是赫斯启森先生怎样呢？他对美国人大发脾气（或者至少是装成这样），在盛怒之下說了許多强詞夺理的話，这些話的不符事实，美国农場主們都是一目了然的，他还使用威胁手段，造成了笑柄。他說英国对美輸出大致只占英国輸出总額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輸出却要占美国总輸出的半数以上。他企图从这一点証明美国的受制于英远胜于英国的受制于美；他还說，如果由于战争、絕交等等原因以致貿易中断时，美国所感受到的恐慌也将远过于英国。如果单从进出口总值来看，赫斯启森的話似乎也有些理由；但是如果从双方进出口的性质来考虑一下，就会使人感到詫异，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个論点，这一点所証明的同他所希望証明的是恰恰相反的。美国运往英国的商品，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原料，这些原料經过英国人之手价值至少可以提高十倍，这些原料英国人既絕对少不了，而且一下子也不容易改从别处购得，至少无法全部从别处购得；而美国从英国輸入的則全部是工业品，这些东西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同样便利地从别的国家輸入。再說两国之間发生了商业中断时的影响情况，如果根据价值理論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論为依据，則足以招致无限損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因为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紡織厂将因此停工、倒閉。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富源就象发生了魔术作用一样，将一泻千里，每年的損耗将远远超过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由此在和平、財富、信用、商务与权力各方面所发生的不利影响将无可計量。但在美国方面这样的情形将造成怎样的結果呢？它原来由英国得来的工业品現在不得不自己制造，数年以后，英国所失的就是它的所得。毫无疑問，这样的政策必然要引起你死我活的斗爭，就象以前航海条例曾引起英国与荷兰之間的斗爭一样；斗

爭的結果或者也会同往时在英吉利海峽的战役結果相类。照現象的趋势看来，似乎迟早总不免决裂，但結局如何，这里正不必深究。总之，上面所說的一些，已經足够証明赫斯启森先生論调的无益与危險；英国由于它的谷物法迫使美国自行制造工业品，这一行动显得多么愚蠢；假使赫斯启森先生不說那些輕率的話，对問題不抱玩弄态度，而尽力設法消除足以导使美国采用 1828 年稅則的那些原因，这样的做法将显得多么明智。

赫斯启森先生为了要向美国人証明他們与英国进行交易的有利，向他們指出了英国輸入原棉数量的突飞猛进这一事实；但美国人是懂得怎样来估量这一說法的眞正意义的。由于美国十多年来棉花产量大大超过了消費，超过了需求，因此这一商品的价格逐年降落，跌价的程度几乎同出口量增加的程度相等；这一点可以从下列統計看出，1816 年美国售出棉花八千万磅，获得的代价是二千四百万美元，1826 年售出量达二亿零四百万磅，所得的代价只二千五百万美元。

最后赫斯启森先生还向美国进行威胁，說是要通过加拿大作有組織的大規模走私活动。在当时情况下足以危及美国保护制度的各种手段，的确再沒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但是要想一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是不是美国人就甘心听任他們的制度由英国議会来摆布；关于他們的工业前途，議会喜欢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是不是他們就会这样年复一年地忍耐过去而絕无反抗呢？这是多么荒唐的設想啊！事实上将由此引起的唯一結果是美国将强占加拿大，把它并入合众国，否則就是一等到走私貿易发展到忍无可忍的情况时，即行协助加拿大实行独立。假使一个已經在工商业方面占了优势的国家，对待在种族、語言与利害关系各方面同它都是极度密切的一个农业国的办法是，起先迫使这个农业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然后为了阻遏它在这样情况下所必

然要引起的冲动，却迫使它去帮助这个优势国家自己的殖民地实行独立，这样的举动在我們看来，岂不是愚蠢得有些过分了嗎？

赫斯启森死后，由波利特·湯普森先生担任英国商务指导事宜。这位政治家不但继承了他的大名鼎鼎的前任者的职位，也继承了前任的政策。这时就有关美国的方面来說，无需他有什么作为；因为美国由于植棉者与进口商的势力影响，加以民主党的支持，特别是由于所謂 1832 年的折衷方案，不必英国費力，已經将以前的税則作了修改；这次的修改对原有税則的过甚之处以及一些缺点当然有所糾正，但是对美国粗棉毛織物工业仍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尽管如此，已經使英国获得了它对美国所期望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則并沒有被迫作出相对的让步。

自从折衷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輸出积极增加。从此英国对美輸出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英輸出，使英国可以随时吸取在美国流通的貴金屬，数量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因此每逢英国自身感到貨币流通量不足时，就会在美国引起商业恐慌。这里有一点最使人惊訝的是这个方案的倡議者就是亨利·克萊，而这位先生却是对美国工业利益最杰出、最有远見的拥护者。談到这里我們一定記得，美国工业由于 1828 年的税則而获得的发展，引起了植棉者方面极大的猜忌，这时南部各州其势汹汹，說 1828 年税則如果不加以修改，将不惜使联邦陷于瓦解。这时在联邦政府执政的是民主党，它只是由于党派利益与竞选动机，对南部各州的农場主表示了左袒，而且向屬于这个党派的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經营者进行疏通，要他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些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經营者因为商品价格普遍高漲，也失去了原来对工业势力的同情心，却不曉得物价的这种漲势主要是国內工业与无数运河及鉄路建設事业发达的結果。他們看到南部各州的反抗态度这样激烈，势将引起整个联邦的眞正决裂，甚

至可能引起内战，在这方面或者也的确存有戒心。因此保持与南部各州民主党的同情关系，就成为中部和东部各州民主党的党派利益。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舆论也有了转变，倾向于赞同对英进行自由贸易，照这个时候的大势看来，很有可能，国家的整个工业利益将在赞同对英自由贸易的论调下受到牺牲。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亨利·克莱的折衷方案似乎成了至少足以部分保持保护制度的唯一手段。在这一方案下，为了保全美国工业的一部分（即从事于制造比较粗劣、代价较低的那些商品的工业），另一部分工业（即制造比较精致贵重商品的工业）将成为对外竞争下的牺牲。一方面一切现象似乎都表明，美国的保护制度再过几年将重新抬头，再度获得新的发展。在英国方面，不论怎样诚意地希望减轻美国商业恐慌，通过购买股票、贷款或移民方式从英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量不论怎样巨大，但美国进出口价值不能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在日益扩大，在这样情况下是决不能长期依靠上述方法来保持收支均衡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惊心动魄的商业恐慌，此后势将继续发生，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祸害的根源，总有一天会下决心来铲除祸根的。

此后赞成保护制度的人一定又会一天天增加起来，赞成自由贸易的人又会一天天减少下去，这是势所必然的。迄今为止，由于工业在前一时期的发展、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建设、棉花产量激增以后对生活日用品需求的高涨，部分也由于农产品的歉收，一般农产品的价格得以保持在非常高度的水平上。但是人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样的价格数年以后势必回跌，将跌到通常标准以下，低于标准的程度就象原来高于标准的情形一样。自从折衷方案成立以后，美国资本的增额大部分用在农业方面，目前对这方面的生产仅仅在开始发生作用。由此农业生产将获得非常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需求必然将大大降低。第一，公共建设此后不会再有同样程

度的扩展；其次，由于国外竞争，工业人口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增长；第三，棉花生产已经大大超过消费，植棉者由于棉花价格低落，将不得不另谋发展，他们原来向中部和西部各州购入的生活必需品，将由他们自己来生产。假使再加上农产大丰收，中部和西部各州那时就将再度面临象实行1828年税则以前那样的情况，受到农产过剩的危害。但是同样的前因必然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就是说，到那时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必然会看到，只有在国内工业人口有了增长以后，农产品的需求才能有所增长，而要使国内工业人口增长，只有扩大保护制度才能实现。在这样情势下，拥护保护制度者的人数和势力将日益增长，而反对派将相对地减弱，这时环境已经有了变化，植棉者如果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就必然会看到，国内工业人口的增长与原料及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都是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美国植棉者和民主党的意向所在，他们以极大热情、在出自本愿的心情下所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是有助于英国的商业利益的，这就使汤普森先生的商业外交天才，在这方面暂时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但是法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里人们所念念不忘的还是禁止制度。诚然，这里有许多政府官吏是价值理论的信徒，也有许多议员主张扩大英法之间的商业关系，由于当时两国处于同盟地位，这样的见解相当流行。但是怎样来达到这一目的，却没有一致意见，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具体表示。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无可争辩的，那就是对国外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料征收高额关税，不容许那种以对法国的工业极为不利的方式输入英国产的煤和生铁，一方面如能促进葡萄酒、白兰地和丝织品的输出，则将使法国获得极大利益。

当时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对于禁止制度的有欠完善只是在口

头上普遍加以责难；但就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攻击，看来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七月革命以后的政府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而这个阶级的绝大部分是与大工业企业有关系的。

汤普森先生针对着这样的情况拟出了一个行动计划，从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广有智谋与外交手腕的老练圆滑。他特为选派了鲍林博士到法国去，这位先生对法国的工商业情况与商业政策是彻底精通的，向来以抱有磊落、阔大的胸襟见称于世，是一位学者，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走遍了整个法国，随后又到了瑞士，去搜集现场的最新资料，用来攻击禁止制度，宣传自由贸易。鲍林博士凭了他向有的机智与干练，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两国间就煤、生铁、葡萄酒与白兰地等项进行进一步自由贸易的有利情况。在他的公开报告里，他的论点主要只是限于这几项商品；关于工业的其他部门他只举了些统计数字，至于这类工业通过对英自由贸易可以获得怎样的推进，他没有提出具体意见或详细论证。

鲍林博士的行动是严格遵守汤普森先生所给他的指示的，那些指示是在深思熟虑下用高度的技巧构成的，出现在他报告的开头部分。汤普森先生使用了十分冠冕堂皇的语调。他表示极端关怀法国的工业利益，并表示对于拟议中的对法谈判，绝不能期望获得任何重大结果。这时法国的棉毛纺织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英国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法国方面未免惴惴不安，而汤普森先生这样的表示正与安定人心的作用完全相配合。按照汤普森先生的意见，在这些方面对法国要求重大让步是愚不可及的。

另一方面，关于“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怎样可以比较容易达到目的这一点，他作了一些暗示。这类所谓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指的是哪些，在他的指示中当然没有举出，但是根据后来法国的经验来

看，却完全可以懂得汤普森先生的意思，因为当他草拟这个指示时，英国运销法国的麻纱和麻织品是列入“重要性较次”的项下的。

法国政府被英国政府及其代表们的那些花言巧语所感动，就打算对英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由此它自己也许还可以终于获得些便宜，于是降低了麻纱与麻织品的进口税。这时法国工业面对着英国在这类工业上的巨大改进已没有任何保护，就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英国这类商品对法国输出有了大量增进，1838年的输出总额即达三千二百万法郎。法国整个麻纺织业的价值极为庞大，达好几百万法郎，对农业和整个农业人口福利的关系极为重大，这时由于英国占了先着，这一工业有全部垮台的危险；除非设法提高关税，制止英国的竞争攻势，否则危险的发生就势难避免。

法国受了汤普森先生的愚弄，这一事实已经极其明显。他在1834年已清楚地看到，英国由于在制麻布的技术上有了新发明，这一工业在数年以后将有重大发展，所以他在这次谈判中是指望着利用法国政府对于这类发明及将由此引起的必然后果还一无所知的情况的。在法国主张降低税率的人们现在竭力要使大家相信，他们不过是要想借此对比利时的麻纺织业作某种让步。但是这能掩饰得了他们对英国在这方面进展情况缺乏知识，对由此所将引起的必然后果缺乏远见吗？

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总是肯定的：法国为了英国方面的利益而失去它的麻纺织业的大部分，因此必须进一步设法保护它自己；这次英法间的增进贸易自由，是一个最近的、崭新的经验，使人永远想起前者的老奸巨猾与后者的不够练达，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新的麦修恩条约，第二个伊甸条约。这时法国麻纺织业者怨声载道，法国政府也有意纠正已经铸成的大错。但是汤普森先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怎样呢？他完全模仿了赫斯启森先生的老调，他大肆威吓，说是要将法国的酒和丝织品摒之门外。这就是英国的世界主义。

法国的麻紡織业已經有了一千年的历史，同它下层社会的整个經济，尤其是同它的农业，已經极度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这一工业的产品是一切阶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全部价額达三亿到四亿法郎；而为了换取特权，得以将額外数百万法郎的酒和絲織品輸赴英国，法国就得放弃这样一个工业。麻紡織业与酒类及絲織品出口双方在价值上的悬殊是一个問題，还有一点必須考虑到的是，法国失去了麻紡織业以后，如果由于战争而两国的商业关系中断，它将处于什么地位；这时法国酒类和絲織品的过剩部分将不再能运往英国，而同时如麻織物这样一类重要的必需品，它将感到缺乏。

任何人对这一点仔細想一想就会明白，麻織物問題不只是一个經济福利問題，而要比这一点重要得多，它同有关国家工业力量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涉及国家独立自主与国家权力的問題。

看起来情形的确是这样，創造发明精神好象是替它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这一精神通过对麻紡織业的改进，使各国理解到工业的本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对国家独立自主与权力的影响，从而暴露了流行理論的錯誤論点。如所周知，流行学派认为各个国家对生产的不同部門各有它的特长，这种特长或者是来源于自然条件，或者部分是从它的經驗过程中得来的，通过自由貿易，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們在前面的一章里曾經举出証据，說明这种說法只有就农业而言是对的，农业所主要依靠的是气候和地力，但是工业的情形不同，凡是处于溫带的国家，如果它具有必要的物质、精神、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方面就具有同等的能力。目前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最显明例証的就是英国。我們曉得，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人民在一千年以前就从事于麻的紡織；如果要問，以过去的經驗与努力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来說，哪些国家最适宜于发展麻紡織业，那么应当說就是这些国家。而英国的情

形却不同，它直到上一世紀中叶，关于这一工业显然还很少进展，它所需要的麻布，那时候大部分是从国外輸入的。如果不是靠了关税对这一工业的不断保护，它甚至还不能用自制的麻織品来供应自己的市場与殖民地。人們都知道，卡斯尔累和利物浦两位勛爵曾在議会中引証說明爱尔兰的麻紡織业如果不是靠了保护制度，就无法与德国竞爭。一百年来，英国的麻織品在全欧洲是最低劣的，但是由于有了新的发明，我們現在却看到它咄咄逼人，企图壟断全欧洲的麻紡織业；这正同棉紡織业的情形一样，近五十年来，英国壟断了东印度群島的棉业市場，然而在一百年前，它的棉織品甚至在自己市場上也还不能与印度产品竞爭。虽然拿破侖是第一个对棉紡机的发明出了那样大的賞格，虽然法国的机器工人和工业家早在英国人之先就从事于麻紡織业，而英国近来在这一工业上何以会有这样的巨大进步，这一点目前在法国已成了一个爭論不决的問題。人們要問，在机械方面具有較大天才的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于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釋，但是沒有一种解釋是正确的和合情合理的。要說英国人在机械方面的才能得天独厚，或者說在工业方面的技巧与耐劳精神胜过德国或法国人民，这样的說法当然是荒謬的。在爱德华三世的时代以前，英国人在全欧洲要算是最粗野、最无能的，那时他們当然决不会想到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上或工业的技术上可以同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或德国人媲美；但自此以后他們的政府就开始着重教育事业，因而逐步前进，終于在工业技术上青出于藍，可以同他們的师傅爭一日之短长。如果說近二十年来英国人在麻紡織机器制作方面的进步超过了别的国家，特别是法国，那么其中原因不外是以下几点：第一，他們在机械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卓越成就；第二，他們在棉紡織机器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类机器与麻紡織业用的机器在性能上是极相近的；第三，由于以前的商业政策，他們比法国人积累了較多

的資本；第四，由于他們的商业政策，他們麻織品的国内市場比法国的要大得多；最后，他們的保护关税，加上上述种种情况，使国内在机械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較大的鼓励和方便，得以专心一志地从事于改进这一工业部門。

以下几点是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一切的工业部門彼此之間有着极密切的交互作用；一个部門有了改进时，就为其他一切部門的改进作好了准备，起了推进作用；忽視了任何一个部門时，其他一切部門必然要感受到由此发生的影响；总之国家的全部工业力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于上述一些意見，英国人給我們提供了一个显著的确証。他們最近在麻紡織业方面的成就，对于上述意見提供了一个更加显著的确証。

# 第三十四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德国商业同盟

德国在最近二十年来方始看清楚，它自己現在是何等样的一个大国，却沒有一个有力的商业政策；假使它有了这样一个政策的話，将居于怎样的地位。德国的情况，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澤西州的那句話一样，“是一只被邻居們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們吸光了”。英国已經破坏了德国大部分的工业，以大量的棉毛織物向德国运銷，可是还不滿足，它不允許德国的谷物和木材进口，甚至有时还要排斥德国的羊毛。曾有一个时期，英国运銷德国的工业品比运到它所竭力称道的印度帝国去的，还要多十倍。然而这个壟断着一切的島国对待可怜的德国人比对被征服的印度人还不如，它輸出德国人所需要的工业品以后，甚至不允許他們用农产品来偿付。德国人低首下心，使自己成了替英国人劈柴挑水的苦工；但是沒有用。英国人对待他們比受統治的

人民还要糟。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如果让自己被某人欺侮了，其他一切的人就都会看他不起，最后甚至会成为孩子們嘲笑的目标。法国以大量的酒、油、絲綢和女帽运銷德国，但是对于德国牲畜、谷物和麻布的出口还非常猜忌。不仅如此，有一个小小的沿海省区，原来屬于德国，是德国人的聚居之处，它靠了德国达到了富强地位，一向是靠了德国才能維持的，却用了一套口头上的无聊的詭辯，阻塞了德国的最大河流达十五年之久。作为这种侮辱的补充曾举办无数的职业讲座来宣傳一种学說，說是只有靠了普遍的自由貿易，国家才能达到富强。过去的情况如此，那么現在呢？德国在繁荣方面、工业方面、国家的尊严与国家的权力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十年的过程相等于一个世紀。怎么会取得这样成就的呢？使德国人彼此之間互相隔絕的国內关稅廢除了，这当然是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德国的国內工业，从那时起如果依然要毫无限制地受到国外竞爭，它就不能单单靠了这一点而高枕无忧。怎么会避免国外竞爭，怎么会产生这种奇迹的呢？主要是由于在关稅同盟下的稅則对普通日用品制造工业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們不妨公开說明。鮑林博士已經将这一点明白指出，① 他說在关稅同盟下的稅則，并不只是象以前所說的那样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收入关稅，稅率并不只是象赫斯启森所想的那样以百分之十到十五为限。对的，我們不妨坦率承认，关于日常使用的工业品，德国关稅同盟所征收的保护关稅从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不等。

但是实行这样的保护关稅有了些什么結果呢？是不是消費者对德国工业品所支付的代价比他們以前付給国外輸入工业品时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六十（假使流行学派的理論是正确的話，情形就必然是这样），或者說这些产品全然不及外来的产品呢？根本沒有

① 約翰·鮑林：《关于德国关稅同盟向巴麦斯頓子爵的报告》，1840年。

这么一回事。鲍林博士自己也引証說明，这类在高額关税下生产的工业品比外国制造的质量好，代价也低。① 由于国內的竞爭，由于防止了有害的国外竞爭，就产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是流行学派所不了解的，也是它下定决心所不願意了解的。由此可見，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內产品价格按所收税額提高的說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保护制度，在短时期內也許会使产品价格增长，但以任何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的情形来說，国內的竞爭不久就会使价格回到容許国外工业品自由輸入时的价格标准以下。

在高額关税下，农业有沒有受到損害呢？一点也沒有。农业是大有所得的；近十年来它获得了十倍于前的利市。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长。农产品价格到处有了提高。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国內工业的发展，各处地产价値上漲了百分之五十到一百不等，各处在支付着較高的工資，交通运輸設备正在各方面改进，有的已經实現，有的正在計划中。

我們的保护制度既已获得了这样的輝煌成就，势必鼓励我們循着这一路綫繼續前进。商业同盟中有些邦也主張采取相类步驟，但是还沒有見諸实施。然而也还有些别的邦，看来它們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取消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税，想由此获得繁荣；据說也还有些有势力人物依然信从着世界主义，不相信自己的經驗。鲍林博士的报告对于这些方面，对于德国商业同盟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的策略，都有极重要的說明。現在让我們对这个报告来作一番大致的观察。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写这个报告时的观点。鲍林博士的来到德国，是墨尔本內閣下商务大臣拉布謝尔先生派遣的，与 1834 年

① 参看波特尔的报告，见本书第 310 頁附注——英譯本注。

湯普森先生的派他前往法国屬于同样目的。到法国去的使命是要借了在葡萄酒与白兰地貿易方面的让步，誘使法国对英国工业品开放它的国内市場；同样的情况，对德国的目的是要借助于谷物与木材貿易方面的让步以取得相类的效果。不过就这两次使命来說，其間也有一个重大区别；英国对法国所提出的让步是不会引起它自己国内的反感的，而对德国提出交換条件时，却首先不能不在它自己国内經过一番斗爭。

因此对法与对德这两个报告的旨趣，彼此在性质上势必大不相同。关于英法間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是专为法国人写的，在报告里必須說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幷沒有获得什么美滿成就，必須使人們相信伊甸条約是对法有利的，拿破侖的大陆制度以及現行的法国禁止制度是对法极端有害的。总之，这里与亚当·斯密的理論必須密切一致，对于保护制度的一切良好成就必須切实地全盘加以否认。但是另外一个报告的任务却沒有这样簡单，这是同时向英国地主和德国政府两方面进言的。对前者必須这样說：你們看，現在有这么一个国家，由于实行了保护制度，在工业上已經有了巨大发展，它具有循此前进的一切必要手段，正在加快步伐从事于独占它自己的国内市場，进一步在国外市場与英国相竞爭。上院的保守党員們，下院的乡村地主們，你們看看，事体就是你們搞糟了的。这就是你們那个不合时宜的谷物法所造成的；由此使德国的食粮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資得以保持于較低水平。德国工业家，与英国工业家对照下就居于比較有利的地位。因此，你們这些傻子，赶快廢除谷物法吧。这样一来，你們就可以使德国工业家受到双重或三重的損害。这是因为：第一，粮食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資在德国将提高，在英国将抑低；第二，德国谷物对英輸出增加以后，英国工业品对德輸出卽将增加；第三，德国商业同盟已經声明，如果英国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給以便利，它也打算相应地降低

一般棉毛織物的关税。这样我們就万无一失，可以再度粉碎德国的工业。但是时不可失。工业家在德国商业同盟中的势力年年在增长，如果你們对于谷物法的廢除稍有迁延，就要为时太晚了。局势的变化是不会过迟的。不久德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对于它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将积极提高，以致使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可以运銷国外。为了要誘使德国政府对它自己的工业采取行动，不让工业家为他們本国人民来紡紗織布，不让他們侵占你們的国外市場，那么你們对德国政府到底願意作出哪些让步呢？

所有这些，都是写报告的人不得不向議会中的地主們談清楚的。英国的行政体制不容許作秘密的政府报告。鮑林博士的报告是一定要公布的，报告的譯文或节略是一定要給德国人看到的。因此在措辞中不可稍露痕迹，使德国人覚察到他們自己眞正利益的所在；因此在說服議会时所使用的一切說詞，不能不兼顧到有以解除德国政府方面的顧虑，防止在这方面发生不良影响。这个报告必須竭力說明，由于实行保护制度，德国的很多資本已轉向到不适当的用途；在这个制度下德国农业将受到損害。就农业方面来說，它所应当注意的只是国外市場；而农业是德国絕对最重要的生产事业，因为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以此为业。那种保护工业的說法簡直是胡扯，工业本身只能在外国竞爭下发展，德国輿論是拥护自由貿易的。德国社会的一般智力非常之高，因此不会抱有实行高額关税的願望。**如果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关税**，德国最开明的人士是贊成降低普通棉毛織物的关税的。

总之，在这个报告里我們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語調，就象是对立的两方彼此在辯难。哪一方应当认为是代表报告者的眞意的——是向英国議会說話的一方呢，还是向德国政府說話的一方？要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鮑林博士所說的一切，凡是要想劝告議会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税的，都有統計資料和根据数字的推算

作証，凡是要想劝德国政府不采行保护制度的，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說詞。

鮑林博士向議会証明，对于他所指出的德国在保护制度下着着进展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英国势将无可挽回地丧失德国这一工业品市場。现在让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論点。

他說德国人民是以克己、耐劳、儉約、聪明見称于世的；全国人民普遍受到教育，优良的工艺学校使技术知識的傳播遍及全国。

德国在設計技术上的造詣远非英国所能企及。德国的人口，它所畜养的牛羊，尤其是羊，逐年有巨大增长，說明它在农业上已經有了多大的成就。（报告里却不提到地产价値的高漲，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沒有提到产品价値的增长。）在工业地区，劳动工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德国有大量的水力現在还沒有利用，这是在一切动力中成本最低的。它的矿业，在国內各地都比以前有了更大发展。它的原棉的每年輸入量，在 1832 到 1837 年間，从十一万八千生丁納增加到二十四万生丁納，棉紗輸入从十七万二千增加到三十二万二千生丁納，棉織品輸出从二万六千增加到七万五千生丁納，普魯士的織布机从 1825 年的二万二千架增加到 1834 年的三万二千架，生羊毛輸入从九万九千增加到十九万五千生丁納，这一商品的輸出从十万增加到十二万二千生丁納，毛織品輸入从一万五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納，这一商品的輸出从四万九千增加到六万九千生丁納。

麻布的生产，因为在艰难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額关税作斗爭，所以沒有增长。但麻紗的輸入則从 1832 年的三万增加到1835年的八万六千生丁納，大部分是由英国輸入的，輸入量还在继續增进中。靛青的消費从 1831 年的一万二千增加到1837年的二万四千生丁納，这是德国工业进展的一个显著証明。陶器的輸出，在1832到 1836 年期間增加了一倍以上。石器的輸入从五千减

少到二千生丁納，輸出則从四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納。瓷器的輸入从四千減少到一千生丁納，而輸出則从七百增加到四千生丁納。煤的产量从1832年的六百万增加到1836年的九百万普魯士吨。普魯士1816年有羊八百万头，1837年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头。

在薩克森1831年有織袜机一万四千架，1836年增加到二万架。从1831到1837年間，这个地方的毛綫厂厂数和錠数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到处都兴起了机器制造厂，其中多数情况都极为发达。

总之，德国工业的一切部門，按照所受到的保护程度，都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显著的是一般使用的棉毛織品，这类商品由英輸入已經完全停止。鮑林博士根据他所听到的可靠意見，承认"普魯士毛織品价格的确比英国的低廉，有些染色比英国最上等的顏色固然要差些，但是其他的顏色簡直完美到无以复加，在紡織以及一切操作过程方面，德国已經完全可以与英国媲美，只是在最后一道修整工序上显有缺点，但这种缺点不久也会消除的。"

英国議会听到了这样的說詞以后，会終于接受劝告，廢除作为針对德国的一种保护措施的谷物法；这一行动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德国同盟方面，眼看到实行保护制度以后已經获得了这样大的进展，怎样就会听受这个报告的劝誘而放弃那产生了这样良好效果的制度，这却是我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鮑林博士告訴我們，德国工业是在牺牲农业利益下受到保护的，他要这样說也好，这是他的說法。但是我們看到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农产品的需求、产品的价格、劳动工資、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处处都在高度增长，而农民对于他所需要的工业品无須付出較高代价，我們根据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說詞怎么能信以为眞呢？

鮑林博士給我們一个估計，說德国从事于农业与工业的人数是三与一之比，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那个說法使我們相信，在德国

从事于工业的人数与从事于农业的还沒有取得适当比例。現在英国有些工业經营者所消費的是英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农产品，他們的出品所供应的却是德国市場，德国对于本国的这类工业应当加强保护，使它們逐漸发展；要糾正上述的不平衡現象就得从这一点着手，除此以外，我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糾正方法。鮑林博士又說，德国如果希望扩充农产品銷路，必須全力注意向国外发展，这也說得很好。但是要使农产品的需求有巨大增长，只有使本国的工业有了充分发展，这个願望才能实現，不但英国的已往經驗这样教导我們，而且鮑林博士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因为他在报告里說，英国对于谷物法的廢除如果再迟延下去，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或木材可以运銷国外，他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鮑林博士說，在德国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农业，这句話当然說得很对；但正是由于农业还占着主要地位这个原因（象我們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須发展工业，使工农两者处于适当比例关系，因为农业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所依靠的就是与工业取得等比关系，而不是它自己对工业保持优势。

报告的作者还有一种錯誤論調，他說，就德国工业本身而言，在德国市場上的外国竞爭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工业等到能够供应德国市場以后，为了出售剩余产品，就必然要与别的国家的工业相竞爭，这时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經得起这种竞爭；但是低价产品的生产是与保护制度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工业家能維持較高价格。

这种論調是荒謬透頂的。鮑林博士不能否认这一点，一个工业家越是有机会多生产，就越能按較低价格供应他的产品；因此能够独占本国市場的工业，就能够在国外貿易中供应价格較低的产品。在他所发表的关于表示德国工业发展的数字里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証据；因为这类数字表明，随着德国工业对它本国市場的占

有程度，它的产品輸出量也同时增进。由此可見，德国最近的經驗与英国过去的經驗一样，說明工业品价格高漲并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結果。

事实上現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場的情况还很远。要做到这一点，关于目前由英国輸入的棉織品一万三千生丁納，毛織品一万八千生丁納，棉紗、棉綫、麻紗五十万生丁納，就首先必須要能由自己来制造。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原棉的輸入就須比以前增加五十万生丁納，就須与热带地区进行更多的直接貿易，对于輸入的原料，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要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

鮑林博士认为德国人民自从商业同盟成立以后，对于英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所謂"自由貿易"这个名詞获得了比較清楚的认識，他曾这样說，"自从那时起，德国人民的情緒已經由側重虛无縹緲的希望与幻想的領域脫离了出来，轉向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因而断言德国輿論贊成自由貿易。我們对于这样的見解必須加以糾正。他說德国的教育非常普及，一般人民都有知識，这句話說得很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現在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中。这里的人民現在由自己来进行独立思考了；他們相信的是自己作出的結論，是自己的經驗，是自己的健全常識，而不是与一切經驗相違反的一面之詞。当初伯克曾私下向亚当·斯密說，"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針决不能以世界主义为依据，所依据的应当是从深思熟慮中了解了的关于他們国家特有利益的知識"；伯克为什么这样說，这个道理他們現在明白了。那些說客的話往往进一句出一句，反复无常；德国人民現在不相信这一套了。有些人在地位上是德国工业的竞爭者，当这些人对德国人民表示关怀，提出忠告时，其間究竟有多少眞正价值，他們也已懂得怎样来作正确估計了。总之，每逢在談論中的是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議，德国人就

会提高警惕，就会把希腊人贈送木馬那件人人知道的故事記在心里。

由于这些原因，說是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們果眞要迎合这个报告的作者的願望，就是說，为了能够把少許的谷物和木材运銷英国，为了取得对方这样一点渺小得可怜的让步，就甘願放弃它的保护政策，我們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无論如何，德国輿論总不会把这样的政治家看成是有深謀远虑的。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要当得起这样一个尊称，单单精通世界主义学派那些肤淺的措辞和論点是不够的。人民对于一个政治家所期望的是，他不必把心机枉費在学說理論方面，他要彻底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要能够发展前者，滿足后者。假使一个政治家不懂得使一国的工业提高到象德国工业現已达到的阶段，其間需要多大的努力；不能够在内心里預見到国家前途的偉大；只是使德国工业阶級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受摧殘；对于一个第一流工业国家所据有的崇高地位与只从事于輸出谷物和木材这样一个国家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这两者之間的差别；就谷物与木材的国外市場来說，即使在平时也是极度不稳定的，关于对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让步是极容易被推翻的，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敌对性的商业政策使貿易中断时是会引起极大动乱的，在这些方面都沒有足够才智来加以估量；最后，别的强大国家是怎样依靠了自己的在一切部門都得到发展的工业，使国家获得了生存、独立与权力，对于这些已有的例子也沒有能吸取教訓——假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他就表明了关于什么叫作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这一点，他是完全无知的。

这个报告的作者在他报告的第二十六頁里說，他认为德国商业同盟的政策所追求的只是普魯士的单独的利益，因为同盟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普魯士人；如果人們相信这样的意見，那么毫无疑

問，他們一定是大大低估了 1830 年以来在德国兴起的民族精神与团結力量。但普魯士的利益要求对英輸出谷物与木材，普魯士在工业上所投資本很少，因此它对于足以阻碍国外工业品輸入的任何制度将坚决反对，它的各部門領导人都抱有这样的意見。然而这位报告者在他报告的开端却这样說:“德国关税同盟是弥漫全国的国家統一观念的化身。这个同盟如果能好好地領导，必然能把德国各方面的势力融合在一个共同組織中。这方面的好处已經由經驗証明，为大家所熟知。这是德意志人民走向国家統一的第一步。它依靠商业問題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已經打开了在政治上趋于統一的道路，原来那种器量狭小的看法、偏見和固陋的風俗习慣已經消失，代之而兴的是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个更广泛、更坚强的因素。”他在报告的开头一段里既然作了这样完全正确的評述，而又說普魯士为了自己方面假定存在的（无論如何只是一时的）私利，就願意牺牲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就不会看到德国的商业政策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就不会看到普魯士自身必然与整个德国共存共亡；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矛盾，又怎样能够統一起来呢？他又硬說普魯士各部門領导人都反对保护制度，但是对普通棉毛織品的征收高額关税就是从普魯士本身方面发生的；前一說法又怎么能与后一事实相一致呢？基于說理上的这些矛盾，再看到报告者把薩克森的工业发展情况描繪得那样如火如荼这一事实，不是要使我們不得不作这样的揣測，认为要激起普魯士猜忌之心的正是报告者他自己嗎？

但不論怎样說，鮑林博士对各部門領导人的私人意見这样重視，却是很使人感到詫异的。他，作为一个英国作家，应当知道輿論的力量，应当曉得，在我們这个时代里，即使在非立宪国家，各部門領导人的私人意見如果与輿論、尤其是与整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相違背，如果贊成危及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的办法，那些意見就无

足重輕，是不値得談起的。他自己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报告的第九十八頁里說，普魯士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廢除英国谷物法这件事所获得的經驗一样，也充分体会到，官吏們的見解并不都是能付諸实施的，因此即使沒有德国同盟方面事先的让步，是否应当允許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場，似乎也有加以考慮的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也可能会打开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市場的道路的。这个意見无論如何不能說不正确。鮑林博士清楚地看到，假使不是由于谷物法的存在，德国工业是决不会获得这样进展的；因此把它廢除以后，倘若德国的关税依然不变，那么它的工业不但继續进展会受到限制，而且必不能免于大大的衰退。可惜的只是英国人沒有能在二十年前看到这一論点的恰当。現在的情况可是不同了，英国的法制本身使德国农业脫离了英国工业，从而使德国走向发展工业的道路已經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在这一目的上已經付出了重大代价，現在德国如果由于英国廢除了谷物法，就在任何程度上放松了对自己国家远大前途的爭取，那就只能說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愚昧，以致这样地輕举妄动。的确，我們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必要随着英国工业由于取消谷物法与德国工业对照下所获得的利益程度，按照这个程度的同等比例，来提高它的保护关税。德国在一个很长时期以內，对待英国不能有別的政策，只是一个工业落后国家当它全力爭取要使它自己与工业最先进国家处于同等地位时所必須采取的那种政策。任何別的政策或措施，总是会危及德国国家的安全的。如果英国人需要外国产的谷物或木材，它尽可以向德国或它所喜欢的任何別处去购买。德国对于它迄今为止在工业上所获得的进展将继續加以保护，保护的程度决不因谷物法的廢除而稍减，对于前途发展的继續努力，也决不因此稍懈。如果英国对于德国的谷物与木材不瞅不睬，那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工业、海运与国外貿易更快地抬头，可以使德国

的国內运輸設备更快地建成，从而使德国国家得以进一步可靠地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这时普魯士出售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和木材所获得的价格，或者不能提高得那样快，象英国市場一旦对它开放时那样的高昂。但是，国內运輸工具的建成，工业方面对农产品的国內需求，将使这些地区的产品在德国內地的銷路迅速增长，这时这些地区所获得的一切利益是以国內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基础的，在这样情况下，这种有利地位就可以永久保持。这些地区从此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时而发生灾害，时而轉入繁荣，每十个年头就要来一次变化，使它們的貿易在这个局面下搖摆不定。还不止这样，普魯士沿海地区在产品的物质价値上眼前固然不免有所牺牲，但这种牺牲实在是一种投資性质，将来会得到补偿；将来德国內地力量大大加强以后，普魯士的政治地位将积极提高，它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将百倍于它以前在产品物质价値上的牺牲。

这个报告說明，英国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普通使用的英国棉毛織品得以进入德国市場；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部分是取消或至少修改按重量課税的办法，部分是降低关税，部分是容許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場。通过这些方法，对德国的保护制度就能够初步打开一个缺口。这类供普通使用的商品，我們在前面有一章里已經提到，是极关重要的，是一国工业中的基本要素。英国方面所希望的显然是从价征税百分之十，假使是这样，再加上低报价値这种慣行的伎俩，就可以使德国工业的大部分牺牲在英国竞爭势力之下，尤其是如果发生了商业恐慌，英国工业家有时就会不計較价格，尽量把存貨抛入市場。因此如果我們說英国建議的用意所在，簡直是要推翻德国的整个保护制度，从而使德国淪于英国农业殖民地的地位，这也不算是說得过分。它既存着这样的目的，所以要促使普魯士注意的是，在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关税以后将何等有利于它的农业，至于它的工业是幷不重要的。

它在同样目的下对普魯士又許下了願心，說是将降低白兰地的关税。同时对别的邦也不宜过于偏枯，让它們空手而去，于是也周旋了一下，說是对紐倫堡的产品、儿童玩具、科隆产的花露水以及别的一些瑣碎物品也将减稅百分之五。这样就使德国的一些小邦也获得了滿足，在它究竟也所費不多。

第二步就是要通过这个报告使德国各邦政府深信，如果让英国代它們来担任紡棉紗、麻紗的工作，对它們将如何地有利。商业同盟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政策是先从鼓励与保护棉布的印染工作着手，然后推广到織布工作，至于中等与上等的紗、綫則取自国外；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是說这个政策在任何时期就永远是正确的。随着国家工业的进展，如果要正确地达到建立工业的目的，稅率就必須提高。我們曾經指出，紡紗工业的重要不只是限于它自身，它是可以使国家进一步获得无数利益的根源，可以使我們由此与热带地区发生直接的商业关系，因此对于我們的海运与工业品出口方面有着极大影响，它对工业的任何部門固然都有好处，但尤其有利于我們机器工业的发展。德国在发展这一偉大而收益丰富的工业时所需要的水力与干练技工、或物质資本、或智力都是充裕的，决不会由于这些方面的欠缺而在发展前途上受到阻碍；因此如果說关于紡紗这一工作不能在漸进的保护下获得发展，从紡粗紗进而到紡細紗，經过五年到十年以后，使我們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能够大部分由自己来供应——如果說不能办到这一点，这种說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們对于谷物与木材輸出的利益，不論把它估計得怎样高，决不能与紡紗业所給我們的好处相提并論。我們如果計算一下将由紡紗业引起的对农产品与木材的消費，就可以看到，单单这一工业部門使德国地主所获得的利益，就必然远胜于国外市場将向他們或可能向他們提供的任何利益；的确，我們对于这一信心的表示毫无犹豫，这是可以用更无爭辯余地

的証据来証明的。

鮑林博士說，如果德国商业同盟不願将进口税大大降低，則哈諾威、布劳恩施魏克、两处梅格棱堡、奥尔登堡以及汉撒城市是否会加入同盟，他表示怀疑。但是我們对于这样的建議不能认眞考慮，因为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危害性，比所要挽救的那个損害，却还要大得无可計量。

我們对于德国前途发展的信心，幷不是象报告者那样的微弱的。已經証明，七月革命对德国商业同盟是有利的，同样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規模的变动，那些小邦对适应国家远大要求的躊躇不决的态度，就会获得轉变。商业上的团結一致，对整个国家有什么价値，对各邦政府有什么价値，除了单是物质利益这一点以外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当法国这次公然发出要夺取来因河边境的叫嚣时，已經第一次获得了有力証明。

国家的統一，是全国幸福、光荣、权力、目前安全存在与前途偉大发展所由爭取的堅稳基础，德国各邦政府和人民对于这一点，应当一天一天地明确起来。因此这些沿海小邦与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馳的态度，不但在同盟中各邦看来，就是在它們自己看来，也越来越覚得这是可耻的，应当以任何代价来加以去除。而且用理智的态度来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小邦加入同盟后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所得，将远过于它們所須付出的牺牲。德国的工业、国内运輸設备、海运事业与国外貿易，在賢明的商业政策下，是能够而且必然要随着它所具备的資源作相应发展的；这些方面的成就越大，那些小邦要从中直接分享利益的願望就越加殷切，它們指望仰仗外国获得幸福与繁荣的那种恶习慣也就越加会早日放弃。

至于汉撒城市，这里也可以特别提一下，我們对于汉堡教区的市民精神幷沒有感到气沮。根据这位报告者自己提出的証言就說明，在这些城市里有許多人有着这样的认識，认为汉堡、不来梅与

律貝克对德国国家的关系，应当而且必然同倫敦与利物浦对英国、同紐約、波士頓与費拉德尔非亚对美国的关系是一样的；他們清楚地看到商业同盟对他們在世界貿易方面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們必須服从同盟規章这一缺点，他們懂得，要想获得繁荣而沒有使繁荣可以长期继續下去的保証，这样的想法根本是荒謬的。

沿海各邦的居民，他若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当他看到本国船只的吨位在不断增进，各口岸的商业关系在不断扩大，而联想到如果沒有海軍力量的保障，只須从赫耳果兰开来两只战艦駐在威悉河与易北河口，就能在二十四小时內把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建成的事业毁掉，当他想到这一点时，怎能衷心地为他自己庆幸呢？可是商业同盟将保証这些口岸永远能够获得繁荣与进展，保証方法部分是在于創建自己的艦队，部分是在于締結联盟关系。它凭了有效能的領事机构和条約关系，将使这些口岸的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为它們的航运业爭取特殊权益，并将从事于保护与促进它們的国外商业关系。它将部分借助于它們的資源，从事于建立新殖民地，經营自己的殖民地貿易。商业同盟的組織充分完成以后，以各邦合計，至少可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人口的增长率約为百分之一点五，这样每年就很容易多出二三十万人来；我們各地区有知識、有教养的人民很多，他們的性格都特别乐于到遙远的地区去找出路，能够在任何地方安家落戶，不論哪里的无主地区需要加以开墾时，他們都可以在那里愉快地生活，象这样的人民是生来要与第一流国家的人民一样，从事于开拓殖民地，从事于傳播文化的。

德国人民感到有建立这样一个完善的商业同盟的必要，这种意向已經这样普遍，因此写报告的人也不得不这样說：“拥护商业同盟者一般希望有更多的海岸和港口，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在同盟下有統一的国旗，有强大的海軍和商船；但就目前情形来說，这

个同盟要同势力在增长中的俄国艦队与荷兰及汉撒城市的商船迎面抵抗，却很少希望。"我們当然无意于与这些国家为敌，而是要多多的靠攏它們，得到它們的帮助。我們說每一个强国的特性总是这样的，为了便于統治，总是要想分化别的国家。这位写报告的人，当他說明了为什么沿海各邦加入同盟是愚昧行动这一点以后，还希望使那些主要口岸永远与德国国家团体相脫离，他談到了在亚尔多納的仓庫，說是一定对汉堡的仓庫有害，好象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就沒有办法使亚尔多納仓庫如何来适应国家目的似的。我們对于他这种别有用心的推断不欲深究；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如果把这样的說法应用到英国方面，那就等于是說倫敦和利物浦假使与英国国家机构脫离，它們在商业上将获得非常发展。英国駐鹿特丹領事曾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所說的却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論点的用意所在。亚历山大·費里尔先生在他报告的末一段里这样說："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要用尽一切方法阻撓上述各邦以及比利时加入德国关税同盟，这一点看来是极关重要的，其中理由已經极为明显，不必再加解釋。"費里尔先生是这样說了，假使鮑林博士也这样說，假使英国的执政者們就照着这样的話行事，誰能怪他們呢？通过他們的言語和行动所表現的只是英国国家的本性。但是德国如果妄想从出于这样一种动机的建議里获得繁荣和幸福，那就未免超出了国家善良本质的适当程度了。費里尔先生說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話以后还加上这么一句："情势不論有了怎样的变化，必須始終把荷兰当作别的国家与德国南部通商的主要途徑。"費里尔先生說的所謂"别的国家"指的显然只是英国；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說，如果英国的工业优势失去了通往德国或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进路，还有荷兰作为一个主要过道，由此来控制德国南部的工业品和殖民地产品的市場。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場来看問題，那么我們认为不

論从地理位置、或工商业环境、或民族的血統与語言这些方面来說，都应当把荷兰算是德国的一个省份。它是在德国分裂的时期脫离的。如果不把它重新并入同盟組織，德国就好比是一間屋子，它的門戶却把持在陌生人手里。荷兰的屬于德国，就象布里塔尼与諾曼底屬于法国一样；如果荷兰决意要自成一个独立国家，只要这样的情况不变，德国就难以达到强盛与独立自主的地位，正同法国上述几个省份假使在英国人手里时，它就难以达到今日这样的地位一样。荷兰的商业势力已經趋于低落，这是由于国家范圍不大的原故。尽管它的殖民地很发达，但是它的地位仍将继續下降，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个国家过于弱小，不能担負这样浩大的海陆軍費。由于要勉力維持它的国家地位，它在負債方面就必然越陷越深。它虽然有很发达的殖民地，但无济于事，它对英国仍然处于依賴地位，表面上虽然独立自主，事实上只是加强了英国的优势。英国在維也納会議为什么要主張恢复荷兰这种表面上的独立地位，上述一点也是一个隐藏的原因。汉撒諸城市的情况同这里也完全一样。荷兰若是倒向英国一边，它的地位只是英国艦队的一个扈从；如果与德国合并，它就能成为德国海軍力的領导。就它目前地位来說，从它殖民地方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如果把这些殖民地轉变成为德国联盟的組成部分，那时它从中所得的利益必然将大大提高；这特别是因为它在开拓殖民地事业方面所需的一些要素，如人口，如精神力量，都过于薄弱。还有一层，迄今为止它在殖民地方面所以能获得一些有利发展，大部分是有賴于德国人的溫厚純良，或者不如說是由于德国人对自己的商业利益的认識不够；因为一切别的国家总是把它們的殖民地产品市場留給它們自己的殖民地或屬国的，只有德国市場对荷兰殖民地产品剩余量的銷售仍然开放。一旦德国人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一点，认为向他們供应殖民地产品的那些国家要明白，它們也必須在特定的优

惠条件下向德国购买工业品，方才能享受这种权益；到了那个时候，德国人也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們是有力量迫使荷兰加入关税同盟的。这样的結合，对德国与荷兰两方面来說都是极度有利的。德国对于荷兰，不但将使它从它的殖民地获得比現在更多的利益，而且将使它建立并取得新殖民地。德国对荷兰与汉撒的航运业、对荷兰殖民地产品的运銷德国市場，都将予以特别优惠的权益。反过来，荷兰与汉撒城市将优先輸出德国工业品，并将优先使用它們的剩余資本于德国内地的工业和农业。

荷兰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却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想从压制与削弱德国的生产力着手，来从中取利，而不去想法把它的偉大前途寄托在处于它背后的那些地区的繁荣上面，因为任何海国总是要同这些內陆地区共存亡的；它要想謀前途发展，而走的道路却是与德国脫离，不是与德国結合——由于这些原因，它終于从作为一个商业强国的崇高地位跌了下来。荷兰要想重新达到它以前的繁荣地位，只有一条路，只有通过德国同盟，跟它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只有依靠了这样的結合，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农工商业国家。

鮑林博士在他的統計中把德国关税同盟与汉撒城市、荷兰及比利时的进出口額集合在一起；从这样的归类，清楚地表明了所有这些国家是怎样极度地依賴着英国的工业；但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如果这些国家結合在一起，則它們的整个生产力将增长到怎样的无可計量的程度。他估計这些国家由英輸入按官价計19,842,121鎊，按申报价值計 8,550,347 鎊，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对英輸出只 4,804,491 鎊，英国从荷兰輸入的大量的爪哇咖啡、干酪、奶油等等也包括在內。这些数字是意味深长的。我們感謝这位博士作出这样的統計組合，也許这就是不久将实現的政治組合的先声。

# 第三十五章 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

我們在本书第二編已經指出，合理政治最高的終极目的是一切国家都联合起来，处于共同的权利法律之下；只有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間目前存在着的猜忌与冲突轉化为同情与和諧以后，它們在文化、繁荣、权力、工业各方面达到了尽可能的均等，只有这样，这个目的才能实現。但这个問題的解决是需要极悠久时間的一种工作。現在各国之間由于多种原因，彼此分裂、排斥，最主要的原因是領土方面的糾紛。到目前止，欧洲各国領土的划分并不符合自然事理。的确，关于領土划分的公平而自然的基本条件，人們即使在理論上也还未能取得一致。有些人认为国家領土应当按照首都的需要来决定，不必顾到語言、商业、种族等等因素，使首都得以处于中心地位，得以尽量避免国外侵略的危險。他們希望有广闊的江河作为边界。还有一些人，他們的理由显然更为充足，认为构成更好国界的是海岸、山脉、語言和种族，而不是广闊河流。現在也还有些国家，缺乏发展世界貿易与建立海軍时所不可缺少的港口与海岸。

无論哪一个国家，如果已經有了內部发展与保持政治及工商业独立所必要的領土，还要向外扩張，略取土地，那就違反了合理政策；因为这种不自然的領土扩張，必然激起被侵略国家的仇恨，并将使之耿耿在心，矢志不忘，結果使得胜的一方因保有这一地区而需付出的牺牲，将远远超过它由此所得的利益。現在大家是不考虑国家領域应当如何公平合理地划分这个問題的，因为其中还牵涉到属于另一性质的許多利害关系。同时还有未可忽視的一点是，关于疆土的修正，現在要算是对各国极关重要的問題，在这方

面的奋斗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这一点在許多情况下是訴諸战爭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些足以使各国之間引起爭执的原因是，目前在工商业、航运业、海軍与殖民地占有这些方面利害关系上的冲突，以及在文化程度、宗教与政治状态这些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再加上各个王朝与政权各有它的利害观点，就使这些情况在多方面更加复杂。

但是另一方面，出于某些国家彼此之間的同感，也可以造成对另一些国家仇視的原因。比較衰弱的国家会共同反对强大的国家，独立自主受到危害的国家会共同反对侵略者，在海上缺少出路的国家会共同反对海軍强国，在工商业方面有缺陷的国家会共同反对企图壟断工商业的国家，半开化国家会共同反对文明国家，君主国家会共同反对实行民主或部分民主政体的国家。

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某一时期可以与意向及利害关系相同的那些国家結为同盟，以反抗在这些方面同它們相冲突的国家。但是意向与利害关系彼此之間的冲突是錯綜复杂、变化不定的，因此同盟关系也随时会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間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以变成敌人，反过来也是这样；只要牵連到了某些重大的利害关系或原則，它們彼此之間不論原来是友是敌，就会互相抵拒，或互相靠攏。

各国之間的势力均等这一点应当是一个終极目的，这是政治家們所久已认識到的。但是我們时常听到的所謂維持欧洲均势这种說法，实际上的含意并沒有别的，只是弱国对于强国的侵略，企图加以限制而已。然而人們往往把它們的眼前目的与最終目的相混淆，反过来也是这样。

国家政策的当前任务总是在于要看清楚，当牵涉到种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因而要进行締結同盟与謀求均势的活动时，在哪一点上是眼前最迫切的；为了达到在这一点上活动的目的，所有别的問

題都可以暫时擱开，不加考虑。

当欧洲各王朝、君主与貴族的力量結合起来，共同对抗 1789 年的革命潮流时，关于权力与商业方面的一切問題都置之度外，它們的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法兰西帝国所采取的方針不是革命而是征服，这种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

拿破侖企图通过大陆制度成立大陆联盟，来反抗英国海軍与商业的优势力量；但是他在这方面要想获得成就，必須首先設法解除欧洲大陆各国在被法国征服这一点上所存的疑惧心理。他失敗了；因为各国对于他在大陆上所占优势的恐怖、畏惧，大大超过了海軍优势使它們受到的損害。

法兰西帝国瓦解以后，大陆联盟的目标也就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大陆各国就不再受到革命潮流与法国征服欲这两方面的威胁。但是当抵抗革命、抵抗法国征服的期間，英国在工商业、海运事业、殖民地經营与海軍力量这些方面的优势却有了大大提高。从这时起，大陆各国所注意的，又一变而为联合法国，共同向那个商业与海軍的优势力量作斗爭。但只是由于对过去来自法国方面的恐怖印象过深，因此对于一向同它們并肩作战的那个战友，沒有能充分提高警惕，这就造成了前門拒虎、后門进狼的局面。神圣同盟是一个政治上的錯誤。

这个錯誤，通过意大利革命，也給它自己带来了懲罰。神圣同盟不必要地引起了一个已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长时期內不会再起的反对力量。对大陆各国說来很僥幸的是，七月王朝竭力設法平息了法国的革命潮流。法国为了七月王朝的利益，为了巩固君主立宪政体，与英国訂立了同盟关系。英国訂立这个同盟是为了保持它的商业优势。

当法国覺得它的七月王朝和君主立宪政体基础已經充分稳固

的时候，英法联盟就不复存在；一方面法国对于海运、海軍力、工商业与国外殖民地，則又成为当前注意的問題。显然，法国在这些問題上与大陆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时七月王朝如果能使国家行政各部門的意見趋于一致，把那些由革命运动激起的領土問題擱开，竭力安定人心，消除大陆各国对于法国的革命与侵略意向的恐怖心理，那么怎样建立大陆联盟，共同抵御英国的海軍优势，就会成为当时的主要問題。

但是当时居于欧洲中心地位的这个国家，从来就沒有能負起天然宜于由它担当的任务，这就成为欧洲大陆进一步团結的莫大障碍。这个欧洲的中心部分，凭着它的地理位置，凭着可以消除邻国恐惧侵略心理的中央宪法，凭着宗教自由和世界主义精神，最后，凭着它所具有的文化与权能，关于各国領土的划分、政体的原則、国家的独立自主与权力这一切問題，原来是可以成为欧洲大陆东部与西部之間的調解人的；但是它当时却成为东部与西部各国争攘的根源，各方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而它自己則由于国内缺少团結而奄奄不振，它的意向所在，倏而偏于这方，倏而偏于那方，也始終举棋不定。

这时德国如果能把它自己与它所屬的沿海地区，以及与荷兰、比利时、瑞士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商业与政治的統一体，如果这个强大的国家机构，能够使彼此可以相容的代議政体与当时的君主及貴族利益融合一致，那么德国就可以使欧洲保持长期和平，并可以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大陆联盟中心。

英国的海軍，即使不以船只数目論，也在战斗力上远远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因此海上势力較弱的各国，只有把它們的海軍力量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在海上敌得过英国，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由此可見，每一个在海軍力量上較弱的国家，对于所有其他情况相类国家海軍的維持与发展，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其他国家的各

个部分过去一直是分裂的，它們或者根本沒有海軍，或者即使有也极其微弱，所以应当把自己組織起来，构成一个联合的海軍力量。談到对付英国的問題，假如俄国的海軍力量有所削弱，在法国与美国方面就要遭受損失，反过来說也是一样。假使德国、荷兰与比利时构成一个共同的海軍力量，对它們来說就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彼此分离，在英国优势力量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随从，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加强对这个海軍优势国家的抵抗力量。

这些力量較差的国家所有的商船，只能适应自己国际貿易上的需要，沒有一个是有余力的，也沒有一个在工业上的力量能够大大超过其余国家。因此它們之間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其余国家的竞争。但是它們对于英国力量足以压倒一切的竞争，却有着自卫的共同利害关系。英国的优势工业力量向来是通过荷兰、比利时与汉撒城市进而控制大陆市場的；因此怎样使英国失去这些通道是它們所必須共同注意的一个問題。

由于輸入热带产品时主要是用溫带的工业品来償付的，就是說前者的消費所依靠的是后者的銷售，因此每个工业国家都应当努力建立与热带地区的直接貿易关系。如果次一流的工业国家都能够认識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并且依照这一点所指的方向进行，那么就沒有一个国家在热带地区会占有范圍特别广大的殖民地，会在这些方面居于特殊有利地位。拿英国来說，如果它現在所努力以赴的目的能够实現，就是說它能够使印度生产它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在这样情况下它与西印度群島之間进行的貿易也仍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用工业品从西印度群島換取到的殖民地产品，以能够轉售給别的国家的数額为限。假使它不能把这些产品轉售給别的国家，那么西印度群島的占領对它就毫无用处。这时它要么任其自由，要么把这部分的貿易让給别的工业国家，除此以外，它别无办法。由此可以推定，所有海上势力較弱的国家遵行着这

样的政策并互相进行支援时，是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假使荷兰参加德国商业同盟，假使荷兰的殖民地与德国有了进一步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国家并沒有一个会受到損失。

自从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得到自由以后，工业国家企图以工业品直接交换殖民地产品时，就不必一定要在热带地区保有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得到自由的热带地区市場是自由的，任何工业国家只要具有在这些自由市場从事竞爭的能力，就可以同它們进行直接貿易。但是必須使这些热带地区普遍享有繁荣与道德、和平与安宁、法律秩序与宗敎自由，才能生产大量殖民地产品，消費大量工业品。因此，凡是海上势力較差的、尤其是沒有殖民地或即使有也极有限的那些国家，应当联合一致，使上述情况成为現实，这是它們共同的利益所在。对英国說来，它在商业上已經居于优势地位，这些地区的情况如何，对它的关系不大；因为在它自己独占的东印度群島与西印度群島的市場上，它已經获得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获得充分的殖民地产品的供应。关于极端重要的奴隶制問題，也必須部分地在这个观点下来加以判断。英国对于解放黑奴这件事抱有很大热情，其間含有很大成分的博爱与善良动机，这种热情使英国国民性格增添了很大的光彩，我們絕不抹煞这一点。但是我們对于英国关于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从它所产生的直接結果来考虑一下，就不能沒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其間还不免混杂着政治动机与商业利益关系。这些結果是：(1)黑人原来的情况是杂乱、散漫，与野兽生活相去不远的。突然获得自由以后，就迅速地轉变到高度的个人独立自主生活，結果将使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島热带产品的产量极度降低，最后甚至会減至于零。圣多明谷就是一个榜样，那里的千眞万确的情况是，自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被逐出以后，生产年年大量减低，而且还在继續

减退中。(2)自由的黑人不断地想多得工資,但是只願为了供应生活上最不可少的需要而劳动,因此自由的結果只是促使他們走向怠惰。(3)另一方面,英国在东印度群島拥有以殖民地产品供应全世界需要的丰富資源。我們都知道,印度人的性格旣勤恳耐劳,而且在飲食与其他欲望方面力求节制,尤其是由于宗教戒律禁止肉食,一般生活极为儉約;此外在那里存在的一般現象是:当地人民缺乏資本,土地对于蔬菜种植极度适宜,种姓的限制很严,寻求工作的竞爭很激烈。

这一切情况所产生的結果是,印度的工資同西印度群島与南美洲的相比,不論在后列两处种植园工作的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前者比后者要低得多;結果印度在开放了貿易并采取了比較开明的施政方針以后,它的生产势必有高度增长,从而使英国不但能从印度取得一切它自己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而且可以有大量余額运銷別国,这样情况的实現为时当已不远。由此可見,西印度群島与南美洲的生产降低以后,英国不会受到損失,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对那些地区也是有所輸出的;不仅如此,印度市場是英国独占的,它所需的工业品是全部由英国供应的,假使印度的殖民地生产事业因此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英国还能大有所得。(4)最后,我們可以說英国还有一种用意,它是要想借了解放奴隶这一事件对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各州造成一种威胁,这种解放运动蔓延得越广,美国黑奴企图获得自由的願望就越加受到激发,美国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如果我們凭着公正的立場来看一看这个問題,当可看出,这是在籠統的博爱主义动机下为了某些方面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这种博爱主义的尝試对于它們究竟是否有利却值得怀疑,至少可以說,对于有賴于同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島进行貿易的那些国家是不利的。这些国家可以很有理由地提出一系列問題。由原来的奴隶状态突然轉变到自由身分,对黑人本身来說,比維持現状是否

会更加有害？黑人現在已經习慣地处于几乎同牲畜一样的服从状态，要教育他們养成自願劳动与节約的习慣，这是不是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从奴隶状态到自由身分的过渡期間采行一种溫和的农奴制形式，开始时就对农奴所耕种的土地給予一定的利益，使他对于他的劳动成果能享有应得的份額，一方面让地主保有充分权利，从而迫使他保持着勤恳工作与遵守秩序的习慣；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如果从被奴役突然轉变到自由，势必造成大群游民，陷于貧困、烂醉、懶惰、邪恶、形同乞丐的状态，这就叫做自由的黑人，拿这样的情况与爱尔兰的悲惨境遇相比，就是那里最落后的状态也要算是繁荣与文明了；上述办法是不是比这样一种演变要値得想望些？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相信英国人的确具有誠意，要想使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能享有同他們自己同样的自由，他們在这方面的热情竟这样高漲，因此卽使对于事物的自然进展是不能越級冒进的这一点沒有能顾到，也必須加以原諒；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們就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几个問題。印度人四种姓中的最低阶級与美国黑奴比較，情况是不是更加悲惨，更加难以忍受？对于这种最悲惨的人，英国人的博爱精神却从来未曾有所激动，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的立法也从来沒有过問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利用这种悲惨状态想尽了一切方法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来，却从沒有想到怎样来直接改善这部分人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

英国对待印度的政策使我們想到了东方問題。卽使我們对于当前最关切的一切政治上的問題，例如关于領土糾紛，关于各王朝、貴族、宗教的利益，关于各国的情势等等，能暂时擱开，也不能不注意到，欧洲大陆各国在东方問題上共同有着重大的国家經济利害关系。各国現在虽然能暂时把这个問題尽量放在后面，但是这个問題必然会不断地以新的力量再度抬头。这是一切有思虑的

人久已得出的一个結論，认为象土耳其那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基础已經彻底破坏，就象一具僵尸，虽然由活人从旁扶持着沒有倒下去，終究还是要腐烂的。土耳其人的情形是这样，波斯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情形也都是这样。亚洲腐朽的文化只要与欧洲的新鮮空气一接触，就化为齏粉；現在印度已經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将来欧洲迟早会感到对整个亚洲也有負責保护的必要。在这样一些地区与民族的极度混乱中，沒有一个国家是值得或能够加以維持或革新的。因此，亚洲各国的全部瓦解看来是无可避免的；要使亚洲获得革新，唯一办法是注入欧洲的有生力量，普遍推行基督教，推行欧洲的道德律与秩序，实行从欧洲移民并采用欧洲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革新才有可能。

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从事于这样的革新时可能遵循的途徑，那么我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东方物产的富饒，那里的大部分有着丰富的天然資源，有大量的原料与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尤其是热带产品，足以供应欧洲工业国家，为了取得这些物資而进行交換时，就为欧洲工业开辟了无限广泛的市場。从这种情形看来，似乎是出于天意的指示，当从事于这样的革新时，同一般对未开化民族进行教化一样，所必須走的道路是工业品对农产品的自由交換。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各国首先必須牢牢遵守的一个原則是，不能容許任何欧洲国家在亚洲任何地区享有独占的商业利益，任何国家在那里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容許絲毫高出其他国家。如果东方的主要商业中心能够辟为自由城市，欧洲移民对当地統治者按年繳納税款以后能够享有自治权利，那就特别有利于这种商务的发展。但是我們还应当仿照英国在印度的政策，由欧洲委派事务官留駐当地統治者的所在地，他們关于促进治安、秩序与文化这些方面的意見，当地統治者必須听从。

还有一点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是，由地

中海到达紅海和到达波斯灣的两条航綫，既不应为英国所独占，也不应由于亚洲方面的蛮横而被阻塞。把保护这些重要据点的責任交托給奥国，对一切欧洲国家来說是最好的保証。

还有，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說来对于这样一个原則的維持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原則就是“自由船舶装运自由商品”；作为中立国家，它們所应尊重的，只是个别口岸的实际封鎖，而不是封鎖整个海岸綫的片面声明。最后，为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关于荒野的、无人的地区的占領原則，似乎应当加以修正。从前教皇可以把一些島屿或地球上的某些部分作为礼物，随意贈送，甚至用笔一揮，就可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把这一部分派給某人，把那一部分派給另一个人；这种現象現在看起来已經成为笑柄。但是現在的情形是，某人在地球上某处竪了一个杆子，上面縛了一块綢子，这个人对于整个这一地带的权利就能获得认可，这难道可以认为比上述現象更合情合理些嗎？假使島屿的面积并不怎样大，因此发現者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象这样的情况或者还可以认为是合乎常情的；但是当問題牽涉到面积不亚于欧洲一个大国那样大的群島（如新西兰），或者牽涉到比整个欧洲还要大的大陆（如澳洲）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类情形下，无非是通过了开拓殖民地方式而进行实际占領，然后由于地区的实际殖民地化，就可以享有独占权利，这难道是合于常情的嗎？德国和法国为什么对于这些距离英国遙远的地区就沒有权利建立殖民地，这我們就不明白了。

如果我們想到面对着英国在海上的优势，欧洲大陆各国之間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我們就会深信，对这些国家說来，就沒有比团結更重要的了，也再沒有比大陆战爭破坏性更大的了。近一世紀的历史还告訴我們，大陆各国彼此之間每有一次战爭，結果就必然使那个島国在权力、財富、工业、海运与殖民地占有各方面

的优势有所增长。

因此我們不能否认，拿破侖的大陆制度关涉到欧洲大陆需求和利益这些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我們也不能忽視，拿破侖企图实施这一計划(它本身是正确的)时的方式却違反了其他大陆各国的独立自主和利益。拿破侖的大陆制度有三个重大缺点，因此受到了打击。首先，它企图建立法国的大陆优势来替代英国的海上优势；它并不以其他大陆国家地位的共同提高与势力的彼此均衡为依据，而只是要使这些国家陷于屈辱地位，陷于土崩瓦解，使法国从中享受利益。其次，法国自己实行排斥其他大陆国家的商业政策，一方面却要求在这些国家里进行自由竞爭。最后，这个制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大陆各工业国家与热带地区之間的貿易，因此不得不使用代用品，作为这种国际貿易被破坏以后的补救办法。[①]

这种大陆制度概念将重新抬头，随着英国在工业、財富与权力这些方面优势的继續增长，大陆各国对这一制度的怀念将越来越深切，这一点現在已經很明显，此后将越来越显著。但同样肯定的是，只有法国具有充分远見，从而避免再蹈拿破侖的覆轍，只有这样，大陆各国联盟才能获得良好成就。如果法国倒行逆施，与一切公道及实际形势相違反，企图以德国为牺牲，扩張自己的疆域，从而迫使其他大陆国家同英国携手，这在法国方面将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行动。

如果法国要想把地中海看作是它自己的一个湖泊，要想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和南美洲取得独占势力，这种想法也同样是愚不可及的。

只有大陆国家彼此之間的自由結合，才能产生有效的大陆制度，由此发生的利益应当由参与者均等享有，只有以此为目的（也

① 这一事实，在儒諾夫人的«达布兰得斯公爵夫人传記»中已經証实——英譯本注。

就是只有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制度才能顺利进行；要使第二流海軍国家能获得英国海上优势的重視，从而不必借助于武力，就可以使后者对力量較差国家的合理要求有所让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走这一条路，再沒有别的办法。大陆工业国家只有靠了这样的联盟，才能与热带地区保持关系，才能在东方和西方主張权利，才能确保这些权利。

英国是处心积虑要保持它的优势地位的；当它看到大陆国家通过彼此之間的协定与条約关系，在工业力量上将相互提高，在海运事业与海軍力方面将相互加强，关于对未开化与未垦殖地区的教化与开拓以及与热带地区的通商，它們也将竭力主張它們生来应有的那一份权利，当它看到了这类情况时，无論如何是要感到不痛快的。然而，展望一下未来的形势，英国关于这些方面种种不利情况的顾虑，就应当可以完全消釋。

使英国上升到現在的崇高地位的同样一些原因，将使美国(也許在下一世紀)在工业、財富、权力方面增长的程度，胜过英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就象英国現在胜过小小的荷兰的情况一样。出于自然的趋势，美国人口在上述期間将积极增加，它的人口、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意志将傳布到整个中美和南美，就象現在傳布到邻近的墨西哥地区一样。所有这些辽闊地区都将包括在这个联邦以內，数以若干亿計的人民将从事于开发这样一片大陆的資源，这一片大陆，在区域范圍方面，在自然財富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西方世界海岸綫之长，河流之多，都大大超过了英国，在海軍力方面也将在同样程度上大大超过英国。

自然的趋势迫使法国和德国現在不得不从事于建立一个欧洲大陆联盟以对抗英国的优势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迫使英国不得不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以对抗美国的优势地位。到那个时候，英国在对抗美国的优势力量时，将不得不靠了它处于欧洲联合力量

的領导地位来寻求保护和安全，并以此作为它失去了的优势地位的补偿。

因此我們代英国設想，它应当見机在先，应当預知利害，早作准备，及时确立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它对自己只是在同輩中的一个老大哥这样一个身分的观念早早树立起来，这样是对它有好处的。

# 第三十六章　德国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

德国在科学与技术、文学与教育、国家行政与公用事业制度各方面都有高度成就，人口繁庶而且富有活力，幅員广闊，土质肥沃，在物质、社会与精神方面資源丰富，在农业方面有高度发展，德国人民有良好的德性与宗教心，勤劳儉朴，进行工作时有毅力、有耐心、而且富有創造精神；如果有任何国家可以认为有建立工业資格的話，那就是德国。

在与国家环境相配合的情况下采用保护制度，就可以使国內工业获得发展，国外貿易与海运事业获得增长，国內交通运輸設备获得改进，农业获得繁荣，并且可以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扩張国家的对外权力；如果有任何国家实行了这样的制度以后，可以认为有权利預期获得这样的效果，那个国家就是德国。

的确，我們敢断言，德国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它的前途所依靠的，就是它的保护制度的发展。只有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民族精神才能生根，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結出丰富的果实；只有在物质利益調和一致的基础上，精神力量才会涌現；也只有在这两者的共同基础上，国家力量才能产生。如果我們沒有国家，沒有使我們国家得以恒久存在的保証，那么我們这些人，不論是統治者或臣民，

貴族或平民，也不論是学者、軍人、市民、工业家、农业家或商人，我們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們要曉得，德国自己还不能紡制棉紗和麻紗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还沒有能从热带地区直接輸入它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用它自己制造的工业品来償付，还沒有能用它自己的船只来經营这类貿易，还沒有方法来保护它自己的国旗，还沒有完善的內河、运河和鉄路运輸系統，德国关税同盟还沒有能把所有德国濱海地区以及荷兰与比利时包括在內；只要这样的情况沒有改变，德国保护制度就不能說是充分达到了它的目的，只能算是在极其欠缺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部分任务。关于上面列举的各項，前已在本书各章分別論及，这里只須扼要地再提一提。

如果我們从埃及、巴西和美国輸入原棉，在那样情况下，就能用自制的工业品来償付；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而从英国輸入棉紗，就得用原料与食物来償付（这些东西我們是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由自己来加工，自己来消費的），否則就不得不用現金来償付；現金是我們在别的方式下得来的，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用它来采购国外原料，由我們自己来加工，或购买殖民地产品，由我們自己来消費。

同样的情况，如果我們自己能用机器紡制麻紗，那就不但能使国內的麻布消費增加，使农业获得改进，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我們对热带地区的貿易。

就上述棉与麻两种工业以及毛紡織业来說，我們所处情况的有利，并不亚于任何别的国家，我們有的是未經利用的水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与低平的工資。我們所缺少的只是一件，我們的資本家投資以后是否会受到亏損，我們的技术工人学得了本領以后是否会沒有工作，还缺乏保障。假定在此后五年內实行有节制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保护税率，然后再酌量情形，降低到百分之十五

到二十，这样就应当可以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反对这样的措施、支持价值理論的論点，都已經被我們駁倒。另一方面，我們还可以加上一个有利于这个措施的論点，卽上述这些工业的重要部門，特别有利于促使我們建成广大的机器工业，培养出大批有能力的技术教师和有实际經驗的技工。

关于殖民地产品貿易，德国应当效法英国和法国的先例，遵守这样一个原則，卽，当我們购入所需的殖民地产品时，对于向我們购买工业品的那些热带地区，应当优先考虑；或者，說得簡单些，就是**我們应当在向我們购买的那些地区购买**。我們对西印度群島与南北美洲的貿易就屬于这种情况。

但是就我們对荷兰的貿易来說，現在还不是屬于这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对我們供应了大量殖民地产品，而向我們购入的工业品数量，却少得不成比例。

然而在荷兰方面，它将殖民地产品的大部分向德国市場运銷是合于自然情势的；英国和法国在它們自己的殖民地和屬国既保有独占的工业品市場，因此它們所需殖民地产品大部分势必向那里取給，对于荷兰的殖民地产品只能作少量的輸入。

荷兰本身幷沒有大工业，可是它的殖民地却有着很大的工业上的生产力，近来这方面的力量已經大大增长，此后也許还要作規模更大得多的增长。但是荷兰一方面希望将它的殖民地产品大部分銷售給德国，另一方面关于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却希望向它所最喜欢的任何地方去采购；如果它能正确地认識到它自己的利益所在，它就应当看到这样做法不但对德国有欠公道，而且对它自己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表面上看来有利的、目光短淺的政策；因为如果荷兰本国和它的殖民地对德国工业品都能給以特惠待遇，德国对于荷兰殖民地产品的需求，将随着德国工业品在荷兰及其殖民地銷售的增长而作同等程度的增长，或者，也就是說，

德国对荷兰售出的工业品数額增长以后，向荷兰购入的殖民地产品数額也将作同等程度的增长，荷兰向德国购入工业品能增加多少，它对德国售出殖民地产品也就能增加多少。如果荷兰将它的殖民地产品售予德国，而关于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却向英国购买，那么上述的相互交换行为就无法实現，因为英国不論銷售給荷兰的工业品是多少，它自己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大部分是必然要取給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或屬国的。

因此为德国的利益着想，它有必要向荷兰要求实行有利于德国工业生产的特定差別关税，从而使德国在荷兰及其殖民地能保有独占的工业品市場；否則，当这样的要求被拒絕的时候，德国对荷兰殖民地产品的輸入，就应当征收差別关税，使中美、南美以及西印度群島自由市場的产品获得优惠待遇。

上述办法是誘使荷兰参加德国关税同盟的最有效手段。

按照現在的情况，德国并沒有理由为了对荷兰貿易关系而牺牲自己的制糖（甜菜糖）工业；因为只有当德国对这一商品的需求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时，让热带地区通过交换貿易来供应，才会比它自己在国内生产更为有利。

为德国設想，当前首先应該注意的是如何扩大对北美、中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島自由市場的貿易关系。关于这一点，除以上談到的以外，似乎还应当考虑以下几項措施：在德国口岸与上述各地区主要口岸之間建立經常的航运业务，鼓励向这些地区移民，巩固与扩大这些地区与德国关税同盟之間的友好关系，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促进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

近来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經常航运关系的建立是多么有助于大規模商业的促进。法国和比利时在这一点上已經在模仿着英国人的先例，它們深曉得，任何国家关于这种比較完善的交通运輸工具如果落后于別国，它的国外貿易就必然要衰退。德国的一些

口岸已經认識到这一点，在不来梅已經組成了一个公司，准备造輪船二、三艘，用于对美国的通商。但这样一点設备显然是不够的。德国的商业利益所要求建立的經常航运路綫，不只是限于美国，尤其不只是限于美国的紐約、波士頓、却尔斯登和新奥尔良，而且要扩展到古巴、圣多明各、中美和南美。德国关于上述末了几处的航运事业不应当落后于任何国家。这里我們不应忽視的是，建設这类事业所需要的資金过于巨大，不是单靠了民間的企业精神所能胜任的，恐怕也不是一些德国口岸本身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在我們看来，要使目的得以实現，还得仰仗关稅同盟各邦的慷慨資助。这类資助办法以及有利于德国航运业的差别关稅所形成的大好远景，应当成为一个有力的动因，促使这些口岸及时加入商业同盟。我們試想一想，通过这样的措施，关稅同盟各邦在工业品輸出、殖民地产品輸入、因此也在关稅收入方面，将有如何高度的增长；当我們想到这一点时就会深切体会到，为了实行这一措施，即使化了巨大費用，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資本的再生产投資，丰富的收益是可以預期的。

由于德国与上述各地区交往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有些德国人就会大大地获得鼓励移居到这些地区，并安居下来，做当地的公民；那时靠了航綫的确立，就已經为他們在商业方面的发展前途打下了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关稅同盟各邦应当在各处多設領事館或外交机构，使各地德国公民的移民工作和所經营的事业便于推进，尤其要尽力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各邦，使它們的政局稳定，文化程度得以逐步提高。

有些人认为对德国殖民事业来說，美洲的热带地区不及北美的溫带地区为有利；我們絕对不能贊同这样的意見。我們对于北美洲这个地方是非常爱慕的，我們并不諱言，作为一个德国移民，就他个人来說，他带着微薄的資本，到北美洲西部去創业时，的确

有較大的成功希望，我們对于这一点很难否认，也不願否认；但是尽管如此，这里仍然不能不說明我們的意見，我們认为向中美和南美移民时，如果領导得好，并且大規模进行，那么站在国家的立場上看来，比向北美移民对德国的利益要大得多。如果在北美的移民发了大財，这对德国又有什么好处？就他們个人来說，他們同德国国家的关系就此永远脫离；就他們的物质生产方面来說，德国也只能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細微的收入。如果有人认为德国人在美国內地久居以后，可以保持德国語言，或者說是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也許可以在那里建成純粹的德意志联邦；这完全是梦想。我們曾經有过这样的幻影，但是經过在这个国家作了十年的就地观察以后，已經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論哪一个国家，在語言、文学、行政与立法这些方面总会发生同化作用的，尤其是美国；能有这种情况是好的。不論現在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有多少，可以肯定地說，其中沒有一个人的孙子、曾孙将来会喜欢德語而不喜欢英語的；这只是由于一个极其自然的原因，在一切有教养人士的口中，在文学、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各行各业中所使用的都是英語啊。过去法国的新教徒雨格諾派在德国，以及法国人在路易斯安那所发生的情形都是这样，德国人在美国能够而且势将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們出于自然趋势，是一定要同人口中的主流混合在一起的；他們有的与同国人相处得亲密些，有的疏远些，但是迟早总是要与当地人口中的主流合而为一的。

就北美西部的情形来說，要想那里的德国移民与德国保持积极的交往关系，那就更不可靠。最初定居下来的移民，关于他所需的一切衣着和用具，大部分总不得不靠他自己来制作；这只是出于不得已而形成的風气，大都在第二代、第三代里将继續下去。因此美国本身生来就是要努力于工业的一个国家，它将越来越积极地努力使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工业品据有本国市場。

但我們并不因此就认为，特别是对德国来說，关于工业品美国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市場。正相反，我們认为就許多奢侈品和运輸上便利的、劳动工資构成价格中主要因素的那些工业品来說，美国是头等重要的市場之一，对德国来說，这样一个能吸收上述工业品的市場的重要性将逐年增长。这里我們所要說明的只是这一点，移殖到北美西部的那些德国人，对于德国工业品在北美銷路的扩大，并不会有多大帮助；如果进行移民为的是这一目的，那么我們对于向中美和南美移民就应当更加注意，予以进一步积极的直接鼓励。

上述各地区，包括得克薩斯，大部分是适宜于生产殖民地产品的。这些地区在工业方面不可能有巨大发展。这里是可以爭取的一个嶄新的、宏大的工业品市場；誰要是在这里树立了牢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关系就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些地区自己并沒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可以把自己提升到較高文化阶段，实行秩序井然的政治制度，并使之持久稳定；它們将越来越感到有借助于外力的必要，实現这一点的方式就是移民。这里所憎嫌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这是由于他們的妄自尊大，也是由于关涉到国家独立自主这一点的猜忌；而德国人的情况正相反，他們是受到欢迎的。因此德国关税同盟各邦对于这些地区应当全力地予以最密切的注意。

德国在这些地区应当建立有力的領事与外交系統，系統中的各分支机构应当互相通信联絡。应当鼓励青年探險家到这些地方去游历，把他們的所見所聞作出不存偏見的报告。应当鼓励青年商人到这一带去考察，鼓励青年医务人員到这一带去行医。应当在德国各口岸創立經营各种业务的公司，通过实际股份的认购来支援它們，并特别加以保护；这些公司有的可以在上述这些地区收买大片土地供德国移民安居，有的可以經营商业和海运事业，为德国工业在这些地区开辟新市場，建立輪运航綫，有的可以經营采矿事

业，从而利用德国的科学知識与工业力量以开发这些地区的大量矿产資源。德国关税同盟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博得这些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尤其要以此为出发点，从事于改进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輸設备、公共治安与秩序；的确，如果靠了这样的活动，能够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受到我們的照顾，我們就应当毫不迟疑地把有力的輔助軍团派去帮助它們。

我們对于东部一带——欧洲部分的土耳其与多瑙河下游地区——也应当执行相类政策。这一带治安与秩序的稳固維持对德国来說是极关重要的，德国人民移殖到这些地区，在个人方面既最易于实行，在国家方面获得的利益也最大。居于多瑙河上游的个人，当他迁移到摩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塞尔維亚或黑海西南沿岸一带时，在金錢和时間方面的消耗，比較迁居伊利湖沿岸地区时所消耗的，只占五分之一；而对居民个人来說，后者却有較大的吸引力，这只是由于后者在自由、治安和秩序各方面的情况都超过了前者。但是在土耳其目前情况下，如果由德国各邦与奥地利联合一致来努力改进上述那些地区的社会情况，从而使德国移民对那些地区不致再感到难以定居，那么这一点应当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各邦政府自己能参加活动，創办殖民事业公司，并不断加以支援，那么进行时就更加順利了。

同时，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德国工业品与移民們的农产品进行交换时不可有任何阻碍，并且要享有便宜而迅捷的交通运輸設备；只有这样，这种类型的移民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才会发生特殊有利的影响。因此为关税同盟各邦的利益起見，奥地利应当竭力促进多瑙河上的直达运輸，使这条河上的輸运业务大大活跃起来，当然，兴办这类事业，在开头时各邦政府应予以資力上的支援。

等到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有了相当发展，所处地位与奥地利已大致相等时，关税同盟与奥地利双方对于它們的工业产品就应

通过訂約方式取得进一步协作，这样的发展形势是最值得想望的。

这样的条約訂立以后，在如何利用土耳其地区，使之有利于关稅同盟各邦与奧地利的工业及国外貿易的发展上，双方就会发生同等的利害关系。

在德国各口岸与荷兰尙未加入关稅同盟以前，最好是普魯士現在就开始行动，采用統一的德国商业旗帜，为将来建立德国艦队打下基础，关于在澳洲、新西兰或大洋洲其他島屿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建立德国殖民地，普魯士在这方面应当着手試探。

关于这类試探与开发工作以及我們在上面所推荐的、认为值得进行的各种事业与补助办法是需要資金的，取得这項資金的办法必須仿照英法的先例，它們支援国外貿易与殖民事业以及維持强大艦队所需要的資金是怎样取得的，我們也应采取同样步驟，那就是对殖民地产品征收进口稅。在上述各种措施的进行中，关稅同盟各邦如果把其中有关北方与海外方面的指导事务的权柄交托給普魯士，把有关多瑙河与东方的指导事务的权柄交托給巴伐利亚，这样的安排必然能有利于工作的进行，使行动能趋于一致，有条不紊，而且有充沛力量。如果就現在对工业品与殖民地产品所征的进口稅提高百分之十，每年就可以有一百五十万的資金供关稅同盟支配。而且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此后由于工业品輸出的不断增长，在相当时期內，关稅同盟各邦对于殖民地产品的消費，将比現在数量提高一倍到两倍，它們的关稅收入也将有同样的增长；在这样情况下，关稅同盟各邦如果能立下一个原则，即**将来所有超过增加百分之十的进口稅余額中也应当留出一部分**，供普魯士政府进行上述各項措施时支配，則上述各項措施所需的資金就可以有充分的准备。

关于建立德国交通运輸系統，特别是德国鉄路系統，我們另有专著討論这个問題，請参考。总之，这个偉大事业在进行过程中就

可以靠它本身的力量来支付一切费用，我們对各邦政府所要求的，說到底只是一点——活力。

# 英譯本附录

## 附　录　一

李斯特的关于英国对欧洲大陆盟国的金錢补助发生了这样一些影响的說法，看来也未尝沒有一些事实依据。任何資本从一个国家移轉到另一国家时（除非是富裕国家之間現有証券的单純移轉），归根到底，总是要以商品为主要形式来完成的。英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有一个时期曾有非常大的增进，从而使我們的繁荣有了"飞跃"进展，这种現象很可能是由于英国資本家对外国政府給予了巨額貸款(尤其是在 1850 年到 1870 年間)。这样說来，英国支出的那些补助金，根据所发生的作用而言，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对英国生产者发給的一种"奖励金"，就象李斯特所說的那样。但这种补助金完全是給予从軍者的贈品，而随后給予那些不履行償債义务的或破产的国家的貸款，其性质也是如此(虽然不是出于自願的)，这类贈品以后是沒有利息收入的。受到李斯特埋怨的那类"奖励金"，即使能使英国工业家获得一时的利益，却使英国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表現在国債的累增上)。由于上述貸款关系，英国工业近来有了一时的"飞跃"进展，但是英国的国外証券持有人所付的代价也是同样沉重的。

## 附　录　二

关于国家在公众同意下对个人在各个行动中的自由的干預，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曾就中举出了一些例子，現轉录如次：

国家为防御外来侵略，預作准备。

它办理与外国訂立条約事宜。

它維持国內和平与秩序。

它規定并貫彻执行婚姻制度，因此是家庭关系、家庭責任、家庭感情和家庭教育的基础。

它制定并保护財产所有权。

它管理关于財产所有权的移轉。

它規定由公路經过或使用公路的那些地区承担修理公路責任。

它責成各州各县建造并修理当地桥梁。

它維持各口岸和港灣。

它办理国家海岸綫的測量与照明工作。

它鑄造貨币并禁止对这一专利权的干犯。

它管理凭票付款期票的签发。

它規定統一的計量制度，并禁止任何其他計量制度的使用。

它担任通过邮政傳递消息的工作。

它凭了专利法与版权法，采用在一定期限內享有专利的形式，对創造才能的努力給予奖励。

它对不論哪一种取得专利权的发現或发明，要求作出公开的詳細說明，从而防止秘訣不肯公开或随着发明人的死亡而泯沒的流弊。

它对于法人团体取得財产时加以约束。

它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禁止无数种有害于公众的事物，并随时設法去除。

它通过檢疫規章，防止傳染病流入。

它負責管理城市清洁工作。

它規定出租車辆的車費并管理駕駛員。

它防止天花傳染并推行預防注射。

它管理破产者財产的分配事宜。

它設法維持貧困者的生活。

它宣布冻結財产到身后二十一年以上的一切企图均屬无效，从而禁止永久占有行为。

它虽然承认宗教自由，但国内应当有确定的信仰和崇拜，使大众的德性和幸福可以有所支持与指导，它对于这一点也并非完全不顾。

以上是政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干預。但还有一类干預，为的是对无能的或无經驗的个人进行保护，举例如次：

它規定未成年人不受契約拘束，从而保护他們的身体和財产；它保护已婚妇人；保护身心不健全的人；多方面保护殘廢的貧困劳动者。

它禁止实物工資制度。

它限制矿井及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

它对典当业进行管制，压制高利貸，并对贖取手續給予方便。

它禁止使用不正当的計量制，象在前面所已經說到的，对違反者并加以懲罰；并禁止販卖有碍健康的食品；禁止在咖啡、烟草、鼻烟、啤酒、茶叶、可可、巧克力与胡椒中搀假。

它为防止欺詐，規定关于执行遺囑的程式。

如果金錢契約附有处罰条款而立約的一方无力如期偿还欠款，国家禁止实行此項罰則。

一个买主，当他购买金銀制品时，对制品所含金銀是眞是伪以及成色是否准确，他是无法識别的；这时国家就对他起了帮助作用，規定这类制品須附有公务人員的檢驗标記。

某人买进酒花一袋。他未必能打开来亲自檢查质量是否均一，是否与所說的相符。这时国家就出来干預，規定在标志或包装

方面如有詐伪，应受处分。

律师送来一張賬单，但收費是否符合常規，是否公道，当事人是无法辨别的；这时国家就出来干預，設立专員管理，他对于浮收濫报等情况不但有权可以糾正，而且可以处罰。

国家規定医务人員与律师必須受过专門教育。

以上不过是就国家对个人自由进行干預的方式方法举几个例子；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些几乎是一切政府都认为应当干預的。

所謂政府干預，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只是整个社会智力与权力对于某一点的集中行动；为了全体的利益，出于共同的願望，确定某些是应当做的，某些是不应当做的。—— 一位律师（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关于自由貿易詭辯的探討》，1870 年。

## 附 录 三

李斯特竭力反对对谷物与其他农产品征收保护关税的意見，认为这类措施对于象德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沒有任何利益；他的这种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他写作的时候（1841 年），德国农产不但足以充分供应它本国人民的需要，而且长时期以来就經常有很大余額可以輸出到别的国家。当时欧洲并沒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将这类产品有利地运銷德国；至于距离較远的国家，由于当时运費高昂，海洋輸运事业尚未建立，要将这类产品运銷德国就更加談不到了。

关于农产品的自由輸入，作为一个純粹政策問題，是否应予贊同姑且不論，不过李斯特把他的这一論点說成是一种普遍原則，而他所依据的显然只是他本国当时的情况，这一点跟他的国家經济学一般理論所依据的其他一些論点却很难认为是一致的。这个論

点，就它本身来說，作为对英国当前問題的一种解决办法，也不能认为是确切无疑的。英国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实行农产品无限制輸入政策，势必使国内很大部分的土地陷于荒蕪，使这部分土地耕作者失去他們的原有工作，使国家在食物方面将大部分有賴于国外的供应；至于对本国农产加以适当保护的政策，則可使国內土地的耕种得以继續維持，并大大减低国家在食物方面对国外輸入的依賴程度；那么究竟是自由輸入政策还是保护政策能最有效地促进国家利益，就大有商討余地了。从他的論点不如說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即某一政策对某一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对处于完全不同情况的另一国家則可能有害，尤其是对处于国家历史某一阶段的人民可能有利，在另一时期就可能是不利的；現在德国政府似乎就抱有这样的見解，关于农产品輸入，它近来已經恢复了保护政策。

有些人似乎贊成适度的保护政策，把它当作一种相互之間的保証，使本国勤劳的生产者，在自己市場上可以同不屬于那个国家的生产者的竞爭势力相对抗。还有些人贊成这个政策，是把所征收的保护关税，看成是要求外国生产竞爭者对征税国家岁入所提供的一种捐献，以此作为允許他在这个国家的国內市場同它本国生产者相竞爭的条件，它的本国生产者在税务上是有許多負担的，而作为一个外商，除上述捐献外，是沒有这类負担的。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对于在后一目的下征收保护关税也表示贊同，认为国外輸入产品在税务上的負担如果的确較輕于同类的国內产品，就应当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4部分，第2章。)

如果本书作者上述的那些見解施之于工业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話，那么他似乎并沒有清楚地举出理由，說明为什么他所承认的那种最主要的生产事业(所使用的資本，参加的人数，比任何别的生产事业还要大，还要多)，为了事业的順利經营需要保护时，就不应

当受到与工业同样的适当保护。

但是关于保护关税原则，全面的或单独施之于工业的，不論是否贊同，我們根据亚当·斯密的学理似乎可以得出两点推論，而这两点似乎李斯特也并不否认。第一，如果为了国家利益，认为本国农业在本国市場对国外农业有处于自由竞爭地位的必要，那么，那些特殊地或过分地压迫着本国农业的种种税收，不論是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就应当一概蠲免。第二，我們由各国輸入商品时，这些国家有的对于我們运往的商品加以限制，有的則不加限制；如果处于这样的情况，我們就有理由对前一类国家輸入的商品征收差別关税。

## 附 录 四

許多人认为，近几年来英国的实际情况足以駁倒李斯特在这一点上的理論。根据紀录，英国輸入超过輸出的价額，由 1869 年的五千八百万鎊增加到 1883 年的一亿二千一百万鎊。

这种情况对国家福利所发生的影响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因此也就是說，李斯特的論断在大体上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要得出准确結論，主要由于两种需要考虑的事实而感到困难。第一，英国直到几年以前，甚至在現在，仍然保有投放在国外的大量資本，由此滋生的股利或利息，如果不重新在国外投入作为資本，就势必要使英国輸入紀录增长。第二，我們关于英国工业品在国內的生产或消費沒有統計数字，关于农业生产也只有不完全的統計。因此关于英国目前的巨額入超，它所体現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原有資本項下每年所得的利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外劳动产品在自己市場上代替了本国劳动产品，簡直无法加以严格确定。

上述两个因素中前一因素如果可以証明是存在的，那么就这

一点而言，經过这样解釋的入超是特殊的，是不正常的，同时也証明与李斯特的主張的一般眞实性并沒有什么抵触。

但即使这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事实上很难相信是这样），即认为我們的利潤較少的入超部分，全部是出于国外投資的收益，这項收益是用輸入商品方式到达我們这里的，那么这样輸入的这类收益的直接影响，如果是侵夺或降低了本国生产的話，将使国家受到損失，任何說成是由于入超而使国家获得的利益，也将由此大大抵消。

假定全国在国外各种各式的投資总計达十亿鎊，每年可以有五千万鎊收入，这項利潤如果不在国外重新投作資本，无疑即将以輸入商品方式到达我們这里，滲入整个社会，这种商品如果主要是各种貨物或产品，就势必侵夺本国生产事业，我們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

如果流到我們这里的这类利潤，在形式上只是我們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或工业上需要的原料，或者还可以认为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在形式上是食品或其他在本国可以生产的物品，結果只是把本国生产者的主顾轉移給国外生产者，那么即使就眼前来說，是否有利也有疑問，若从前途着想，看来对社会是絕对有害的。

# 譯名对照表

## 〔三　　画〕

凡·标倫　Van Buren

## 〔四　　画〕

不来梅　Bremen
巴麦斯頓　Palmerston
巴拉登　Palatine
巴拉圭　Paraguay
巴登　Baden
比吉洛　Bigelow
比斯开灣　Bay of Biscay
比薩　Pisa
夫拉維欧·基欧　Flavio Guio
戈塔　Gotha
厄勒塞拉　Ereceira
牙买加　Jamaica

## 〔五　　画〕

瓦拉几亚　Wallachia
瓦根海姆　Wangenheim
瓦倫西亚　Valencia
加勒比人　Caribeans
加第斯　Cadiz
卡拉克　Karrack
卡斯尔累　Castlereagh
卡斯提尔　Castile
卡斯特罗綽·卡斯特拉卡尼　Castruccio Castracani
卡塞耳　Cassel
布什尔　Bushire
布列塔尼　Brittany
布劳恩施魏克　Brunswick
布劳比侖　Blaubeeren
布拉奔　Brabant
布朗基　Blanqui
布累撒丁諾，馬科　Brasadino, Marco
布魯日　Bruges
布魯姆　Brougham
圣西門　Saint Simon
圣多明各　San Domingo
弗吉尼亚　Virginia
皮埃尔，圣　Pierre, St
古尔耐　Gourney
尼科尔森，希尔德　Nicholson, Shield
卢加　Lucca

## 〔六　　画〕

亚丁　Aden
亚尔多納　Altona
西季威克，亨利　Sidgwick, Henry
西斯蒙第　Sismondi
西塞罗　Cicero
安的列斯群島　Antilles
安娜　Anne
托利多　Toledo
托倫斯　Torrens
托斯卡那　Tuscany
达夫南特　Davenent
达姆斯塔特　Darmstadt
达律　Daru
艾希利　Ashley
百慕大群島　Bermudas
吉耳平　Gilpin

伊甸 Eden
伊凡·瓦西里哲維奇 Evan Wassilijewitsch
合恩角 Cape Horn
迈宁根 Meiningen

〔七 画〕

麦克洛克 McCulloch
麦克弗森 Macpherson
麦迪逊，詹姆斯 Madison, James
麦克奎恩 Mc Queen
麦修恩，保罗 Methuen, Paul
里夫斯 Rives
里加 Riga
里舍留 Richelieu
杜平根 Tübingen
杜閣 Tuygot
杜潘 Dupin
佛罗倫薩 Florence
坎宁 Canning
坎貝尔 Campbell
克力門 Clement
克宁汉 Cunningham
克利奥尔人 Creole
沙忒尔 Chatel
沙普塔尔 Chaptal
伯克 Burke
庇特，威廉 Pitt, William
貝托里 Bettori
貝奇奥 Pechio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沃德耳 Wardle
利文斯通，爱德华 Livingstone, Edward

〔八 画〕

杰克逊 Jackson
杰斐逊 Jefferson
阿卜都拉曼 Abdulrahman
阿扎拉 Azara
阿尔及尔 Algiers
阿司堡 Asberg
阿西安托 Assiento
阿伯丁 Aberdeen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馬斐 Amalfi
罗西 Rossi
罗伊特林根 Reutlingen
罗威尔 Lowell
罗得島 Rhode Island
波士頓 Boston
波托貝洛 Portobello
波特尔 Porter
波旁王室 Bourbons
居尔特人 Celts
居諾 Junot
拉布谢尔 Labouchere
拉法夷脫 Lafayette
法兰克福 Frankfort
法兰德斯 Flanders
舍拉，安东尼 Serra, Antonio
卑尔根 Bergen
帕拉斯 Pallas
雨格諾派 Huguenots
刻普勒 Kepler
松德（海峽） Sound
庞巴尔 Pombal

〔九 画〕

英格索尔 Ingersoll
科尔伯特 Colbert
科布 Kolb
科布登 Cobden
科隆 Cologne
查尔廷 Chardin
查坦 Chatham
查默斯 Chalmers

威利　Verri
威悉（河）　Weser
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勃艮第　Burgundy
柏卡里亚　Beccaria
南卡罗来納　South Carolina
柯苏士　Kossuth
律貝克　Lübeck
耶納　Jena
美因兹　Mayence
哈勒　Halle
拜尔斯　Byles

〔十　画〕

馬丁　Martin
馬扎蓝　Mazarin
馬歇尔　Marshall
馬基雅弗利　Macchiavelli
馬德拉群島　Madeira
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格伯利族　Guebres
格拉那达　Granada
格恩济島　Guernsey
格鲁吉亚　Georgia
埃尔富特　Erfurt
埃弗雷特　Everett
埃克斯毛思　Exmouth
烏耳姆　Ulm
烏洛阿　Ulloa
烏斯塔里兹　Ustaritz
海华德　Hayward
海林　Heylyn
特洛伊　Troy
特納里夫島　Teneriffe
庫夫斯泰因　Kufstein
庫柏，托馬斯　Cooper, Thomas
哥尔多华　Cordova
哲尔济島　Jersey
納克　Necker
桑度　Sandu
根特　Ghent
紐倫堡　Nürnberg
爱奥尼亚群島　Ionian Islands
爱澤納赫　Eisenach
泰特　Tait
俾斯麦　Bismarck
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

〔十 一 画〕

梅迪奇　Medici
鹿特丹　Rotterdam
莫塞尔，賈斯特斯　Möser, Justus
基察第尼　Guicciardini
符騰堡　Würtemberg

〔十 二 画〕

菲兰哲里　Filangieri
斯瓦比亚　Swabia
斯托哈　Storch
斯图尔特　Stewart
斯特拉波　Strabo
斯特拉斯堡　Strasburg
斯宾塞　Spencer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斯塔普尔頓　Stapleton
費里尔，亚历山大　Ferrier, Alexander
費拉德尔非亚　Philadelphia
普立查德　Pritchard
普里斯特利　Priestley
傅立叶　Fourier
敦克尔克　Dunkirk
提罗尔　Tyrol
湯普森，波利特　Thompson, Poulett
喀德邻二世　Catherine II.

## 〔十 三 画〕

奥尔曼 Allman
奥尔登堡 Oldenburg
奥格斯堡 Augsburg
奥康奈耳 O'connell
塞哥維亚 Segovia
塞維尔 Seville
塞加西亚 Circassia
歇伐利埃，密歇尔 Chevalier, Michel
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新斯科夏（半島） Nova Scotia
瑙漠堡 Naumberg

## 〔十 四 画〕

魁奈 Quesnay
赫尔果兰島 Helgoland
赫斯启森 Huskisson
維莱耳 Villele

## 〔十 五 画〕

德拉韦 Delaware
德・威特 De Witte
德・莱可呂斯 De L'Ecluse
摩立尔 Morill
摩尔达維亚 Moldavia
魯文 Louvain
墨尔本 Melbourne

## 〔十 六 画〕

鮑尔文 Baldwin
鮑克尔斯，彼得 Böckels, Peter
鮑林 Bowring
諾夫戈罗德 Novgorod
諾思 North
諾曼底 Normandy
穆勒 Mill
賴默尔 Rymer
霍亨斯陶芬王室 Hohenstaufen

## 〔十 七 画〕

賽里薩，瑪丽亚 Theresa, Maria

## 〔十 八 画〕

薩尔斯堡 Salzburg
薩托留斯 Sartorius
薩依，尙・巴普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薩依，路易 Say, Louis
魏馬 Weimar